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68-3

83



国防大学 2 065 8616 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13-1468-3

I. 联…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②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364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第四卷

书名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著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市双桥威宁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955(千字)
版次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468-3/K·260
定价 精装 80.00元(全二册)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
究员)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МИНАР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1926—1927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
М. Л. ТИГ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1996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二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发表，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〇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人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函电，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等。这些文件记录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冯玉祥在北方的失败、北伐的开始、“三二〇事件”、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国共关系破裂等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演变过程，同时也暴露了它们试图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变成工农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并要在国民党各派保持联

盟情况下开展土地革命等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这些文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绍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6年上半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7年初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两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四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从略。另外，根据中国读者的要求，我们还补译第一卷译本略去的人名索引，与本卷译本人名索引合编在一起。为反映文件原貌，本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广东语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注明其姓名全称。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刘桂生教授、张注洪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奉献给读者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的第二卷，将续完第一卷^①对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第一个很长时期（1922—1927）对华政策的阐述，这个时期从战略策略方针的内容来看是统一的。这个时期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而首先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方式实行的。

收入第二卷的文件涵盖了从1926年初到1927年7月中旬，即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同武汉国民党之间关系破裂的这一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于1924至1925年间在苏联的积极支持下制订的并开始实施的军政计划，在国民革命军所进行的北伐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内部演变过程仍在继续并有了新的发展。群众运动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于保证国民革命军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首先是由于共产党

^① 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莫斯科1994年版。

人的积极工作，国民党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向长江进发和向华中华东一些大城市推进，以前在双方关系中就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又尖锐起来了。1927年春，当可以清楚地看出消灭主要地方军阀集团和统一中国基本领土已不是遥远未来的问题时，这些矛盾和冲突就特别地尖锐，因为需要解决由哪一种力量组合来决定未来国民党国家体制的性质问题。

第二卷的文件补充说明了这些冲突中的主要事件，即1926年的“三二〇事件”、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组织联席代表会议在广州的召开、1926年底1927年初对国民政府所在地的争论、在占领南京和上海前夕和期间展开的控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的斗争（这场斗争最后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分裂而告终），最后是同武汉政府发生的冲突（这次冲突是由于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试图将武汉国民党变成“革命的雅各宾”党并在其支持下发动土地革命而引起的）。

像在第一卷中一样，编者注意的中心首先是揭示文件集主题的文件，也就是揭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的政策及其理论和策略方针的文件，以及揭示对实现所提出的目标的途径的探索和苏联驻华代表的立场等等的文件。

正是考虑到这个主题，第二卷的材料分成几个与莫斯科的策略方针的探索和变换时期相对应的基本部分。

同时应当考虑到，这种策略方针的变换或侧重点在一些场合是与中国的实际事态发展有关（如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北方的失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叛变），在另一些场合则明显提出的为时过晚（如“三二〇事件”、北伐开始），或相反反映了往往脱离实际的主观意向（如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方针有关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各部分的引言指出了本卷文件为阐明主题，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同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部分决议的制订内情，以及苏联领导在这个时期的总的对华政策的内容及其演变提供了哪些新东西。本卷文件表明，中国的事态发展，国民革命阵营中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显示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变成工农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并在同国民党某些派别保持联盟的情况下开展土地革命。

莫斯科认为这个方针的破产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克服中国的半殖民地附属地位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方面迈出了明显的一步，是使中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变成有活动能力和有组织的力量的一个重要阶段。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合作才成为国内执政力量的。

1927年7月同国民党关系的破裂，意味着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的结束，并揭开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

策和国共两党历史的一个新的时期。

莫斯科宣布，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都是没有能力解决国民革命运动任务的“反革命力量”，它把“继续争取通过‘平民’途径，也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城市贫民联盟的革命进攻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党身上，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转入同所有与它相对立的力量公开对抗。

不久，这些表明莫斯科对华政策进一步“向左”转的新的估计和指导方针，变成了在中国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试图把这个方针实行到30年代中期。

本系列文件集后面几卷将专门阐述莫斯科在这个新的时期的对华政策。

*

*

*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自1920年初至1927年夏的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目标和实施方法，以及本卷的档案资料来源和对这个时期存在的历史“空白点”的说明（至今还没有找到所需要的文件来阐明这些空白点）——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重要方面在第一卷的绪论中都作了分析和说明，编者认为这个绪论乃是第一、二卷的总绪论。

这里不再重复这个绪论的基本论点，在第二卷的这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1927年7月13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版第141页。

个简短的前言中，只向读者说明选择本卷文件的原则。

同第一卷一样，本卷也是收录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档案文件。但也有例外，如不久前发现和发表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一些信件^①。这些信件披露了许多业已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决议的内情。发掘文件数量之多和这些文件的意义促使编者分两册出版第二卷，并编有统一页码。本卷容量很大，所以编者决定不仅收录一些很重要的但已发表过的材料（例如斯大林、布哈林^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和讲话）^③，而且还收录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很有意思的、但数量很大的中国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七、八次全会专门委员会的材料，以及联共（布）中央全会和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和农民国际的一些部和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材料。

除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管的主要一组材料外，第二卷还收录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几个文件。这些文件是根据我们的查询找到的，并由该馆工作人员盛情提供给编者的。

遗憾的是，不得不加以说明，有许多文件编者至今还没有找到（例如鲍罗廷和加伦给莫斯科的电报和报告），还有一些在已发表的材料中以某种方式提到的发给莫斯科的和莫斯科发出的函电也没有找到。

①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莫斯科1995年版。

② 《中国革命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

③ 《托洛茨基档案，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K. 费尔什廷斯基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一、二卷；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版；《托洛茨基论中国》，纽约1976年版。

编者不能不重提总绪论结尾部分谈到的希望和信念：随着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其他档案馆藏的开放，在论述这个题目的文献出版物和史学家著作中，“文件没有找到”的注释会越来越来少。

* * *

本卷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 1990 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以及意思不清、空白或无法辨认的片断。文件复制时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 20 年代在文献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中国政府、国民政府、民族革命运动等。保留了制订文件时期所特有的并已纳入辞典的一些缩写，如党支部、党的工作、宣传工作、党的组成、革委会、政治部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教授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И.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哲学博士、教授 M. И.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副教授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郭恒钰、M. 莱特奈尔和 P. 费尔帕。

编者认为自己有责任特别指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郭恒钰教授为策划本合作方案作出的贡献。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

工作人员 Л. И. 科舍列娃、Л. А. 罗戈娃和 З. Н. 萨哈纳扎罗娃，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А. И. 卡尔图诺娃帮助发掘文件，А. И. 卡尔图诺娃提供了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考虑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一些文件，包括第 131 号文件。

本卷前言和各部分的引言由 В. И. 格卢宁、А. М. 格里戈里耶夫、М. Л. 季塔连科、К. В. 舍维廖夫、М. 莱特奈尔和 Р. 费尔帕撰写。文献目录由 К. В. 舍维廖夫编写。人名索引由 И. Н. 索特尼科娃和 В. В. 拉林编写，并有 К. В. 舍维廖夫和 В. Н. 谢契林娜参加。

编写人名索引时利用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任研究员 К. К. 米罗诺娃盛情提供的材料。

Н.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做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Е. К.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Д. Б. 斯拉文斯基制作了软片。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В. В. 拉林、Н. И. 梅利尼科娃、И. Н. 索特尼科娃和 Т. В. 萨伊科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因国民军失败和“三二〇事件”而实行的 “喘息”政策	
1. 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 （1926年1月4日）	(13)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特字第1号） 记录（摘录）（1926年1月7日）	(14)
3. 古比雪夫给叶戈罗夫的信（摘录） （1926年1月13日）	(15)
4. 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	(17)
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特字第2号） 记录（摘录）（1926年1月14日）	(21)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21日）	(22)
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3号） 记录（摘录）（1926年1月21日）	(23)
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号记录（摘录） （1926年1月25日）	(25)

9. 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 (1926年1月26日) (27)
10. 拉菲斯同胡汉民关于中东铁路冲突问题的谈话记录
(1926年1月26日) (28)
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号(特字第4号)
记录(摘录)(1926年1月28日) (34)
12.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不晚于1926年2月3日) (35)
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号记录
(1926年2月4日) (36)
14. 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
(1926年2月8日) (38)
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
速记记录(摘录)(1926年2月10日) (43)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号记录(摘录)
(1926年2月11日) (65)
17.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
报告(1926年2月11日) (68)
18. 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致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提要
(1926年2月13日) (91)
19. 斯大林给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信
(1926年2月16日) (92)
20. 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1926年2月16日) (93)
21.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
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 (97)
22. 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
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

-
- (1926年2月17日) (147)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
(1926年2月18日) (149)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信(1926年2月25日) (151)
25.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6年3月2日) (153)
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记录(摘录)
(1926年3月4日) (154)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特字第9号)
记录(摘录)(1926年3月4日) (156)
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4号(特字第10号)
记录(摘录)(1926年3月11日) (157)
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
(1926年3月18日) (158)
30.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
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 (161)
31.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
..... (176)
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7号记录(摘录)
(1926年3月25日) (180)
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7号(特字第12号)
记录(摘录)(1926年3月25日) (182)
34. 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 ... (183)
3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
(1926年4月1日) (188)
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
记录(摘录)(1926年4月1日) (190)
37. 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 (1926年4月3日) (201)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0号(特字第14号)
记录(摘录)(1926年4月15日) (202)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
(1926年4月22日) (207)
40.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4月23日)
..... (209)
41. 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
(1926年4月24日) (210)
42. 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 ... (217)
43. 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
报告(1926年4月25日) (222)
44. 维经斯基给契切林的信(1926年4月26日) ... (226)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
记录(1926年4月27日) (227)
4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
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 (232)
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
记录(摘录)(1926年4月29日) (236)
48. 胡汉民就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给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报告(摘录)
(1926年5月3日) (238)
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3号(特字第17号)
记录(摘录)(1926年5月6日) (240)
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特字第18号)
记录(摘录)(1926年5月6日) (241)
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特字第19号)
记录(摘录)(1926年5月13日) (242)

52.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
 (1926年5月17日) (244)
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
 记录(摘录)(1926年5月20日) (267)
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8号(特字第22号)
 记录(摘录)(1926年5月27日) (269)
55.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
 (1926年5月30日) (272)
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2号(特字第24号)
 记录(摘录)(1926年6月7日) (283)

第二部分：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探索

57.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
 (1926年6月7日) (298)
58.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
 (1926年6月11日) (301)
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
 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 (304)
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
 第2号记录(1926年6月21日) (307)
6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6月21日) ... (308)
62. 拉狄克《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
 (1926年6月22日) (311)
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
 (1926年6月30日) (316)
64.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 (317)
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0次会议第4号记录(摘录)
(1926年7月4日) …………… (323)
66.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摘录)
(1926年7月6日) …………… (325)
67. 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
(1926年7月7日) …………… (329)
68.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便函(1926年7月8日) …………… (335)
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3次会议第7号记录(1926年7月14日) …………… (336)
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4次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7月15日) …………… (338)
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5次会议第9号记录(摘录)(1926年7月17日)
…………… (341)
72.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 …… (342)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摘录)
(1926年7月18日) …………… (350)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7次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
(1926年7月23日) …………… (357)
75.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7月24日) … (360)
76. 鲍罗廷同蒋介石的谈话记录(1926年7月26日)

- (363)
77.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6年7月27日) (365)
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5号(特字第33号)
记录(摘录)(1926年8月5日) (366)
7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
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 (368)
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关于广州局
势问题的初步结论(1926年8月9日) (373)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
地区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议记录
(1926年8月12日) (376)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6年8月15日) (385)
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
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 (388)
84.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1926年8月17日)
..... (398)
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和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8月19日) (402)
8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8月20日) (408)
87.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

- (1926年8月26日) (415)
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9号(特字第37号)
记录(摘录)(1926年8月26日) (420)
89.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
(1926年8月31日) (422)
90. 拉狄克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
(1926年8月31日) (425)
91. 拉菲斯对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
在广州工作情况的材料的总的意见
(1926年9月1日) (426)
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0号(特字第38号)
记录(摘录)(1926年9月2日) (427)
9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24次
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
(1926年9月11日) (430)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
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
(1926年9月12日) (434)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
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
(1926年9月12日) (482)
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电报(1926年9月12日) (491)
97. 鲍罗廷给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电报
(1926年9月15日) (493)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9月16日) (497)

-
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
(1926年9月16日) (503)
1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
(特字第44号)记录(摘录)
(1926年9月16日) (505)
101.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不晚于1926年9月16日) (507)
1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
第19号记录(摘录)
(1926年9月18、19、21日) (516)
10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补充报告
(不晚于1926年9月22日) (521)
104.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9月20日) (524)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给联共(布)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6年9月22日) (529)
106.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7月19日
至9月22日期间工作情况的第2号总结报告
(摘录)(1926年9月22日) (531)
10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6年9月23日) (537)
108.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3日) (538)
109.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9月23日) (544)

-
110. 福京给某些人的书信（摘录）
（1926年9月25日、11月4日、
12月18日）……………（554）
111. 拉狄克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6年9月28日）……………（567）
1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布留赫尔对国民政府
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的通报
（1926年10月7日）……………（569）
1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1号（特字第45号）
记录（摘录）（1926年10月14日）……………（570）
114. 拉菲斯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6年10月15日）……………（573）
1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
记录（摘录）（1926年10月15至18日）…（580）
1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7号记录
（1926年10月19日）……………（582）
1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和64号
（特字第47号）记录（摘录）
（1926年10月20日和21日）……………（584）
118.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6年10月22日）……………（588）
1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
（1926年10月28日）……………（590）
1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5号（特字第48号）
记录（摘录）（1926年10月29日）……………（603）
1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特字第49号）

-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1 月 4 日) (605)
1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1 月 5 日) (607)
123.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
的发言记录 (1926 年 11 月 5 至 6 日) (609)
124.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6 年 11 月 6 日) (613)
125. 维经斯基给联共 (布)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的信 (1926 年 11 月 6 日) (617)
1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 年 11 月 10 日) (621)
127.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7 号 (特字第 50 号)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1 月 11 日) (623)
1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1 月 15 日) (625)
129.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8 号 (特字第 51 号)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1 月 18 日) (626)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 年 11 月 20 日) (628)
131. 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 (1926 年 11 月 22 日)
..... (631)
132. 联共 (布) 中央会议第 71 号 (特字第 53 号)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1 月 25 日) (634)
13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6 年 11 月 25 日) (636)

第一部分

因国民军失败和“三二〇事件”
而实行的“喘息”政策

1926年初，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莫斯科寄予厚望的国民军遭到惨重失败并撤退到西北省份，1926年秋季以前又在这里同张作霖及其盟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激烈的防御战。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元帅早在1926年1月就宣布，他要放弃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采取观望态度。5月初，他来到莫斯科，在这里逗留到8月初。同他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第53、54、56、78号文件）。对国民军的物资援助已减少到最低限度^①。

伴随着对国民军采取的军事行动，外国报纸和保守的中国报纸掀起了一场反共反苏宣传运动。在华出版的外国报纸公然讨论列强军事干涉问题，而且还要求苏联从中国召回其大使加拉罕。3月18日在北京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组织的反帝示威游行遭到镇压，在北京的共产党人领袖和国民党左派首领不得不转入地下。很长时期警察镇压制度笼罩着北方^②。1926年1月在中东铁路上发生的尖锐冲突是北方反动派总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冲突是因中国军事指挥部擅自拦截向南方运送军队的机车，逮捕以铁路局长A. H. 伊万诺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和实施其他暴行而引发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这些事件是帝国主义列强反对中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

苏联总的国际处境，特别是英苏关系的紧张，包括因苏联积极参与中国事务而出现的关系的紧张，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莫斯科担心出现反苏联盟，因此继续实行在大国间“加楔子”的政策。在远东则实行同日本千方百计改善关系的方针。

1926年，对莫斯科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之一是联共

^① 关于冯玉祥在莫斯科谈判的详细情况，见P. A. 米罗维茨卡娅：《苏联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3—1937）》，莫斯科1969年版第127—135页。

^② 详见M. Ф. 尤里耶夫：《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莫斯科1968年版第290—310页；A. B. 布拉戈达托夫：《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札记》，莫斯科1970年版第65—115页；《三·一八运动资料》，北京1984年版。

（布）党内斗争的加剧，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为首的“新反对派”在许多内外政策上反对斯大林多数派。中国问题第一次成了论战对象^①。

另一方面，在广东革命根据地，据3月底以前来自那里的消息说，出现了使莫斯科备受鼓舞的形势。广东清除了敌视广州政府的军队，在政府内和在国民党领导中加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领导人的地位。在国民革命军中确立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领导。持续数月的省港大罢工和广东对香港的经济封锁仍在进行。同时不顾莫斯科的坚决反对^②，展开了对进行北伐以夺取全国政权的宣传工作和实际准备工作。国民党领导由于关心其军事、政治基础的巩固和群众的支持，表面上越来越向左转。1月4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左派和共产党人明显占居优势。在大会选出的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左派和共产党人占居多数。1月22日举行的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常设委员会、书记处、各部领导），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在代表大会上，右派的分裂行径及其反共立场受到批判，其思想鼓舞者戴季陶所作的理论探索遭到谴责。但在对右派作组织结论时，经共产党人同意，大会总的说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仅把7名最不可调和和最顽固的右派首领开除出党^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莫斯科接纳该党加入共产国际。国民党二大在中共中央1926年2月12日发出的76号通令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东方，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而斗争》，莫斯科1969年版第293—294页；A. M. 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斗争（1926—1927）》，载《远东问题》杂志1993年第2期第102—117页；第3期第109—128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第666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1986年版第1卷第127—460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66年版第2卷第472—475页；H. J. 马马耶娃：《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国民党（1923—1927）》，莫斯科1991年版第86—112页。

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该通令明显夸大了右派的失败程度，实际上忽视了他们对革命发展的影响^①。根据对国民党内部状况的这种夸大的评价，2月21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非常会议，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的思想，认为它是革命的主要突击力量^②。

但是在广州政府取得一些实际成就和国民党表面上向左转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也在暗地里惶恐不安地加紧活动和联合起来，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和军官当中出现了骚乱。

上述矛盾进程一方面使苏联领导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状况和潜力产生了夸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安。这一部分中发表的文件反映了这两种倾向的同时并存。

对苏联领导人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定产生影响的因素不只是中国的复杂局势，而且还有驻华苏联工作人员的严重意见分歧，即北方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加拉罕大使同武官叶戈罗夫及其副手特里福诺夫之间的意见分歧（第17号文件）、驻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同首席军事顾问古比雪夫之间的意见分歧（第3、4号文件）。

莫斯科试图“就地”弄清楚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对事态的发展趋向和前景作出评估。这种想法促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6年1月作出决定，向中国派出一个享有广泛权力的检查团。指定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政治局检查团团团长，成员有库比雅克、列普赛和加拉罕（第5、7号文件）。布勃诺夫（伊万诺夫斯基）使团自1926年2月初到4月底在中国工作。3月中，政治局还成立一个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委员会，责成它进一步阐明苏联对中、日政策的基本任务（第32号文件）。鉴于国民军遭到失败，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受命起草关于以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年版第2卷第42—47页。

^② 同上，第55—56页。

如何在华进行军政工作的建议（第38号文件）。3月底政治局决定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为确定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在2月中旬向维经斯基提出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维经斯基作了简要的回答（第19、20号文件）。2、3月间，共产国际（即2月10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第15号文件）和作出全面决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中国专门委员会）还讨论了中国问题^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前夕和期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了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第14、18、22号文件）。2月18日政治局拒绝了国民党要求接纳它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第23号文件），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知了此事（第24号文件）。

这个部分提供的几个篇幅很长的文件，反映了1926年初在莫斯科和在北京对中国问题的讨论的性质和内容（第15、17、20、36、38号文件）。通过讨论，更加明确了主要的难题和参与讨论者在观点上的分歧。当时围绕几个中心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就是如何评价国民革命运动的状况（“失败”、“低落”、“放慢速度”）？能否根据广州的经验重建国民军？国民党的发展前景以及国民革命的发展前景如何（人民民主革命或“凯末尔式”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如何扩大地盘或深入开展（粗放式还是集约式）？以及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应持什么态度？对这些中心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对国民党和对中共采取什么政策和工农运动的任务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在这里，既有对业已出现的局势和已经到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困难时期的清醒估计，又有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

在业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一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58—63、67—83页；B. И. 格卢宁：《在国民革命前夕和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版第2册第37—45页。

方面保留了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内容和前景的总的战略方针，同时不得不对自己的政策作出重大修改。1925年的进攻路线被“争取喘息时间”的方针所取代，“三二〇事件”以后这种方针带有暂时退却策略的性质。

从国民军失败中得出的结论。4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全面性的文件，确定了苏联对华政策的总的长期战略方针及其针对国民军的失败所采取的暂时策略手段（第36、38号文件）。在政治局4月1日批准的《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的决议中，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首先是“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并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政治局表示相信，“在最近一个时期”，广大（工农）民众运动将会得到发展和加强”，而我们“也应尽力使这场运动具有很大的规模”。同时文件中有一个重要说明：“在欧亚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中国革命顶不住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换句话说，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直接取决于“世界革命”的成功，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很渺茫的。

政治局认为，由于国民军遭到了失败，所以“必须”向帝国主义者“作出让步”，以便为中国革命力量“争得喘息时间”和“延长苏联的喘息时间”。因而采取了“在远东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方针”和首先把日本作为与英国这个中国革命（和苏联）的“主要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相抗衡的力量而同其实行某种妥协的方针。决议中列数了旨在“同日本达成妥协”的一整套措施，包括继续同张作霖举行中东铁路问题以及“满洲其他铁路问题”的谈判。政治局重申以前坚决反对国民革命军“在目前时期”进行北伐的意见，这也符合“争取喘息时间”的策略（第36号文件）。

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起草并由政治局于4月15日通过的关于在华军政工作的决议是很坦诚的，承认在国民军中这项工作的总的效果是“不够的”，而在第二军和第三军中“简直无效果可

言”，并且不只是考虑到这项工作的纯军事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对国民军的物质支援“无论在军队中还是在它们所占有的地区”，都没有起到“巩固我们的影响”和“确立”国共两党影响的作用。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冯玉祥的态度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要么在冯玉祥履行一系列政治条件情况下，这项工作“虽然范围有所缩小但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要么“这项工作在目前这个时期结束”。

由于国民军在北方的失败，4月15日的决议为“进一步加强广州的军队”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广州政府要求提供教官和给予物质支援，“这应尽可能予以满足”（第38号文件）。这个决定是在莫斯科收到关于“三二〇事件”的最初报告后作出的，当时还没有收到关于这次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充分报告。

1926年初在中国，苏联领导最实际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解决中东铁路上的冲突。这次冲突是在张作霖及其盟友反攻国民军时发生的。这个问题在1926年1至3月间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第6、8、11、13、16、26、29、36号文件）。苏联给中国当局的照会和苏联公开发表的声明，以及报刊和苏联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历史著作，都把发生冲突的全部责任推到军事指挥部和满洲当局身上^①。但是首次发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文件也谈到中东铁路局势的另一一些方面，如在部分俄国铁路员工中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中东铁路上的某些俄国工会组织试图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最后通牒等。政治局在2月11日和3月4日、8日的决议中，要求采取果断措施，杜绝发生这种现象（第16、27、29号文件）。1月26日拉菲斯同胡汉民的长时间谈话（第10号文件）和2月8日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很大部分谈话（第14号文件）都谈到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中东铁路上的尖锐冲

^① 如 M. C. 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155—160页。

突在1926年1、2月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中东铁路上的冲突气氛在整个1926年间一直存在。发表的许多外交文件证明了这一点^①。苏联最高领导在1926年的随后一些月份中也不止一次地研究过中东铁路上的局势。

从“三二〇事件”中得出的结论。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采取的行动和他后来的政治举动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受到了特别沉痛的打击。

“三二〇事件”无论对于莫斯科和苏联驻华代表来说还是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国民党显然失去了控制，所以人们不得不为寻求摆脱这种错综复杂的和十分不利的局面的出路而进行艰难的探索。

文件集中收录了一些新的文件，含有对“三二〇事件”起因的估计、关于消除其后果的建议，以及对事件过程本身的某些细节的补充说明。这些文件主要来自于苏联驻华工作人员，在多数文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问题是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以后的工作策略问题，即如何对待左中右各派和特别是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这时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苏联驻华代表中间都立即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据我们所知，在对“三二〇事件”作出的全面反应中，第一个反应当属3月24日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布勃诺夫使团在广州工作两周，24日离开广州）。布勃诺夫使团认为，“三二〇事件”是蒋介石旨在“反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小规模准起义”。鉴于广州市内和广东全省的力量对比，布勃诺夫使团决定向蒋介石“作出让步”以“赢得时间”（第30号文件）。在3月27日写给鲍罗廷的指示信中，布勃诺夫复述了他的报告的主要结论（第34号文件）。据当时取代鲍罗廷工作

^① 《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4年版第9卷。

的索洛维约夫证明，对于使团来说，“赢得时间”的目的是“准备除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认为，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并将同我们共事”，向他作出让步是需要的，以期以自己的损失和一定的牺牲来换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第31号文件）。穆辛（第41号文件）和罗加乔夫（第46号文件）持同样意见。布勃诺夫的报告承认，试图通过绝不接受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战略的这种做法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现在”共产党人没有能力承担“他们根本力所不及的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即靠自己的双手来直接实行基本革命措施的任务”，所以报告说，不得不运用“很复杂类型的策略”，做“很长时期”的工作（第30号文件）。

至于国民党，包括它的左派，都很清楚“这种类型的策略”对他们有什么威胁。正如鲍罗廷指出的，蒋介石在3月20日对共产党人发动的进攻，也符合“诚实的”国民党人即左派的心愿，“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国民党最终会被共产党人吃掉”。同样重要的是，鲍罗廷承认这样的事实：国民党“不能领导军队，更不能对它发号施令”。“三二〇事件”表明，“蒋介石显得比党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显然比蒋介石软弱”。由于3月20日政变，蒋介石所指挥的“党军”也不再是党的军队了，而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军队”。（第55号文件）

“三二〇事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维经斯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第42号文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关切。在收到来自中国的补充报告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4月29日作出决议，认为国共关系破裂“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必须实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而且“要设法使右派离开（或将其开除）”。同时建议“在内部组织方面对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即调整人事，基本上保留目前的组织关系”（第47号文件）。这样一来，为了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

党内，政治局不得不同意作出组织方面的让步，实际上不只是对国民党左派作出了让步，而且对蒋介石也作出了让步。5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重申以前对进行北伐的反对态度后，对蒋介石又作出一个让步，同意派遣“一个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第49号文件）。5月17日，布勃诺夫使团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去总的结论和从使团在华两个半月工作结果中得出的实际建议（第52号文件）。文件中多处逐字重复了布勃诺夫3月24日广州报告中的评价（第30号文件）和政治局4月15日决议中的评价（第38号文件）。作为一个重大的缺点，文件中提出了苏联驻华外交、军事、商务、侦察等机构工作的不协调。报告中还提到“三二〇事件”，但主要是在告诫一旦重犯广州的错误，类似事件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的情况下提到的。然而对广州的形势却作出了很乐观的评价。报告中说，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巨大成果”，而国民革命军是广州政府的“主要成就”。“广州的左翼国民党政府是以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种力量联盟为基础的”。对广州政府的这种评价可能来自于布勃诺夫使团的这样一种信念，即由于它在“三二〇事件”发生后不失时机地采取一些措施，才保持了广州政权以前的面貌。这种情况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起草报告时，还不了解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结果。布勃诺夫使团认为广州政府是左翼国民党政府，根据这个评价，它建议在广东坚持“深入”进行革命变革的方针，虽然他也提醒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许多的困难（第52号文件）。

5月20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布勃诺夫使团的报告。有关主管部门得到授权根据布勃诺夫使团的建议采取了必要的实际措施。授权的第一条是指示季诺维也夫也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千方百计从人力上和资金上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并且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奉行孤立国民党右派的方针”。政

治局还决定，“责成广州同志保证执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指示，坚决谴责在现在进行或准备进行北伐”（第53号文件）。但不久事态发展迫使莫斯科容忍违背其意志开始进行北伐的这一事实。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对“三二〇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后果作了深入的分析，该使团在1926年8月的一个月间认真地研究了广州的局势（使团的材料编在本文件集的下一个部分里）。

政治局4月29日和5月6日的指示决定了鲍罗廷和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筹备和举行国民党二中全会时（1926年5月15至22日）的行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面作出了让步，全会的决议使国民党的关键领导职位转到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手中，限制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相应地也大大缩小了苏联对国民党政策的影响力。全会的决议实际上使导致国民党的政策指针向右摆动的蒋介石的不流血军政变革合法化了^①。

^① 关于“三二〇事件”及其近期后果，见A. И. 切列潘诺夫：《一位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莫斯科1976年第2版第374—416页；B. И. 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期间的中国共产党》，第2册第45—82页；《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翻译资料），莫斯科1928年版第318—323、325—326、335—339页；《中国现代史（1917—1927）》，莫斯科1983年版第236—239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卷第712—72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卷第483—517页；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1925至1926年间的反共运动》，载《中国论坛》第1卷第1期第245—289页；《中山舰事件》，广州1981年版；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北京1993年版第431—474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劳伦斯1971年版第493—519页；《向导》第148期第1376—1381页。

1

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

1926年1月4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央书记处

中国日益扩大的事态可能对许多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再次提出派遣一个权威的政治使团问题，它可以就地作出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决定^①。

全宗 325，目录 1，卷宗 420，第 2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Л. Д. 托洛茨基以前的建议没有找到。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 （特字第1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1月7日于莫斯科

听取：〔6〕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同志）。

决定：〔6〕（1）关于向中国派遣专门使团问题推迟一周作出最后决定。

（2）建议组织局物色使团成员人选并在一周内报政治局批准。

（3）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讨论中国局势，并提出具体建议供政治局讨论。

（4）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紧急要求在华的加拉罕同志和其他同志作出全面的报告，并分送所有政治局委员。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全部；

格伊同志——（2）；

组织局——（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1—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

古比雪夫给叶戈罗夫的信^①
(摘 录)

1926 年 1 月 13 日于广州

绝密

季山嘉^② 同志信摘抄

(3) 从同鲍罗廷同志的谈话中得知，他打算乘下一班轮船离开这里。这就是说是在 1 月份的最后几天。坦率地说，我很不想为华南的国民运动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有谁来取代鲍罗廷，那我是最满意不过的了。但是反对鲍罗廷离开的话我也说不出来。我认为，鲍罗廷工作方法僵化，其危害越来越大。我不否认，而相反却强调鲍罗廷对我们过去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作出的巨大功绩，我认为，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更多的他做不了。必须向广州派遣一名新的强有力的工作人员，并且必须是优秀党员。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为了在俄国工作人员的眼中有必要的威信，新的政治顾问应当是党和革命的一位著名人物。最近我和鲍罗廷

^① 信的全文没有找到。
^② 即 И. В. 古比雪夫。

同志很少争吵，因为他在我的强大攻势下认输了，基本上不再干预我的工作。我想以后工作关系也是会搞好的。如果说我认为有必要撤换鲍罗廷，那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我认为，他在现实工作中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但在以后他会跟不上事态和形势的发展。

（4）最近一个时期，我与鲍罗廷同志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作用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我在这里不谈这个问题，因为您从我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①。我只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再一次说明，从军队中清除共产党员的问题，根据我对军队情况的认真研究来看，不仅是完全荒谬的，而且实际上是极为有害的。我确有把握地认为，从军队中召回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有碍于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百分之百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工作。

核对无误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12，第 47--48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见第 4 号文件。

4

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于广州^①

致中共中央

抄送共产国际驻北京代表

现在很尖锐地存在着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工作问题，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②至今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从上海得到任何指示，也没有承担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广东的军事政治形势却要求紧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军队的政治状况可以说是各个部队都达到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和对国民革命政府的忠诚。在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军中，从纪律性和政治成熟程度来说，居第一位的当是第一军，即所谓黄埔“党军”。这是因为这个军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共产党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个军的各个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团和连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应当指出的是，最近共产党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削弱了，结果他们的影响也有所削弱。由于中国同志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表现为抵制所

① 日期是根据第3号文件确定的。

② 委员会成立时间和任务不详。

谓的孙文主义学会^①，国民党右派在这个学会中为自己构筑了巢穴，掀起了反共运动。这个错误现在正在纠正，这些学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已经感到后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能不久这个学会就会被取消。

毕竟达到顶峰的右倾潮流一时间造成了同共产党人的紧张关系，右派在代表大会^②前搞的鼓动宣传更加剧了这次冲突。修订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策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部分同志产生了不健康情绪，认为共产党人应彻底离开军队，理由是：

1. 共产党人就其本质而言在军队中起着瓦解分子的作用，目前国民革命运动的利益要求巩固军队，而共产党人则在瓦解军队。

2. 国民党无法完成国民革命运动，因为在它的社会本质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军队中的磨擦不可避免，而迄今共产党人还在加剧这种磨擦，在军队中起着有害的作用。

3.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反对派，因此他们在军队中的作用将是消极的。在谈到这些不同意见的原则方面之前，需要看一看事实，而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问题的理论方面。

1. 共产党人在瓦解军队。当公式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时，乍一看好像是这样。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很不对的。共产党人不是始终在做瓦解工作和必须做瓦解工作。就我们的本质或我们的内在实质而言，我们并不是分裂主义者。当我们做瓦解工作可以使工人

^① 指1925年4月在黄埔军校出现的孙文主义学会，该组织与此前不久在该校成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宣传国民党右派观点。这两个组织在1926年4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解散。

^② 指1926年1月4至19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阶级表现出和产生出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就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各地共产党人的态度。这是辩证法。只有辩证地看待这种现象，才能理解似乎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存在的矛盾。

2. 如果国民党不能完成国民革命，那么看来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就应该是无产阶级。通过分析中国目前的局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民革命运动迄今所依靠的社会集团中，发生了角色的变动和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断定，目前在中国，无产阶级是以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姿态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离开领导岗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和毫无疑义的。无产阶级能让军队这样强大的斗争武器摆脱自己的影响吗？无产阶级能无视历史上必然要落到它头上的组建和筹备武装力量的工作吗？回答是明确的。

3. 中国共产党人是知识分子反对派，并在军队中起着有害的作用。根据上述原因这种论点是根本不对的。实际上它也是不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军队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都完全无愧于自己的工作，如果说有误解和磨擦的话，那应该归咎于党的机关对共产党员领导不力。最后，我们在军队中的策略应取决于或正在取决于我们在国民党中的策略。如果我们退出国民党，我们就要离开军队；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退出国民党为时尚早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做分裂或离开国民党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需要预先为此掌握群众和为自己打下基础**，**那么我们离开军队，离开那个在中国条件下能够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起到主导作用的组织，那就是幼稚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把关于共产党人离开军队的议论看作是有害的和确实能给国民革命运动造成不可挽救的打击的。军队中的情况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不仅在第一军中，而且在其余各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已经赢得士兵群众的一定信任和对他们的良好态度。指挥官开始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现在必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深入开展军

队中的政治工作。当然,这项工作的带头人主要应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部队生活,参加国民党组织,从而可以对军队施加影响,防止(如果不能完全防止,则可以部分防止)军队将来起富农的作用,因为资产阶级会利用富农来打击无产阶级。在预见到将来国民革命运动不可避免要发生分裂的同时,应该提防军队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影响,进而造成对中国劳苦大众革命运动的威胁。

如果在军队中没有形成真正的革命核心,那么对军队的训练和战备工作的领导,就会有許多危险隐患,其中的主要危险是将从技术方面培训干部,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会利用这些干部来扼杀群众的革命运动。

我们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群众,我们不能让国民革命军脱离我们的影响轨道。我认为^①,这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工作问题不应有任何怀疑。需要解决的仅仅是这项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革命的传统和相应的正确领导,常常犯许多策略性错误,他们同其余国民党人疏远,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小宗派里,因此有时造成了误会。应该把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目前工作时期看作是积蓄力量和巩固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的时期,所以我们把工作方式方法作如下设想:

1. 共产党人的整个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领导,该部也主管组建工农武装工作。

2. 共产党人要进入相应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并以国民党名义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目的是防止这些组织产生右的倾向。

3. 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部队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并把它们的工作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4. 部队中的共产党支部不公开,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工作。

① 原文如此。

请紧急讨论这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作出具体指示。

团长（季山嘉^①）

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奥尔金^②）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23，第 106—110 页。

打字稿，副本。

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 号 （特字第 2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 月 14 日于莫斯科

听取：〔7〕—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 月 7 日会议第 1 号记录，决定：9—〔6〕）（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决定：〔7〕—（1）认为由布勃诺夫（团长）、库比雅克和列普赛组成的使团需要紧急动身前往中国，使团成员包括加拉罕同志。

（2）使团任务：①弄清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②同加拉罕同志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③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的工作；④检查向中国正确

① 即 Н. В. 古比雪夫。

② 即 И. Я. 拉兹贡。

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和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

抄送：布勃诺夫、库比雅克、列普赛、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4、7—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 月 21 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克维林、科托夫、皮达可夫、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托洛孔采夫、契切林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卡明斯基、洛莫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丘茨卡耶夫、斯基里雅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决定：〔5〕（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保护苏联在中东铁路上的利益，仅对中国和日本采取外交措施。

（2）撤消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与中东铁路有关的其余所有问题。

（3）决定为特别文件。

1926年1月21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6——关于中国委员会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26——增补拉狄克同志加入中国委员会。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1，第 1、3、6、7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 号 （特字第 3 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1月21日于莫斯科

听取：6——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关于西藏

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 月 7 日会议第 1 号记录，决定：1——〔7〕），（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6——〔3〕（1）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在最近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处名义向拉萨派驻苏联非官方代表处的建议。

（2）拨款 2 万卢布作为代表处的经费。

抄送：

契切林同志；

李维诺夫同志。

听取：〔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同志）。

决定：〔5〕（3）建议布勃诺夫同志使团尽快动身去中国，首先了解中东铁路上的局势，并向政治局作出详细报告。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

契切林同志；

布勃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16—1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1月25日于莫斯科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科肖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拉科夫斯基、契切林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科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1）认为科普同志关于在奉天同日本人联合行动的建议是不必要的^①。建议科普同志告诉日本政府，必要时他可以就此问题征询莫斯科的意见。

（2）责成契切林同志在一周内向政治局提出给科普同志的详细指示稿^②。

（3）认为“最后通牒”状态在释放伊万诺夫同志之后业已终

① B. JI. 科普的建议没有找到。

② 给 B. JI. 科普的指示没有找到。

止^①。

(4) 在以后的谈判中，要对克拉科韦茨基同志签署的协议作出补充^②，要求①履行关于释放所有因中东铁路冲突而被逮捕的人员的承诺，追究对中东铁路员工施行暴力的那些有严重过失的人的责任；②赔偿损失；③恢复工人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④遵守中东铁路条约和铁路规章。

(5) 在报纸上刊登塔斯社关于满洲冲突的报道^③，责成契切林同志来审定报道内容。

(6) 责成契切林同志起草说明整个满洲冲突情况的谈话稿，预先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谈话稿应在整个满洲冲突解决后发表。

(7) 按照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指示，暂不停止在边境上集结军队。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让费尔德曼和格里亚兹诺夫个人负责采取措施，防止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和非法行为。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3，第 1—2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A. H. 伊万诺夫 1926 年 1 月 21 日被捕，1 月 24 日获释。

② Г. В. 契切林 1926 年 1 月 22 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了在 3 天期限内彻底恢复中东铁路秩序和释放伊万诺夫的要求。1 月 24 日在奉天签订了包含苏联政府要求的相应协议，见《苏联外交文件》第 9 卷第 48、673 页。

③ 如 1926 年 1 月 27 日《消息报》。

9

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

1926年1月26日于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同志：

现在在莫斯科逗留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原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和军队总司令胡汉民，有一项任务是研究我们共产党的工作问题，主要是研究广大群众与党、党（中央）与国家管理机构（即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问题。

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很有必要安排您同胡汉民就上述问题进行一次谈话。胡汉民不久就返回广州，他以后实行的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莫斯科这里受到的政治教育和教诲。

请勿拒绝回复^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全宗 17，目录 85，卷宗 138，第 5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回复没有找到。

10

拉菲斯同胡汉民关于中东铁路冲突问题的谈话记录

1926年1月26日于莫斯科^①

同胡汉民同志就中东铁路冲突问题的谈话 （在局势缓和之前）

胡汉民：我今天已同四位新闻记者进行了交谈^②。我认为，这次冲突不是同中国，而是同日本。早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争斗一开始，我就说过，不要注意他们，而要注意冲突的根源即帝国主义。张的势力已被摧毁，他是日本手中的工具，段^③现在也没有任何权力。这里是日本主宰一切。我曾写信给片山潜同志，说共产国际应突出它的整个反日鼓动宣传^④。但遗憾的是，我的这封信没有回音。

问题：我希望我们的交谈是毫不拘束的。我们都不发表这次谈话。我想请您完全放开地谈谈您对冲突的看法。

胡汉民：我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就试图尽量帮助苏联和显示中国人民的同情。我明确谈到，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中国人民将同

① 谈话是在1926年1月25日进行的。

② 详见1926年1月27日《真理报》。

③ 段祺瑞。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情苏联。要知道这对苏联来说绝非无关紧要。要知道在作战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中国人，得到他们的同情是很重要的。而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情况却相反：那时中国人对俄国怀有敌意。冲突加剧了，因此需要认真查清日本是否真的—定要打仗。这一点是不清楚的。苏联应该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冲突和想使冲突发展成军事冲突并相应地制订出自己在这场冲突中的策略。我认为，现在日本不会向苏联正式宣战。这种情况只有在苏军进入满洲之后冲突骤然加剧时才会发生。日本将在幕后支持张作霖。因此苏联应该采取同样方法，即尽力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国民军。应该在日本无产阶级当中开展宣传工作，以便发动他们反对战争。我相信，苏联不想打仗，它在竭力避免战争。在日本，现在不可能有好战情绪，终归日本在战争投机中失败了。人民不满意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日本，人们明白，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就会趁机再次削弱日本。所有这一切使我得出结论：现在我们并没有受到战争威胁。日本军阀现在的心情与1904年不同，那时他们可能考虑，借助战争把民众的注意力从内政问题上引开。现在他们知道，战争会导致军国主义的彻底垮台。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削弱了。在中产阶级中已经没有加入军官队伍的愿望，军队中纪律松弛，士气消沉。在这个时候援助张，鉴于背离政府的中立声明^①，定会使日本民众与政府疏远。在日本，现在思想不统一。国家不准备打仗，在发生冲突期间，国家不是在进行战争，而只是在进行战争威胁。即便苏联坚决决定不引发战争，但也决不要退让，以便不致损害自己在全世界的声誉，不致造成似乎苏联面对日本压力作出退让的印象。当然，常常有战争威胁导致战争的情况，这是不可挽回的。因此必须全面考虑问题并做好打仗的准备。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对苏联在目前的冲突中打算

^① 1926年1月21日日本首相加藤在议会会议上声明“绝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走多远要有准确的概念。这非常重要，因为需要同苏联建立统一战线。

问题：到傍晚时分我可以告诉您现在冲突处于什么状态，我在等情报。

胡汉民秘书^①：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好像日本政府已向满洲下达命令，让各种军事力量做好准备以防同苏联发生冲突。

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目前日本政府确实不想使问题发展到战争的地步。张作霖的挑衅可能是想检验一下苏联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能走多远。从苏联方面来说，契切林同志的照会当然不是空洞的威胁^②。如果张作霖不退让，事情当然会发展到苏联方面以武力占领中东铁路的地步。我觉得，胡汉民同志把日本的情况描绘得好了一些，他断定争夺满洲的战争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实际上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对日本小资产阶级民众的影响是很强大的。胡同志低估了日本进行战争的能力。

胡汉民：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评价。在日本，只有大资本家希望进行战争，因为他们可以发战争财。日本无产阶级可能愿意打仗，为的是在发生战争危机情况下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愿意打仗，因为它始终要吃战争的亏。

问题：我想听听胡汉民同志对各种社会阶层、政治团体和派别的心态作出的坦率评价，以及这些阶层、团体和派别可能对目前的冲突和对苏态度作出的评价。胡汉民同志如何评估现在正在开展反苏宣传运动，高喊“苏联帝国主义”等口号的那些团体的影响呢？

胡汉民：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在中国面前，现在的问题不是对苏联的同情问题，而是它对张作霖的态度问题。在对

^① 朱和中。

^② 指1926年1月22日L. B. 契切林向段祺瑞和王正廷递交的照会（见《苏联外交文件》第9卷第47—48页）。

待张作霖的态度上，情况完全不同；同情他的恐怕不到中国人民的20%。有同情日本的吗？这里100%都反对。这就为完全乐观主义地评价对苏联的同情提供了依据。是什么阶层对苏联持否定态度呢？这首先是官僚买办，然后是像梁启超这样被帝国主义或官僚买办收买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搞不清楚的，在对苏联的同情上它没有坚定的态度。人们用共产主义吓唬它。但不管怎么说，不能把小资产阶级算到那一边。结论是：苏联的敌人是些小团体，但不要忘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影响，他们会全力掀起反苏宣传运动。对这种帝国主义宣传应当开展反宣传。要在中国人民大众当中广泛宣传苏联所做的事情，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中国签订协议，建立真正的友谊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等。我们将只讲事实，这是最起作用的。要广泛宣传苏联将继续全力帮助中国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要广泛宣传苏联不想向中国输入共产主义和剥夺小资产阶级财产。要考虑到群众觉悟程度不高，今天需要本着这种精神做解释工作，晚些时候就不需要了。现在不要谈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还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实行这种专政，为什么要徒劳地吓唬人呢？

问题：难道在中国有谁在进行这种宣传吗？

胡汉民：是敌人在散布这种关于共产党人的宣传性质的说法。帝国主义者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归入红色阵营。但是在中国，哪儿也没有剥夺财产，因此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那么国民党右派的宣传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胡汉民：可以不理睬他们，他们既没有统一的观点，也没有领袖。他们的口号是混乱的。他们提出了“同苏联结盟但反对共产党人”的口号。

问题：在上海有国民党的报纸吗？

胡汉民：有，那里的报纸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里^①。编辑部在兜售这样的观点：他们拥护俄国共产党人，但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他们更缓和了：他们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但反对他们参加国民党。

问题：不久前从上海来了一位同志^②，我们问他，上海报界会如何对待中东铁路上的这次冲突？他回答说，在这种时刻整个上海报界都会毫无例外地反对苏联。是这样吗？

胡的秘书：是这样，因为报界全被帝国主义者收买了。

胡汉民：是的，报界都被收买了。但在报界毕竟不会出现反苏统一战线。至少在报界谁都不会支持日本。国民党右派的报纸始终主张同苏联结盟，它也不会反对苏联。

问题：在去年6月的上海运动期间，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都参加了抵制运动，现在在上海所有居民阶层还会建立那种统一战线吗？

胡的秘书：不会，现在不会建立这种统一战线。

胡汉民：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上海运动是由于进行大屠杀而骤然爆发的。工人和学生非常积极地发动起来了，带动了商人，再说商人也害怕由于反对日益高涨的运动而遭受损失。小资产阶级也被吸引过去了。如果现在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上海也一致联合行动并能成为这样的力量，那么它们就能再次把所有人吸引过去。抵制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原因：1. 军阀镇压运动；2. 经费不足。在广州没有这种情况，因此运动日益高涨。如果我们现在想把上海发动起来，我们就必须预先为支持这场群众运动保证经费。我们现在也可以掀起运动^③。其实根本不需要打着支援苏联的口号来组织罢工和抵制行动。需要打着反对

① 指1915至1931年间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

② 指蔡和森。

③ 原文如此。

张作霖和日本的口号来组织运动，俄国可袖手旁观。一旦我们组织抵制日本的运动，我们就可以使所有同英美进行贸易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对帝国主义者要各个击破。

问题：有关于苏联及其对华态度的什么中文小册子和传单吗？

胡汉民：没有，只有一些报纸。

问题：国民党中央在北京或在上海有什么报纸吗？

胡汉民：没有，我们现在想更换上海报纸的编辑部。北京的整个报界是同我们在一起的。还应注意来自新闻检查机关方面的障碍（以后的交谈是在向胡汉民同志通报了中东铁路冲突业已消除之后进行的。通报是根据报社收到的消息作出的）^①。

胡汉民：总之，外交冲突结束了。但是只要张作霖还在，就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什么冲突。因此需要继续进行我们在这里拟定的工作（可以断定，胡汉民同志及其秘书显然对冲突结束和苏联不给张作霖以打击感到不满。当胡汉民被告知半官方报道中的一段话，即“苏维埃共和国将密切注视协议的准确执行和工人组织的不受迫害”之后，对话者都很高兴）。

胡汉民：这对日本是个教训，迫使他们退让。现在更需要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继续退让，中国人民支持苏联。

谈话参加者本人记录

（傍晚）同胡同志就他的单纯反日方针进行的争论未作记录。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5，第 39—44 页。

打字稿，带有修改手迹，原件，无签字。

① 如 1926 年 1 月 27 日《消息报》。

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 号
（特字第 4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 月 28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5〕（3）根据得到的各种情报，认为军事、外交行动相结合的政策基本上产生了效果，以后可以仅限于采取外交行动，因此建议军事人民委员部着手将军队撤离满洲边境。

抄送：

契切林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18、1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2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不晚于 1926 年 2 月 3 日于莫斯科^①

敬爱的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们请求您对下面这个问题作出指示。

东方部^② 由于不能及时得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等）就与该部工作有关的问题作出的决定而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我们认为有必要让该部主任（或主任不在时让他的副手）出席中央（政治局等）相应机关讨论与东方部工作有关的问题的会议。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东方部代表不能出席这些会议，我们请求让东方部了解在这些场合作出的决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5，第 78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以下标注确定的：1926 年 2 月 3 日由彼得罗夫交给季诺维也夫同志本人。彼得罗夫即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

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号记录

1926年2月4日于莫斯科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科肖尔、米哈伊洛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契切林、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基谢廖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索尔茨、扬松同志。

听取：1. ---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通报和谈话（政治局1926年1月25日会议第7号记录，决定：(1)），（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 (1) (1) 责成契切林同志根据政治局交换的意见修改谈话初稿并在明天即2月5日见报。建议政治局委员不迟于今晚将他们对谈话的修改意见告契切林同志^①。

(2) 责成拉狄克和维经斯基同志起草“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就满洲事件发表告全体劳动者书的初稿。初稿先送全体政治局委

^① U. D. B. 契切林1926年2月4日的谈话刊载在1926年2月5日《消息报》上（见《苏联外交文件》第9卷第73—77页）。

员阅，完成期限两天¹⁾。

听取：(2) 关于解决同日本在满洲的关系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 月 25 日会议第 7 号记录，决定：1 — (2)），（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2) (1) 契切林同志的报告备案待查。

(2) 责成契切林同志紧急征询加拉罕同志对向他提出的中日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还要让他介绍一下中国人对即将宣布满洲独立一事²⁾的看法²⁾。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5，第 1、9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 给全体劳动者书刊载在 1926 年 2 月 11 日《消息报》上。

2) 1926 年 1 月底 2 月初，一些通讯社从奉天发出几篇关于张作霖打算宣布满洲独立（据另一些材料说是自治）的报道，但是这种打算没有得到日本的赞许，并遇到了与方列强和北京政府的消极反应，所以张作霖没有下决心走这一步。

14

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

1926年2月8日于莫斯科

同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谈话^①

季诺维也夫：第三国际的代表会议不久即将召开^②，您在回国之前能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并向全世界革命者致意吗？

考察组·胡^③：能，我能出席，因为我的任务是同各国革命者交换看法。现在我以国民党的名义向第三国际的同志们表示敬意。会议何时开始？

季诺维也夫：15日开始，我以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名义欢迎中国国民党的代表。我们今天谈话的题目是什么？

考察组·胡：我想问您的，是世界革命总的形势问题，特别是世界革命与中国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

季诺维也夫：首先我想问问，您来到这里后感觉如何？

考察组·胡：我确信，无产阶级政党确实能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能领导世界革命事业。我还弄清楚，无产阶级有能力解决

① 文件附在胡汉民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关于同共产国际活动家会谈情况的书面报告上（见第48号文件）。

② 指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③ 原文如此。

世界革命的任务。

季诺维也夫：为什么您急于返回中国而不在这里多呆一些日子？

考察组，胡：因为我已事先确定了我在这里的逗留期限，此外，国内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

季诺维也夫：传说张作霖想宣布满洲独立，您认为这能成为事实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俄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察组，胡：张作霖是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当然应该把他除掉。至于他决定宣布独立，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1. 他能否继续独立存在；2. 中国民众是否抵制他的意图？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才能宣布独立。如果他真的宣布独立，俄国则应在决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之前，检验一下中国民众的舆论。从俄国对我国反帝运动的态度来看，它支持中国革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既然日本没有公开进犯我国，而是在暗中支持张作霖，那么俄国也可以在暗中支持中国革命，以避免我国公民的不理解。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然而，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对于俄国来说最正确的做法是直接对张使用武力。消灭日本的这一工具后，俄国就能迫使日本不同英国合作而与俄国联合。这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但是由于许多中国人至今在心中多少都有些沙文主义思想，所以很可能当他们看到俄国人进攻张作霖时会产生误解，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含义。此外，帝国主义者也会利用有利时机，加强他们的不合法措施。因此对俄国来说，对张作霖采取果断措施是不明智的。但这只是政策问题，我并不认为，俄国直接站出来反对张作霖是不正义的。

季诺维也夫：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全体中国人民是否知道张作霖受日本人的控制？

考察组，胡：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但是从日本只在暗中支持张作霖时起，另一个国家对

我国事务的任何公开干涉都会激起中国人的沙文主义情绪。现在我想问一下，俄国人认为什么问题更重要，是同日本的关系问题还是同英国的关系问题？日本当然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障碍。如果俄国认为同日本的关系问题比同英国的关系问题更重要，并认为它对日本采取行动不会引起中国人的误解，那么也许它这样做是明智的。而如果它认为同英国的关系问题更重要，并认为既然日本不公开帮助张作霖，它对它的暗中支持对中国不是特别有害，那么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就可以是暗中的，这样也不会给英国人提供可乘之机，因为英国人一直在寻找机会利用俄日之间的冲突把他们的罪恶行动进行到底。这对俄国来说也是一种推荐性的政策。

季诺维也夫：最近中国发生许多变化和骚动。这些变化和骚动使革命取得了很大发展，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发展来推进我们的工作。目前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以下方面：

1. 中国的各种革命运动应当联合起来。现在各种示威或罢工行动只是限定在某些地区。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联合在一起，使之变成统一的群众性的伟大革命运动。这项工作叫作“革命统一战线”。这是最重要的具体任务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任务。

2. 中国革命者应当同苏联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原因很清楚，不需要作解释。

3. 中国革命应当欧洲化。这一点过去被中国国民党忽视了。现在我认为，国民党必须派更多的代表到英、法等国去，同那里的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让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状况，因为没有世界劳动者的支持，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

4. 应当特别重视农民运动，因为各种运动，众所周知，都是从大城市或某些村镇发起的。但是它们不能仅限于一些城市和村镇，应当扩展到各个农村。然而往往很难把农村农民吸引到这种运动中来，因此有必要在农民中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5. 中国革命者应当同日本劳动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最近传说，美国改良派想通过日本的中介来掌握中国工人运动。所以必须同日本工人联合起来，以防止美国人实施他们的计划。此外，在中国也需要进行社会革命。不过，现在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只能从反对帝国主义做起。

现在我们可以把东方革命形势看作是一张图。在这张图上白点要比红点多得多。在中国只有三个地方，即广东、上海和北京是红色的。现在日本对华南、华中和华北地区同时展开了进攻，而美国在集中精力进攻华中。

附带说一下，现在我们可以顺便谈谈第二国际。目前只有第三国际这个组织在满意地研究中国工人运动。至于第二国际，它不重视这种事情。中国如何崛起？中国国民党在做什么工作？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的问题。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孙逸仙博士是何许人。现在第二国际要弄清这个问题。第二国际一直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该涉及国际，因此它不想与中国建立任何联系。鉴于中国发生了“五卅惨案”，我们请求第二国际给予支援，然而令我们非常失望的是，它表示不愿意满足我们的要求。更有甚者，第二国际的某些成员，从中国回来后说，中国苦力都是坏人，许多罢工工人偷窃各种材料或强行拿走别人的材料。中国工人、农民和学生应当根据这些事实分清敌友。

考察组、胡：我高度评价您的说法和同您的谈话。至于把我国革命欧洲化的第三点，我们认为它是重要的，只可惜，我们没有积极地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去。至于农民运动的第四点，我们的同志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但是，我们只能在我们管辖的有限地区积极领导运动，一是因为我们党的力量还不是很发展，二是因为组建运动基本机构的工作尚未得到应有的改进。至于同苏联结盟的第五点，我相信，中国民众中一切有觉悟的人士都同苏联有密切的联系。关于同日本工人和印度工人联合的问题，我们的

同志觉得这是必须做的。因为这两国的工人也像中国人一样有同样的解放要求。我认为，加强这种政策的最好办法是这里的同志出面做中间人，并同两国工人首领举行会谈，制订它们之间的联合计划。

季诺维也夫：我们知道，国民党组织还不是很强大，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改组，因此对它的成员来说很难领导各种群众运动。然而，如果它在领导各种运动时，能掌握这些运动的几个重要因素，那么它的工作就会变得相当容易。在1917年的革命时期，俄国共产党只有6.7万党员。但由于它掌握了运动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党发展得非常快。我想，国民党不仅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也应该了解整个世界的情况，不仅应该了解现在的情况，而且也应该了解过去的情况。因此国民党应当同世界上最革命的团体联合起来，并表明自己的真正力量。现在，我想，我有必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同您，胡同志进行讨论。这就是国民党应当同第三国际联合的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应当是名义上的而且也应当是实质上的。

考察组，胡：我非常同意您的想法。我认为，首先国民党应当使自己的本质和志向变成像第三国际那样的，也就是它必须像第三国际那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上；其次，它必须考虑到中国国民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表示同意您的建议。

季诺维也夫：我认为，国民党应当同第三国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为它的组织对此很感兴趣。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不久就要召开了，各国革命者都将出席会议。胡同志，您想作关于中国革命事件的详细报告吗？

考察组，胡：我很愿意作这个报告，但何时和怎么能作这样的报告呢？

季诺维也夫：我认为，最恰当的办法是在会议开幕前提出报

告并分送给第三国际执委会和来自各国的其他同志。

考察组，胡：好吧。

季诺维也夫：在您返回中国之前我们还能见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3，第 30--31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 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 (摘 录)

1926 年 2 月 10 日于莫斯科

维经斯基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

在今天的报告中，我要谈一谈上海事变^①的某些成果以及目前形势、前景和任务。

上海事变的涵义现在被说成是中国民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本国资本家两条战线上争取国家统一和民主化的斗争。

在持续 7、8 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国民运动几乎在不间断地高涨。确实，仅有一次不大的间歇，即国民运动中的罢工现象。但

^① 指 1925 年的“五卅运动”。

过了不长时间运动又高涨起来。所以可以认为，运动自始至终在不断高涨。

这个运动持续 7、8 个月后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第一个成果是，自 1911 年革命以来，国内国民武装力量第一次靠近政党——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开始影响并部分地领导国民运动，领导国内国民武装力量。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国民武装力量是革命动力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国民武装力量的积极干预，统一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以前，即中国成立国民军以前，也就是去年以前，看不到有什么武装力量会同争取国家统一的社会运动一起行动。只是在上海事变后，在国民运动大发展的背景下才看清楚，国民军和国民党都是国民运动事业的领导力量。

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在这几个月的解放运动进程中，需要指出的第二个成果是，国民党本身取得了很大发展。国民党在去年还只有几万党员，现在已有 30 万。（洛佐夫斯基说：在最近这次代表大会上，好像讲有 50 万^①）。国民党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这些数字。国民党不再是省的党、南方的党，现在它是国家的党。国民党把自己的影响不仅扩大到华中，而且扩大到北方。此外，国民党的思想影响，不言而喻已波及到比其党员数量多得多的民众。国民党在去年提出的口号对于多数居民来说多少有些抽象，最近几个月却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行动口号。消灭不平等条约口号动员了大量民众，既

① 二大前夕对国民党人数的估计是在 15 万到 50 万之间。

有城市居民，又有部分农民。帝国主义者于10月召开的关税会议^①就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下开展民众运动的结果。北京的关税会议是帝国主义者迫于社会运动的压力和“打倒不平等条约”口号下进行的群众性斗争的压力不得不作出的让步。去年10至11月间，国共两党提出了必须召开全国国民会议的口号^②，在这个口号下，中国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进行了斗争。反映英日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即张作霖政府已被动摇^③，被削弱，不得不抛弃许多部长，用部分自由主义部长和部分国民党人取代他们。这样做是迫于群众的压力，因为群众打出了召开全国国民会议的口号，打出了推翻现有帝国主义政府并用民主政府取代它的口号。

除了群众坚持的这些基本口号外，还有国共两党提出的经济口号。群众投入了反对外国企业主和反对当局的斗争。在华南，运动更加鲜明，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而在上海和一些中部省份则指向帝国主义者联合集团，这里的运动有时针对日本人，有时针对英国人，有时以统一战线形式针对所有帝国主义者。在南方，运动完全针对英帝国主义。在这里，运动之所以更加鲜明也是因为在广东省执政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是政府党。这里的政府支持人民大众的运动。最近，英帝国主义在这里遭到了惨重失败，自鸦片战争以来它还没有遭到过这种失败。香港已不再是主要中转港口，它的经济受到破坏，这不仅在华南而且在全中国都给英帝国主义造成了极大的道义失败，并且还在其殖民地，比如印度给英帝国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失败。英国人第一次在华南遭到

① 早在1922年华盛顿九国会议上答应为中国举行的关税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开幕。在1925年11月19日通过的决议中，列强承认中国的海关自治权，但该决议的具体实施被推迟到1929年1月1日。然而在华盛顿答应增加进口关税2.5%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会议于1926年春结束。

② 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国共两党于1924年11月提出的。

③ 当时北京政府的首脑是得到张作霖支持的段祺瑞。

这种失败，群众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粉碎了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发展运动提供了可能性，这就为巩固广州根据地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并从全省清除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广东省有自己的反革命将领，最主要的一个是英国人给以资金和交通工具支持的……（名字）^①。当省港罢工使香港遭到失败时，也从广东省清除了中国的反革命残余。现在南方是解放事业得以继续发展的主要基地。在中部和北部省份，由于在南方进行了成功的反帝斗争，工人运动得到了迅猛发展，继直接开展反帝斗争之后，又掀起了经济罢工浪潮。我们看到在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地都发生了经济罢工。而且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进行斗争的工人，不仅反对外国企业主，而且反对本国资本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民运动发展的界标。以前，斗争只是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运动仅仅是民族运动，并只有民族统一战线。工人群众被小资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者、商业资产阶级以至部分大资产阶级的上百万群众的同情气氛所包围。而当运动转向本国资本家方面时，他们就开始对工人群众有些疏远了。工人群众感觉到，同他们组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另外一些居民阶层也开始动摇和离开他们。在这里，国共两党都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在将来会起很大的作用。它们明白，常有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有时同其他居民阶层，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起来进行反帝斗争，但当无产阶级需要相机行事，当运动开始削弱时，小资产阶级就不是支持力量，而是障碍了。我们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和中等商业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很复杂的策略。在南方，这个过程表明，在有民主政权的地方，当部分资产阶级疏远时，农民则会靠近无产阶级。同陈炯明的斗争表明，农民支持工人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过这也是因为有国民党的领导。共

① 原文如此，指陈炯明。

共产党同工业无产阶级的联系这几个月来确实建立起来了，而且共产党垄断了对罢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和对产业工会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共产党没有竞争对手。

取得的成果是：在上海，破天荒第一次把 12 万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了。共产党在这个巨大的外国港口组织了工会，创办了报刊，领导了工会运动。共产党曾在公开条件下工作，后来当国民运动走向低潮时，工会开始转入地下。在这种斗争过程中，不言而喻，共产党本身得到了发展，靠吸引工业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扩大了队伍。现在我们党有 4500 名党员，其中 60% 是产业工人。共产党连同它所领导的共青团共有 1 万多名成员。我们党拥有相当多的报刊：几个周报（每周发行 5 万份），一系列工人画报、报纸，甚至墙报在中国工业中心城市的许多工厂中也很盛行。共产党现在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国民党是个大的人民民主政党，其社会基础相当复杂。这里有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和商人。在最近 6、7 个月的斗争过程中，我已经说过，党得到了迅猛发展。党内开始发生分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内情况的反映。当资产阶级开始离开工人运动，离开统一战线时，自然在国民党身上也有反映。在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动摇。这期间，在国民党内就形成了右派，是由那些从 1911 年革命时起就加入国民党的分子组成的。他们同旧贵族、旧官僚有联系，同外国企业主有联系。国民党的这部分人不单是离开，而且是在争夺党内大多数、争夺机关。基于这种情况，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发生了争斗。共产党对整个国民党采取的方针是：设法孤立右派，不指责整个党，而要揭露国民党右派当中的那些不仅要脱离国民党而且企图分裂党的分子。我们要在不使党感到难堪的情况下把这些分子开除出党。的确，国民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表明党保持了团结。但为了纯洁党和使党能对中派和左派产生更大的影响，终归不得不把一些右派开除出党。现在特别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内保持统一

战线。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紧密联盟，我们就不能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因此我们认为，最近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不仅是保持统一战线，而且是扩大统一战线。我们认为，不仅需要使国民党人加入统一战线，而且需要使那些愿意反帝的政治派别和人士加入统一战线。在中国有纯粹民族主义的派别，可以让它们加入这个战线。共产党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保持统一战线和巩固统一战线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帝国主义者表现得比以前更加活跃。去年发生上海事变时，可以说，帝国主义者茫然不知所措，劲头骤然消失，他们在几个月间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措施来镇压社会运动。而现在，当国民运动出现某种间歇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方开始变得更加活跃，不久前发生的中东铁路冲突，就可以认为是日本人在北方活跃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天津与上海之间煤矿的大歇业。这是英国人活跃的表现。在南方，香港总督不愿同香港商人继续对话^①。这又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主动的例子。可以认为，在这方面英日帝国主义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帝国主义者想利用今天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间歇以统一战线形式或按单个地段发起攻势，不管怎么说是要发起攻势。

美国不会采取积极步骤进行武装干涉或给予武力支援，但会迎合国民党右派，它不会镇压民族运动，而会通过政治、外交、报刊、工会等途径瓦解民族运动。所以帝国主义者试图从各个方面(从思想方面或通过军事途径)镇压和瓦解民族运动。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有统一战线，所以保持国民党的团结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现在我来谈谈近几周的中国运动和今后的前景。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的运动已转入低潮。国民军在北方遭到了失败，在国民运动中没有以前那样引人注目的行动，没有示威游行和以前那样的罢工浪潮。好像革命浪潮已开始退落。而实际

^① 原文如此。

上并不是这样。的确，没有引人注目的行动，没有罢工浪潮，但这种行动也不会是不间断的。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国民运动并没有遭到失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采取行动，还不是全体城市工人群众都参加了斗争。只是现在我们看到，像天津这样的城市，在上海掀起罢工浪潮时，并没有开展支援上海的运动，因为那里是帝国主义者的一统天下，工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天津是中国的一个大的革命中心。第三天在天津举行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北方召开代表大会^①。北方工人开始活跃起来。确实，这是在华中、华南浪潮低落的时候。现在北方工人开始参加斗争了。这意味着工人运动没有失败。同样国民运动也可以这么说。有许多省只是现在才参加反帝运动。整个直隶省就是这样。由此可见，国民运动很有潜力，它没有失败。由于军事上的重新组合它放慢了速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军事上的重新组合过程。日本人支持张作霖，英国人支持吴佩孚。因此在中国发生了军事上的重新组合。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重新组合是这样进行的：国民军是基本军事力量，没有因为重新组合而丧失这个地位。山东省虽有张作霖安插的人，看来还会站到国民军一边。北方在这次重新组合期间，军事力量在集中，同张作霖力量合在一起，张作霖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不久前有报道说，他想宣布满洲独立^②，这表明，在北方，军事力量在集中，但不是为了立即发起全国性的斗争，而是为了在北方聚集力量，经过一段时间再开始行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某种稳定的和军事喘息的时期。中国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我们面临一个喘息时期，这时国民运动还没有遭到失败，它在聚集力量，在组织和集中力量。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新的军事冲突。

^① 第一次（1924年）和第二次（1925年）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相应在中国北方北京和郑州举行。

^② 见本书第37页注②。

在这样的军事政治形势下，国共两党面临着什么任务呢？应该说有以下任务：国共两党仍要提出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和召开全国国民会议的口号。同时它们应该明白，主要问题是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以及在农民当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应当利用这个时期协调和巩固通过开展运动而取得的成果。然后需要开展反帝运动，重点是反对英国人。应当争取使直隶集团保持中立，使军事集团加入反帝运动。这里需要说一说吴佩孚。这是在去年以前起过很大作用的著名将领。上海事变期间和之后，他本应保持中立，不反对国民军。现在当张作霖能在北方打败国民军并赢得喘息时间的时候，吴佩孚也想显露头角和取得充当军事因素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在他所在的地区和他活动的那些省份搞臭他，说他不反对张作霖，而反对国民军，实际上是在帮助张作霖，也是在帮助日本人和英国人，然后要使他对方保持中立。

国共两党应当明白，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组织包括国民党左派、中派和纯粹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统一战线。可以认为，国共两党是能够坚持和发展反帝统一战线的。解放运动的浪潮自去年5月以来不仅把大港口的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了，而且很明显的是，在华南这半年间已把40万农民组织到农会中来了。中国的农会是同地方当局、同地主作斗争的战斗组织，它们必然被卷入反帝斗争。不过不只是在南方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在国民军地区，在离北京不远的……省^①也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两个月以前我们看到了农民的示威行动。农民要求取消农产品进城税。在中国有中世纪的法律，按照这种法律，农民运产品进城，要纳税（洛佐夫斯基：巴黎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最近，如果在奉天人和国民军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一旦国民军取得胜利，能组建中央政府吗？能像国共两党纲领中所说的，召

^① 原文如此，应是河南省。

开全国国民会议吗？这将取决于国共两党是否善于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组织社会运动和国民党能对国民军产生多大影响。与这些问题直接相联系的是能否成立国民政府和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口号（即国共两党在上海事变一开始就提出的统一国家、建立中央政府的口号）将是国共两党在使奉天势力遭到失败后所遵循的指导性口号。

洛佐夫斯基：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在开始发生变化，我想提请主席团和各国党的代表们注意共产国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总的说来，目前的形势是这样：我们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即日本方面和英国方面的再次武装干涉问题。

鉴于工人阶级为成为有组织的阶级做了很多工作，鉴于工会联合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所以社会上的斗争、国民运动中的社会矛盾也会在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民主政党^①中日益加剧。在这个党内部将会发生分化。

我们在中国所面临的武装干涉威胁，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会激化党内的社会矛盾。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将转到帝国主义方面来反对工人阶级。已有迹象表明，一部分中国大资产阶级已站到帝国主义者方面。在国民运动内部就要发生分化。

国民党是由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即工人、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社会上发生的斗争会立即在分裂的事实上有反映。

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如何呢？共产党有4500名拥护者，而在国民党队伍中有50万人〔这个数字是在（广州）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

即便国民党队伍有3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对比对我们

^① 指国民党。

党也不利。在国民党内和在它的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

你们自己可以看到，这种分化，各种运动之间的这种斗争将朝什么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党有4500名党员，并且它领导着工会运动，我们还有6000多名共青团员，但是力量对比还是对共产党不利。成千上万的工人、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

在中国，没有德法等国的那种社会民主党。这就是说，国民党内不存在欧洲式的孟什维主义。现时一切思想斗争都会以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遭驱逐而告结束。我预料，最近几个月内，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会发生分化。大资产阶级会反对加强民族斗争。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中国党和(共产)国际提出一个大难题：开始要加强对工会运动的领导，也就是对产业工人的领导，然后要对城乡小资产阶级施加影响。

为此需要做什么工作呢？我觉得，我们党最迫切的任务是把所有力量集中到工会运动上来，还要吸收无产阶级力量以增加我们党的人数，因为力量对比对我们很不利，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被拖入同极左派、中派和右派的斗争中。这场斗争会使我们处于非常复杂的境地。所以要做以下工作。

1. 把我们党的力量集中到吸引工业无产阶级的工作上；
2. 吸收城市的产业工人加入我们党；
3. 加强同极右派的斗争，同时继续维护民族统一战线。

我还想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共产)国际本身和中国工人运动。(共产)国际和各国党在不久前的中国风潮期间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我认为，我们做的不够。中国发生的风潮的规模，那里进行的斗争，都是同欧洲劳苦大众以至党的积极分子所熟悉的这类行动无与伦比的。在欧洲，人们传统上认为，似乎我们只对欧洲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然而，中国的风潮具有很大的国

际意义，必须使中国将来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我们的会晤中，在我们的报刊上，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有所反映，并占有位置，使欧洲工人阶级了解这些事件的世界意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欧洲这里，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有另一种性质的统一战线。中国是我们在那里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情况的特殊性，这证明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角度来看我们共产党的策略是有灵活性的。但是在我们的一些党内，人们不了解这一点，总的来说，在共产国际中，人们不了解我们中国党的处境，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国民运动中使用这个策略，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的所有党员都应当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还要建议委托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同志^①……起草一个关于中国党的这种特殊情况和中国工人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可以用各种文字在所有代表当中散发，对于我们所有的党来说，对于我们所有的斗士来说，再一次了解这个很复杂的、并且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的一切细节，都是很有好处的。

曼努伊尔斯基：在我们的日程上有一项是讨论国际运动中的新现象。如果我们结合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谈的内容提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那是很有好处的。我觉得，最近我们有两大事件：首先是今年夏天^②的上海罢工。一年前在印度就发生过这种事件，那是孟买罢工^③。

我问自己，是否到了修改或者补充（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

① 删节号是原来有的，可能是蔡和森。

② 原文如此，应为1925年夏天。

③ 1924年和1925年在孟买发生两次纺织工人大罢工，每次都持续约三个月时间。

族运动的提纲的时候了。在这个提纲中我们恰恰指出，我们党、我们支部的策略应当是支持现有形式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资产阶级运动。我们不需要修改这个提纲，但是我觉得在各个国家都可以看到……^① 我们在最近所谈到的罢工运动，给（共产）国际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还没有到要把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洛佐夫斯基同志谈论孟什维主义呢；他曾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寻找过这个孟什维主义。他认为像鼠疫等许多其他现象一样，孟什维主义应该在中国存在。他在中国没有找到这种现象，他说，看来，国民党代表中国的孟什维主义，也可能是我们在中国制造孟什维主义。

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支持中国现有的民族运动。如果与俄国 1905 年革命前夕的孟什维克策略作比较，如果洛佐夫斯基同志在寻求这种比较，那么可能他这样做是为了对我们的策略提出怀疑，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中国实行孟什维克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到了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在现时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触怒国民党。党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程度了呢？

其次，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对殖民地工人运动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在现时情况下，我们应当提出，整个问题确实是美俄工会之间争夺工人的斗争^②。美国劳工联合会遵循自己政府的政策将要放弃门罗主义^③。所以，同志们，如果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真的想组织左翼，我们就应该寻找盟友，而我认为，殖民地的工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

③ 门罗主义是 1823 年美国总统一乔治·门罗在给国会的信中提出的美国政府外交纲领。该纲领宣布美欧国家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美国实力的增长取决于并入新的领地。

人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因为他们受到多两倍的剥削：从国家角度来说，在社会等级中他们是被压迫者。

我看了南非支部提出的报告。我看到欧洲工人的工资比黑人工人的工资高出9倍。同志们，我想，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何况这个无产阶级保持着不发达革命力量的全部潜力。我想，在目前形势下，需要我们更加重视这个运动，特别是在我们想同阿姆斯特丹右翼^①，也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那个右翼作斗争的时候更需要这样做。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应当提到执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谢马尔：我理解洛佐夫斯基同志对中国局势的担心，因为在那里有4500名成员的党加入了有50万成员的国民党。但我不同意他对中国有可能产生孟什维克党的担心。

报告人同志没有充分说明我们党的影响问题，没有说它是否是国民党政治机关、工会机关和农民运动的真正主人。为弄清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党的真实作用和它对各种运动的影响。

我认为，我们当然应当控制它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种保证，尽管我们中国党存在着党员数量不多的弱点。

作为发展前景，有人给我们指出，存在着帝国主义在几个月后进行武装干涉和国民党垮台的威胁。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随着对民族力量的军事进攻的开始，国民党将会发生分裂，而这种分裂过程也会在军队中发生。

我们需要有关民族武装力量的状况及其能力的材料，以及有关工人阶级能借助于罢工或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给予它们多大支持以阻止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的材料。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党在现时条件下，即在民族武装力量准备与那些为日英帝国主义效劳的军阀相抗衡的时候，取得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把工农群众吸引到

^① 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国际工会联合会），该组织是在1919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民主工会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45年解散。

斗争中来的可能性。同时必须说明，同国民党以外的组织可以组成怎样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有人对我们说，在国民党以外不存在有前途的组织。那么它们是什么性质的，它们进行斗争的能力如何，它们组成反对武装干涉的统一战线的的能力如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目前局势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还有一点是我们开展工会运动的能力。好在有人向我们说明了最近工人进攻行动的发展情况，但没有向我们提供我们党对罢工斗争提出的全面的要求纲领，没有说明是不是我们党在领导罢工斗争。如果只有国民党同我们党合作才能领导罢工运动，那确实是危险的。在危急的形势下如果国民党发生分裂，我们就会失去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我想，为了明确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弄清这一点。

洛佐夫斯基：我没有说我们如何对待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当我们分析中国的形势，分析党同国民党（唯一的革命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时，必然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在中国，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有没有产生孟什维主义的可能性？回答是有，因为孟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仅可以来到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殖民地国家也可以找到一定的土壤。

如果我们问，孟什维主义来自何方？回答是来自国民党，是国民党在其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的斗争中发生分化之后。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社会联系的加强，社会矛盾也会在国民党内有所反映。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内的孟什维主义。尽管我们尽一切可能排除产生孟什维克党的可能性，但它还是会出现的。其次，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们可以在殖民地工人阶级当中找到欧洲左翼的盟友，我认为他错误地提出了问题。何谓错误地提出了问题和为什么说这是错误的呢？因为左翼对于欧洲来说是进步的，而对于殖民地来说是退步的。建立左翼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不是我们的任务，殖民地国家的工人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天然

盟友，但不是左翼。他们同我们一起前进，但我们的目标不允许这个左翼同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人士和工会联合，或者说这些社会人士将起消极作用^①。

最后一个问题是罢工问题。在中国，我们有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形：工人阶级已表明它是一支力量，甚至它能迫使雇主作出让步。例如，在上海，现在雇主不得不重视工会，他们不能再像一年前那样对待中国工人，这是事实。运动取得了如此的发展，以至所有帝国主义者都不得不重视这个工人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印度的罢工从各个角度来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组织在开始形成，因为这些组织是在罢工中形成的，然后继续进行斗争。在印度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在这里，我们的党在成长壮大，并在罢工过程中聚集力量。

当我说我们党的最重要任务是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工会运动上来的时候，我是指，我们可以利用工会运动把成千上万工人吸引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以保证工人运动将得到共产党和革命分子的指导。

这就是我想说的意见。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总报告中，在工会委员会中和在我提出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

季诺维也夫：我认为，中国问题在即将举行的执委会扩大全会上将起很大作用。今天，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罢工运动，特别是上海的罢工运动，将是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此我们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虽然我们处于运动的初期，在中国也是这样。我这里有一张图，大致标出了民族运动发展的地区。你们可以看到两三

① 原文如此。

个有萌芽的地方和暂时还没有发生任何情况的大片地区。我们处在这种运动的初始时期。但是从长远发展角度看，那里发生的事情将是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不久前由梁赞诺夫同志发表的那篇马克思论述中国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件的文章^①，假如马克思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对去年发生的这些事件定会给以很大的注意。

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国民党是否会变成孟什维克党或资产阶级党呢？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这取决于整个世界革命的进程。如果分析一下民族运动的类型，把国民党同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的运动作个比较则是很有意思的。过去，凯末尔主义者大体上同现在的国民党运动是一样的，当然也有些差异。那么国民党的运动会退化成某种凯末尔主义者的运动吗？当然可能！它很可能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人民运动，变成凯末尔主义者的运动所变成的那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运动。

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本国的社会结构和欧洲总的事态发展，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有人谈到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工人领导了中国的运动。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苏维埃俄国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国际组织即共产国际，虽然还很弱小，但现在已经联合了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可以抽象地从理论上来设想没有苏维埃俄国的帮助和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的中国运动。那时会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影响吗？绝对感觉不到。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也谈不上领导权问题。这还取决于整个世界革命进程的情况如何。抽象地拿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它本身没有能力在中国实施领导权，但借助于苏维埃俄国和日益坚强的共产国际，这个弱小

^① 1925年7月14日，И. Б. 梁赞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的译文。

的中国无产阶级就能够实施领导权。这一年的事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孟什维主义在中国。我不认为，孟什维主义现在就会发生，虽然说孟什维主义，这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在业已成为帝国主义政策对象的国家可能发生的现象，例如在意大利，在那里的工人当中有相当大的孟什维克影响的萌芽。有可能第二国际从美国经日本来到中国。我们还要讲工人阶级美国化的问题。这是个新题目。这种美国化在欧洲已经开始，如在德国建立工人银行等等。

但是我认为，当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壮大，而资产阶级看到那里出现了一支多么强大的力量的时候，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的所有代理人就会试图摧毁这个运动。他们已经着手做这件事了。我认为，他们只能通过日本来做这件事，因为在日本改良主义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可以通过日本把这些社会和平主义思潮从美国引入中国，以便把工人运动的萌芽从我们的手中夺走。

决定：维经斯基同志的报告备案待查并交维经斯基同志一项任务：把这个报告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将译文分送给扩大执委会全体成员。

季诺维也夫：我建议让维经斯基同志再报告一下我们的东方部是如何设想扩大执委会的工作的。

维经斯基：（讲俄语）^①

季诺维也夫：（继续）^②

可能会是这样，我们应该加以反对。我认为，我们整个工作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我们不善于向欧洲工人运动充分说明中国事件的实质。虽然说孙逸仙和国民党这些名字现在比以前更为人所知，但现在还是知者甚少。这应该是我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我认为从实际安排上说，我们应该增加访问苏俄代表团次数，也就是

① 1. 11. 维经斯基的发言在速记稿中没有。

② 原文如此。

应该组织中国和欧洲代表团互访。可以组织对英国（到那里去可能又复杂一些）、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访问，以及欧洲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没有一个代表团去过中国，广州其实是中国的小莫斯科，到过那里的同志都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首先是共产国际的同志，即鲍罗廷同志。这是事实。为什么不向那里派代表团？这不只是出于好奇，而且是因为在那里有我们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具体讨论一下，能否组织中国工人代表团同欧洲代表团的相互交流，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

我们还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即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组织关系问题。至今这个问题还不明确。他们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国民党的领袖之一……^①将军在莫斯科这里，前天我接待了他^②。他是领导成员。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加入共产国际，在我们的章程中有这样一条：我们可以接纳一些同情我们的党。我们应该建立这种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何从组织手续上解决这个问题。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民主因素有可能得到加强，但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应付裕如的话，以后就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人的影响微不足道。现在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下次会议上我们应拿出更多的精力来讨论这个东方问题。我们还不善于利用第二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请回想一下它

① 原文如此。应是邵汉民。

② 见第14号文件。

的立场。中国工人在进行斗争的时刻曾找过阿姆斯特丹和第二国际寻求帮助^①。它们是怎样答复的呢？它们作了什么答复都被忘却了：说它们还在等待新的材料，它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是英国人向中国人开枪，还是可能相反。这是在中国人民开始觉醒的时候就世界历史问题对第二国际的历史性揭露。这应该成为反对第二国际的重要论据之一。我们应该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未能兜售其货色之前，就使它们的声誉扫地。

我认为，因此我们现在也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关注日本的运动。我们将设立一个大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些问题。确实，现在到了欧洲同志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过去“布尔什维克”一词在欧洲并不是这样为人所知，而现在到了让诸如“国民党”这样的词在欧洲工人当中更流行的时候了。只有在欧洲工人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把国民党运动作为真正的革命运动保持下去。否则它可能变成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最终将不是赞成世界革命，而是反对世界革命。

我只是从洛佐夫斯基同志那里听到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他建议维经斯基同志写出书面报告，并用各种文字分送给执委会全体成员。还有一个要求：请维经斯基同志向会议报告，东方部对执委会的整个工作安排是怎么考虑的。

接着发言的是：

维经斯基（讲俄语）^②。

洛佐夫斯基（讲法语）。

季诺维也夫。

洛佐夫斯基^③。

① 1925年7月12日上海总工会通过红色工会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请求国际无产阶级给以支持。

② F. H. 维经斯基的发言在速记稿中没有。

③ C. A. 洛佐夫斯基的发言在速记稿中没有。

谢马尔^①。

洛佐夫斯基：我认为，可能有必要改变我们东方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最“帝国主义的”委员会。它联合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党，都堆积到一块了……^②到了需要为所有这些国家不是设立一个委员会而是设立四个委员会的时候了，即为中国、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各设一个委员会。

在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需要考虑设立专门委员会^③来分别研究这些问题。

季诺维也夫：维经斯基同志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将成立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专门委员会以及综合这些专门委员会工作的联合委员会。

在初步讨论东方部本身的改组问题时，有人曾提出意见，要求我们在主席团中付出比以前更多的精力来研究东方部的工作，大体上是50%用来研究东方问题，50%用来研究西欧问题，我拥护这个意见。

至此讨论问题暂告结束。

维经斯基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结束语

我简单地谈一谈洛佐夫斯基同志就中国产生孟什维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可以说，国民党是有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倾向，这主要涉及国民党右派。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也在形成。但不是孟什维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至于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左翼不接近中国工人运动，我认为不该有这种担心。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左翼应当尽可能多地，当

^① 11. 谢马尔的发言在速记稿中没有。

^② 原文如此。

^③ 这里说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的专门委员会。

然是在我们的推动下，接近中国工人运动。在这里我们要起足够的作用。否则我们也无法想象我们如何推动，这种推动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提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即是否该对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支持民族运动的提纲作些修改？是否需要提出民族运动的分化问题和东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我要说，问题现在可以提出，但不要着急。上海事变和中国的运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工人是民族运动的发起者，他们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我们在港口城市和在有铁路的城市看到了这一点。农民大众必然会反对帝国主义。城市居民，即小手工业者、店主等已聚集到工人阶级周围。不能说工人阶级领导了（运动）。工人阶级由于自己的坚决态度和处于前哨阵地，它把所有这些居民阶层都吸引到运动中来了。但是农民不是很快就行动起来。如果说他们紧随工人之后行动起来，那是在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地方。中国的经验说明，在港口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民族运动的发起者，但没有证明它是运动的领导者。它只是吸引了所有群众，而要成为这种运动的领导者，它还需要更成熟些。

谢马尔同志提出一些有关党在各种组织中的影响的问题，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是什么？我们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其他组织中的机关。我们党有自己的生活。它在有机地发展壮大，吸收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优秀分子，但同时它又是其他组织中的机关。如果拿中央的一些部来说^①，那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员。在工会中，机关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同志。工会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情况也是这样。那里有政治部，有我们共产党的影响。那里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军的军事部^②也有足够数量的共产党员。我们这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

② 原文如此。

个小党有没有被淹没在所有这些组织中的危险呢?当然有。因此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是,无论如何要发展我们的党。这样做有客观条件。但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缺乏力量。运动发展得非常快,工人群众却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很快地组织起来。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无论如何要发展党的问题。

关于国民党的分化问题。分化在发生,但没有任何危险。说什么国民党会突然垮台,一方面会从中产生真正的孟什维克党,然后是法西斯主义。发展进程并非这么快。国民党早就存在,分化只是刚刚开始,而我们却讲国民党要垮台了。

关于国民军的力量问题。国民军和中国的所有军队一样都是雇佣军。谈不上人民将同情国民军并向它们提供兵员以便把它们动员起来的问题。中国有足够的兵员,而没有经费。当然农民是会同情国民军,但不是向军队提供农民兵员,而是给予物质支援。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很可能将来还会有这种情况。国民军有近35万人,对手约有30万人。

关于我们党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在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有200万到250万。这是在一个很大的国度里。不言而喻,还有辅助条件,即有几百万革命的小手工业者。这是大量的革命干部。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我们在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南方有唯一的一个例子。在那里,工农联盟实际上是在同反革命和同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实现的,所以在许多其他省份,自然也有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可以在反帝民族斗争过程中加以实现。

我们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有保证的。而如果我们党不发展,如果我们不从组织上打下牢固基础,那么当然我们是有失去部分领导权的危险的。我不认为,由于国民党发生瓦解、分化,我们就会失去领导权。国民党是会发生分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充当外国资本和中国原料之间中介的资产阶级将离去,国民党的这一部分对工人没有影响。国民党主要是通过我们或国民

党左派对工人施加影响。而我们对左派还有影响。所以国民党发生分化时，我们不会失去领导权。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51，第 8—48 页。

（维经斯基的发言）俄文打字稿、（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谢马尔的发言）法文打字稿和（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德文打字稿。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2 月 11 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多加多夫、克维林、科肖尔、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托洛孔采夫、契切林、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洛莫夫、瑟尔佐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5- 关于在中山大学设立俄中翻译班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 月 28 日会议第 8 号记录，决定，3），（报告人：温施利赫特

同志）。

决定：5— 采纳温施利赫特和拉狄克同志的以下建议：

[1] 中山大学从现有学员中挑选出最适合当翻译的 50 人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培训。

[2] 把必要的军事、政治课程纳入培训翻译计划。

1926 年 2 月 9 日

听取：29— 关于伊万诺夫斯基同志^①的电报问题。

决定：29— 采纳斯大林同志关于给伊万诺夫斯基同志发去以下电报的建议。

“鉴于您报告说，对中东铁路上的中国职工的工作薄弱，一些俄国铁路员工存在着沙文主义思想，而某些地方工会组织试图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最后通牒，中央建议：

[1] 为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制订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指示，加强对中东铁路上的中国职工的政治工作和专业工作并从他们当中清除祖巴托夫分子和白卫分子；

[2] 为消除某些铁路员工中存在的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格格不入的沙文主义情绪，要对铁路职工进行一次清理，以便在不长时间内解除那些以搞沙文主义而臭名昭著的人的工作；

[3] 禁止地方工会组织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任何最后通牒，并向它们说明，解决中东铁路冲突纯属苏联政府及其驻满洲代表的事情，中国地方当局的一切违背协定行为，现在只能通过苏联政府代表同中国政府代表的谈判来消除；

[4] 提醒中东铁路职工，满洲的主人是中国人民，中东铁路不是经过我们的领土，而是经过中国的领土，职工应当领会同中国居民，特别是同中国工农的友好政策，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对

① A. C. 乔勃诺夫。

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来说才是体面的，正是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共和国才是强大的。这样的政策是既能抵制帝国主义又能抵制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提出的一切责难的重要消毒剂。

[5] 本着这些指示精神组织对中东铁路员工的宣传工作；

[6] 警告中东铁路员工，我们将解除任何违背这些指示的人的工作；

至于伊万诺夫同志辞职的问题，请告诉他，中央不同意他辞职。”

听取：30·“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就满洲事变告全体劳动者书初稿（政治局 1926 年 2 月 4 日会议第 9 号记录，决定：1—[1]）

决定：30—批准并作一些修改（见附录--）^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6，第 2—3、9—10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发表在 1926 年 2 月 11 日的《消息报》上。

17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
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

1926年2月11日于北京

绝密

政治局使团会议速记稿^①

主持：布勃诺夫同志。

出席：列普谢、隆格瓦、库比雅克、加拉罕、叶戈罗夫、索洛维约夫和特里福诺夫同志。

.....

布勃诺夫同志：还要听取加拉罕同志的发言。

加拉罕同志^②：我认为，这里所谈的问题，有许多是不能通过简单地交换意见就可以解决的，例如关于在国民军中的工作成果

① 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馆藏文件集中有 A. C. 布勃诺夫（伊万诺夫斯基）使团 1926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的速记稿。2 月 11 日使团听取了武官 A. H. 叶戈罗夫及其助理 B. A. 特里福诺夫和全权代表 Л. M. 加拉罕的发言；2 月 12 日听取了 M. 阿尔斯基（B. M. 施坦因）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2 月 14 日听取了广州组顾问尼洛夫（P. H. 萨赫诺夫斯基）、B. H. 捷列沙托夫、A. H. 切列潘诺夫的通报；2 月 15 日听取了冯玉祥的顾问 B. M. 普里马科夫的报告和 M. M. 鲍罗廷报告的第一部分；2 月 17 日听取了鲍罗廷报告的结束部分。鉴于上面列数的材料篇幅很大，在本文件集中仅发表加拉罕的发言和鲍罗廷的报告。对叶戈罗夫、特里福诺夫、尼洛夫、捷列沙托夫、切列潘诺夫和鲍罗廷的发言的简要叙述，见 A. H. 切列潘诺夫：《一位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 327—341、348—350 页。叶戈罗夫和特里福诺夫立场的实质在所发表的加拉罕的政治发言中也有相应的反映。还可见《B. A. 特里福诺夫的中国档案摘录》一文，载《远东问题》杂志 1990 年第 3 期第 110—123 页。

② 在使团白天会议上的发言。

问题和其他一些与已经做过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可能我们也需要听取这些军（第一军、第二军等）的工作人员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有明确的概念，我们才能作出果断的决定。不过我认为，鉴于对这个问题还要进行更长时间和更深入的讨论，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谈谈这项工作。

至于叶戈罗夫同志和特里福诺夫同志谈到的总计划和总任务，我并不认为需要对特里福诺夫同志的全部想法作出很详尽的分析，但是他的想法与我们在这里所执行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还是有必要谈一谈。我认为，特里福诺夫同志和叶戈罗夫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同一个。在他们的想法中我看不出有大的差别，差别仅在于，叶戈罗夫同志没有讲完，而特里福诺夫以他特有的坦率摆出了所有理由，这就便于弄清楚他的建议的实质。要知道，实际上中国问题有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当我们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时，中国是什么呢？它是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战线的一个重要地段。这不是空话，这是我们应有的基本出发点。我提醒你们不要忘记土耳其和凯末尔。土耳其和凯末尔就其内涵而言，就其心理和政治而言是什么呢？我们是怎样看待土耳其的呢？这是政府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的一个地段，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被压迫人民打仗，帮助他们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曾给予凯末尔很大帮助。

布勃诺夫同志：做得对。

加拉罕同志：您肯定这样做是对的，我很高兴。尽管凯末尔是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这样做了。我们给他送去了黄金，收到了送去黄金的收条，而他在这个时候枪杀我们共产党人，不让我们工会存在。土耳其的反动派穷凶极恶地反对工人、反对共产党人，而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他钱，给他援助，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土耳其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的一个地段。如果你们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问题，你们可以看到，中

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所有进行这种斗争的力量。不管国内实行什么政策我们都应该给予帮助，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斗争地段，并且有许多事情取决于这种斗争。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帝国主义和反帝力量之间在进行怎样的斗争。如果我们只从这个限定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说，我们应该支持的不只是国民党，不只是纯革命组织，而是一切反帝力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这就是：我们有张作霖的具体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现在与张作霖联手的在长江彼岸的吴佩孚的具体力量；另一方面我们有联合反帝的国民军。你们会说，可能这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过一支力量，即曾一度占领全国的张作霖。现在这支力量被消灭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局限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省份。与两年前相比，它们的地盘很小。我们拥有一支反帝的力量——国民军。这是对于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十分明确十分清楚的公式。现在我谈谈对冯^①的怀疑，谈谈你们的看法，你们认为他不诚实，他是叛徒、骗子、变节分子等。当然，在一些人士中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冯是不可靠的人，他可能叛变。的确，在某些人士中对他没有好感。如果我们把谁不喜欢冯的传闻收集起来，我们可以排出一个很长的社会界、报界等的名单。但要知道，这是错误的做法。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的真正革命分子是如何对待他的？谁是革命分子呢？学生。

特里福诺夫同志：共产党中央。

加拉罕同志：是的，还有共产党中央。谁也不该漏掉。我想说，学生，共产党中央，工人组织都是跟冯走和支持冯的人民革命因素，他们跟他走是因为他们认为冯是不受苏俄左右的力量，是

^① 冯玉祥。

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这并非无关紧要。你们看外国报纸时（在这里你们更容易看到外国报纸），看到人们在骂冯的时候，你们就会得出结论，国内有反冯情绪。这是不对的。诚实的中国人，他们拥护冯，支持冯。去年，当全中国燃起战火、被革命烈火笼罩时，在军阀中谁曾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呢？是冯。你们说，他不诚实，他想利用社会舆论，他是阴谋家，等等。要知道一切政治事件都是社会因素。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人民进行的斗争中，国民军而首先是冯的第一军保护了革命的社会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冯和第一军是如何日益沿着与人民群众接近的轨道发展的。比较一下两年前的情况是可以看出这一点的。你们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看到冯的现状，看到国民军第一军后院发生的情况时，你们开始得出悲观的结论。但你们要看一看，问一问国民军和冯在两年前是什么情况，冯有没有什么政治面目。你们得到的回答会是，他没有任何政治面目，而现在他成了具有一定声望和影响的著名政治人物。对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不能不考虑这个情况。你们说，他收买工会上层。这是常有的事，但须知这个上层只是在张家口。对于真正的社会活动家来说，当然这样做是不光彩的，但不能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我们同国民军的合作，结果出现了收买社会组织的现象。当然，应当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但是作出这种结论，这就是在对我们所具有的组织形式作出评价时提出的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我们有另一支土匪式的军队，即政治素养很差的第二军。你们知道那里是怎么工作的吗？说那里在收买工人组织上层，我不清楚，其实你们看到过这支军队^①，但不管怎么说，假如你们看到过，你们就会相信，那里对农民，对工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那里有共产党人坐阵。共产党人在暗地里做反对岳维峻的工作。他们将反对岳维峻，但在那里也有国民党可与之共事

^① 原文如此，应为：没有看到过。

的社会力量。我不清楚，你们是否了解这项工作，但我们可以叫来省委书记^①，请他作个报告，讲讲他们在那里如何做工作和吴佩孚在河南时那里的工作条件怎样。不久前刚刚度过遭吴佩孚枪杀的工人的纪念日^②。你们不能忘记这一天，不要根据岳维峻是军阀，是国民党人，他的军队无组织无纪律，就作出农民等反对他的结论。不要忘记，你们是在中国，在这里要接触真正的黎民百姓。我们在河南要利用国民军，一定要利用。你们试图证明，在河南，农民反对国民军，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农民反对过我们红军没有？当然，反对过，也应该是反对过，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到一定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政权本身是工农政权的国家会这样呢？不管怎么说，农民群众是反对过这个政权的。

列普谢同志：农民没有觉悟，因为没有觉悟他们才反对。

加拉罕同志：那么说这里是因为自己的觉悟问题了？不能用这样的事实来掩盖真相，这样的事实可以找到很多。但它们不能为作出广大群众反对国民军的结论提供根据。

特里福诺夫同志：不过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事实。

加拉罕同志：当然，应该考虑到，并设法加以改变。在广州也发生过农民反对军队的暴动。你们记得，两年前农民还对这支军队表示不满，而现在那里的农民同军队一起行动。为什么你们认为在国民军中不能这样做呢？你们问问同志们，广大群众对国民军第一军是什么态度？我问过我们的一名骑兵，他是跟第一军的一支部队行动的。他说，农民铺地毯迎接他们，而当他们离开时，老百姓，甚至妇女下跪请求他们留下，因为他们害怕张作霖的土匪卷土重来。这是事实，应该认真思考这种事实，而不要这样讲国民军。按照你们的想象，国民军是什么呢？是某种不必要的组织，那里没有我们在广州军队中所设的政治部。但毫无疑问，

^① 何人不知。

^② 指1923年2月7日枪杀罢工铁路工人事件。

国民军同民众更接近，它们接近民众，这是你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对国民军的态度是什么呢？不只是要建立政治部机关。你们开玩笑地讲了我们怎样来到第一军的：军事工作人员来了，没有地方安排他们，把他们交给了冯。这是不严肃的。在向政治局使团报告这些情况之前，应该先审查一下材料，先研究一下。

特里福诺夫同志：这是目击者的叙述。

加拉罕同志：我确信，先应十分认真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同冯的关系。我们做冯的工作不只是从他在1924年春拒绝签署条件时^①开始的。我们的关系不是偶然的，要知道，冯研究过俄国军队，结果没有任何收获。我不记得为什么没有收获。但在1924年春天以前我们就在步骤地做冯的工作了。我们有经常不断的工作联系。几乎每天晚上充当我和冯之间传递员的鲍威尔都来我这里。不要以为，只是偶然发现了第一军，就抓住它开展工作。你们一来到这里就接触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则不同，我们非常认真地了解了军队的情况，了解了应该同谁建立联系，我们曾试图同吴佩孚建立联系，我们曾考虑过能否抓住他的问题，也许由他这里产生一个国家政权。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同吴佩孚合不来，因为他反对国民党。1924年初，甚至在1923年，我就讲过，如果我们能使吴佩孚同冯玉祥联手和解，那是最理想的。但吴佩孚无论如何不同意这样做。我想说，我们猎取某一个军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再有，当我们刚开始做冯的工作时，他还不是什么人物，而由于我们的工作，特里福诺夫同志，他现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具有一定的形象和分量，我们在这里的影响当然不能排除，但应该把国民革命运动放在第一位，因为是这场运动改变了这个军阀。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将领，他们将同这个运动一起反对张作霖，反对帝国主义。

① 不清楚说的是什么条件

你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不好的东西，研究一些事件等等。从长远看，你们可以看出，冯是一个应当给予重视的重要人物。而我们去广州做工作，我们派去工作人员时，广州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①，有党^②，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在那里我们从何处着手呢？我将专门来讲这一点，讲广州，讲那里的工作安排。我想谈一谈叶戈罗夫同志和特里福诺夫同志所说的接近军队的方法。请向我们作出政治保证吧，如果有政治保证的话，那就请吧。换句话说，你们想同冯签订他同意作出一定政治保证的政治协议。但他不愿意签订这样的政治协议。我们有他在我不在时寄给索洛维约夫同志的提纲，在提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等等^③。对于军队的政治教育，我们也不能同冯签订我们要设立政治部等机构的协议。同样我们也不能给他提出一个庞大的组织计划和指望他接受这个计划。组织工作的新方法在中国军队中不可能很快被中国将领接受。要有一段时间，让他们在心理上习惯于自己身边有外国教官。我们看到，在广州，在较好的政治形势下做这项工作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在那里立即着手做能做的事情。第一军里的情况怎样呢？从军事观点讲，我们制订了一个很出色的计划，而……^④说：我们应该让冯把这个计划寄来。在军队中工作，你不仅要下达命令，约束自己，而且要展示自己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相信，你善于做某项工作，你熟悉中国情况。在小事上要表明，你善于做什么工作。例如林^⑤，他按另一种方式对待这项工作，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承担了什么工作呢？需要搞建设，就搞建设，

① 孙逸仙。

② 国民党。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⑤ B. M. 普里马科夫。

需要骑兵，就组建骑兵，需要射击，就教射击。这样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在那里开办了许多培训军官的学校，而这是很有好处的事情。你们顺便提到，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态度都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做了工作。你们对问题持讥讽态度，并说他们见到我们的顾问就微笑，而在政治上这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感兴趣。遗憾的是，我们的顾问不懂中文，只能靠微笑进行交流，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经过我们学校培训的每个军官和士兵都相信，我们能教给他们一些东西。你们可以问问林嘛！我相信，每个士兵和军官看到我们的顾问同他们并肩战斗在前线，无疑都会在这项工作中接近我们的顾问。他们知道俄国做了哪些工作。

我不谈我们把第一军建成了什么类型军队的问题。但我问过我们的同志，他们说，毫无疑问是做了有益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效果。第一军最后未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另一回事，因为高级指挥官即高级将领没有受过任何学校的培训，没有受过我们教官的训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不幸。我们的时间很少，我们只能训练基层指挥官。但这里需要做工作，你们应当同意这一点。当然，应该预见到许多事情，这一点我还要讲，不过我要强调指出，天津战役^①以前，我们在第一军中的工作是出色的：我们办了一些学校，我们开始在司令部中做工作。我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谈过话，包括同林，他们都说，他们那里有司令部，他们坐在司令部里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不是军事专家，但要是我们问他们，他们会对我们说，坐在司令部工作意味着什么。天津战役是一次考验，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不知道，这次失败是谁的过错。在天津战役期间，我们未能向将领们证明我们的计划是好的。为什么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军

^① 天津战役（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即国民军同张作霖军队的会战。1925年12月24日国民军占领天津，而3月22至23日放弃天津。

人的问题。我曾问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外行的印象是，我们的人对自己对将领们的影响力考虑不够，对形势考虑不够。他们表现出一些没有分寸的地方，他们没有分寸是逼人太甚。一句话，我们的人做得太过火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目前的形势。您，亚历山大·伊里奇^①，下令在某个日期前拿下天津。当然，有这个限期拿下天津的命令，人们就暴跳如雷了。结果天津战役怎么样呢？我们使一些将领与自己疏远了，我们干预得太厉害，他们开始斜眼看我们。天津战役后发生了某种转折。我们的人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林，以及对事实材料的分析都说明，这种情况现在在消失，也许会消失，但还没有根除。这说明，对工作的态度并非始终都正确，我们常犯各种错误，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某种协议我们就不能工作。其实，我们有协议。不能说有固定的工作计划才能工作。在接受这些事情之前，应当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很正常和很自然的是，我们不能要求在中国军队中……^②，而中国人一般对外国人都持特别怀疑的态度，不能要求我们在国民军中立即得到有影响而又稳固的地位。我想起了广州的情况。你们问问最先来的人，当时他们必须如何争取影响，如何在取得胜利后巩固自己的地位，以致现在才与军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否有过这种情况呢？也许我们工作做得不够，也许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下面我要谈一谈国民党和冯玉祥。亚历山大·伊里奇说，应当直截了当地向冯提出整编军队的问题。

叶戈罗夫同志：我讲的是方针。

加拉罕同志：方针意味着什么？是让我们坚持第一军同国民党接近的方针吗？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是要通过国民党做工作吗？在你们在场情况下我同国民党人交谈过，让他们

^① A. M. 叶戈罗夫。

^② 原文句子不完整——译者。

也坚持这个方针。如果我们讲方针，那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但如果我们要到冯那里说“整编自己的全部军队吧”，那不会有任何结果。要知道我们的首要难题是什么呢？是使冯相信，政治工作是非常好的东西，它不会使军队瓦解。其实我们至今只有游击式的尝试：组织一个又一个的俱乐部，出版报纸。冯曾要求我们提供政工人员。天津战役开始时，妨碍了他为军队组建政工学校。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他知道需要做政治工作，但不能像我们现在对待蒋介石这样对待他。要知道，这位将军毕竟没有完全抛弃中国的各种偏见，毕竟没有摆脱整个上千年的古老传统。他毕竟是他的军队的主人，他不让异己分子加入自己的军队。我要问：“如果为你的军队提供外国顾问，你会怎么办？”你会把他赶走，当然，谁都会这样做。而你们却想马上就设政工人员，还要设共产党员政工人员，这是危险的事情，不能马上做这件事。我们应当使人相信个人的经验是有助益的。我们应当通过事实证明这些政工人员对军队有好处。蒋介石要求提供政工人员时，他就说：给共产党员吧，不要国民党员，而要共产党员，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员最可靠，从来不出卖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信得过，最忠实，从来不动摇，有人格。而对于冯来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不是他完全信赖的人。要达到这个地步，要他完全信赖，需要做工作，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是要花一段时间的。冯对学校是什么态度呢？他开办了29人的学校。他让什么人进这所学校呢？他从自己的卫队里选送了29人。他不完全相信一切都会如意，因此他选了最信得过的人，即自己的贴身卫士，并对他们进行了政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到他那里说“通过国民党做工作”吗？我们应当更耐心更沉着地做这项工作，不要怕失败。冯曾经同意做政治工作，但后来张作霖给他发电报说：“我听说你同俄国人取得了联系，这不值得。”冯这时害怕同张作霖发生冲突。他派一名将领到我这里来说，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此事暂缓吧！这发生

在上海事件期间^①，于是我们将此事推迟了4、5个月。后来在上海事件后，他又同意做政治工作。因为不能在很大范围开展工作，就满足于派教官和暂停整个工作，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我还想谈谈第二军。如果你们想听我的意见的话，我要说我们在那里的人员选得不太好。第一批人员从专业技术和外表上看还不错，但不知为什么参谋部人员过多，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在那里刚开展工作，我们自己不知道，怎样做工作和做什么工作，当然，从一开始出现这种错误是很自然的。第二批人员从专业技术和道德品质上看差一些。向第二军派了40人，在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确实派了一些什么事情也没做的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我们根本搞不清情况，应该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们同第一军建立了联系，这是胡景翼^②的军队。我们已经事先认定了岳^③的一些品质，岳取代了胡景翼并说他将把胡的工作继续下去。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并且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月复一月地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知识。我们没有考虑到胡景翼有很大威望，是个处事果断的人。他找到我们还是在吴佩孚羽翼未丰，还不是自己军队的真正主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向那里派去自己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开展起来了。但后来来了岳维峻，是个摇摆不定的人。这个时候吴佩孚和直隶人开始崛起。岳维峻一方面不想同我们断绝关系，另一方面他必须考虑他身边坐着直隶人。他不能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靠近他，他怕这样做。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考虑到第二军中的复杂情况，以为胡景翼时是什么样，岳维峻时也是什么样。我们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不能再次作出这种结论。当时我们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请你们

① 指1925年的“五卅惨案”。

② 胡景翼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1925年4月去世；他的继承人是岳维峻。

③ 即岳维峻。

相信，我们不会再一次地犯错误。现在我们变得聪明多了。在第二批人员中有过什么错误吗？当然有。人们都呆着，无事可做，哪里也不让他们去，他们住在开封，非常闭塞，于是他们就在阻力最小的方面进行活动，这就是做政治工作，他们完全公开地开始在工会等组织中做工作，而且他们做了值得赞许的工作，既有实际工作又有组织工作，既做了农民的工作又做了工人组织的工作，还研究了农民问题。这样做好不好呢？当然，从军事形势角度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向来不好的将领们看到他们同工农混在一起，就更不信任他们了。现在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召回。

我还想讲一件事，即我们对国民军的援助问题。特里福诺夫同志作出结论说，由于我们援助国民军，等等，等等，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在变坏，因此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开始恶化。当然，在中国社会的某些人士中，现在在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运动，非常敌对，不只是因为 we 支持国民军，而且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将成为中国运动中的重大因素。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法西斯分子在如何组织起来。在右派当中肯定会进行反对我们的运动，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把一个重要的城市即遭到他们嘲笑的广州组织起来了，并且成了巩固的基地。帝国主义明显感觉到我们更巩固了。他们知道，如果说广州相当强大，那只是因为有俄国人在那里做工作。我们是否应该由此而得出这会造成严重麻烦的结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该卷起我们的旗帜了。其实你们都知道，在所有国家都在开展反对我们的运动，所以我们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说帝国主义者反对我们，英国报纸反对我们，中国社会中的右派反对我们，据此我们就得出结论，我们应当退让，那是不对的。相反，这应该证明我们是对的，证明我们变成了如此重要的因素，以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右派开始组织起来反对我们，因为

他们感觉到在中国对他们有多么严重的威胁。你们徒劳地以为，美国会联合和团结中国各社会团体。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对的。的确，这里阶级分化比较薄弱，但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在物质上有保障的人士会反对我们的，因为我们威胁他们的安宁，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实行的政策不好，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方针。我要指出，这是一种遇事张皇失措的典型表现。在中东铁路出现麻烦时，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来到我这里，简直就是发牢骚，说什么我们要加快民族革命运动，等等，等等，应该调进军队，等等。我当时很焦急，我问：“你们到这里来是帮忙还是添乱？”在形势很危急很复杂的时刻，问题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要加快民族革命运动，等等。

叶戈罗夫同志：你们的顾问没有发牢骚？

加拉罕同志：顾问的态度是不需要调进军队。

索洛维约夫同志：但我没有发牢骚。

加拉罕同志：他诚实而坦率地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不是说谁在危急时刻张皇失措，而是想说，你们处理问题太慌张。特里福诺夫同志乘火车时，见到一个士兵上车后看着他们说：“鬼知道，坐着的是一些俄国人”，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对俄国人的态度不好。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还有一个故事，他私下会向你们讲述。他看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就得出结论：在中国很难做工作。我对他说：“到开封来吧！”他却说：“在那里无法生活。鬼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证明，您完全暴露出您什么也没有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作何解释呢？这可以从纯心理学角度作解释，一个人不想呆在这里，想去莫斯科，因此出现了这里无事可做的议论。人们在这里呆着，什么事也不做，然后写出长篇报告说，我们支持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等等，等等。

现在谈一谈所谓我们没有计划，不打算制订计划，没有前途

等说法。我不清楚，但依我看是有计划有前途的，依我看，我们有很明确的计划和前途。我始终不认为，两年间我们在这里是在盲目地做工作。我们没有白白地到这里来。两年间我们在这里做了工作，并收到了效果，你们却抓住某些枝节，说什么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做了什么莫名其妙的工作。但毕竟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们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你们想得到对形势的评价吗？这可以，不过是最概括的评价。你们想有个描绘得很好的计划，想有一些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小组，而且各就各位，并从这个计划和这些小组出发，在它们的范围之内进行工作吗？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可以拟定对第一、第二、第三军的计划，你们可以拟定你们工作的发展趋向，并在这些具体问题和任务范围内进行工作，但制订包罗万象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你们指责我说，加拉罕想建立国民政府，当然，我是想建立国民政府，难道这不好吗？特里福诺夫同志，我们一定要建立国民政府，尽管您持悲观主义态度。也许要经过3到5年，但毫无疑问一定会建立起来，因为事情在朝这方面发展。可是您认为，我们想建立国民政府，这是我们政策的一个缺点。我不清楚，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巨大成就。我在发给莫斯科的一份电报中曾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造就政治上很强的国民党干部，另一方面，我们要造就未来革命军队的干部。在广州，这项工作可以认为已经结束，因为工作在按正常渠道进行，但在这里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我说这一点是为了不造成在建立国民军的印象。如果建立起一个好的政府，保证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要去管我们建立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否已经实现，因为这只不过是偶然性的临时政府。也许它将存在3、4个月，然后消失。但建立国民政府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应该从这个方针出发。如果不从这个方针出发，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为了什么做工作？我们

想建立一个革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这是总的计划、总的任务，这是我们前进的目标，也许经过3、5年我们会达到。我不清楚，但这是我们提出的目标。我们走的道路对吗？对。我们在聚集政治力量，在造就革命军队的干部。我们有计划吗？有。我们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这里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为此需要有耐心，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耐心地在第一、第二、第三军中做相应的工作。在政治方针方面，我们确实在从事重大的历史性工作。国民党在广州，但力量不只是在广州，在北方也有。两年前在北方基本上没有国民党人，而现在呢？应当看到这一点，不只是拿到名单时要看到这一点，而且要看到这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在最近四个月间是怎样发展的。列普谢同志在北京这里时^①，哪怕要见一个工人，也得去寻找，而昨天你们可以出席几千人的群众大会。这说明，运动在发展，政治力量在集结，我们采取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它带来了不容置疑的效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继续支持这个运动。国民党现在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久前……^② 将军给一所大学^③的校长寄来一封信说，他确信国民党是一支重要力量，他想同国民党取得联系，并通过它同苏俄取得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心实意，也许他在耍花招，但重要的是，从来没有同国民党和苏俄打过交道的人竟要派人到校长这里来要求建立这种联系。这表明，国民党是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有广州，不只是因为有广州，而且还因为有国民军。有国民军，这意味着很多东西，国民党是唯一一个同国民军有联系并得到国民军支持的党。实际上这是两种力量：一种是纯政治力

① 1925年7月至10月间以И. И. 列普谢为首的苏联工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③ 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国民党一大上（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而在二大上（1926年1月）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量，另一种是军事政治力量，两种力量手挽手走向统一的目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特里福诺夫同志在这里讲笑话说，没有必要花钱，而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如果他指的是我们那里锻炼干部和培养真正党员的那种镇压制度，那么由于我们有很好的党、很好的干部，也不能以希望的形式提出这种意见，希望在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最好有镇压、枪决等制度。这是胡说八道。你们说要不然在张家口发生分化也不坏，这是绝对错误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应该把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但我们只有在取得某种合法性的情况下才能吸引群众。遗憾的是，现在需要在革命的严峻制度和镇压中锤炼坚定的革命干部，我们要等很久。而如果我们把工人联合起来，我们就能迅速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凡有国民军的地方，群众都在联合起来。你们可以对我说，在上海没有国民军，形势也很好。的确是这样，但那里的情况不同，那里有引起民众愤怒的枪杀事件。不要忘记，在没有这种情况的天津，我们就做不到任何支援上海的事情，而现在那里有了很大的职工运动。如果这个运动在只有很差的第三军的孙岳那里，在孙岳这个坏人身边发展起来，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天津拥有极好的基地，拥有极好的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而这是很大的事情，要知道，天津是中国的第二工业中心，并且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业中心，这意义重大。所有这一切，特里福诺夫同志，需要理解，需要看到和评估这些情况的极端重要性。而您说，我们只不过是白花钱，等等，等等。不能作出这种结论。

布勃诺夫同志：我们现在休会。晚上5点半继续。

（休息）

加拉罕同志^①。其实我现在没有更多要讲的了。关于广州我想

^① 在使团晚上会议上继续发言。

讲两句。其实在对广州的态度上，特里福诺夫同志赞同我们的方针。广州是我们的基地，特里福诺夫同志也同意这个说法。当然，不能讲反对广州的话。广州已为自己赢得了生存权和承认权，当然，不能讲广州什么坏话。但你们当中有谁知道广州会是这个样子呢？若是两年前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若是那个时候你们看到广州，你们就会说，广州不会有什么作为。要知道当时广州的情况是很糟糕的，要知道在广州有孟什维克总司令，后来不得不解除其武装^①。他的大部分军队是由我们的敌人组成，但在那里也开展了工作。是否有过现在特里福诺夫同志和多多少少叶戈罗夫同志提出的那些怀疑呢？有过，那里的许多同志曾对此有过怀疑。在我们的军事人员当中也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那时也有人说：不让我们干事，不能做任何工作，我们撤走不更好吗？把一切都撤销不更好吗？更有甚者，不只是在我们人当中有这种怀疑，我们还得经受住同中国中央^②的大战，中国中央说，不该支持广州，因为广州微不足道，因为我们在支持那里的军阀。现在特里福诺夫同志有的怀疑在中共中央那里也曾有过，而且中共中央在自己的全会上还作出许多决议反对我们的工作^③。甚至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④上公开发表一些文章，至少我记得有些文章直接讲我们支持军阀统治和反对工人阶级。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并通过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不管开始时条件如何。我认为，关于广州，没有什么可特别说的了。中央的人反对过并且他们也曾有过特里福诺夫同志的这种要撤销一切的思想。结果如何呢？结果我们说服了他们，我们向他们证明，一切都不值一提，

① 可能指1924年至1925年间任滇军总司令和国民党广州政府军总司令的杨希闵将军，1925年6月发动叛乱反对广州政府，但被粉碎，而他的滇军被解除武装。“孟什维克”一词用于杨希闵没有实际意义，只能认为是否定的评价。

② 原文如此。指中共中央——译者。

③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第480—481页。

④ 指《向导》周报，自1922年9月至1927年7月在上海、广州和武汉出版。

尽管工作有困难，尽管总司令是孟什维克，尽管军阀谋取个人私利，但在广州也能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我们在那里只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军校，我们的工作就是从这所学校开始的^①。在军队中的真正工作只是从去年开始的。我想以此来说明，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广州工作条件也很艰难。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比这里多百倍的各种阴暗面，但是我们在那里还是成功地开展了工作。我不希望谁以为这里情况类似，但我想说，广州的阴暗面比冯这里多一百倍。为什么在这里不能克服阴暗面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在这里取得成功呢？也许，我们不能完全造就我们在广州的所有条件，毕竟那里是党的中心，但肯定我们在这里也能取得成功。我不久前提出的一个想法，至今亚历山大·伊里奇对这个想法还持怀疑态度。在困难时刻，我们建议孙岳组建模范部队，他同意了。为此，我们要从广州调来指挥人员并在这里扩编成一个师。我的这个想法从可行性角度看引起很大的疑问，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能否做到，我不十分有把握，也许能成功。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组建模范师。在模范师下面办一所学校。孙岳都同意了。如果此事行得通，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开展一项工作，经过一年或一年半时间就有可能把直隶省变成第二个广州。这个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接下来我还要谈一谈所谓日本人有计划而我们没有计划的问题。日本人在满洲像在中国一样有传统的政策，他们实行了几十年，日俄战争前他们就实行了这种政策，日俄战争后他们也在实行这种政策。他们有十分明确的任务。当他们得手时，例如在1922年，他们就提出21条要求^②，并在满洲广泛推行。我们有这样现成的计划吗？我们能有这样的计划吗？我们应该着手制订这样的计划。但我们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吗？首先，我们力量薄弱，要

^① 指1924年由苏联帮助建立的黄埔军校。

^② 原文如此。二十一条是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的。

考虑到我们在军事上和在国际上的力量都薄弱。我们力量薄弱，两年前我们在远东的任务是很有限的，现在已完全不同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有任何计划。计划是应该制订的。所以我们已着手研究在满洲对日本人采取什么明确态度的难题。我们知道日本人打算在满洲修一条新路。我，科普都同日本大使谈过，但我们未能阻止住他们的这个打算，因为我们无计可施。除了谈话我没有别的办法。5天前，我收到契切林同志的一份电报，内称：“我们听说日本人想从哈尔滨修一条路，这是对我们的威胁。请提出建议。”我能提出什么建议呢？我们没有力量对日本人说：“不要修路”。当我建议科普同日本人进行更严厉的交涉时，中央反对这样做。为什么？它感到自己不是很有力量同日本人严正交涉。我们现在可以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的近期措施是什么呢？我们应该适时召开日本、中国和我们的三方会议，解决在满洲的这些任务。我在莫斯科时，我曾向日本大使提出过这个建议，以避免对我们和对他们都很有害的竞争。我收到了大使的答复，说日本政府不反对这个建议，但想预先准确知道这个会议的计划。现在我向契切林同志作出答复：回到这个建议上来，召开这样的会议，以便作出试探，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日本人会同意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意在满洲的势力范围，这就是说日本人不要向北扩张。在沙皇政府时期，他们同意这个势力范围，没有向北扩张，但现在力量对比变了，他们要向北扩张。我想说，叶戈罗夫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也很棘手，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对的，并且我们得到消息说，一些军阀在怂恿日本政府，可能他们也想怂恿我们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审查、研究和考虑这件事，以后怎么办？我不相信，我们能找到可以接受的妥协形式，也许我们能通过某些让步来换取平静，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同民族运动打交道，也不是因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犯错误。外交人民委员部是什么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它的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只能

根据我们的强大程度，力所能及地做工作。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一谈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也就是谈一谈组织问题。至于谈到组织问题，在我们这里，除了政治方面的重大问题外，在组织问题上也有意见分歧，遗憾的是，叶戈罗夫同志没有充分说明情况。

确实，特里福诺夫同志旅行归来时，我们讨论了他的印象，结果我在晚上收到一个建议，要在这里成立三人小组，这个三人小组不仅研究军事问题而且也研究政治问题。这样一来，对在华其他系统的整个政治领导工作也要由这个集体来承担。于是我问，假如我们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你们两个人是多数，我一个人是少数，当然，少数要服从多数，这怎么办？我说，这是不能接受的领导方式。这个建议是什么意思呢？是设立集体代表机构的想法。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这种组织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我是绝对不同意的），那么你们想想我的处境，来到这里的两个同志对情况了解较少，而我了解较多，我要参与以简单的多数票来决定问题。我说，我不同意这样做。这里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没有什么用，那就可以委派一个集体，任用了解情况的我和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他们将逼着我实行这样或那样的方针和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步骤。这是遭到我反对的最初建议，从这时起我们就发生了意见分歧。接着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可能稍晚些时候。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想帮助您，我们想支持您。我太感激啦。特里福诺夫同志和叶戈罗夫同志到来后，我得到的支持是使我完全越出了常轨。他们想把我抬得很高，让我看不到脚底下在做什么。我说，我不同意这样做。我要为整个对华政策负责，鉴于军事工作与整个政治工作有很密切的联系，我应当领导这项工作，当然要同你们商量，但在主要问题上，不管大小由我作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们制订战场上的作战计划，是什么计划我不管，但如何实施

这个计划，如何使中国人接受这个计划，我有决定权。由此我们发生了意见分歧，有大的分歧，有小的分歧。要知道，如果我不了解每个部队在做什么，我们的每个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我就无法工作。所以过去有哪个组的同志来到这里，不管他是组长还是一般工作人员，我都把他叫来，询问一个多小时，因为这可以使我直接感觉到在某个军队里是如何对待我们的。这是对的。我同亚历山大·伊里奇谈过几次，最初他反对，而五六天前他作出了指示，所以现在有人向我报告所有来的人的情况。这种组织方面的误解证明对问题的处理方法不对，表明这里是在怎样进行工作。

叶戈罗夫同志说，这里90%是军事工作。请原谅，不是90%是军事工作。这个问题特里福诺夫同志已经谈到了。他说，他来时候以为军事工作是主要的，但来到后他确信军事工作不是主要的，而是辅助性工作，从属性工作。可以说国民党的工作是主要的或者不是主要的吗？它同样是辅助性工作，应该把所有工作结合在一起。如何结合呢？你们建议结合，就是成立由三人组成的集体来领导各方面工作。在北京这里应设统一的指挥部，它应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此人要将党、共产国际、军事、外交等方面工作集于一身。迄今为止的这种做法不好吗？依我看，这种做法是好的，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统一的领导，我认为，为了工作这样的程序应该保持。如果你们反对这样做，如果有什么未说出来的理由，那就说明我们对如何评价整个问题和如何评价我们在这里所实行的整个方针没有正确的态度。这样下去当然不行，来到这里的使团应该作出某种决定，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这是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大的赌注，以便我们今后能使这里进行的工作尽量少受动摇。

最后再说两句。新同志到来后对组里情况的新评价是什么呢？是涣散。说什么应当返回莫斯科，说什么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

奇^①只答应一年期限，这种议论以前没有过。为什么呢？因为同志们认为他们将做有益的事情。只是在第二组中感觉到了这种涣散状况，而一直在那里工作的第一组里没有这种情况，他们都很乐意工作。但现在那里的情况怎样呢？你们亲自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就会确信不疑了。如今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人们做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精力，而现在看来他们好像没有脚踏实地地做工作，似乎犯了什么错误，白白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浪费身体和力量。所有这些造成了涣散状态。在各地工作的人不能有这种情绪。相反，应当保持饱满的精神，应当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在做需要做的事情。只有借助于激情和对他们所做工作的正确性的认识，才能迫使我们的人，甚至共产党员、负责的共产党员在组里工作。如果有怀疑，那就全完了，而他们已经有怀疑。我已对特里福诺夫同志说了，他应该赶快走，因为他在瓦解工作人员。

特里福诺夫同志：对。

加拉罕同志：他本人多次谈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对的。

特里福诺夫同志：说我在瓦解人这不对，但我认为我应该走。

加拉罕同志：我绝不允许你们在开封或在张家口对同志们中任何人谈自己的印象。无论你们开会时说“小伙子们，让我们回莫斯科去吧”！还是仅仅在谈话中说些不该支持军阀之类的东西，这都是不好的。大家都知道，有加拉罕的方针，现在来了一些新人，他们认为有错误，应该作些修改。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是危险的、有害的和完全不能允许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存在。我认为，在短期内，同志们彼此熟悉后会相信这一点的。

我想，到这里我的发言可以结束了。

布勃诺夫同志：我们将如何进行以后的工作呢？也许我们到此就可以结束了，因为给我们提的问题是清楚的。我们的观点也

^① M. B. 伏龙芝。

是明确的。至于对整个工作的评论，那是以后的事。这要求有相当多的时间，并且我们使团来到这里后应该了解整个工作。我不反对交换意见，但也可以不交换意见。如果有人想交换意见，可向加拉罕同志提问题。

特里福诺夫同志：我想问加拉罕同志，一旦广州军队向北推进，他确信第二军和第一军不会进行抵抗吗？

加拉罕同志：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比如说，如果爆发大战，一方是冯和国民军，另一方是吴佩孚和张作霖，这时需要广州军队的支援，当需要同共同的敌人作战时，我相信他们不会有任何误会，作为盟友他们会一起战斗。他们接近后就会找到共同语言。我相信，通过联合行动可以增进广州军队和国民军之间的了解，但不能在胜利条件下分析所有问题。毫无疑问，国民军在发展，中国的事态在发展，人民革命运动在发展，不能像你们这样孤立地分析问题。当需要消灭张作霖和吴佩孚时，毫无疑问他们会找到共同语言并创造一些因素和条件，使他们能够避免发生这样的冲突。我不相信可能需要冯、第一军同广州军队达成谅解，而在第二、第三军中可能发生误会。你们知道，在广州，不得不解除整个一个军的武装，因为它不愿听从指挥^①。也许，在国民军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至少对于国民军的主力即第一军来说是可以避免的，而对于其他军来说也许需要解除其武装…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

全宗 17，文件集，第 1—9、34—52 页。

打字稿，未经校对的速记稿。

^① 可能指 1925 年 9 月解除以许崇智将军为首的粤军武装。

18

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提要

1926年2月13日于莫斯科^①

胡汉民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提要

中国革命在为中国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进行改组后，决定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并将此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国民党力求完成业已摆在中国革命运动面前30年的任务——由国民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当前，苏维埃俄国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先进战士。帝国主义列强害怕中国人民同苏维埃俄国联合，认为这是对它们的致命打击，因此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这种联合。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会长期容忍帝国主义对它的压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到了。国民党要想完成自己的革命事业，就要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同其他各国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必须同它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的口号，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手迹确定的。

斗争策略的唯一正确口号。

鉴于世界革命阵线的集中统一会给革命运动赋予新的力量，如果共产国际有步骤地领导各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定会日益高涨；鉴于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应当按照总的计划进行，国民党认为它有必要加入共产国际的队伍。

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并根据它的授权，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这个组织。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3，第 13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9

斯大林给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信

1926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机密

致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乌格拉诺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中央委员：叶夫多基莫夫、科肖尔、瞿鲁巴、契切林、布勃诺夫。

日前，书记处给布勃诺夫同志使团寄去了根据政治局交换的

意见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还寄给了不久前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同志。

布勃诺夫同志使团的答复还没有收到。维经斯基同志的答复在这里连同问题一并附上^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卷宗 471，第 11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0

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1926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敬爱的同志：

对您的有关中国的问题^②，我可以作如下答复，但附带说明一下，这些答复不是全面的，因为最近一个月来中国的情况与我去

^① 见第 20 号文件。寄给 A. C. 布勃诺夫使团和 Г. И. 维经斯基的问题在卷宗里没有。

^② 文件没有找到。

那里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①。

1. 张作霖过去就曾试图宣布满洲独立。一年多以前，张作霖在军事方面的处境很困难时，曾声称他要宣布满洲独立，现在他也在以此进行威胁。实际上，张宣布独立的企图说明，他想在1924年秋天战胜吴佩孚之后成为中国中心人物的愿望已经破产。

张威胁要宣布满洲独立，似乎是说他要暂时离开全国舞台，不过他的离开明显带有敌对情绪，并打算一旦在满洲积蓄更多的力量后将再次沿长城那一侧出动，同时他希望加剧在中国北方以直隶人和国民军为一方同以反对国民军的奉天张宗昌和李景林余孽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

不言而喻，张作霖同这些反对国民军的军事力量都有联系，但看来他现在更愿意他的盟友同国民军及早发生军事冲突，以期在敌人和盟友两方都遭削弱后他得以成为首领。

张作霖“威胁”要宣布满洲独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试图在满洲本地把自己的权力更好地集中起来，消除他的某些省督在郭松龄倒戈^②时表现出来的种种独立企图。

但是这一次张作霖是否真的宣布满洲独立，这还是个问题。上面列举的原因仅仅表明，为什么张有可能采取这种策略，但绝不是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也有妨碍实行独立计划的一些原因。第一，这种举动无疑会加深包括商界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对张的敌视态度，从而使直隶人（吴佩孚）同奉天人在反对国民军的斗争中难以联合和合作。

第二，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会同意满洲独立，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势力不仅在满洲而且以后在北方都会有更大的

① P. H. 维经斯基于1925年7月去中国，1926年2月初返回莫斯科。

② 指1925年11月27日奉军将领之一郭松龄采取的反张作霖行动，郭转到冯玉祥方面，其部队改名为国民军第四军。1925年12月底，张作霖借助日军将郭松龄哗变镇压下去。郭松龄被日本人俘虏、处决。

加强。

另一方面，在日本本土，在这个问题上军方和宪政会内阁也不会有一致意见。很可能出现郭松龄倒戈时出现的那种局面，即军方主张积极支持张，而内阁摇摆不定。

至于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可能它只以劝导的方式对张施加影响而不进行公开斗争，因为现在力量对比还不能促使政府对张宣战。

2. 依我看来，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现在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由于郭松龄失败和国民军暂时停止进攻，军事力量在重新组合。这种重新组合会加强奉天人的军事联盟，也会通过吸收被卷入斗争的新的军事力量巩固国民军的军事联盟。另一方面，现在在华北和华中，上海事件^①时期发起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群众接受并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在北方，在国民军地区，国民党将会得到发展，工人组织将会取得半合法存在和在某些地方取得合法存在的可能性。而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也会得到发展壮大。

3. 就第三点而言，我不能对加拉罕发自北京的报告补充任何东西^②。

4. 现时的北京政府与前政府（即组成以冯玉祥分子黄郛为总理的新内阁以前）的区别仅在于，在内阁组成人员中，冯^③的拥护者比张作霖的拥护者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新的内阁和前几届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冯可以推动它或推翻它，但是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无论推动它还是推翻它都不能给冯带来任何实际的东西。

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帝国主义者对北京政府持藐视态度，他们很清楚，北京政府只不过是靠国民军的仁慈支撑着，有部分国民

① 指1925年的上海“五卅惨案”。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冯玉祥。

军就驻扎在直隶地区。

5. 广州在全中国的声誉确实提高了，特别是在去年秋季之前，香港政府不得不改变对南方政府的调子，甚至帝国主义报纸也认为，在广州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受欢迎的政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发展情况，可以根据以下数字作出判断：最近半年来，共产党人数增加了2倍，而国民党人数增加了5到6倍。

6. 中国公众对我们同张作霖在中东铁路上的冲突的态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国民党左派当然将站在我们一边，并在自己的报纸上和发言中说明冲突的真相。但国民党右派和未加入国民党的纯民族主义集团，将对我们产生怀疑。他们不会维护张作霖，甚至相反，会说应该打败他，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我们利用这一点来侵犯中国领土和不损害中国的主权。

我不认为，因为这次冲突对我们的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但需要尽一切可能向广大群众说明冲突的真相。

7. 关于叶戈罗夫和特里福诺夫的问题，使团已作出答复，我认为它的建议是正确的^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471，第112—115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A. C. 布勃诺夫使团的建议没有找到。

21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使团会议上的报告

1926年2月15日和17日于北京

绝密

政治局使团会议速记记录

主持：伊万诺夫斯基同志^①。

出席：列普谢、库比雅克、隆格瓦、加拉罕、索洛维约夫、鲍罗廷同志^②。

伊万诺夫斯基：今天我们听鲍罗廷同志的报告。我想，我们给鲍罗廷同志一个小时时间，让他好好给我们谈谈问题。如果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就继续下去。

鲍罗廷^③：在1923年年中以前，关于中国，我基本上只知道可以从某个书本中和一些文章中读到的东西，以及从一些东方同志向我讲述的情况中了解到的东西。我带着这点儿知识来到这里，可以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在广州我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有40年革命经历的孙逸仙坐守广州，没有任何权力。全部权力掌握在几个将领手中，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其实也不存在。共产党人有时举行集会，好像他们总共只有40人，他们研究共产国际的提纲，

^① 即 A. C. 布勃诺夫。

^② A. H. 叶戈罗夫也出席了1926年2月17日的会议。

^③ 在2月15日使团会议上的报告的开始部分。

因为已译成中文，好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活动。当时没有任何群众性的农民运动。至于无产阶级运动，虽然共产党人同工会有联系，但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政府的财政是孙逸仙本人的一些能说会道的代表从军阀那里弄来的。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财政部。孙的代表苦苦劝说一些军阀绝对需要供养国民党和他们没有掌握的某些机关。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去讨伐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一会儿讨伐吴佩孚，一会儿讨伐张作霖，一会儿讨伐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军阀。他不止一次地采取了这种北伐行动，也就是说把几个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出征，到离广州 100 到 150 里的山东^①，有时闯入山东省^② 或湖南省。在那里他经常被打败，然后又回到广州，又考虑如何摆脱这种局面。

孙逸仙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他之所以呆在不止一次地落入他的追随者之手的广东的原因，他之所以一事无成的原因，你们都清楚，现在尤为清楚。但在当时，应该说，至少我对这些原因不十分清楚。应该说，从那时起我们经历了最近两年半时间的整个发展过程，也就是分析孙博士过去历次失败原因的整个发展过程。

比如说，两年半以前，我们以为原因是一个，而随着不断了解情况，渐渐地我们或者得出另一个结论，或者为以前的原因补充了新的原因。我们不能马上对孙说，原来您不能取得胜利的原因就是什么什么，我们不得不自己来研究情况，以便单独弄清楚他失败的原因。

但是当时需要着手做实际工作，需要按我们当时的理解指出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汕头——译者。

^② 原文如此。

他失败的原因。我们给他指出，没有党，没有明确的党纲，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取得什么成就。那个时候他对这一点听得很仔细，虽然以前来广州的同志曾作出这方面的尝试，提请他注意缺少纲领和需要建党的问题，但未取得成效。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即我们到来以前，3、4年前，孙逸仙认为，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他能够把核心力量，主要是军人中的核心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并且借助北伐能够推翻北方政府并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但到我们到来的时候，他已相当注意听取需要建党这一点了。此外，我们还给他指出，靠旧军队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必须在改组党的同时也着手改编军队，以至建立新的军队。

这就是我们通过分析我们所遇到的形势和研究导致他在两年半以前陷入悲惨处境的原因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我们有步骤地在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这些孙逸仙最杰出的信徒中做宣传工作，说明无论如何必须改组国民党和为它制订相应的纲领，最后在1924年初，即大约在我们到来后6、7个月^①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似乎开辟了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新时代，主要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明确指出，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1911年爆发的革命就不会结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大以前，国民党人，甚至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一会儿他们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局势上，主要是放在同所谓的军阀的斗争上。一会儿他们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明确概念，即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

^① M. M. 鲍罗廷于1923年10月6日抵达广州。

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

这个情况就把国民党一大同国民党一大以前召开的所有会议区别开来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正是因为在这里明确指出了1911年爆发的中国革命至今未能结束的原因，国民党才开始作为一个政党，作为国内的一支政治力量而存在。

在整个13年间，他们从未考虑过，不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们就一事无成，而从1924年起，国民党人越来越明白，他们屡遭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缺少明确的反帝纲领。

但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在国民党内就产生了磨擦，首先起因于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意见分歧。在国民党内有人还坚持认为，需要先消灭军阀统治，需要先建立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然后才能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次是在共产党人问题上产生了磨擦，他们说，因为共产主义与孙博士的三民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同共产党人合作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人应当离开国民党。孙逸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需要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共产党人合作。他甚至试图证明共产主义与他的三民主义没有区别，三民主义与列宁主义没有区别，反对派什么都不懂。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反对派不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区别这一点。

但是这些意见分歧……^①，尽管当时我本人持这样的观点（这是同列夫·米哈伊洛维奇^②完全一致的观点）：不要加深这些意见分歧，不要扩大这些意见分歧，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右派进行真正的斗争。总的来说，我们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支持孙的，即应当设法对这些右派进行彻底改造和重新教育，使其中尽可能多的人明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是可能的，等等。至少我们的方针是不加深这些意见分歧，不扩大这些意见分歧，相反要寻求在一定时期实行合作的方式。

^① 原文句子不完整——译者。

^② 即Л. М. 加拉罕。

孙在世时，这些意见分歧不是很明显很强烈，更何况一大在自己的决议中为大多数忠实的、正直的、有活动能力的国民党人提出了行动纲领，为实际工作提出了行动纲领。一大不仅谈到必须首先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且还谈到如果没有群众运动，首先是没有群众性的农民运动，如果国民党不依靠群众，那么即便反帝纲领是最好的，也将一事无成。

从一大时起，在农民当中开展了相当有力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人进行的，不过他们是根据国民党一大的行动纲领进行的。一大关于必须做农民工作的决议，也是以政府法令（即赋予农民成立自卫协会权利的法令）^①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稍晚些时候，我们看到，根据纯粹自卫的纲领建立起来的这些协会如何变成了农民同地主豪绅积极作斗争的组织。对工人的工作也是一样。

在谈到群众运动时，主要是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商人运动。国民党一大以后，党中央还成立了商人部，即做商人工作，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运动的专门的部。

在改组党的同时，通过做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的工作，为国民党的第一所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应该说，若是在我们来到这里时和我们来以后很长时间掌握政权的军阀们，知道改组国民党意味着什么，知道提高革命精神，活跃全国气氛意味着什么，并且马上把国民党说成是一支政治力量，因为它明显打击了造成中国混乱的根源——帝国主义，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然而当时军阀们很少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他们以为，这些都是议论，因为这些议论实际上没有触及他们的权力，他们没有妨碍这种反帝工作，也没有妨碍做农民、工人等的工作。这是他们灭亡的原因

^① 可能指1924年6月19日革命政府发表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见《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1986年版第145—147页。

之一。他们只注意实际力量，也就是能算出有多少支枪，多少名士兵的力量，任何这种力量的出现都会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很少注意国民党一大和它后来的整个工作，也很少注意黄埔。他们不认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能帮助提高军队的纪律。他们说，按照俄国人推荐的外来体制建立新式军队，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能是一种玩物，因此他们很少注意这一实验，而当黄埔形成真正的力量时他们才惊慌不安起来。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给予注意，如果他们了解这个实验，如果他们对其他地方在干什么有所了解，如果他们听取关于其他地方在干什么的报告，如果他们对此有点兴趣的话，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一支新生力量在成长，应该加以阻止。但是他们没有给予注意，因而使我们有可能准备力量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我说过，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当然是敌视那些对老百姓进行无情掠夺的所谓的国民党将领，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

对广东整个国民党的这种反对态度，不能不在老百姓的某种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终于出现了。商人采取了主动，他们首先同这个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这场斗争你们可能知道是名为猛虎队同政府的斗争^①。这是个商人组织，试图夺取政权，消灭广东的国民党。看到军阀的前所未闻的掠夺行径，看到孙本人的孤立无援，看到不存在任何政党，而政府里的情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尔虞我诈，看到面前这样的情景，自然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帮助商人反对这些恶棍，从而在商人那里为自己打下基础，与商人一起同军阀和卖国政府作斗争，并把孙吸引到商人方面来，也就是劝告他：到了您可以率领商人打击那些似乎崇拜您而实际上根本不听从指挥的军阀的时

^① 指1924年8月至10月间的广州商团（“纸老虎”）反政府叛乱。

候了？但是我们当时决定支持这些军阀，把他们吸引到同商团、同所谓猛虎队的斗争中来，消除商人夺权的任何可能性。

我们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不是第一条道路，为什么？因为商人运动虽然主要针对军阀，针对人人憎恨的军阀，但我们还是觉得它比这些军阀有害得多，因为这个运动，第一是由外部帝国主义、香港指使的，第二是想使广东处于混乱状态。你们可以设想，就连商人，统率这些队伍的商人，都想使全省处于混乱状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他们作为买办才能靠广东的混乱大发横财，但不管怎么说，政权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不利用军阀来对付这场混乱。

我们对自己说，只要我们作好准备，我们就能对付军阀，但如若政权落入商人手里，这就等于我们把政权交给了香港。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们同我们准备与之作斗争的军阀一起战胜猛虎队。军阀知道，猛虎政权意味着军阀政权的灭亡。虽然当时有人骂我们，并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商人想把人人憎恨的军阀赶出省去，想恢复秩序与安宁，而你们不是帮助商人做这项工作，相反却帮助军阀，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做。只有当我们把我们与之共同战胜猛虎队的军阀消灭的时候，居民才会明白，别无出路，我们做得对，不能为猛虎队提供统治全省的机会。

上面列数的国民党一大后出现的意见分歧，又增加一个在同商人作斗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是广东所有国民党人都拥护我刚才向你们阐述的这种观点，即同人人憎恨的军阀一起打击商人。在国民党中有一派认为，应该帮助商人，而不是帮助军阀，应该同商人一起打击军阀。

应该对你们说，当商团为夺取政权而积极采取行动时，他们还帮了忙，这就是他们在广州街头制造了真正的屠杀事件，从而为认为必须同商人作斗争而不是帮助商人的一派提供了绝妙的口实，为积极反对商人提供了绝妙的口实。同时这也表明，如果商

人夺得政权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人运动或农民运动。

我谈这一点，是因为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你们会直接碰到主张帮助商人以便利用商人的力量来反对人人都憎恨的军阀的一派，是因为从这一派中多少产生一些后来不得不与之进行武装斗争的国民党人。

下面一个事件是在东线讨伐陈炯明的行动，这好像是近两年半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事件。我到广州几天后，给孙逸仙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谈到：他能否同陈炯明共事（我是以很策略的方式写这封信的，但其实质就是这一点）。好像当时不知从哪里有人质询，是列夫·米哈伊洛维奇，还是从莫斯科那里，或许是我自己带来的问题，我不记得了，但至少我是根据质询的问题写的这封信。我问孙，他能否设法同陈炯明共事，对此他回答说：“如果建议您同邓尼金一起工作，您会说什么呢？”^①

加拉罕同志：就是说他还知道邓尼金？

鲍罗廷：是的。我向他讲过邓尼金，因为在我们的几次谈话中，在谈到一些事情时不得不提到邓尼金等人。

我没有坚持第一封信中的想法，因此对他的信大致作了这样的答复：如果您能像我们打败邓尼金那样迅速彻底地打败陈炯明，这就很好。就是说在这封信中作了设法同陈炯明和解的尝试，并且不只是通过这种途径，而且在同其他国民党人的交谈中我也试探过能否设法使这两派和解的问题。

后来发现，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陈炯明和孙逸仙不可能和解。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原则性分歧，也许他们本人不知道，然而存在的，并且在广州的两次内战期间一直影响着他们的联合，所以使双方和解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并从迟早要进攻陈炯明，要

^① 详见 M. M. 鲍罗廷：《就同陈的斗争问题给孙逸仙的公开信》，载 1923 年 10 月 10 日《广州》通讯（全宗 514，目录 I，卷宗 986，第 70—72 页）。

打败他的角度考虑作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首先表明，已经有相当广泛的群众支持国民党，支持孙逸仙。这一点在军队征讨陈炯明时特别明显，当时农民自愿帮助军队运送弹药，并通过侦察和其他途径帮助黄埔军^①同陈炯明作斗争。工人也被完全吸引到运动中来了，以至于他们决定在敌人所在的地区或敌人途经的地区举行罢工，这个决定准确无误地得到了贯彻执行。还很快证实黄埔的经验是十分成功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如3000人的军队能同1万人的军队作战并战胜它。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如果说东征以前军阀不重视政治工作、不重视新军中的工作，那么现在，当3000人在一次战斗中打败1万人的军队时，当这支军队所向无敌时，军阀大为震惊并决定消灭这支军队。

这也说明一直控制着广东政权的军阀为什么举行叛乱反对这支军队。他们一直企图消灭我们的军队。

但是叛乱的滇军将领和其他将领^②终究未能消灭年轻的国民党军队，原因何在呢？主要是因为这支军队把具有反桂军和滇军情绪的人都像反对广东以前的主人（即影响其他军阀生存的独裁者）那样吸引到反对他们的运动中来了。例如，湘军与滇军没有任何区别，在军队上层缺少（可靠的）指挥官，一人除外……^③，但却成功地把湘军拉到（反对）滇军方面来了。能把粤军^④吸引到这种斗争中，建立反对桂军和滇军这些广东的独裁者的完整联盟，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这个联盟的成员本身想从省里赶走滇军和桂军，进而自得各项收入。这个联盟是惊人的一致。这里有黄埔军，它在同滇军和桂军的斗争中追求民族革命的目的，这里

① 指由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军校第一团和第二团。

② 指1925年6月被镇压的以杨希闵将军为首的滇军和以刘震寰将军为首的桂军的叛乱。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以许崇智将军为首的粤军。

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左派，还有粤军和被解散的湘军中的反革命将领。一些人追求革命目的，另一些人则要取代滇军和桂军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建立了联盟，以期每进行一次战争，我们的力量都能得到发展壮大，并在每次战争后我们都能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在同滇军和桂军进行的这场斗争中，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他们当中做了工作。

我谈一谈这个问题，尽管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关于同广东的主人即滇军和桂军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材料。我谈这个问题是为了公开那些后来不得不非常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的国民党人，虽然这些国民党人曾以左派著称，以孙逸仙最忠实的信徒著称，比如说胡汉民。当时他反对同滇军和桂军打仗，他公开没有这样说，但我们很清楚，胡汉民不是很关心在广东消除遇到复杂情势可能在督军之间左右逢源的现象。情况越复杂，胡汉民本人的权力就越巩固。他不关心消灭当时广东的主要主人——滇军和桂军，并把政权交给黄埔新军和粤军许崇智。这场战争几乎是背离胡汉民的意愿进行的。他对猛虎队也采取了这种态度。胡汉民是反对同商人作斗争和千方百计阻止进行这场斗争的国民党人之一。

征讨叛乱军阀的这场战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最后以彻底胜利而告终。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国民党明白，滇军和桂军反对广东政府时使用的口号是要消灭进驻广东的共产党人，这个口号来自香港，受到香港的支持，国民党明白，问题不在于共产党人，而在于滇军和桂军，如果说它们不是同香港联手，也是同它串通一气，要消除日益增大的所谓赤祸。这时国民党为使这场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性质，已充分组织起来了。这不是共产党人与反共分子之间的斗争，而是国民党争取广东独立的斗争。如果滇军和桂军取胜，那么这将意味着广东会变成第二个安南，变成第二个印度支那，政权不是转到滇军和桂军

手中，而是转到要把这个省变成第二个安南的香港手中。

有哪些力量站出来反对滇军和桂军呢？主要有三支军事力量：第一支是粤军，第二支是湘军，第三支是新的黄埔国民党军。以前我说过，整个联盟是由一些各自追求各自目的的集团组成的。例如，粤军认为战胜滇军和桂军必然导致政权落入粤军首领许崇智之手。当我们讲某个军的首领时，始终都要注意到可能他不是这个军的首领，实际上在军队中有一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将领。在粤军中就有这样的将领。

许崇智名义上是粤军的首领，而实际上他并不是这个军的首领，这个军有几个首领，比方说有6个，那么需要分别了解这6个首领中的每一个，以便弄清楚许崇智是个什么人物，以便知道这个军根本不是他的军队，他不是这个军的首领；不过如果在战胜滇军和桂军之后，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遇到任何障碍的话，他也能够成为这个军的首领，但是他必然要遇到障碍，因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不信任他。首先，应该说，孙逸仙本人对他很敌视，像对任何别的将领那样忍让着他，对他的态度甚至比对桂军首领的态度更坏。这个人不是革命将领，他参加过革命战争，但不是有名的老革命将领，而许崇智总是说，革命初期他在哪里哪里打过仗，而后又在哪里哪里打过仗，15年间他一直在为革命而战斗。实际上他不是革命将领，实际上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当孙逸仙及其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军队处境十分艰难时，曾向富豪许崇智寻求过帮助，当时许控制着15—20个地区，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他从20个地区的老百姓身上征收大笔捐税，但他拒绝向孙提供帮助。如果说孙向他求助1000元，他都不提供，就不要说，他对孙逸仙的任何顺从了。所以孙逸仙很憎恨他，不只是孙逸仙，而且还有其他国民党人，如1925年8月遭杀害的廖仲恺和你们所熟悉

的现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①。

我对他有些怀疑，虽然为改造他，我用国民党的名义说了和做了我所能说和能做的一切。我花了很多精力设法使许崇智加入忠实于孙逸仙和三民主义的人的集团，但没有成功。我反对他主要是因为他一会儿在暗地里同农会作对，一会儿公开反对农会，主要是因为在一些战争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在广东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军队始终站在豪绅一边。现在是到了不能不注意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如果说以前我们没有力量或力量很小，我们不能同许崇智谈这个问题，不能说一旦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战争，他的军队必然会站在豪绅一边，那么现在则到了公开明确地向许崇智说明他的军队的政策与国民党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时候了。这不意味着我们怂恿广东的内战，不意味着我们很乐意参加农民同豪绅的流血战争。这种战争是自发的，无法防止。为什么？这一点稍后可以看出。

我认为，如果许崇智在前进道路上不遇到障碍，他有可能成为粤军首领。在战胜滇军和桂军之后他有近4万名士兵。粤军至少由许崇智、梁鸿楷和李福林三个集团组成。关于许崇智，只能说他用革命的辞藻作掩饰，他在一些会议上大唱革命高调，他甚至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用革命辞藻掩饰自己。而实际上他在追求很明确的目的，即在广东取代陈炯明，这意味着他置全国革命运动问题于不顾，只考虑广东省的问题，即“广东人的广东”。这一伙人，即许崇智一伙人，只有得到香港的支持，才能守住广东。这个许崇智已经堕落到实行“广东人的广东”这个口号的地步。

这里其实也有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陈炯明所持的观点是，先要把广东省变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省。但

^①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不是蒋介石而是汪精卫。

在广东的条件下，这样的口号意味着同香港合作，而这样做就意味着广东要变成安南。这不是说，我们完全抹杀要把广东变成模范省这个口号，不是的，我们并不抹杀这个口号，相反，我们说，同时不要忘记全国的任务，不要忘记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范围内解决，我们应该向老百姓证明，广东是改善各省状况的一种尝试。充其量不过就是这样。顶多可以说，许崇智持陈炯明的观点：先建模范省，然后解决全国任务。而实际上他利用这种观点来追求既定的目的：当粤军的真正首领，不为工农商的利益管理广东，而为豪绅的利益，首先为香港的利益管理广东，因为没有香港他就无法管理。其次，他正式地为香港的利益进行了活动，因为后来查明，他参与了以杀害廖仲恺而告终的反政府阴谋。

至于李福林，在国民党领袖当中对此人责难最多。有人说，他是土匪出身，只想个人发财，他洗劫湖南并虎视眈眈地站在离广州不远的珠江对岸，应当把他除掉。而我的观点是可以尽快除掉许崇智而不是李福林，因为许崇智没有立足之地，当时他同豪绅还没有密切的联系，他曾设法建立这种联系，试图通过反对农会，通过他的军队援助豪绅来建立这种联系，但在许崇智和豪绅之间没有这种有机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当时我相信，他没有任何社会基础，而李福林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诚然，李是土匪出身，他把湖南老百姓洗劫一空，他寻求个人发财，但他毕竟是唯一一个确实同农村、同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在城市里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将领。尽管他洗劫过老百姓，但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因为在他的时期终究比在杨希闵时期即滇军时期生活要好些。当时的政策是：不触动李福林，暂时把他放一放，不管他，不让他投入许崇智的怀抱，而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许崇智和梁鸿楷身上。

在那些战胜滇军和桂军的力量内部发生直接争斗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粤军试图夺取广东省的整个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为实现“广东人的广东”的口号而同香港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从梁

鸿楷和粤军将领之一的某个人^①的活动中看得出来。

对于许崇智来说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其直接的最近的原因是他掌握了广东的财政。在战胜滇军和桂军之后曾有组建政府的机会。这时许崇智试图取得整个财政大权，而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了这个权力，并利用这个财权来巩固自己在粤军中的影响和不让新的国民党军队有发展壮大可能，但这还不是全部。问题在于，战胜滇军和桂军后不久，即去年6月23日，帝国主义者，主要是英国人从沙面开枪射击中国人，打死10多人，打伤100多人。你们知道，在此基础上，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斗争，最初几乎所有居民阶层，而主要是香港和沙面的工人都被吸引到斗争中来了。

这时政府已掌握在国民党人，主要是国民党左派手中。若不是在6月12日以后，也就是在战胜滇军和桂军以后，政府落到较左倾人上手中，并且该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支持罢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主要是反对香港英国人的斗争决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你们知道，它还在继续。政府现在也支持这场罢工，每天发放1万元。香港很清楚，由于广州政府支持罢工，它面临着艰难的斗争，香港自然想打击广东。这也说明为什么陈炯明反对广州。最近陈炯明去过香港，香港为他提供一套住宅，他的住宅在那里是完全公开的。香港为他提供了在买办商人当中募捐的机会。香港为他从北方获得的舰队提供了基地。曾经大喊大叫广东土匪的香港竟然为上匪提供在香港街头举行集会的机会，以期同陈炯明串通一气共同反对广州政府。香港完全公开地支持陈炯明。广州还从来没有过当时的那种危险处境。得到香港支持的陈炯明，在所有战略牌都被打乱的时候有了稳固的基地。你们知道，这以前进行的战役行动一直是从南方到北方或从北方到南方。当你们在香港的时候，你们要注视汕头方向并向汕头方向推进自己的战

^① 可能是郑润琦。

役行动，主要准备工作将在汕头进行，而你们的大本营设在广州。这次是另一种战略。你们的左翼是在距广州 60 英里的广东省南部，你们有舰队，可以在一天之内把自己的力量从右翼调到左翼，你们可以把舰队投放到中心地区。就像我对你们说的，陈炯明的威胁是很大的，无论如何要在陈炯明还没有来得及集结兵力，还没有来得及在香港完全站住脚的时候就把他除掉，尽快把他除掉。

我们及时指出了这个威胁，从政治委员会到街头集会都谈过这个威胁。我们也向国民党领袖指出过这个威胁，他们知道这个威胁后作出了立即反对陈炯明的决定，以便不让他有机会集结兵力。这个决定许崇智本应执行，而实际上他在抵制，因为他追求陈炯明的目的。如果你们看一看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你们就可以发现，至少作出过三个关于反对陈炯明的决定。每次许崇智都保证执行决定，而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他（不是第一次）抱怨缺钱时，政府提供了 50 万元专款用于发动战役。他拿到这 50 万元后，根本不用于进行这场战役的准备工作。时间过去了，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令人生畏，并使人感觉到，这次陈炯明同香港联系这样紧密，构成了对我们的致命威胁。无论如何应该行动起来反对陈炯明，即使以排除许崇智为代价。还有另一些原因。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陈炯明无论如何要排除许崇智。

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排除许崇智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们听说他是革命将领。我希望你们能从我所说的情况中弄清楚这个问题，如若弄不清楚，则可以借助于一些问题更详细地弄清楚，为什么除了排除许崇智别无出路。

从 6 月 12 日即战胜滇军和桂军之日起，到 8 月 20 日即廖仲恺被害之时止，粤军将领们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掌握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梁鸿楷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这是众所周知的，梁鸿楷出席的一些作出必然干

掉廖仲恺的决定的会议也是众所周知的。当廖仲恺被害，需要对参与反廖仲恺阴谋的那个部队采取行动时，许崇智却拒绝执行。他庇护这个将领的行为。需要花很多天时间来迫使许崇智逮捕梁鸿楷，需要采取种种计谋和策略来设法使这个许崇智意识到同梁鸿楷作斗争的必要性和逮捕他的必要性。我们给他指出，梁鸿楷同香港有直接联系，如果他取胜，借助于香港推翻政府，那么他将占据许崇智的地位，粤军中的某某某某将领必定成为他的敌人。需要给他指出梁鸿楷取胜后对他的不利方面。我们列举了种种思想上的理由，力求使他相信，必须对梁鸿楷采取行动。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做这项工作，花了很宝贵的几天时间。在这几天里我们明白了，既不能与这个许崇智一起同外部敌人，即同集结越来越多兵力的陈炯明作斗争，也不能和他一起同内部敌人作斗争。他掌握着对梁鸿楷采取行动的主动权，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梁鸿楷是粤军中最明显的反革命代表，而许崇智抵制对他的逮捕。无论为了进行外部斗争还是为了进行内部斗争，都拿他没办法。请你们注意，为了设法把这个许崇智拉到我们方面，我们简直采取了一切措施，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但所有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坚持走以前的路。如果我们不除掉最终同意逮捕梁鸿楷的许崇智，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梁鸿楷的军队曾留在城市附近。如果我们不在前进道路上清除许崇智，那么东征也许就要晚一个月开始。内部的梁鸿楷反革命军队就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那时陈炯明就会打击广州，就会发生内部爆炸。在说服许崇智，把许崇智拉到我们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无效后，无论如何要清除他。许崇智一旦被驱逐出广州，形势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鉴于时间不够，恐怕在这里不能详谈为什么我们把他流放到上海而不是逮捕他的细节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逮

捕他，另一种意见主张把他流放到上海。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①。如果你们对此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再谈这个问题。一旦清除了许崇智，没过几天东征就开始了。

财权交给了可靠的人^②，此人以极大的干劲着手做这项工作，并弄到了必要的资金。没过几天就做好了发动战役的准备工作。在内部解除了梁鸿楷的武装，几乎是他的整个军队的武装，消灭了粤军的支柱，在广州造成了一时稳定的局面，特别是还因为8月25日在市中心出色地组织了解除武装行动。8月20日夜廖仲恺被杀害，而到8月25日白天才开始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有5天时间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但在8月25日解除梁鸿楷的武装的行动开始了。那天夜里在几个地方，一会儿解除他的这个团的武装，一会儿解除他的那个团的武装。局势是稳定的，正是有了这种局势，才能指望前线取得胜利。

许崇智离去没有引起任何居民团体和个人的抗议，好像他不曾存在一样。我恰恰预料到了这一点。我很清楚地知道，许崇智那里绝对没有什么力量能出面保护他。从我们方面来说，他的灭亡没有特别的障碍，障碍只在于要做适当的准备来对付他的司令部，对付他的军队。不存在特别的政治难题。

随着许崇智的离去和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粤军只剩下确实能将其吸引到我们方面来的部分了。这部分军队（即现在的第四军）的首领是吴铁城^③，他好像是左翼国民党将领。大约有4万人的粤军，不算吴铁城军，剩下2万人左右。这2万人当中除去李福林的几个团以外全部被歼灭。在驱逐许崇智的同时还不得不摆脱胡汉民。你们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摆脱他，因为胡汉民始终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即使一个集团垮台了，他也

① 1925年9月29日许崇智被逐出广州。

② 应为宋子文。

③ 原文如此，应当为李济深。

总能同另一个集团一起执政。胡汉民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很聪明、在中国问题上很老练的人。他知道，他在玩弄权术时，必须依靠某种力量。他想要在反共口号上找到这个支柱。不过他知道，对手的几次战役行动都败在这个口号上了。“必须消灭红色广州！”这个口号使陈炯明在其第一战役中就遭到了失败。杨希闵、滇军和桂军连司马素这个坐镇香港为杨提供物资供应的最反动的国民党人都是打着这个口号登场的。陈炯明的第二战役也是打着这个口号进行的。胡汉民有充分理由预计到陈炯明的第二战役也要败在这个口号上，何况在第二战役中已有大批群众支持我们，特别是香港和沙面的工人。但是尽管如此，胡汉民还是采用了这个口号。与以前打着这个口号的所有表演的区别在于，他暗中讲这个口号，公开不讲，在其信徒的秘密会议上，他说应该同苏俄共事，还说一些赞扬我的话。他对自己的信徒说：我们应该同苏维埃政权携手前进，鲍罗廷为我们带来很大好处，我们不应拒绝这个好处，但我们应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他就是以这样的行动纲领组织了国民党人。他提出了在许多方面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口号相似的口号，即“没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若是胡汉民公开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我们就容易对付他，那时我们就直截了当地向国民党提出它是否真的需要继续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老实说，你们是否以为到了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时候了？共产党人没有坚持要求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投奔国民党。因此，如果整个政治委员会，整个中央认为到了分手的时候，那么对不起，由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允许分裂。但糟就糟在胡汉民没有公开提出他的行动纲领，他只是在暗地里聚集力量。突然冒出一家名叫……的报纸^①，恰恰在贯彻执行这个行动纲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应为《国民新闻》，是1925年起在广州出版的日报。

胡汉民本人必然要滑到这种地步，说我们国民党人把中国太多的权力交给了苏俄。这家胡汉民派报纸从反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谈起，一直谈到要设法同苏俄分手。说得不是很明确，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点经验的人，都明白说这些话是什么目的。此外，在这种秘密会议上，胡汉民、孙科等人站出来反对廖仲恺，这就有意无意地同粤军中明显反对革命的那部分人结成了联盟。

好像我以前已经说过，胡汉民出版的报纸^①已走到了攻击苏俄的地步。支持胡汉民的一伙人甚至问胡汉民，他是否有意要拿香港提供的用来同政府作斗争的那 200 万元钱？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是否该干掉廖仲恺了？对第一个问题，据被逮捕的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的证人供述，他回答说他不允许这样做，也就是不允许拿香港的钱来同政府作斗争。对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语。

你们可以看到，胡汉民处于什么状态和为什么鉴于我所说的内外威胁需要通过排除胡汉民来巩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

我还不得不向你们讲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可能有点儿奇怪，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细节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胡汉民和许崇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敌对情绪。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试图查明原因，但除了私仇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未能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原则性分歧，我寻找过，因为我认为当时有必要把胡汉民的力量和许崇智的力量联合起来，可是每次我碰到的都是个人恩怨。只是两个人夺权的欲望都特别突出，以至变成了某种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我已经说过，我们花了许多天时间，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特别是去同反革命军队作斗争。你们知道对于许崇智来说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吗？是胡汉民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这一事实，不是直接关系，而

^① 即《国民新闻》。

是间接关系，但毕竟有关系，所以决定把他赶出一切机关。人们甚至谈到要逮捕胡汉民。至少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必须让他离开。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

随着许崇智的离去，梁鸿楷被解除武装和胡汉民被流放到海参崴^①，我们在广州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领袖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

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刻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省政府或国民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没有受到抵制。以前一直受到或胡汉民或许崇智的抵制，而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了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

东线和南线的战役^②进展顺利，主要是因为广州政权是巩固的。我们没有受到来自后方的任何打击，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导机关遇到抵制，也没有在基层遇到特别大的抵制行动。应该说，在许崇智、胡汉民或其他人的每次表演之后，我们都要向老百姓说明，这样做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在北方，这个政策被称作左派的宽容政策。广东的政策在向左转，现在随之而来的是对老百姓的宽容。有人对我说，不能用宽容来克服所犯的错误。看来，有人认为我们赶走许崇智、胡汉民，同时反对部分粤军等等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用宽容来克服。我同意先镇压后改革。

伊万诺夫斯基：这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一个字也不能少。

^① 胡汉民于1925年9月23日以赴苏出差方式被赶出广州，1926年4月29日返回广州。

^② 指1925年10月至11月间的第二次东征和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间的南征，前者是广州政府军在蒋介石统帅下进攻陈炯明将军，以陈的彻底被歼灭而告终；后者是广州政府军进攻邓本殷，最后解放了广东省南部地区。

鲍罗廷：因此他们每次表演后，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转到我们方面。甚至商人也公开对政府表示满意。我应该作出某种历史性的声明：从6月12日到敌人在东线和南线遭到失败这期间，在广东所做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做到，就是因为有罢工斗争。若是没有香港罢工和沙面罢工，我不认为，所有这些行动会这样成功，局势会像现在这样稳定。

伊万诺夫斯基：军事工作人员也谈到了这一点。

鲍罗廷：我经常给所有人员（中国人和俄国工作人员）指出，罢工斗争为我们在广东建立真正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成千上万的工人造成了对香港的真正封锁，从而也造成了可以使反革命窒息的局面。可以打着同香港作斗争，同香港对广州的封锁作斗争的旗号，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和保卫广东的旗号来支持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我不能展开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革命策略问题。这个情况也使我们有可能摆脱某些理论难题。我们一直说，只要帝国主义不消灭，就不能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巩固政权，建立真正的政府和改革财政（体制），以及建立真正的国家体制。可是现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而广东在继续发展壮大，不是每日而是每时都在发展壮大。我们怎样摆脱这种局面的呢？很简单，在广东没有帝国主义，在广东没有不平等条约，在广东，港沪银团即控制着广东的著名（汇丰）银行没有起作用，香港工人实行了出色的封锁，他们用封锁终止了不平等条约，创造了使广东彻底摆脱任何帝国主义影响的环境。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镇压反革命，实行某些改革。当其他居民阶层离开工人时，就应该停止罢工。这是正确的策略。正是因为这种罢工是有其他居民阶层参加的民族斗争的先锋队，所以要将它继续下去。既然其他居民阶层离开了罢工斗争，那就应该采取较好的策略停止罢工。要对工人们说：“现在其他居民阶层

不支持你们了，停止罢工吧，你们应该聚集新的力量，到时候还会出现新的高潮”。我意识到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是在继续进行罢工，并且有意识公开地给工人领袖们提出了问题：“你们应该继续为国民革命运动作出牺牲，你们应该继续进行罢工，因为如果你们今天停止罢工，那就意味着我们同内部反革命进行的整个斗争和在前线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简单的例子是：结束罢工，就会有几艘轮船在白天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向你们后方运送不只是武器、奸细，而是所需要的一切，目的在于在广州本地从背后打击你们。罢工在继续，3000名纠察队员身着制服以示同其他罢工工人相区别。他们继续实行封锁，收缴每一个火油桶，这3000名纠察队员沿着河流和海岸追捕往返于香港的人员和船只，以支持左派政府。我们听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抗议，主要是英国领事的抗议，对这些抗议我们未予理睬，我们很清楚这3000名纠察队员和罢工斗争是控制主要中心的最好军队。我向你们讲过，香港是我们敌人的中心。在这个战线上我们既没有舰队也没有军队用来对付这个中心。但是罢工斗争控制了 this 中心，工人控制了 this 中心，他们使这个中心的活动完全瘫痪了。

这就是说，比如罢工在上海发生了，需要停止罢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停止罢工。我的观点是：在上海，当发生分化，商人开始瓦解，只剩下工人的时候，就应该停止罢工。这个时候应该明白，如果有人搞垮先锋队，那么工人就会孤立无援。当先锋队就意味着有人跟在后面，有人拥护你们，但实际上工人是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当弄清楚应该停止罢工时，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要利用罢工一劳永逸地为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基础。现在工人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足以说明问题的是，现在每月至少死去20到30名工人。

伊万诺夫斯基：怎么死的？

鲍罗廷：得各种疾病死的，饿死的。确实，他们每天从政府

那里得到1万元钱。在广东本地有工人约4万，以前工人还从国外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国际援助，而现在得不到了。随着斗争规模的扩大，而且也正在扩大，现在香港又爆发了机械工人罢工，在我离开之前曾决定把给每个工人的资助款提高到10元，这是我的建议，工人过去得到8元，但随着运动的日益高涨，国外援助规模越来越小。研究一下工人是如何在这场斗争中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谈了城市居民，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谈谈农民问题。农民同罢工也有联系，因为10万罢工工人当中有4万在城里，而其余的在农村。这是有联系的，但不能说罢工工人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有机联系。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另一个什么时间继续向你们作通报性的报告，向你们详细通报过去做了些什么工作和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而今天请允许我来谈谈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任务，以便现在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些任务。至于通报，可以在另一个时间继续进行。

问题在于，这两年半的主要斗争是遵循首先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方针进行的，消灭帝国主义就会消灭军阀统治和建立某种国家制度，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卒，消灭走卒还不等于消灭帝国主义，必须吸引广大工农群众等参加斗争。在中国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同苏俄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最近的代表大会上^①还补充说：必须同其他被压迫民族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要由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反帝群众在同苏维埃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来进行。

今天我想谈谈“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卒”这个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已经过时，而且它在理论上从来就不正确。实际上它为广东带来了好处，但它已过时了，因为在广东几乎没有军阀，没

^① 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有我们所理解的在中国其余地区的那种军阀。在一些军队中还需要做大量政治工作，否则就不能组建真正的革命军队。但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处在国民党左派和我们的影响之下。那里同军阀的斗争是指与外面军阀的斗争，即同云南军阀以至广西军阀的斗争，因为他们同英国结成了联盟。在我动身之前从广西回来的同志说，广西人同意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

我说了，把同军阀的斗争看作是同帝国主义的走卒的斗争，在理论上从来就不正确。我个人认为，帝国主义在整个中国，特别是在广东的最主要支柱不是军阀，而是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落后的中世纪土地关系是帝国主义的最好支柱，只要我们不消灭这个支柱，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同帝国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为什么我突然谈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对于广东来说这个问题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它之所以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因为需要在广东建立某种国家制度（布勃诺夫同志说，他没有想象到国家制度会腐败到他实际上所看到的这种程度）。但你们知道吗，若是你们具有我在近两年半时间对这种国家制度的体验，你们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你们连一个诚实的官员都找不到，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官员，因为每个官员的理论是，凡对他和他的家族有帮助的都是有道德的，都是诚实的。这里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就是我的家族。国家制度需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在这里我们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广东，还不只是在广东，存在着这样的土地关系，以它为基础你们建立不了任何国家制度。必须消灭这种土地关系，那时才能谈得上建立某种国家制度。你们知道，我到处提的口号之一，特别是当外国记者公开问我：“您在从事什么工作？您想做什么工作？”时提的口号之一，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我曾对一个记者说：“我

们只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他说：“难道你们布尔什维克只满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纲领？”我对他说：“要知道，在中国这是最革命的纲领。如果在你们英国或美国有谁讲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那么我会说，这个人沉睡了一百年。在你们那里这是最保守的纲领，但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就等于在伦敦建立共产主义。请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吧！你们如何在中国建立这个诚实的政府呢？我很清楚是建立不了的。”^①我只是向外国记者讲在中国建立诚实的政府，但我们很清楚，任何诚实的政府也建立不了。是什么妨碍做这件事呢？是落后的土地关系，而这种落后的土地关系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有帮助。消灭这种土地关系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土地革命问题是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土地革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广东，这个问题被称作是地方政权问题，很少人了解地方政权怎么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

在广东有94个地区，约有4000万人口。在广东有94个县长，他们叫地方官。确实，从滇军、桂军、陈炯明等被打败时起，免去了一些县长，但剩下的许多县长，按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实际情况来说，都是旧官吏，在农村的每次斗争中总是支持陈炯明。最近几个月在广东农村发生了七次内战，即七次大血战。农会是在很单纯的防匪自卫、进行合作等行动纲领上组建的，这一点在一百年前就有人谈到了。但是农会渐渐被卷入同豪绅的真正社会斗争中，这种斗争必然以流血而告终。若不是政治委员会立即派军队去援助，农会就会被消灭，当然在这种斗争中它们会被打败。当许崇智派他的一个师到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流血斗争的地区时，我们决定把这个师赶走。当然政府始终站在农民方面。但并非这么简单。政府没有马上这样做，而是试图寻求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设法使双方和解，然而此伏彼起，斗争不断。也许是因为我

^① 与记者的谈话没有找到。

们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无法对付这种自发行动。做 60 万有组织的农民的工作大约需要有 100 名共产党员。至于国民党人，他们不到农民群众中去。只有共产党人，几乎只有共产党人利用“一大”关于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决议。也许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有 100 名共产党员来做 60 万农民的工作而不能控制住这种自发行动。也许，如果有 500 名共产党员，也还是一样，因为在广东对农民的剥削已达到收入的 65%。假定一亩地一年给农民带来 10 元钱，农民则必须或作为捐税或作为地租交出这 10 元钱的 65%。这就使农民的财产成为子虚乌有，实际上不存在，但农民反正都得或作为捐税或作为地租交出 65%。只要存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就未必能迫使共产党人，或更确切地说共产党人就未必能迫使农民克制自己。既然他们组织起来了并感觉到政府在支持他们，至少不镇压他们，我们就未必能迫使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就未必能迫使农民放弃过早的行动，从我们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来说……^① 当政府在北方做好准备时，我们再采取行动。

多数县长就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来说是站在豪绅一边的，自然，地方政权也就面向豪绅。要赶走这些官吏和向那里安排依靠农民的人，那就必然要进行一场 4000 万人的内战。而如果我们要防止他们面向农民运动，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受到豪绅的影响。二者必居其一。我们可以用各种策略维持一段时间，但迟早他们会或者支持豪绅或者同农民一起发动起义，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北伐也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普遍的心态是，一些人意识到，另一些人本能地感觉到，不能打击陈炯明，同时也不能实行陈炯明的政策。不能坐守广东，建立模范省，不扩大自己的战略范围。而应该北上，但是打着什么口号北上，如何北上？如果重复孙的

^① 原文如此。

北伐，即集结军队北上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斗争，那不会有什么结果。而如果我们再占领一个省，比方说湖南很容易占领，但要知道那时我们无法应付广东地方政权，因为没有人力。对此有人会说：“办学校吧”，应该办学校，以便培养出可以派到广西、湖南等地的足够官员。但问题不在于此。不是需要依靠某个阶级，依靠大多数老百姓吗！

我们是否还要建立农会？如果还要建立，那么同豪绅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反对65%剥削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现在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湖南、广西和各地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夺取这些省，派去官员，他们会依靠豪绅，结果我们不会有任何地方政权。而要有地方政权，看来就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广东反革命的支柱不是军阀，而是包含着对农民65%剥削的这种土地关系。一切都靠这种关系支撑着，军阀靠这种关系支撑着，买办靠这种关系支撑着，官吏、豪绅靠这种关系支撑着，政权的一切腐败现象都靠这种关系支撑着。我不认为，我们能靠国民党的军队进军到北京。我不谈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在土地关系上。

伊万诺夫斯基：而口号的内容呢？

鲍罗廷：口号的内容应是明确而通俗地阐明土地纲领。现在广东的情况是这样：敌人被赶走了，而下一步干什么？下一步不能再采取任何步骤。应该着手建立国家机关，应该把它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为此就需要进行土地革命。

我说了，军阀是帝国主义者走卒的口号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反革命的支柱是这种土地关系。只要我们不消灭这种关系，恐怕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会惨遭失败。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帝国主义者有可能采取明的和暗的行动，他们可能有组织地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行动，但仍然是暗地里，他们可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要保留甚至加强自己的巨大商业影响，到那时我们又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我们没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有为国

民革命建立支柱，而一直坚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等易动感情的口号。应当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暂时我们还没有基地。我们有60万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我们有数万，或许更多，有数十万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对我们有好感的商人，而且他们支持土地革命，关心土地革命，现在他们与豪绅也没有特别的联系。商人关心国内市场，关心农民的福利，因此我认为商人也关心土地革命。现在商人对我们的态度很好。我们有相当好的军队、国民政府，有着手进行土地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既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在农民中就没有真正的基础，预计将来也不会有。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将来的行动中要紧紧抓住社会问题。我们无一例外地抛掉一切，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这是现在在广东的主要问题。

当我谈土地革命时，我不是指现在就进行土地革命，我是从准备土地革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

我们在南方大约超前了两年半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北方在于我们两年半以前所干的事情，互相吞并，一个军阀消灭另一个军阀。将来冯^①还在吗？我们要不要向这里投放一个师的兵力，将一些力量集中在自己周围，一会儿推翻这个军阀，一会儿推翻另一个军阀？现在这里的人们在于我们两年半以前所干的事情，也就是处于筹备运动的最初阶段，而在广东我们在抓紧解决我们将以什么为依靠来建立国民革命运动的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着落。最后广东将成为很富裕的极好的省份，而我们将迫于客观形势，迫于大家都喜欢的经济的巨大发展，成为那些自发地采取行动的农民的对立面。那么政权会落人何人之手呢？

^① 冯玉祥。

鲍罗廷^①：今天我从行政方面谈起。我已经讲了，94名县长中至今我们仅除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很久以来就在这个职位上，有的甚至还是从清朝开始就做这个官的。他们做了整个共和时期的官。你们知道，1911年革命根本没有触及地方，好像地方上也并不知道这次革命。捐税依旧，政权依旧。

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没有抛弃所有县长，没有用优秀的，比如说较左的国民党人取代他们呢？这是因为多数县长是在1925年8月24日发生主要政变以前由在广东掌握政权的各派军阀安插的。过程大致是这样：既然全省被这些军阀肢解，每个军阀掌管一定数量的地区，他自然要向那里安插自己的官员。在中国，县长掌握地方全权。他既收税，又审判，还领导警察。除了县长没有其他政权，有县长就意味着有政权。只要我们不能惩处军阀，就不能触动他们。

那么要问为什么在8月25日以后我们还是留下了多数老县长呢？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第一，没有足够的人力取代他们。当然，我们可以任用没有经验的国民党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国民党人，安排他们做县长，但是我们怕向那里安排没有经验的县长，因为这样做会搞乱财政机构。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钱财来满足政府和军队的各种需要。就是现在，月收入近5百万元，但军队吃掉很多，已所剩无几，更确切地说，为民事部门已分文不剩。我们结束最后一次战役时是亏空的，现在我们怕在这次战役之后，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触动老的地方政权机构，用新县长取代老县长。

但是，正如上次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主要问题不是缺少人力，也不是怕搞乱财政机构，而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地方当局的基本政策，那么新县长与老县长又有什么区别呢？

^① 这是在2月17日使团会议上的报告的最后部分。

因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十分具体而迫切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在开办比如说两个月课程的学校之后用新县长取代老县长，而完全不涉及是否要改变地方政策的问题，或者在培训新的地方工作干部的同时还必须解决应通过进行某种土地改革来建设政权的问题？在离开广州之前，一些最著名的政治委员会委员曾要求我为他们答复这个问题，要求制订如何建设地方政权的计划。大家觉得，不建立地方政权，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就不巩固。

第二个问题。我随身带来了几册（4册）描写最近几个月在农村发生的农民与豪绅之间的斗争的书籍^①。我们以后怎么办？如果我们继续建立农会，如果在这些农会不断发展会员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数量不增加（上次我已经指出共有100名共产党员做60万有组织的农民的工作），如果党的发展进程，主要是共产党的发展进程（因为国民党中的主要农民工作者还是共产党人）不与农民运动的发展进程相适应，那么这种流血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方针：必须由共产党人来从事这项工作，而是因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国民党的全部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国民党是城市组织，国民党从不具体关心农民运动。国民党作出了关于必须把农民群众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的各种决定，但还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挑选出农村工作人员。国民党青年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掌握这样一条原则：不真正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他们就一事无成。只是现在这些青年才开始懂得在农村做工作的必要性。这里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一个情况，国民党批评和指责共产党人（可能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因此我要提醒你们），似乎共产党人不让国民党工作人员去农村，共产党人垄断了全部农村工作。

这种批评有合理的成分，但很小，因为在个别地方共产党人

^① 卷宗中没有这些文献，但其大部分内容可能收入了下面一本书中：M. 沃林、E. 约尔克：《广东农民运动——中国土地问题资料》，广州1927年版。

曾试图不让国民党人去农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我们也能为此种做法找出某些辩解理由，但是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让共产党人阻止国民党人去农村的方针。我认为，总的来说作这种批评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国民党人自己根本不想去农村，根本不愿意去那里。只是当他们看到农村群众开始觉醒，开始理解国民革命运动时，他们才说有必要到农村去。这在技术上也是难于做到的。

我说过，国民党青年主要是学生，是城市青年，可能现在还没有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好像我第一次在广东像民粹派似地谈到过需要到民间去，为什么需要到民间去，等等。

加拉罕：您是否可以谈谈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土地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他们什么时候成立了委员会，等等？

鲍罗廷：说得很对，我来谈谈会前和会上在农民问题上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表明，说共产党人不让国民党人去农村的批评意见是不公正的。孙逸仙任命的一个由胡汉民……^① 廖仲恺和我组成的委员会，奉命为党的代表大会制订在所有问题上的行动纲领，在农民问题上花的时间比在任何别的问题上都多。我们用了几个小时研究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左派来说都清楚的东西，当时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变成了这样的左派。委员会所能接受的东西是孙逸仙在某一本书中谈到的一条原则，即应当迫使地主说出他们土地的价钱。如果他们说的价钱比实际上的价钱高，那么地主就不得不交更多的税。就是说他们自己坑了自己。如果他们说的价钱低，那就可能按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怕说低了。你的土地值多少钱？100元，而实际上值200元。他说的价低是为了少交税。那好吧，我们收购你的土地。而如果相反，土地值100元，他说200元，那就要交更多的税。孙是从何处援

^① 原文如此，应是汪精卫。

引来这个原则的，我不知道^①。总之，我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有同孙进行过大的理论争论，这样做是危险的，我们始终力求为他本人的理论注入某种实际的涵义。

而当我们试图以更现实更具体的形式提出土地问题时，我第一次遭到了孙本人的反对。他说：“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贯彻执行，因为我们的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组织起来，在我们和农民之间有豪绅，如果我们颁布法令，那么这个法令会首先落到豪绅手里（如果法令能传到农村的话），豪绅就会利用法令来反对我们，并且他们不仅把军阀而且也把农民发动起来反对我们。因此首先应当着手组织农民。”

我正是抓住这一点同他进行了很大的争论，我说：“好极了，我们颁布一个法令吧，说明农民有权组织起来。”于是就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但在赋予农民在最单纯的起码的自卫立场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之后，不仅由现在的左派组成的委员会不想再向前迈出一步，而且孙逸仙本人也不想再向前迈出一步，他的观点还找到了相当有根据的理由来反对颁布土地改革的法令。后来我还是得以说服他，使他相信确有必要颁布减租 25% 的法令。这个法令通过了，但好像至今还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未能贯彻执行。

在对土地问题持这种态度的情况下，自然国民党青年不可能特别愿意到农村去。上层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大意义，或者认为这个问题有意义，但说实际上这是实现不了的。关于农民有权组织起来的法令，至今只有共产党人在利用。上次我讲 100 名共产党员要做 60 万农民的工作，我觉得表述得有些不准确。我是指 100 名共产党员工作人员，但这不是说在农民中没有党员，没有共产党员。我讲的是积极的工作人员，有 100 名职业共产党员经常

^① M. M. 鲍罗廷在 1925 年 2 月发自广州的札记中指出，所说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孙逸仙是从亨利·乔治那里借用来的。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383 页。

在农民当中做工作，而在农民当中也有共产党员，这一点我没有讲。

我们是否将继续组织农民呢？当然要尽量通过宣传工作把国民党左派吸引到农民工作中来，并且为了农村工作要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之间寻求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继续组织农民，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把他们组织起来，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好，那么我们就不是有60万有组织的农民，而可能是6百万有组织的农民。但这意味着必然发生内战，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住农民。即便有更多的共产党员，我们也无法制止农民为实现自己最迫切的要求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内战。要么是放弃组织农民，并说还不到时候，我们应当从事国民革命运动；要么是组织农民，那就要明确地对自己说：我们准备进行土地改革。我上次已经讲了土地革命问题。

伊万诺夫斯基：最好您谈一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因为上次由于时间不够我们没有来得及好好谈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如您自己说的，实质上是工作中的中心问题。

鲍罗廷：不管农民是不是土地所有者，都要剥削他们劳动成果的65%，这个事实决定了广东农民的经济状况。在广东有三类农民：完全无地的农民即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和半佃农，即有一点儿土地还需租一块土地。无地农民加上半佃农（即既是佃农又是土地所有者）占居多数。与这三类农民中的另两类相比较而言，无地农民即佃农是数量比较多的。多数是无地农民。

上次我顺便说过，我们农民的财产完全子虚乌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有地农民需要交纳的各种捐税总额与租金数额大致相同，在有些情况下相当于租金加税款，而在有些情况下，则什么也没有了^①。不管怎么说，有几亩地的农民要为自己的土地交

^① 最后一句意思不清楚。

纳的捐税相当于他租地所要交纳的租金。我所谓子虚乌有就在于，他有这块土地和没有这块土地都一样。反正他都得交出自己劳动成果的65%，这里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在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农民之间没有大的差别。如果你们看一遍农会名单，你们就会发现，除了完全无地的农民外还有一些有土地的农民，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土地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大体上受到了同样的剥削。我不知道，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的情况如何，苛捐杂税是否达到农民劳动成果的65%，不管怎么说，这是闻所未闻的。在一些地方捐税竟达40种，包括支付庚子赔款的捐税^①。坐镇那里的一伙人掠夺我们的农民，逼迫他们交纳庚子赔款。各种捐税达40种。以前军阀征收，现在政府征收，县长征收，豪绅以各种名义征收。在一些地方，豪绅有自己的武装即民团。土匪也征收，土匪有印章，定期征税。在整个这种税收制度的领头者是半官吏半地主的豪绅。

当我们谈论夺取地方政权问题时，我们始终是指改变土地关系，我们对自己说，在最近这一年，我们进行了许多战役、许多斗争和种种对抗，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曾经进行过的最复杂最艰难的斗争。打败军阀，这是一，而着手改变土地关系，改变税收制度，虽然说似乎可以依靠各种人士、各种集团，但能否把他们联合起来，这是我们政策中的一个大问题。

在党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豪绅思想意识、官吏思想意识和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国民党还没有清除妨碍实行土地关系改革的各种思想意识。人们常说，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可以克服的势力，但也可能是不可克服的势力。这就是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

着手做这项工作吗？在这方面我感到自己有些麻木了。你随便触动一下孙科或者许崇智，结果是一片埋怨，差点把国民党左

^① 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在镇压义和团后于1901年强加给中国的。

派丢掉。但这与进行土地改革需要做的事情相比，是小事一桩。据统计，有5000万个家庭从事农业，如果以一家8口人计算，那我们就有4亿人。而如果从中去掉300万产业无产阶级，并把这300万乘上每家6口人，那就得出1800万，就是说剩下的3亿8千万人受着65%的剥削。你们尝试触动一下这65%吧。这些人骑在农民的脖子上。我根据广东的经验了解到这个情况。你们尝试触动一下农村，那立刻就会爆发内战。这些豪绅势力同土匪串通一气，在城市里同以各种名称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组织串通一气。你稍微触动一下，四面八方就会冲你来。

当我讲有40种捐税时，我想，你们会对我说：“你们有力量，为什么不废除这些捐税？”我也要问你们：“做不做这件事？”我们有力量，政权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我个人认为，我们未必能掌握豪绅，如果我们做这件事，那就意味着进行土地革命。那么能在中国的一个角落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吗？

可以肯定，你们会说：“好，你们准备进行土地革命吧，把准备进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放在你们整个工作的首位，而你们的党是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改革的，国民党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知道，至今我们大致是这样评价国民党左派的：凡国民党员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认为帝国主义是造成整个中国混乱的主要原因；其次，都赞同孙的同苏联合作的观点。他们有时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第三，都认为需要把工农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但不是一般群众，因为所有国民党人都说，现在群众已被吸引过来了，但什么样的群众呢？你们问一下某个国民党右派：“你们讲的群众是指什么？”，他会给你们讲种种故事，但不明确说是“工农”。而国民党左派现在就说是“工农，农工”。最后，最近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认为有必要同其他被压迫民族实行合作，共同进行斗争。但我们能否对以上所述作出补充说，第二次代表

大会也认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通过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土地革命意味着什么？这方面的工作应进行到什么程度？可能有意见分歧，但如果现在国民党内日益发展壮大的左派不接受最后一点，即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通过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一事无成了。不过我认为，国民党内日益发展壮大的左派在接受了以前的东西之后，采取了以武力保护农民使之免遭豪绅掠夺的措施，因为在广东最近发生的战争期间，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左派用武力支援了农民。如果说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这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关于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通过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这一点不会被接受呢？也许，接受这一点就意味着出现了曲折和偏离，而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加深和扩大国民党内存在的矛盾。我不是讲那些已经脱离关系的国民党人，这是脱离关系，不是分裂。如果不考虑这种脱离关系的情况，这不就意味着现在逼迫左派接受吗？（这样就从本质上注定了国民革命运动一定要通过土地革命来进行，否则就一事无成），不就是在加深和扩大现有政权中的矛盾吗？我们现在能这样做吗？

可见，我提出的地方政权问题，并不是通过两个月的课程来为占据地方职位和用新县长取代老县长培养人员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是否应该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和我们能否迫使国民党左派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这不只是着眼于在广东需要建立地方政权，而且还着眼于一般说来在中国如果农民不能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国民革命运动也不会取得胜利。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不进行土地革命，那么国民革命运动就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将会因为帝国主义者向它作出让步而被彻底搞垮。我不相信美国人会不放弃治外法权。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发生阶层分化，那时我们只能做一般的、我们很习惯和熟悉的工作，即对工农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而谈论这样的国民革命运动，谈

论阶级斗争，谈论借助于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等等，就是冒险了，并且这不只是像我所说的着眼于在广东建立地方政权，着眼于国民革命运动应该首先通过农民来进行，而且还着眼于援助北方，着眼于进行所谓的北伐。

我至今怎么也不明白，北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怎么也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北伐？仿效孙的做法吗？也就是集合军队北上，机械地北上吗？那么何时北上？……^①但是有过这样做的某些前提，我们曾想完成这样的事情，到欧洲去，制造社会革命。而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北上？上次北上是为了惩罚吴佩孚等人，而他们在什么方面比其他军阀更坏，不清楚。所以当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北上时，就回答说要惩罚吴佩孚。我们在广东所处的环境很恶劣，这种环境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经受不住，忍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离开那里，但离开广东就应该北上，把广东留在身后，务必离开那里。否则我们应付不了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即广东的新经济政策，应付不了我们的国民党，应付不了优秀的党，而这种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务必要走，但口号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是不够的。要联系沿途农民。就是说我们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都可以得出，我们现在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停留在同帝国主义、同军阀进行的抽象斗争上，还是说口号是改变土地关系，不改变土地关系，我们就一事无成。

至于事情的军事方面，请允许我不来谈我们有多少师，这些师是什么情况，哪些将领统率着这些师，军事委员会在做什么工作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可以直接提出统计材料附在会议记录上。

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与军事问题有关的问题。在最近一次战役结束以前，怎么也不能把广东的将领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将领划分成将领和政治家，因为同一个将领既当将领又征收捐

^① 原文如此，缺前半句。

税，掌管警察，同那些与帝国主义者有联系的人勾结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是自己的外交部长。你们可以设想，一个将领既是征收捐税、统领警察的长官，同时又是自己的外交部长，还是贸易、工业部长，他像墨索里尼一样包揽一切，墨索里尼有个讽刺画：画面上有4个镜子，每个镜子里都是墨索里尼，他也是外交部长。能说你们面前的将领在领导军事机关吗？怎么也不能。实际上我们这里军政领导人之间发生的所有误解都在于此。一切祸根都在于此。若是能把这些将领划分开来，那么就能很容易地把从事军事工作的将领交给军事组，交给我们的军人同志，我们的同志就会同他们一道工作，仅此而已。然而同他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些将领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将领。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必然要把他们作为政治家掌握在自己手里。发生这些误解不是因为哪一方没有分寸。谢天谢地，有人善于寻找同完全格格不入的人，同甚至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共事的可能性，有人善于接近他们却不能接近自己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所有误解产生于何处？误解产生于你怎么也不能使中国将领只当将领，他一定要从政，既然他要从政，那就要同他打交道，而同他打交道就要同他达成协议。

现在在广东是否到了将领不再当政治家而只从事将领工作的时候了？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来。不可能把这些将领交给军人同志，交给军事机关，因为他们仍然是政治家，首先是政治家，当然是国民党的政治家，但毕竟是政治家。

从报告中和你们在中国所进行的谈话中，你们可能得出结论：关于局势的复杂性可以讲几天几夜，但是我们在广州所遇到的这种复杂性，谁在中国都未曾遇到过。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作出判断的。我曾遇到过很困难的局面，1922年我在英国工作时，那里陷入了极其严重和极其复杂的局面。你们知道，当时至少在个别封建国家已经有了工会，要在英国做工会运动工作，需要具有

战略经验。当时处境很艰难也很复杂，从伊里奇^①本人那里得到的指示是，在适当的时候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仅此而已。但是我要说，在中国进行工作的这种复杂局面你连想都想不到，也难以理解。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了利用这种极其复杂的局面，无论如何要表现出一致意见。不能有两种权力。你们知道，中国军阀、中国局势和一般中国人的特点之一是玩弄权术，特殊类型的权术，他们习惯于唆使一个反对另一个。一般说来，这不新鲜，但在中国非同寻常，大家都这样做：唆使和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一旦发现某处有缺口，他们就即刻打入并加以利用。当他们在我们这里遇到一堵严密无缝的墙，怎么也找不到缺口时，相反倒有可能利用他们的矛盾，他们的分歧，而不是我们的分歧，不是打入我们的缺口。应该迫使中国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沿着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

我们怎么能迫使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呢？第一，可以通过说服劝导，指出他们过去遭到失败的原因。但这不是全部。我们不可能光凭宣传鼓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从来没有达到过。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也就是采用他们的方法，但同时自己要坚定和坚强，不给他们提供利用我们的机会。胡汉民几次想利用汪精卫和我之间的分歧。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情况的，天晓得。如果一个人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他会说同另一个人谈谈，而如果另一个人逼得他走投无路，他会说同第一个人谈谈。他千方百计要利用我们。这就是为了取得我们在这两年半时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需要采取独裁方法的原因。

现在是否到了再没有这种复杂情况，可以转入按部门、按类别等分权的时候了呢？我认为，就是在广东也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① B. H. 列宁。

请问，能说我们有军事任务，就有从事军事工作的人，我们有政治任务，就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政治家吗？也就是说可以把权力机关分解成部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解成不是狭义上的部门，而是广义上的部门吗？不能这样说：就是在广东也没有到这样做的时候。政治应当是整个工作的统帅，一切都要服从政治。人们常说：“对军事工作的总的领导”，毫无疑问，这是政治机关的话，但在中国这里只讲“总的领导”不行。这里有时需要领导具体的工作，最一般的具体工作。需要深入和领导这种具体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我要作报告和说明，为什么最近在所谓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之间发生了分歧，我觉得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很错误的，需要在这里谈谈这个问题。至于说到军事工作，现在在广东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的，不会遇到大的困难。正在制订的计划将通过各种机关来执行，在地方贯彻执行时不会遇到什么大的困难。困难可能在于，军事机关需要的资金，财政部无法提供，因此可能产生误会，虽然不常有这种情况。如果还有几个月时间的协调工作，那就有可能把现有的这个 21 师动员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利用。现在急需下级和中级指挥官。

为了解决这个不足，现在要创办培训中级指挥官的中心学校。这所学校要受黄埔领导。一般说来，这所学校的校长将是蒋介石，这就表明了这所学校的性质。此外，我们还要向那里派遣优秀的政工人员。

武器不足也可以感觉得到，因为这里讲的不是个人组建军队和武装，但由于我们已经获准给广州一定数量的武器，所以我认为这些武器暂时是够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至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这里必须指出，国民党内关于共产党人问题的辩论也触及到了军队，在军队中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问题在于，共产党人一直是军队中最优秀最忠诚的工作人员，在各次战役中，并且不只是在军队中，而且在

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最勇敢。这种情况不能不在指挥官当中引起某种忌妒、某种对立，特别是在那些自称是国民党人而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转到国民党方面来的人当中。

总的说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东西，由于它要求指挥官负有更大的责任和对事业的更加忠诚，所以不可能受到他们的喜欢，除非有些部队早就有政治工作并且这种工作已有适当表现。但是就是在这些部队中，同共产党人的关系至今也不是很好。当然这里也有社会原因。指挥人员都是老的，即使在黄埔军校，也不是完全由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新人组成。老的指挥人员始终反对政治，特别是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应该说，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势单力薄时，问题不是特别突出，但最近，最近几个月，在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相当多，正因为如此，很难避免某些共产党人犯错误，没有分寸。共产党人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而他们工作出色、诚实，他们不能保持沉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不能以恰当的分寸来对待，至少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在由老指挥人员组成的军队中的复杂情况下玩弄权术，所以也产生一些误会。

这些情况导致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共产党人的问题，即共产党人是否应该继续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为什么这样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过去我们不知怎么把共产党人看作是私生子，避而不谈某某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员。这是不是一个错误，或者这样做是因为不需要从一开始就吓唬他们。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不是以其他党即非国民党成员的身份出现的，没有明确直接地宣布，我们在国民军中工作，是因为我们党需要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合作。没有这样提出问题，没有这样作出表示，而好像是用共产党人去充实军队，不说某某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员。只是整个党的系统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只是在共产党人在工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时候，才暴露出共产

党人是否掌握了太多权力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本人认为需要直截了当地提出：你们是否认为已经到了散伙的时候？

加拉罕：您向谁提出这个问题？

鲍罗廷：向国民党人。

加拉罕：向政治委员会？

鲍罗廷：我从未向政治委员会提出过，而是向国民党领袖们提出：你们是否认为已经到了散伙的时候？如果你们认为是，那我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要知道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加入军队。

加拉罕：您能否谈谈一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反对在国民党中工作的？

鲍罗廷：其实是我们逼着他们工作的。其实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拒绝同国民党合作，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1920年，即共产党成立时起，问题就这样摆着。我也对这些领袖们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的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行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同你们合作。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到了散伙的时候，我想，共产党人对这种情况是求之不得的。你们是怎么想的？说不说这句话？这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看来情况不是这样，不是共产党人强求（在国民党中工作），或者我本人或共产国际认为，让共产党人一定在国民党和军队中工作，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准备随时散伙和确立某种临时协议。国共两党可以退到任何一种立场上。散伙不等于彼此对立，可以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这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好像共产党人不强求。我还说，如果共产党人继续处于这种状态，即对他们所做的每件小事，所犯的每个错误，都进行挑剔，那么这就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例如，有位共产党人给军队写信，对共产党人称同志，而对国民党人不称同志，结

果这封信就被用来说明，共产党人只认为自己的人是同志，而不认为国民党人是同志。我们甚至想把这个共产党人开除，但他们自己反对这样做。不能把人置于这种状态，我强调说不能把好人置于这种状态。这立即促使他们思索起来，鉴于这件事恰巧发生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会上要解决共产党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认真，并决定让共产党人合法化，不像我们那样掩盖他们，不回避某些同志是共产党人，而相反要完全有意识地对待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的合作问题。

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个步骤，他们以为我的观点是要把这些共产党员同志开除出去^①。这是我的一个策略。我反对从军队中清除共产党人，我主张共产党人留在军队内，以便能在军队中建立左派。如果我们能建立25%的左派，那么胜利就有保证。如果我们能以军队中25%的左派为基础，那就足够了。

但是不能说，这样一来军队中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认为军队反映党内情况，而军队又不能成为某种独立存在的因素，不能具有与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注意到国民党人面临着很大的蜕化过程，还面临着很大的分歧，而我们在国民党内建立真正的左派时还需要克服某些分歧，那么就不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情况必然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这种看法在同共产党人的关系方面、土地改革方面、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和任何其他方面也适用吗？不管怎么说，如果在国民党内发生重大分歧，在军队中必然会有所反映。

在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即共产党人留在军队内，取得合法地位等）之前，反对共产党人的反对派首领是孙文主义学会，该学会是在廖仲恺时期为研究三民主义成立的。但是国民党右派同该学会建立了联系并为它赋予了不是某种教育性质而是政治性

^① 见第3号文件。

质。该学会在第二师中为自己构筑了巢穴，同一些团长、营长等建立了联系。这里出现了这样的复杂情况：原来一向反对政治工作的指挥官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因此抓住了孙文主义学会同共产党人进行的某种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在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不是一回事。如果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当时有两个党？为什么你们加入国民党而不让国民党人加入你们的党？

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孙文主义学会给予应有的注意，我们就可能把它变成接受我们影响的组织，而不是接受国民党人影响的组织，但我们对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很少给予关注。这有许多原因：缺少人力，到处要进行战争，要全力以赴搞罢工，等等。根本没有时间没有人力去注意在这个师里对孙文主义学会做些什么工作。更何况应该了解第二师情况的同志都在前线，在广州的同志很少，而第二师驻扎在广州，是在那里组建的，没有参加最近的战役行动。当我们接触到整个这个组织时，我们作了认真的分析，最后弄清楚在这个学会中并没有出现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们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没有一致的思想。例如，学会最主要的领导人同我一起从广州来到这里，现住在北京等护照，要去俄国留学^①。原来这个同志曾八次提交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八次遭拒绝。当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接收他人党时，老实说，我并没有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

该学会主要由18至20岁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和指挥官中的一些人组成。一些军官利用这个学会作掩护进行反共活动。我们掌握了这个学会，想把它逐步取消，暂时只赋予它教学小组的性质，至于那些利用这种情况的军官，则要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清理。

在6个军和6个军长当中，可以认为有4个是完全可靠的。我

^① 可能指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主席贺衷寒。见《党史研究资料》，成都1987年版第2册第245页。

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的蒋介石、谭延闿、吴铁城^①和朱培德无可非议。可以同这些军长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至于其余两人——李福林和程潜，不能把他们算作某一派某一类。也许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完全拉到我们方面来，即使目前，如果有人对他能否同我们走到底表示某种怀疑的话，他也会感到吃惊。他个人认为，他是最革命的将军，但是他的过去使人们对这一点有些怀疑。他本人农家出身，从来不是有钱的人，也许，最终这一点能使他走上正路。

至于李福林，当我们准备打击他植根于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时，我想是很容易把他除掉的。

在广西方面，情况是这样。我之所以谈广西，是因为我们同这个省达成了谅解。广西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切都在按照新的方式进行。大家知道，这个省始终有一些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从来做不成任何事情。但这个省有两个人^②，他们以那些有可能帮助清除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居民阶层和国共两党的团体为基础，成立了某种与广东政府相似的政府，他们现在成立了国民政府，从而把广西省同广东省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个省有近4万军队，而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这个军队的组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应按照我们的指示进行。他们强烈要求给以人力、指示等方面的帮助。至于武器，如果我们提供，他们准备付钱。在广西，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在进行很有意思的工作，如在军队改编方面，在财政方面，在行政机构改革方面，等等。广西人在最近一次战役中帮助我们。若不是广西人，我想，当南线敌人进攻广东时，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然而广西人及时赶来援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南方打败了敌人，之后没有打算留在我们省，而是立即提出何时需要撤离的问题。他们准备随时撤离，并且已在

① 原文如此，应为李济深

② 可能指李宗仁和黄绍竑。

撤离。

对广西应给予极大的注意，主要还因为这个省是通向云南的必经之路，而云南是我们需要的地方，如果我们想到印度支那边界附近去，绝对需要这个地方，因为通过其他道路到印度支那去是很困难的。法国人为了打击我们，最近不仅在注意观察，而且在做相应的组织工作。我们需要云南，不仅是为了直接去印度支那，而且是因为那里的首领……^①同反动的国民党人勾结在一起，曾打算会同反动的国民党人建立西北省联邦^②，以便消灭广东。

至于湖南南部，现在在那里有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很大可能性。那里有一支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可以随时派去同湖南督军赵恒惕作战。如果将来要求我们，过多少时间要北上，那就可以拿下这个湖南省，因为在它的南部有对我们友好的力量。在湖南南部需要做工作，需要提供顾问，需要派去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一句话，需要十分认真地注意湖南南部。

在结束这个问题时请允许我说一下：我和军事机关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可以说，甚至变成了良好的关系。这不是因为我们就此问题真正达成了谅解，而是因为收到了委任状，其中指出军事部门享有什么权利，并且注意到这个委任状正是在我们没有面临任何严重问题的时候收到的，各地的战事已经结束，预料不会失去斗志，不会同军阀发生特别困难的作战行动。我们决定试试看，以确认是否真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达成谅解。试试看吧。我本人逐步让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职权，好像力图把这个试验做得最充分。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这样，我在动身之前，对汪精卫同志说（我认为我同汪精卫的关系很好，我不知道他对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说的）：“您知道，我还是得出了二者必居其一的结论：或者军事

^① 原文如此，应为唐继尧。

^② 原文如此，应为西南联邦。

机关应当是政治机关的辅助，或者相反，军事机关应当有政治工作做辅助，仅此而已。”我向他指出几个情况，证明如果军事部门是辅助机关，即政治部门的附属部分，那么什么什么情况就不会发生。朋友们都这样说，那些决定寻找某种临时协议的人也这样说。双方的愿望都很好，但实际生活却是另一个样子。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么工作以军人为首。在军人那里设政工人员，设政治工作方面的助手，就像现在汪精卫同志有政治方面的助手一样，可以再设一个，可以设第三个，如果这样更好，我不反对。需要作出决定，要么这样，要么那样。我不反对工作以军事机关为首，并在这个军事机关设政工人员。试试看吧，也许这样一来你们能够解决派我们到这里来所要解决的那些复杂的民族任务。试试吧！我们商定要再试试，以确认是否能得到什么结果。你们试试吧！我在北京不再坚持军事部门是政治的附属部分。相反，我说，反过来的做法对于我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人这样说很好，那样也很好，我不争辩。但是如果今天在广东，在我们面前出现很复杂的任务，那么我要说，我对事情的结局不负任何责任。今天没有很复杂的任务，但过一周，过二四周，有可能出现。如果将作出这样的决定，那时你们也要承担责任。

我可能表达得不清楚。问题不在总的领导上，我知道，关于这一点不会有争论。问题不在总的领导上，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人全部工作负责。如果他不好，就要另找一个。同中国人你们不要说把工作分成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等等。我试验过，我同汪精卫达成过谅解，但没有任何结果。为了同一个同志谈谈话，稍稍偏离某种奇怪的令人不解的规矩，就是对某种制度的违反。有一个人在蒋介石的那个军里工作，就遇到了很复杂的情况。重要的是要知道，现在怎样进行工作，从第二手那里听取情况，这并不是同直接在那里工作的人交谈，这不意味着干预战事。作战时期唯一一次我问同志们：“你们的敌人在哪里？

不是你们中心所在地那里是左翼，而敌人要借助舰队把全军投放到南面去吗？”这不意味着干预战事和任何其他事务。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封闭起来。现场工作负责人应有权同任何一个同志谈话，有权作出某些指示，决定如何对待某个集团、某个军队。不能不这样。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在我动身之前能得到解决。我想，我向汪精卫作出的保证是，过一个月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的解决并正式履行手续。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的财政问题。我不谈细节，但要涉及基本的东西。两年半以前，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是1天1万元或1月30万元。现在是1月500万元。怎么回事呢？据说主要是因为全省统一了，消除了影响财政统一、不把财政交到政府手里的军阀。这都是对的，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建立这样的财政。但全国唯一的省份广东能把财政建立在如果说不是牢固的也是广泛的基础之上，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香港和沙面的罢工工人封锁了帝国主义者的全部财力。最近一次罢工之前，全部财权掌握在港沪银团（汇丰银行）手中。英帝国主义通过这家银行控制了广东省。它发行的纸币就是没有应有的保证，也能像金币一样流通于广东全省。这家银行要么排挤当地银行，要么虐待它们。这家银行的买办是广东的实际主人。你们知道，商人老虎队的首领是港沪银行买办陈廉伯。居民，特别是商人甚至根本不相信能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他们已经习惯于没有香港没有香港银行就不能生活，这是唯一一家可以信赖的银行。这种情况妨碍着手建立自己的财政。需要消除这种影响，换句话说，需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知道，在广东不存在不平等条约，可以把任何一个英国人投入监狱，给他带上镣铐，当我们从政治角度看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把他放了。外国法庭，特别是香港的英国法庭到处进行搜查，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放过它们，如果没有必要，就不放过。为什么？因为10万工人实际上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只要这些不平等条约在广东不复存在，就可以着手建立应有的财政机构，我想就是这个情况以前没有注意到。

6月23日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口号下开始进行的斗争，在广州发生枪杀工人事件^①后，已具有争取独立、争取广东经济独立的性质。罢工已经持续6个月，这场斗争，除坚持所有其他反帝口号外，还把争取广东经济独立作为一个基本口号。在这场斗争中建立了财政并为今后的经济独立确立了相应的思想意识。例如要建设自己的港口，以期在没有香港港口情况下也能过得去。主要是谁帮助广东政府建立了财政的呢？是香港工人和沙面工人。若不是他们的罢工，我们今天还会在同不平等条约和港元打交道。谁也不会比财政部长本人、年轻的宋子文更意识到这一点，宋子文每天早晨都满意地发给罢工工人1万元。工人阶级今天帮助广东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即国民革命政府建立财政与英帝国主义财政相对抗。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历史性功绩。

伊万诺夫斯基：这确实不错。

鲍罗廷：如果罢工结束，当不平等条约重新起作用时，当在沙面和香港再次出现开展各种银行业务的可能性时，广东重新建立起来的财政能否经受住同外国资本的竞争，这还是个问题。可能有人已向你们报告，广州政府现在筹集的500万元已有400万拨给了军队。这并不可怕，因为政府的资金毫无疑问很快就会增加，但军队的开支不能以资金增加的速度来增加。因为借助于财政资金的增加才能为民事部门提供服务，才能支付我们向他们提供的物资援助。

与广东政府的财政成就相联系，值得指出的是老百姓对现政府的态度。连我们的敌人，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说，广东还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政府，但糟糕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国人干的。他

^① 指1925年6月23日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巡捕对反帝游行的开枪事件激起了香港和沙面租界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

们就是这样说的。问题在于，这些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报刊，主要是在香港，有几家报纸整个这一年都在疯狂地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它们向广东老百姓说（顺便提一下，在香港大量发行的中文报纸也和它们一起宣传），布尔什维克只搞破坏，因此我们怕它们。这是一些无政府主义破坏者，我们应该怕它们。这就是英国人及其走卒提出的理由。它们还这样吓唬老百姓，说我们打算引进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被说成是割掉女人的乳房，强占中国人的妻子，虽然他们有许多妻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老百姓，最广大的老百姓在想，如果这是共产主义，如果这是布尔什维主义，那么广东怎么办，那就给我们布尔什维克吧。商人这样说：“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世界革命万岁！”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现在的政府在铺路，维持秩序，最近几个月，尽管有这么多失业者，几万失业者，但仅发生 30 起小的抢劫事件，警察抓获一半多抢劫者。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如果说这是共产主义，那么国际革命万岁！因此在广东对俄国人的态度最好。如果说我们已经达到小资产阶级开始把我们说成是恩人的地步（当我出席商人宴会时，他们热烈欢迎我），那么这正是需要证明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尽可能多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了。当广州一家银行由于它的资本与上海和香港有联系而陷入困境不得不关门时，我们的国民党中央银行装了几卡车白银存入广州这家银行，到这家银行提取存款的居民看到由中央银行向那里运送白银，简直都惊呆了。当广东政府援助有居民存款的银行时，这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呀！这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国民党政府对居民的影响也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了。

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我们从那里赶走了帝国主义，正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今后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能解决土地革命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如果我们不再碰到以前碰到的那些困难，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我们在那里已经不是外人，我们毛遂自荐，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这一点当然在当地可以看得到，所以就不讲了。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
全宗 17，文件集第 1—38、1—31 页。
打字稿，未经核对的速记记录。

22

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 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 小组会议第 1 号记录

1926 年 2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联 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 1 号记录^①

出席：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曼努伊尔斯基和皮亚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全会上专门研究了中国问题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两个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58—63、67—83 页）。

特尼茨基同志。

日程：1. 联共参加主席团的代表。

2. 联共代表按委员会的分配。

3.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开幕式上的开幕词。

4. 贺词。

5. 季诺维也夫同志通报胡汉民的建议。

1. 参加主席团人选
 1. 让代表联共的布哈林和斯大林同志以及代表乌克兰共产党（布）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参加全会的主席团。
2. 按委员会的分配
 2. (1) 政治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委员：布哈林、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和代表乌克兰的斯克雷普尼克同志。
 - (2) 工会委员会：洛佐夫斯基、托姆斯基同志，候补委员安德烈耶夫同志，代表乌克兰的舒姆斯基同志。
 - (3) 东方委员会：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茨哈卡娅同志。
 - (4) 英国委员会：布哈林同志。
 - (5) 法国委员会：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同志。
 - (6) 美国委员会：布哈林、古谢夫、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和代表乌克兰的舒姆斯基同志。
 - (7) 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 (8) 五大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计划委员会：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 (9) 研究各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经验委员会：莫洛托夫、科肖尔同志。

3. 开幕词 3. 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开幕词的审查是多余的。
4. 贺词 4. 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胡汉民同志和朝鲜人民党代表致贺词，英国共产党代表布劳恩同志代表主席团致答词是必要的。
5. 季诺维也夫同志通报说，胡汉民要提出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5. 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季诺维也夫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8，第 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2 月 18 日于莫斯科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莫洛

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科托夫、科肖尔、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洛博夫、米哈伊洛夫、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施瓦茨、施密特、契切林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卡明斯基、斯克雷普尼克、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2—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人：季诺维也夫、维经斯基同志）。

决定：12—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今后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在预先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私下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47，第 2、6、9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6年2月2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

敬爱的同志们：

根据胡汉民同志的提议，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了关于你们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并决定将此事通报给你们。

在共产国际旗帜下组织起来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进步的革命农民怀着深切的关注和炽热的同情心注视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正在进行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伟大斗争。

共产国际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从上海和香港工业无产阶级举行政治罢工时起，特别广泛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得到了加强，你们党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它在中国北方的成就在日益增多，代表中国整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友好的和相互的合作^①（这一点在我

^① 在文件中和在胡汉民递交的英文信稿中都是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起草的信稿中是“国民党同代表中国整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友好的和相互的合作”。

们看来尤为重要)。你们运动的巨大成就使我们产生了希望,我们深信,1911年在伟大领袖孙逸仙领导下发动的中国革命,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农民和广大城市革命民主群众实行紧密的革命团结并在全世界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你们的党应当同共产党一起联合和团结城乡劳动群众去进行这场伟大的胜利的斗争。在设在广州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你们的党和它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①,实际上已确认了这个政策,拒绝了右派的顽固要求,从而保证了民族解放运动勇往直前的顺利发展,直至革命民主力量取得胜利。

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非常满意地获悉你们决定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事实证明,加入你们党的进步分子已经意识到中国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上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的巨大(现时和深远)意义。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它在全世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直接盟友。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然而,如果共产国际认为目前的时机不适合于国民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话,那只是考虑到中国和特别是广州的国际环境。国民党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党,并且国民党正式组建了广州政府。在最近的将来,国际帝国主义会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施加更大的压力。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认为共产国际是其不共戴天的仇敌,国民党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只会促使帝国主义者竭力动员反革命力量同广州、同中国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作斗争。这会便于帝国主义者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当然也会给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造成困难。中国的反革命集团会利用国民党的这种正

^① 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式加入共产国际的做法，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作出摧毁革命统一战线的尝试，而国民党在这种蛊惑宣传过程中会被说成是失去其民族性质的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避免发生这样的麻烦事。

我们请求你们认真讨论我们在这里阐述的意见。但是如果你们中央委员会坚持胡汉民同志在此间提出的建议，那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并且我们请求你们派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来共同认真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国民党中央保证，在它领导下开展的革命运动始终会得到共产国际和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革命组织的最有力的支持。

致兄弟般的共产主义敬礼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71，第 10—12 页。
打字稿，副本。

25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①

1926 年 3 月 2 日于莫斯科

敬爱的同志：

^① 估计是给 H. M. 穆辛的信。

从伊万诺夫斯基^①使团以及加拉罕同志的电报^②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帝国主义报纸正在开展一场反对我们的宣传运动。我认为，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一些大的港口城市设有分支的华俄通讯社可以充当反击这种宣传运动的工具之一。

多列茨基同志请求为此提供经费并且准备了组织者。

我想，我们能使中国北方和南方的著名国民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还可能为这项工作提供中国共产党的几个优秀同志。

请告知您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5，第 11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3 月 4 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李可夫、托洛茨基、加里宁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乌格拉诺夫同志。

① A. C. 布勃诺夫。

② 电报没有找到。

联共中央委员：克维林、科肖尔、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斯米尔加、契切林、丘巴尔、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基谢廖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7] 关于满洲和中东铁路问题（政治局1926年2月25日会议第12号记录，决定：1—[2]），（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7]（1）认为可以允许按地方问题同满洲签订技术性协定，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这种地方技术性协定草案。

（2）责成伊万诺夫斯基同志^①使团采取具体果断措施同沙文主义分子和情绪作斗争，为此要立即让那些败坏名誉的人离开他们所占据的职位并下达相应的命令在铁路系统进行调整。

（3）认为同中国政府谈判签订主要条约的补充协定问题是适宜的，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加拉罕同志制定这些协定的草案并提交政治局批准。

听取：3.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洛佐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3. 决定——定为特别文件。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17，目录3，卷宗549，第1、3、11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A. C. 布勃诺夫。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 号 （特字第 9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3 月 4 日于莫斯科

听取：3.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洛佐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3. —（1）不接受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建议^①。

（2）鉴于国民军的困难处境，认为可以赊给冯^② 1000 万发子弹，条件是保证绝对秘密调运。

（3）由加拉罕和伊万诺夫斯基^③ 同志负责秘密调运。

（4）革命军事委员会要以超出以前政治局的拨款数额补偿提供给冯的 1000 万发子弹的价值。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洛佐夫斯基同志——（1）；

伏罗希洛夫同志——（2）、（3）、（4）；

布留汉诺夫同志——（4）；

^① 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建议没有找到。

^② 冯玉祥。

^③ A. C. 布勃诺夫。

阿瓦涅索夫同志——(4)。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3, 第 27—29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4 号 （特字第 10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3 月 11 日于莫斯科

听取：3——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1]——关于预算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3 月 4 日会议第 13 号记录，决定：16—[1]），（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布留汉诺夫同志）。

决定：3—[1] (1) 认为可以给中国军政工作拨出 1925—1926 年度上半年的经费，数额为中国委员会所批准的预算的一半。

(2) 建议加拉罕同志设法缩减下半年的开支并争取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意支付至少开支的一半。

(3) 责成加拉罕同志向政治局提出所拨经费的开支报告并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制定和向政治局提出下半年的预算。

抄送：

温施利赫特、布留汉诺夫、契切林同志。

听取：〔2〕——关于胡汉民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3 月 4 日会议第 13 号记录，决定：16-〔2〕），（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2〕——责成加拉罕同志接见胡汉民并和他同我们的军事专家和科学专家一起讨论改组广州大学和在广州建立高等军事学校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并报告是否有必要为此事从莫斯科派去教官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官^①。

抄送：

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30—3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6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3 月 18 日于莫斯科

出席：

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

① 关于 J. M. 加拉罕同胡汉民会见的材料没有找到。

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叶夫多基莫夫、朱可夫、泽连斯基、科肖尔、克维林、洛博夫、米高扬、米哈伊洛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契切林、丘多夫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关于日本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库兹涅佐夫、缅任斯基同志）。

决定：1 [1] ——（1）日本问题交由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和特里利塞尔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作初步研究。由托洛茨基同志负责召集委员会会议。

（2）吸收维经斯基同志参加委员会工作。

（3）委员会要熟悉关于日本的材料和改变在华工作方法的问题，并研究发表缅任斯基同志所宣布的文件问题^①。

（4）委员会要向政治局下次会议提出我们近期对日具体政策草案。

听取：[2] ——关于同日本的贸易协定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3 月 11 日会议第 14 号记录，决定：29）（报告人：加米涅夫、契切林同志）。

决定：[2] ——认为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同日本签订协定是适宜的，要以扬松电报中通报的内容为基础^② 并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完善有关条款。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电报没有找到。

听取：〔3〕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同志）。

决定：〔3〕——（1）撤换伊万诺夫同志。任命叶姆沙诺夫同志取代他。召回乌斯特里亚洛夫。

（2）在中东铁路上进行清洗，解除所有那些因搞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而名誉扫地的负责人的职务，首先更换《满洲通报》^①编辑部，解除安多格斯基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职务。

（3）今后整个中东铁路当局要坚决执行苏联的方针。

（4）认为有必要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专门文章批驳《满洲通报》的整个方针，尤其要批驳苏林^②的挑衅性文章。

（5）要把中东铁路看作是商业企业，将其领导权委托给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

（6）根据我们同奉天和同北京协商一致的意见，制定在中东铁路上消除冲突的办法，即调解程序等^③。

（7）有机会时要在文章中或权威性声明中说明，我们的立场依然是同中国签订条约时的立场。

（8）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到中东铁路出差，责成他同奉天谈判并负责实行本决定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9）就满洲问题作出的决定要告知加拉罕同志，责成他协助贯彻执行本决定。

（10）认为有必要让伊万诺夫斯基同志使团提前回国。

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满洲通报》系中东铁路管理局机关刊物，1925至1932年间在哈尔滨每月出版一期，1933至1934年间每两周出版一期。

② 见B. H. 苏林：《太平洋问题和北满》，载《满洲通报》1926年第1—2期第12—23页。又见斯捷潘诺夫：《出自〈满洲通报〉的帝国主义分子》，载1926年3月23日《真理报》；斯捷潘诺夫〔B. H. 梅利尼科夫〕：《中东铁路上的沙文主义者》，载1926年3月23日《消息报》。

③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3年版第7卷第342—345、459—465页。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52，第 1--2 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0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 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

1926 年 3 月 24 日于广州

伊万诺夫斯基^①同志在广州顾问 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 (6 小时)

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得不大大压缩我的报告。对整个形势的评价，最好是在对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广州和广东省阶级力量的基本对比关系以及我们在广州的不同工作方面而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

先说两句开场白。当前广州还处在过渡时期。同香港公开代理人的直接内战已经结束，但是创造一些基本的前提，充分保证国民政府能够全面着手建设国家机关、整顿经济等工作还远未结束。

同香港作战的第一个时期已经结束，并且是胜利结束，现在是由战争向和平过渡，但是真正持久的和平还没有出现，广州内

^① A. C. 布勃诺夫。

部的均势，同样是真正持久的均势还没有出现，恐怕当前也不可能出现。广州的预算充分反映了这种状况：4/5 的经费用于军队，仅 1/5 用于整顿国家机关和经济生活。我说当前没有出现全面持久的和平，我还指出在广州内部也没有出现全面持久的均势，恐怕当前也不可能出现。既然这样，那么广州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就有可能随着某些情况的结合而具有十分鲜明的外部表现。由于我们在广州所经历的时期是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战争因素和作战任务肯定居主导地位，所以属于广州内部的那些矛盾就会以战争时期所特有的某些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当前在广州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些矛盾都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在这个时期，作战任务还是多于积极的、创造性的、和平的工作任务。因此，如果这些矛盾表现为某种冲突的话，那么它们必然要通过军队官兵表现出来，并且只能是军队中的某一种运动形式。

三月行动^①是由三种矛盾造成的，即：1. 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2. 在国民革命中一起战斗的基本力量之间，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于，无产阶级参加中国国民革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政府，同时力求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尽量保证它取得彻底的胜利和进一步的发展。小资产阶级虽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但它经常向沿着另一条道路，也就是保证纯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发展革命的方面摇摆。最后是造成三月行动的第三种矛盾，这就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冲突（根据十分明显的原因，“和农民”要加上引号），也就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冲突。不应该忽略这里存在的基本矛盾，即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的中国

^① 指蒋介石于 1926 年 3 月 20 日发动的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活动的行动。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二二〇事件”。

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我在这里不涉及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全国性问题。我谈谈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在走与香港和解的道路，是香港在广州的影响的传播者。国民党右派是香港的政治买办。

在三月行动中，不只是有问题的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三月行动不只是产生于一定的矛盾和暴露了一定的矛盾，而且它还显示出我们在广州这里的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所以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些困难基本上、主要的、实质上可归结为：我们应当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保证这次革命取得全然而彻底的胜利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来直接实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务。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会：1. 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2. 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 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 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5. 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 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和总起来更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看不到这种危险，就不能从三月行动的经验中汲取任何实际教训。

中国革命走的道路当然不是笔直的。在这里我们有很复杂的策略，应由中国共产党来加以实施。我在这里不谈造成这种发展、这种矛盾和这种基本困难的经济原因，因为这会把我拉得很远。在作了这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只谈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这里作过探讨，我们既看到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当然也发现了一些疏忽、缺点和错误。

我首先谈这样一些问题，即国民党左派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中国共产党问题、香港罢工问题、香港工作问题、北伐问题、军事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以及对我们的军事顾问组工作的评价和这项

工作的前景问题。

国民党左派。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内部组织性方面、在对群众的影响和同群众的联系方面还是很薄弱的。国民党左派至今还是将领性的组织，而远非群众性的组织。按照我们总的策略，我们在这里是这样进行活动的：我们通过国民党左派做工作，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通过国民党左派做工作的情况下，现在不仅要关注在国民党左派当中加强共产党的影响，而且要通过在国民党左派当中做工作来直接加强国民党本身。应该说，当然这是一项很长时期的工作，它要求有很大的毅力，要求中国共产党有很灵活、很沉着和很耐心的策略。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这样的原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虽然在这个原则中对于中国同志来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新东西。

广州的工会。我们了解情况后，在这里也指出了一些不足，虽然说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在工会运动方面无疑也有一些成绩。可是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互相恭维和指出成绩，而是为了帮助出主意改进工作，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来谈谈缺点和错误。

工会工作有什么缺点呢？有相当多的缺点。工会的群众工作和同群众的联系还非常薄弱，工会不了解群众生活，不了解工人的日常利益，不会在日常工作中抓住这些日常的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利益。工会对工商企业中的日常经济斗争几乎不做领导工作，不做工会组织的联合统一进而组成更大组织的工作。大家知道，这里有130多个各种工会。当地工会运动中心的一个很大错误是，不知怎么从他们的视野中滑掉了机器工会，他们没有好好在加入机器工会的企业里做工作。机器工会至今是改良主义工会，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一点是，联合在机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职工运动的基础。

在这方而，我们认为需要指出两个情况：第一，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攫取了根本不属于它的警察职能；第二，为了同群众运动

建立真正的联系，所谓的“中国工会中央理事会”^①应该从广州迁到其他地方。

中国共产党。毋庸置疑，最近4至6个月，中国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人数有巨大的增长（而且据尚未核实的材料称，是靠发展工人增长的）。这当然是特别值得赞许的事情，因为如果党组织在数量上有这样的增长，并且是靠发展工人增长的，如果对党组织进行必要的党的政治教育，那么党组织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就有可能提高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水平。但是为实现这一点，需要把更多的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教育工作上。在这里，这项工作肯定被忽视了，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我们十分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并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开展、深化、改进和加强内部教育工作。

我们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另一个任务，是共产党人要在国家机关中做工作。我已经对你们讲了，广州现在处于过渡时期，作战任务和军事费用要比和平任务和和平费用占上风。这造成了越来越不太重视民用建设的问题，同时也迫使我们现在就得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国家机关工作上，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做这项工作，我们就可能有放过很重要一部分工作的危险。当然，有人会对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说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本来就够多的了，摆在它面前的这么大量的职责和大大小小的任务它都应付不了。这当然是实情，但不管怎么说，不解决或不着手解决党内教育问题，不着手多少解决一点儿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家机关的问题，不为自己解决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实际办法，那么我们肯定要犯大错误。

我们认为，党有些热衷于军事工作，我们在军队内分配党的

^①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

力量很不均匀。我们要争取做到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在这里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到的，因为你们不能把士兵从一个军调到另一个军，这有很大的困难，但至少军队内部调配党的力量，在各军之间更均匀地分配党的力量方面，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应该去做。然后不但要做这项工作，而且还要把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一定力量转移到其他工作领域，首先转移到党内教育工作中去。

香港罢工问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绝非偶然，因为这是一个与国民革命、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和工会有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广州这里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最大症结之一。我们不怀疑，罢工给国民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好处，我们不怀疑，罢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广州对于香港的独立，使广州在经济上得到加强，从而帮助国民政府真正地站立起来。香港运动是以罢工形式开始的，但现在它一方面像是同盟歇业，另一方面像是封锁香港保护广州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我们认为，根据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目前应该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罢工拖得太久了，已经拖到如此地步，以致再拖下去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如果有要手腕的人在此间较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下试图利用这种力量来反对我们的话，他们肯定是能够得逞的，因为现在罢工工人有许多不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使没有多少觉悟的工人群众保持这么长时间的紧张状态。我们认为，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是必要的，而且我们预见到取消罢工有两种办法：或者通过同香港达成妥协（这是一种办法），或者利用国民政府的资金和力量（这是另一种办法）。我不谈第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很清楚，无需作任何说明。第二种办法不是很清楚，需要作出哪怕很简短但十分重要的说明。

如果出于需要，不得不采取第二种办法，即利用广州国民政府的资金和力量来取消罢工的办法，那么第一，必须在最近就这

样做；第二，必须完全公开进行；第三，必须有国民政府的明确声明，强调罢工在保证广州对于香港的独立、保护广州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并指出罢工工人表现得无比的投入。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和十分明确地说明，工人们为国民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其巨大而宝贵的贡献。我不得不说我们这里有一张期票，当然我们不想给国民政府拿出这张期票，不想为了广州政府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友谊和联盟拿出这张期票，但毕竟我们应该感觉到在自己的口袋里有这张期票，它可以使国民政府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对香港罢工工人负有很多的责任。应该让政府提供取消罢工所需要的资金。我们知道，国民政府不像香港那样有钱（这不用说），罢工工人可以分期得到钱，并且我再说一遍，也不像从香港那里得到的那样多，但是国民政府应当认真地采取措施，在自己的生产企业安置罢工工人，在这方面比方说可以尽量利用即将到来的农业运动。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封锁问题还是一个实际问题。应该设法实行封锁。当然，国民政府不能公开承担对香港的封锁，这样做在政治上也是不对的。它必须保证自己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以便通过这个专门的志愿组织来保证自己在抵御香港侵犯方面的利益。我们认为，现在就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在罢工工人当中做解释工作，应该向他们说明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这会振奋他们的精神。还应该说明国民政府对罢工工人的责任，以便通过这种办法为取消罢工做好准备。我们深信，应该认真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定会在罢工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①中进行认真的讨论。必须让共产党中央也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不管怎么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劝告：这个问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拖下去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停滞不前，现在应该寻

① 指中共广东委员会。

找消除这种冲突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对香港罢工问题的意见。

北伐问题。实际上北伐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是否需要进行北伐的问题。华南的国民革命不能停滞不前，不能躲在华南，等待北方自己来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而那里的矛盾和问题由于中国的全面混乱和被肢解已成了最尖锐的问题。华南这里的国民革命不能不前进。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几乎同所有军长都谈过话，我向他们询问了北伐问题，他们都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问题，并且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在军官和将领上层中作了决定，而且这是全体官兵的深刻信念。因此应该提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北伐的问题，而是进行北伐的时间问题。所以在这里应该说，这个问题应这样提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果吴佩孚北上，就要从后面进攻他，让他丢掉北上的打算。这既有利于南方革命，也有利于解决整个中国问题。要迫使湖南和江西采取行动。广州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他们这样做。如果需要向那里投放一定力量的话，那就要投放。如果我们提出北伐开始的时间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北伐开始和投入一定数量的广州力量之后，主要做远征的准备工作。当然谁也不怀疑，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方面也应做这种准备。但不提出明确口号进行北伐，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我们需要在这里弄清楚一些问题。我不认为有必要说，从司令部和后勤部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做好远征的准备。进行北伐也有外部援助问题，因为很清楚，光靠广州武库的力量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作出了决定。

军事工作。现在我来谈一谈军事工作问题，谈这项工作时我要指出，三月行动无非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它起因于我所指出的那些矛盾，毫无疑问由于我们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大错误而复杂化和尖锐化了。我们在军事工作中犯了哪些错误呢？有哪些一般政治领导方面的错误呢？这些

错误是：1. 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内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在国民军中有反映；2. 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程度；3. 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行动中暴露得很明显；4. 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的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在暗中反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所特有的做法。我要谈谈这一点。如果认为不需要做这项工作，那是错误的。这项工作需要做，顾问组着手做这项工作，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步骤。但是应该考虑到中国将领和军官的心理和习惯，不应该这样迅速地转入集中管理和按日历安排工作程序。5. 在将领们周围有过多的监督他们的工作和对其工作施加影响的机关。在作战部队中政委有权签发每一道命令，在军事机关中政委有更大的权力，而且还有俄国顾问，他们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对这种情况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如果我们认为，军队中不需要设政委（国民党代表），不需要俄国顾问，那就又是一个错误，那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两者都需要，但安排他们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国民革命军军官的习惯和性质。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往往还带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而顾问是俄国的。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觉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这种情况要充分考虑到。我应该说，这里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我注意到，最近已采取一些步骤，稍稍修改了方针。例如，海军是以中国人为首而不是俄国顾问，司

令部不是以俄国顾问为首而是中国将领。这个方针当然是对的。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这一点务必要做到，这里要有分寸。若是我们来到部队，来到学校，全校排成两列，校长向俄国顾问报告，恕我直言，这就不像话了。这是反革命行为，这是应该从根本上消除的行为。你们以为3月20日行动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种没有分寸的行为而发生的吗？请你们相信，这次行动不能用个别人的原因作解释，显然它在较多的中国将领和中国军官当中有根子。不能让师长或司令部首长走在后面，而俄国顾问走在前面。如果我在红军中十分认真地对待在军区中不能让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走在司令员前面的事，这好像是吹毛求疵。我们那里不是中国，我们那里没有中国的礼节，但这也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力求不出现这种事，因为这不是吹毛求疵。我们那里是另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那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很令人讨厌的争吵、退伍申请等等。而这里是中国将领、我和你们这些俄国顾问，走在中国将领前面或后面，这可能是小事，你们来到作战部队时，将领列队并向你们报告，这也可能是小事。海军以俄国顾问为首，司令部以俄国顾问为首，从某个人的观点来说，这些可能也是小事。但使团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要了解这种情况和毫不留情地根除这种情况，因为这是胡来，这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要指出的最后一点是，没有始终正确地指导宣传鼓动工作。要考虑到，我和你们在这里解释诸如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问题时，应该记住我们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而不是在红军中，不是在近似工农军的军队中。我们在这里不是很谨慎。我认为需要强调指出，军事工作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疏忽、缺点和错误。我应该说，已经发生的三月行动，我想应该使那些没有看到这些错误的人看到这些错误。

我认为需要在这里作一个声明，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撤掉上层领导的职务^①，决不能理解为我们想诽谤军事工作的整个方向。如果有谁试图这样理解使团的决定，那么他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同志是因为别的原因被撤职的，他们之所以被撤职，是因为在21日夜间我们接到报告说，20日行动可能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会，得出以下结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以应该顺势而下，于是我们下决心撤掉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同志的职务。由于作出这种让步，我们取得了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能持续和稳定多久，它临时或长期到何种程度，现在还不好说。但至少是赢得了时间，取得了均势，也许这种均势不太稳定。在你们面前我要强调指出，是这种考虑促使我们走了这一步，而不是对这些同志工作的评价（虽然毋庸置疑，顾问团及其团长犯了不少错误）。作为给军事工作方面领导人的指示，我们现在提什么建议呢？我们的建议是：你们要十分认真地对待三月行动提供的经验，要纠正所犯的错误。马上可以做什么呢？马上可以做以下工作：首先要从根本上消除俄国顾问突出自己以及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新团长要在这方面做出相应的指示。与此同时，要减少政委对将领们的监督，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更加谨慎（不要大讲特讲新式军阀、小资产阶级性等）。

我认为需要谈一谈政委的问题。假如在政委方面不发生这些过火行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时国民政府就不必在不利形势下“刹车”，因为任何退让步骤都会被看作是迫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这对国民政府是不利的。我们在这里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

^① J. A. C. 布勃诺夫使团解除了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团长 И. B. 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团长 B. Л. 罗加乔夫和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 И. Я. 拉兹贡（奥尔金）的职务。

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主动。我们应该在这里同意削弱政委的监督，也就是在国民军中把政委作为国民党党代表保留下来，仅此而已。保留党代表，就可以在军队中取得所需要的一切。要取消政委签署指挥官命令的权力。在某种紧急需要的情况下，比如在前线作战时，国民政府可以任命拥有特别权力的特派政委。但这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改革”应通过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①来进行，并且要以军队已经巩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已经确立，军官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并在完全捍卫国民革命利益等等理由予以公布。上述这一措施不是别的，正是某种刹车。在这里要表现出很有分寸和很有耐心，要从各个方面认真讨论应该怎么做。我相信，你们能为此找到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你们要考虑到这样一来可能出现的低沉情绪。你们要保证迅速消除这种情绪，这很重要，并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记住，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

现在我谈一谈顾问团本身的工作。首先我应该指出，无论党中央还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都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着同志们在中国，特别是在广州的工作。我还应该指出，广州的工作比其他组的工作高明得多。在这里，同志们善于通过掌握分寸，表现出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来争取更大的成果。我们高度评价老广州人为国民革命事业和国民军建设作出的巨大功绩，他们为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致后来人不必改变他们的方针，而只需加以充实和发展。我认为还需要指出，近半年来的工作我们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因为，我再说一遍，以为在建设国民革命军的事业中可以踏步不前，那是极大的错误；当然，纵容国民政府正在与之作斗争的那些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和怪癖，那也是一个错误。否则那就根本不需要着手做这项工作，那就只需要像迄今北方那样在原地踏步不前，那时我们拥有一些军

① 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队，它们只不过是一些中国军阀的商业生产企业。如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这是很大的功绩。只有集中管理的军队才能保证国民革命的利益，否则国民革命的利益时刻都会受到威胁。假如我们没有取得这些成绩，那么广州政府就会因中国军阀利益发生冲突而遭灭亡。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要制止取消派的一切企图。他们有可能出现。凡有人诉苦说应该取消整个工作，整个工作是个错误，那就要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并要对这些人作出极其严厉的处分。无论是3月20日行动，还是我们作出的让步，以至我们提出的建议，都有可能产生取消派情绪，一旦这些情绪出现就要立即予以根除。新顾问团长要履行这个职责。

我还应该指出，广州顾问团党的工作、日常生活条件和总的生活方式，无疑比所有其他团都更高更好。我完全同意奥尔金^①同志昨天在你们支委会会议上对你们这方面工作所作的评价，因为总的来说，你们的党支部是健全的，支部生活是正常的。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需要争取无论在上层还是在基层，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广州、张家口，即在有我们顾问的任何地方，都要使我们的顾问有坚实的基础。应当意识到，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和在其他地方着手做的工作，都是长期性工作，需要全面加以筹划。为此需要做什么工作呢？需要使所有人都感到自己很坚强，都知道他们享有什么权利和担负着什么职责。

我认为，需要实行一些措施，如进一步明确顾问团的任务，规定政治领导与军事工作之间的关系，明确工作程序、纪律、物质状况和日常生活条件。这方面的指令，正如使团所决定的，应当出自这样一种考虑，即必须把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看作是调

^① Н. Я. 拉兹贡。

去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重要工作并负有十分重大责任的工作人员。

我应该在这里谈一个对于广州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这就是政治领导和军事工作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我们这里并非事事如意，在这里需要争取做到两件事：1. 要争取做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政治领导高于军事工作，而不是相反，这是一。2. 要争取使军事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要争取使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能够在自己的部队中对自己的部队负责。这样就会在政治领导和军事工作之间造成一种关系，使我们有可能吸引某一部门的负责人而不是小伙计，同时还使我们有可能好好安排政治领导工作，好好安排军事工作，并认真建立它们之间的正确而牢固的关系。

我认为需要十分明确地指出，这里的军事工作是专门的工作，要求有专门的知识，必须使军事工作摆脱不适当的干预。我认为，我在谈军事工作时所列举的我们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有一部分毫无疑问是政治领导方面的。

我在这里不想留下任何不清楚的问题，因此我认为需要对你们说，政治领导应该预见到在国民政府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这种冲突在军内也会有所反映。政治领导应该不允许过高地估计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程度。善于事先预见到军事工作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并及时提出消除这些行为的任务，这是政治领导的职责。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没有必要捉迷藏，而应该明确说我们在想什么，因为我同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客气可言，我们认为客气无助于工作，而只会有害于工作。

最后，我认为需要强调一下我在张家口团所做的事情和你们这里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要重申几条纪律。重申纪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为食堂、俱乐部、街道、私人生活等保持你们这

里已有的那种个人关系，但在司令部机关和办公地点要恢复工农红军中的那种长官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我曾在张家口相当尖锐地指出过这一点，我认为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在广州的环境中，守纪律是一项重要任务。这里的不足之处是存在着产生各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的前提。顾问团长也要履行这个职责。

现在我简要地谈一谈可以向你们通报的我们在了解中国情况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没有作出关于整个中国情况的总结，因此我不能以使团的名义来谈这些问题。但我认为需要指出，现在国民军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在广州军队中的情况怎样呢？是这样，我们需要从后面拉一拉顾问，让他们同中国将领保持距离，不要过于“渗人”。我们在北方的情况截然不同。在那里顾问只不过是军事专家，中国将领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所领导的军事组织。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那些错误促使我们对你们说，你们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张家口团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那里有一些成绩，但总的方针是错误的。也许那里的任务比你们这里更复杂些。也许那里的工作更困难些，这是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评价实际情况。你们深入到国民军中，为这支军队打上了政治烙印，为这支军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实现了这支军队的集中管理。这些都是很大的成绩。总的来说，这里的情况是，你们不仅作为军事专家，而且作为国民革命的政治朋友帮助了国民政府，也就是说你们在军队中留下了一定的政治痕迹。在北方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在北方，我再说一遍，我们俄国顾问同志是军事专家，不是很经常让他们接触政治领导工作。还需要对你们说，最近无论在张家口团还是在开封团都发生了工作危机，危机在于我们的同志没有进行任何工作。这种状况持续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在开封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我认为需要谈的最后一条意见是，现在我们分析了你们团的人员情况，并注意到“因超过服务年限”而进行的一些替换，因生病等进行的一些替换。顾问团在近几个月间肯定会更新，留下的同志要争取使团里的工作有连续性，要使团里的新成员继续你们在这里开创的事业，借鉴你们的经验，纠正所犯的错误。

这就是我以使团的名义所要说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6，第 78—97 页。

打字稿，副本。

31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

1926 年 3 月 24 日于广州“纪念列宁”号轮船上

亲启，私信

亲爱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①：

像往常一样，我总是在路上的最后一分钟给您写信，我已经在轮船上，是来送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②等人的。

在今天的密电^③中，我向您谈了我对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关系状况的简要评价。电报发出后又弄清了一些新的细节，我想就此函告。在“三二〇”事件期间，为弄清情况，伊万诺夫斯基同

① Л. М. 加拉罕。

② А. С. 布勃诺夫。

③ 电报没有找到。

志^①去见过蒋介石。当时他们约定，3月21日上午蒋介石到他这里来进行更认真深入的交谈。但次日上午蒋介石未来，捎来话说，他来不了。

看来，所有这一切证明，蒋介石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传闻，说他公开声明他不愿再同俄国顾问共事。尽管如此，我们当时还是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

接着我们召回了季山嘉^②、罗加乔夫和奥尔金^③。汪精卫对此作何反应，我现在不谈，还是来谈谈蒋介石。

今天出乎预料的是，当斯捷潘诺夫同志作为老顾问第一次正式拜会蒋介石时，蒋得知使团^④要走而鲍罗廷何时返回还不清楚，就想同伊万诺夫斯基谈谈并要到他这里来。蒋介石同斯捷潘诺夫一起从黄埔来到伊万诺夫斯基住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蒋介石表面上很诚恳，想为自己辩解并对3月20日事件作出解释。详细情况伊万诺夫基本人会讲。但我需要用这个插曲、这个细节来说明和证实我在动身之前同您一致的看法，即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

但是您要注意到，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我之所以赞成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我深信，迄今为止，我指的是近几个月，或更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

① A. C. 布勃诺夫。

② H. B. 古比雪夫。

③ H. Я. 拉兹贡。

④ 指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使团。

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

我完全相信，我本人根本无法应付这项工作，只有鲍罗廷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在蒋介石那里确实享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威望。

下面谈汪精卫。虽然我电告您，我们能同他比较容易地达成谅解，但您比我更了解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您记得孙^①在北京时他去西山时的情况，您知道他在廖仲恺被害后和在胡汉民被孤立时如何失去理智和大发雷霆。现在他在准确无误地重演他的老把戏。他称病不起，医生登门诊治，他拒绝进行任何认真的交谈，最后他完全隐匿起来，不会见任何人，表面上未离职，实际上已离开工作。除了我刚才所说的一般性原因外，“三二〇事件”肯定对他作出这个决定有影响。蒋介石要采取行动，他可能在事发两天前就知道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行动出乎他的意料，背离了他的意愿。现在他认为，并对自己的友好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济深说，他丢了脸，应该离开工作一段时间。当然，很可能，如果我们更加温和地预先让汪精卫对此做好准备，然后再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就可能把汪精卫留下来。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们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使汪精卫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们召回他所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所以他未经我们同意，违背我们的愿望隐匿起来。我认为，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他从避难所请出来，并向他表明和证明，对蒋介石的让步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迫不得已作出的，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方针有改变，尤其不意味着我们对汪精卫和对整个国民党左派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我们应该作出这样的尝试并将作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相信，这样的尝试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在这里是新手，不熟悉情况，不具备所需要的个人威望，而这种威望在个人关系中，特

① 孙逸仙。

别是在东方这里，是很重要的。惟有鲍罗廷，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信任他，他能胜任这个任务。

简言之一句话，如果至今鲍罗廷还没有从北京动身的话，尽管有我的电报和使团的两个决定^①，我还是十分坚决地请求他立即动身。这可以说不只是我个人的愿望，而且这是我最深切的信念：为了事业应该这样做。

还写什么呢。很遗憾，我未能像在电报中所答应的那样借这次机会捎去我的广西之行报告，有些材料我给了伊万诺夫斯基，我争取一旦写好这个报告就借下次机会捎去。我仅提出两点总的看法：1. 广西对我们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特别好，我要说，简直是浪漫主义的。他们请求我们提建议，邀请我们的人到那里去，希望我们能像在广州所做的那样去迎合他们，一句话，工作环境是很有利的。

2. 对火油的想法。由于广州实行火油专卖，不仅在广东省而且在西江上游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在营业，因而也没有提供服务，特别是在广西，全省已有几个月没有火油了，并把自己的这个灾难完全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因为它在广东取得专卖地位后靠专卖生活，不提供火油。我同多谢尔^②在这里讨论了取消专卖问题，而使团决定，如果他在4月1日前不向市场投放相当大量的火油的话，那么从4月1日起我们就建议广州政府取消火油专卖。如果他在4月1日前能解除目前的危机，我们在得到汉堡火油前暂缓取消专卖。这以后反正要取消专卖。我现在不想详谈此事，但既然决定已一致作出，我记得您过去也反对专卖，我想您是会同意这个决定的。

好像公事就这些。我答应一定每天电告所有最有意思的东西。但相互地我也请求您在我在这里的日子里，像您此前对伊万诺夫

^① 决定没有找到。

^② 3. 11. 多谢尔，1925年至1926年间任苏联驻华石油辛迪加组织代表。

斯基所做的那样向我通报北方的情况。接下来是紧握您的手并期待很快在北京见面。如果前线情况还像现在这样不稳定，我不想走海路，而想取道长沙走陆路。您知道，谭延闿本人是湖南人，他认为这完全可以，甚至支持我的打算。

紧握您的手，敬礼

索洛维约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6，第 74—77 页。

打字稿，副本。

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7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3 月 25 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安季波夫、鲍曼、多加多夫、泽连斯基、科肖尔、科托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契切林、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格伊、卡缅斯基、基谢廖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2]——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18日会议第16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决定：[2]——（1）基本上通过委员会关于我们对满洲和日本政策问题的建议。

（2）整个中国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3）责成委员会把自己建议的准确文本分送各政治局委员并为政治局委员提供一夜时间告知有关满洲和日本部分的修改补充意见。

（4）决定——定为特别文件。

（5）向加拉罕和鲍罗廷同志询问广州情况、为稳定广州局势采取了什么措施，以及鉴于华中和华北局势的变化莫斯科能在这方面做什么事情。

（6）责成特里利塞尔和李维诺夫同志在两天期限内解决发表某些材料的方式问题¹⁾。

1926年3月2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

决定：32——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让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参加政治局日中问题委员会（政治局3月16日会议决定，第16号记录，决定：1—[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53，第1—2、7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¹⁾ 材料没有找到。

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7 号 （特字第 12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3 月 25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2] 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3 月 18 日会议第 16 号记录，决定：1-- [1]），（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决定：1. — [2] (4) 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组成人员先由中央组织局确定。

抄送：

季诺维也夫、皮亚特尼茨基和维经斯基、莫洛托夫、格伊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3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4

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

1926年3月27日于汕头

秘密，亲启

致鲍罗廷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们在广州逗留这14天，不仅详细了解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而且还弄清了国家机关、各社会团体和军队的工作。

我们结识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袖、军队的将领和军官，以及中国共产党、职工运动等组织的领导人。我们对农民工作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地方委员会^①和广州顾问团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报告。在告别宴会上，我们基本上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说明了了解情况的结果。很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在动身前再次与汪精卫同志交谈，并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我们的结论。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除以上所述，我们还有机会（不敢说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说是很惬意的）了解到一些在广州有影响的并在3月20日事件中有所体现的内部矛盾。

① 指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对广州情况的了解确实是充分的，无疑也是全面的。我们希望这次了解情况既有利于广州的政治领导工作也有利于华南的整个国民革命事业。在报告中我们对成绩谈得很少，而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谈了缺点、疏忽和错误。在这封信中，向您谈谈我们最主要的几个指导性结论：

1. 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内部组织性、对群众的影响和与群众的联系方面还很薄弱。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上层组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不断做工作来帮助国民党加强其（学生、青年、城市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等）基层组织。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国民党作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的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

2. 广州和广东省的工会组织无论如何不能吹嘘取得了很大成绩和善于在应有的方面开展工作。工会的群众工作和同群众的联系还非常薄弱（不了解群众生活及其日常的迫切利益，不善于依靠群众等）。工会几乎不在工商企业中做日常经济斗争的领导工作。工会不做各种工会组织的联合统一和组成更大工会组织的工作（在广州和广东省有130多个各种工会组织）。工会无疑忽视了在那些加入机器工会的大企业中做工作的重要意义，其表现是至今机器工会还是改良主义工会，然而它本应成为（无疑也能成为）广州工会运动的主要基础。应当承认，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掌握一些警察性质的职能，这绝对是一个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无论如何应加以克服。

同时，必须提出把所谓的中国工会中央理事会^①迁到另一个地方的问题，因为它设在广州，同全国的职工运动完全断绝了联系。

3. 中国共产党也是还很年轻的和刚刚形成的组织。但近4到6个月，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在数量上增加了几十倍。这无疑会给进一步开展共产主义工作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群众运动中的影响创造先决条件，而削弱它内部团结的因素同时也会把党内教育任务提到首位。对这项任务至今领导机关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个错误无论如何要加以纠正。当然应该承认，迄今中国共产党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和农村工作上无疑是对的。目前必须把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作些转移，尽量在各军之间作更均匀的分配。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必须提出把党在军队中的部分力量转移到党的其他工作领域（党内教育、国家机关等领域）中去的问题。

4.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香港罢工问题。罢工为国民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好处。实际上罢工大大保证了广州对香港的独立性，使广州在经济上得到了加强，从而帮助国民政府站立了起来。罢工保证了工人同广州政府的联合，但罢工拖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它一方面带有同盟歇业性质，另一方面它是封锁香港保护广州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在目前条件下，把罢工拖下去迟早会给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造成很大威胁：工人在国民政府面前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国民政府则应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协助顺利取消罢工。对于国民政府和工人阶级来说，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尽量保证顺利取消，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可以通过或者与香港和解或者使用国民政府的资金和力量来取消罢工。如果有必要采取第二种途径，那就要在最近公开采取这个步骤，同时要发表相应的政府声明，并要在即将到来的农业运动

①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使用大量罢工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利用部分罢工工人继续封锁香港，并为此按自愿原则建立专门的组织。根据这种前途，现在就应该在工人群众中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向罢工工人说明他们在保证广州独立方面所起的作用，说明国民政府对罢工工人的责任等）。

5. 三月行动^①只不过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它是广州内部矛盾的产物，同时也由于我们在军事工作中犯了一些大错误而变得更加复杂，来得更快和更激烈，它还暴露了领导工作的一些普遍性错误。

这些错误是：（1）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内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在军队中有反映；（2）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程度；（3）不善于事先揭示和及时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行动中暴露得很明显；（4）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在暗中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所特有的做法；（5）在国民革命军将领周围有过多的监督他们的工作和对其工作施加影响的机关。在作战部队中政委有权签发每一道命令，在军事机关中政委有否决权，俄国顾问常常把自己突出到首要地位，而在一些地方甚至直接发号施令；（6）没有始终正确地指导军队中就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问题等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所有这些过火行为从根本上歪曲了军事工作的正确方针，并为将领和军官阶层中出现反对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反对派及其发展造成了过多的口实。这些错误无论如何必须加以纠正。首先应该消除顾问突出自己进而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同时应该削弱政委对将领的监督，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还应该表现出更加谨慎。要争取通过采取

^① 指“三二〇事件”。

这些措施为修改军队管理制度准备条件。这项工作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来进行，理由是军队更巩固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得到了发展，军官在政治上更成熟了，并在完全捍卫国民革命的利益。

6. 至于俄国顾问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除以上所述，还应该实行一些措施：进一步明确顾问团的任务、政治领导与军事工作之间的关系、工作程序、纪律、物质状况和日常生活条件。这个指令应当出自这样一种考虑，即必须把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看作是暂时调出，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重要工作，并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使团认为有必要对以上所述作以下补充：

1. 要指出我们在香港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这就是香港工人在目前几乎根本得不到我们的指导（在共产党方面，尤其在工会组织方面都有这种情况）。这个错误无论如何要予以纠正。

2. 了解北伐问题后，使团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决定是否进行北伐的问题，因为整个军队和全体指挥人员都确信北伐是必要的，是迟早要进行的。使团认为，因此北伐问题是时间和行动方式问题。使团认为，现在就要对北方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力求从后面进攻吴佩孚。这项工作最好是现在通过发动湖南和江西反对吴佩孚来进行。与此同时，应为大量国民军北上做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现在军队向湖南推进只应以国民军小股部队形式进行。同时应（以适当形式）向湘军提供弹药、军官和顾问方面的援助。

3. 使团认为，由于3月20日行动，又提出了国民党右派的问题。使团认为，没有理由改变我们对国民党右派的策略，但同时确信，应该采取措施取消国民军中的孙文主义学会。取消方式应视形势发展而定。不过使团认为，自行取消是最好的方式。此事要做好准备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

4. 使团认为，鉴于民事机关工作薄弱，有必要向广州派遣两

三名相应专业的工作人员。

使团认为，这些结论是初步的，因为许多材料和听到的报告，使团还没有作充分的研究。我们根据总的结论口头上已给斯捷潘诺夫同志作了一些具体指示，后来又向他作了书面说明^①。我们请您看一下给斯捷潘诺夫同志的这封信。我们也请您让斯捷潘诺夫同志看一下我们给您的信。现通知您，根据使团的决定，季山嘉^②和罗加乔夫同志已被解除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个决定是考虑到3月20日后出现的局势作出的。在您抵达之前，我们让索洛维约夫留在广州，他会比我们在此信中所作的通报更详细地向您报告我们的工作情况和20日后广州的事态发展。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伊万诺夫斯基^③

全宗514，目录1，卷宗186，第98-103页。

打字稿，副本。

3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4月1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H. B. 古比雪夫。
③ A. C. 布勃诺夫。

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多加多夫、泽连斯基、科托夫、科肖尔、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皮达可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斯米尔加、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施密特、契切林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戈洛谢金、卡缅斯基、基谢廖夫、拉舍维奇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 —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同志）。

决定：1. — [1] 决定—— 定为特别文件。

听取：16. —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提交的问题（代表团核心小组 1926 年 3 月 22 日会议决定，第 10 号记录，决定：13）。

决定：16. — 批准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以下建议：（1）在主席团举行会议前召集联共的主席团成员会议，他们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和代表团秘书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2）在执委会举行会议前召集联共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会议，他们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加米涅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洛佐夫斯基、舒姆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3）为解决重要问题，不管主席团或执委会举行会议与否代表团可召集全体会议。

1926年3月2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7. 一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会议第17号记录，决定：1—[2]（3））。

决定：27. 一通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在涉及日本和满洲部分中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54，第1、6、8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 （特字第13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4月1日于莫斯科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会议第17号记录，决定：6），（报告人：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同志）。

决定：1 [1]（1）通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就我们对日本政策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作以下修改和补充：

①在决议中要考虑到国民军和其他军阀军队之间的区别，而

国民军的失败应视为导致帝国主义者影响加强和向后者作出让步的因素之一。

②在关于广州的条款（决定：21）中说，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不要促使广州去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③建议国民党中央大力加强国民军中的工作。

④在关于我们的人清理中东铁路工作的决议第15条中，引用政治局有关这方面的决议。

⑤在中国报刊上为加拉罕同志开展系统的猛烈的宣传运动。尽可能在英国也这样做。

⑥责成托洛茨基同志修改决议草案，因为这些修改意见来自于政治局决议。

（2）责成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通知张作霖，苏联政府不得不把他关于召回加拉罕的声明视为可能严重影响苏联同他所建立的合作关系的步骤，视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怂恿他采取的步骤。

（3）还责成他通知张作霖，苏联政府同意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将派遣新的人员取代伊万诺夫同志，并将根据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与张作霖的会谈精神为其作出严格的指示。

（4）责成契切林同志以适当的、一开始要很谨慎的方式制造英国的这种舆论：英国政府在制造新的尖锐冲突，授意中国反动派要求我们从北京召回大使。

（5）责成托姆斯基同志就此同英国工联主义者取得联系，如若可能，在议会中组织对政府的质询。

（6）在共产国际系统开展相应的宣传鼓动工作。

（7）责成拉科夫斯基同志弄清法国外交界对英国所掀起的要从北京召回加拉罕同志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并以适当方式告诉法国，它在这个问题上对英国人的支持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最敌对的举动。

(8) 请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局对叶姆沙诺夫同志的任命决定的问题并追究过失者的责任^①。

(9) 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建议，交由国防委员会紧急讨论。

(10) 鉴于冯^②本人可能不打算离开蒙古，认为蒙古人要求冯立即离开库伦是不合适的。

(11) 将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关于在华军政工作问题的提纲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审阅，并在三天内将其修改补充意见告中央书记处^③。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8)、(9) 除外；

托洛茨基同志——(1) 及附录；

扬松同志——(8)；

伏罗希洛夫同志——(9)；

李可夫同志——(9)；

全体政治局委员——(11)；

季诺维也夫同志——(4)、(6)；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6)；

鲁祖塔克同志——(2)、(6)、(8)；

托姆斯基同志——(4)、(5)；

亚戈达同志——Ⅲ. 21^④，仅附录；

温施利赫特同志——Ⅳ. 23，仅附录。

① 1926年3月26日在《经济生活》报上发表一则关于任命A. И. 叶姆沙诺夫为中东铁路新局长的消息。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1926年4月12日会议上研究了追究过失者不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协会擅自发表这则消息的责任问题(见全宗613，目录1，卷宗45，第18页)。

② 冯玉祥。

③ 见第38号文件。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N. 2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 1926 年 4 月 1 日会议第 18 号记录，决定：1--

[1] 附录（特别文件）。

绝密

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①（最后稿）

1. 在中国的局势中应考虑到三种因素：

(1) 中国的内部力量；

(2) 军阀组织，它们以某种形式代表着中国的内部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外国；

(3) 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力量，另一方面是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量。

确定方针的全部困难在于掌握这三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因为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有自己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发展速度。

在拥有 4 亿人口的已经觉醒了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最终是国内因素。我们应当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发展这些国内力量，也就是首先要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并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我们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我们能在中国实行很长历史时期的政策。

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军阀集团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的斗争，但不应让这些事件使我们离开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

^① 本文件集发表的最后文本与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档案中保存的文本相比较，文句有所不同（见托洛茨基档案：《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第 1 卷第 174—181 页）。

一、中国革命的国际方针和苏联

2. 没有什么材料会使人认为,中国革命内部力量的发展已经停止,哪怕是暂时停止。相反,有一切理由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广大工农群众的运动将会得到发展和加强。我们从自己方面应尽一切努力使这场运动具有最大的规模。但是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签订洛迦诺协定^①和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全面提出中国问题,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主导革命力量,尤其是苏维埃国家,应尽一切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华统一战线。无论从日本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它在满洲的切身经济、军事利益来看,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革命可能是最危险的。中国革命运动已接近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对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搁下”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也就是实际上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

3. 这种政治方针应当是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协调一致的,当然它绝不意味着停止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般政治斗争。这里要预先估计到,鉴于对日本的极端仇恨,这种方针对于中国的革命人士及广大舆论界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然而,中国革命的内部需要要求我们采取这种方针,因为在欧亚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它不可能顶住帝国主义者的联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也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同中国革命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像中国革命运动需要争取喘息时间一样,苏维埃国家

^① 指1925年的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可侵犯以及保持莱茵地区非军事化的洛迦诺协定(1925年10月16日在洛迦诺草签,1925年12月1日在伦敦签署)。按照当时苏联的评价,签署洛迦诺协定是旨在建立吸收德国参加的反苏联盟,它助长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气焰。

也需要延长喘息时间。

4. 从所说的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远东采取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方针和首先同日本实行某种妥协的方针，需要在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方面认真做好准备，以排除不十分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对这种政策作出错误的解释，认为这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调整苏联和日本国家间的关系。

5. 为了对中国社会舆论作适当的引导，认为有必要通过创办新的报刊和通过对现有报刊施加影响来加强对中国报界的革命反帝影响。

6. 一旦建立自治的满洲（这是日本所渴望的），就应该争取使张作霖放弃南进和基本上放弃对中国其余地区内部事务的干预。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决不能采取主动或承担哪怕是间接的责任。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满洲自治涵义的确切理解本身，就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我们规定了必要的行动方针。

7. 鉴于上述总的政治方针，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排除一切刺激中国社会舆论的多余的、附带的和第二位的因素。毫无疑问，在各主管部门人员对中国的行为中，不允许有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和造成对它的帝国主义看法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要使有关的机关和人员相信，对中国实行这样的政策，甚至采用这样的外部政策形式，以消除怀疑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意图的思想阴影，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各地都要实行以非常重视中国的权利、强调它的主权等等为基础的方针。在每一个违反这种政策的场合，不管这种违反行为多么微小，都要惩处过失者，并通报给中国公众。

8. 要以各种方式公开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同情中国民众争取实现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基础之上的，而丝毫没有我们要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人民自己能够解决，

也应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苏联政府力求同中国现有一切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政府建立和保持真诚的关系。

9. 在满洲，外交工作将彻底从哈尔滨转移到奉天。

10. 要同张作霖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我们知道，在现有条件下，满洲政权应当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和稳定的关系；我们不损害这种关系，但对满洲政权来说，同时保持同我们的稳定和和睦的关系，从而确保自己对于东京的某种独立性，也是有利的。

谈判时要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人士同意用另一个缓冲将领取代张作霖，而我们认为在建立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有理由用另一个人取代张作霖。

11. 同满洲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为中东铁路制订严格而切实可行的制度：(1) 为所有有争议问题或冲突问题制订符合实际的(对等)调解程序；(2) 一旦发生麻烦事把问题交由奉天处理。

与此同时，我们的铁路局长、驻哈尔滨领事和驻奉天总领事将得到以下指示：铁路当局通过中国当局首脑，尤其是通过向后者提出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单方面解决问题的任何企图，都要受到惩处，决不姑息。

12. 在同张作霖达成协议和在北京对这个协议作相应的注册之后，争取召开中日苏三国铁路会议，其任务是制订三大国共同的满洲铁路经营、建设计划，争取在充分尊重相互的利益和权力的基础上签订涉及满洲的经济协定。

13. 在把中东铁路的实际机构严格保留在苏维埃政权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在最近一个时期使铁路免遭帝国主义者占领)的情况下，现在就需要采取广泛的文化政治性措施来使铁路中国化：

(1) 公文处理要用两种文字。车站站牌、挂在车站和车厢里的规则等都要用两种文字。

(2) 成立中国铁路职工学校，把技术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来。

(3) 在沿线相应地点为中国工人和与铁路相毗邻的中国居民成立必要的文化教育机构。

14. 必须(让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查明,把铁路直接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是否会被中方解释为我们单方面占领铁路的步骤。

同中国有关人士一起认真考虑和制订修改铁路规章的一切细节。

15. 利用目前我们在铁路上的行动还很自由的时机,根据政治局3月4日和18日决定^①,在中东铁路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认真清洗,把不太适用的或名誉扫地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工人调到苏联铁路线上,并用中心铁路线上的绝对可靠的有政治教养的工作人员取代他们在满洲的工作。

16. 另一方面,现在需要认真收集(以后弄清)中国军阀、警察和俄国白卫分子对中东铁路上俄国工人和职员の专横暴力事件,以及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所有民族冲突和生活冲突事件。要创造维护俄国工人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的途径和方法,以便使这些冲突不激起双方的沙文主义情绪,而相反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必须在工会中建立特别的调解委员会或公意审判会,双方以平等原则参加并由那些理解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人进行实际领导。

应根据(同奉天和北京达成的)相应协议制订使铁路职工免遭中国地方当局欺凌的办法,并辅以一切必要的组织保证。

必须就这些问题印发俄文和中文告示和呼吁书并在铁路沿线散发,贴在车站和类似建筑物上以及车厢里。

17. 根据上述政策,更新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人员。

18. 同张作霖(而以后同日本)达成协议的条款之一,应该是

^① 见第26、29号文件

使人民革命的蒙古免遭张作霖的侵犯。

19. 现在不要开始同日本进行一般性谈判。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实行上述各种措施和通过对日本舆论施加相应的影响来切实改善关系上，并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制订相应的措施。不要预先决定(苏联、日本、中国)三国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形式，而要从政治上和外交上准备论据，以便使中国可能迫不得已暂时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不致在中国被说成是在我们参与下的势力范围划分。中国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左翼人士的舆论，应该准确地领会到，我们只准备容忍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作出那些对于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来说为避免遭到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而需要作出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的一般性谈判应力求以作出让步的代价来使日本同英国断绝联系。

20. 一旦弄清楚，国民军将长时间把阵地让给吴佩孚，那么同后者寻求和解以削弱他对英国的依赖性的做法就可能是恰当的了，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同英国这个中国独立的主要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作斗争。

21. 国共两党必须对国民军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以便使它成为人民革命运动的不受个人影响左右的真正支柱。

22. 广州。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下，不仅需要把广州看作是临时的革命桥头堡，而且是拥有3700万人口的大国，它需要有正确而稳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

广州政府应当通过实行土地、财政、行政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通过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华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通过加强它的内部防卫能力，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共和国的内部巩固上。广州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应该坚决放弃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的想法和那些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动。

注：询问拉科夫斯基同志：广州政府是否有可能同法国正式或非正式地达成某种临时协定？为对法国政府作出这方面的试探，

派广州政府代表去巴黎是否合适？

23. 考虑到在已作出的一些决定中含有促使国民党领导人在某些严格划定的问题上表现出谨慎谦让的成分，为避免产生任何偏离总政策的倾向，必须明确说明，这种迫于形势作出的让步，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运动的革命胆略或减少在中国和其以外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促进相邻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等等，等等。

24. 鉴于受帝国主义挑唆的中国反动派提出了召回加拉罕同志的要求，认为有必要在中国（视情况也在其他国家，首先是在英国和日本）积极开展反对这种蛮不讲理的要求的政治宣传运动，说明加拉罕同志作为苏联的代表所奉行的解放政策的意义和内容。

满洲的铁路问题

1. 在中东铁路上的关系得到改善之前，最好推迟满洲铁路会议。

2. 考虑到苏联不能独立在满洲进行铁路建设，应预先就中东铁路的建设问题同奉天达成协议。

3. 为发展中东铁路的建设事业：必须减少用在完善中东铁路设施上的费用，以便把所有自由资金投放到铁路建设上。

4. 采纳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中东铁路建设计划。

5. 为敷设单独的专用线，认为最好成立股份公司，吸收中国地方资金，并尽可能由中国发起。

6. 中东铁路不应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敷设专用线上，而应争取修筑公路进行汽车运输和发展船舶运输。

7. 要利用一切现有手段反对由中东铁路向吉林以东敷设日本铁路线。

8. 为对日本施加压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关于我们敷设由赤塔经东蒙的铁路线的消息。

9. 打算首先着手建设从上乌丁斯克到库伦、张家口的铁路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苏维埃港的铁路。

10.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弄清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在运价、运价折扣和货物分配问题上有哪些分歧意见要提交政府间会议讨论。

11. 答复出渊胜治：借谢列布里亚科夫访问之机，将就地弄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本人还顺路去东京，之后我们将提出具体建议，力求调解有争议的问题并在有关三方相互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消除磨擦。

关于日本移民问题

在解决日本在苏联远东的移民问题时，必须重视日本社会舆论对此事的极端关注。但是，考虑到日本在远东搞殖民化的危险，必须谨慎地和循序渐进地实行一切步骤。现在要确定被允许进入苏联的日本移民人数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日本的移民不应是大量的。日本的移民应当受到严格的控制，应当借助于为此建立的专门协会利用日本的资金来分批进行。日本的移民应当在加强从俄国中部的移民工作的同时，按国际象棋规则分散安置。提供的地区应当是日本农民可以接受的，并且要考虑到日本的耕作特点。在哈巴罗夫斯克及其以南地区有适合于日本移民的地方，但在西伯利亚中心。不应让朝鲜移民打着日本移民的幌子进入这些地区。朝鲜移民问题应单独研究，而且可以为朝鲜人提供更深入西伯利亚的地区。

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34—36 页。

打字稿，会议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37

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26 年 4 月 3 日于北京

秘密

译出的密码电报

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

答复您 102 号电。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但它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现在在湖南，唐生智将军赶走了赵恒惕成了省督办。这是根据同广州的协议进行的，几个月前广州同这位将军达成了协议。现在的情况是：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唐生智是普通的中国将领，他同情广州，与其说是出于对它的原则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它的实力的尊重。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广州军队的存在意味着在政治上使该省变成国民党的省。对湖南的这种支持也会巩固已对吴佩孚宣战的江西方本仁的地位。如果在湖南驻有广州军队，方会感到自己更坚强。方本仁在寻求同广州的联盟。他的代表（他儿子）今天来过我这里，请求给予支持和帮助同广州建立友谊。

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以协助，这是预防性(?)^①措施，因此在湖南可能受到吴佩孚的影响。我认为，作出的决定^②不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具体情况。

加拉罕

核对无误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65，卷宗562，第186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0号 （特字第14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1926年4月5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3.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33. 采纳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以中央名义给加拉罕同志的电报稿：

1. 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

① 原文如此。

② 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日决定（见第36号文件）。

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①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2. 在加拉罕同志第 242 号电报^②中发现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

3. 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抄送：

契切林、加拉罕同志——用密码。

1926 年 4 月 12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9. 关于日本和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4 月 1 日会议第 18 号记录，决定：1. [1]（11））。

决定：39. 采纳政治局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华军政工作和远东防务的决议草案（见附录）。

抄送：

伏罗希洛夫、契切林同志。

亚戈达同志——IV. 21 及注。

温施利赫特同志——IV. 23. 及附录。

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见第 36 号文件。

^② 见第 37 号文件。

第20号记录
决定：39附录

在华军政工作和近期对它的必要改组

(1926年4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1. 除广州之外教官组已在各地得到某种程度的推广，但没有对实际需要情况作充分的调查，没有做必要的准备，没有考虑形势。工作人员的数量和类型与实际需要不一致。结果许多来这里的人预先注定无所事事。如果根据明确的任务逐步地派人和根据工作的开展程度来扩充教官组，就可以避免无效地浪费资金，避免发生指挥人员的腐化，就可以为工作带来更大的成绩，更增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声望。

2. 工作人员没有做好在中国环境中工作的准备，人员的挑选往往不符合任务的需要。

3. 物质支援与我们工作的开展和我们影响的加强不是很协调。

4. 我们的指导工作和我们的物质支援速度与国共工作开展的速度，以及与它们对军队和它们所占领的地方的影响的深入也不很协调。国民革命组织在军队中做的工作微不足道，而在本地区居民中的工作也十分薄弱。

5. 由于这些主观原因，也由于客观形势(军事行动)不允许继续在一些部队中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无疑应该承认工作成果是很不够的，在有些场合简直无成果可言。例如，在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中，由于它们彻底崩溃，成果也就等于零。在国民军第一军中可以感觉到的成果是骑兵有所加强，中级指挥人员对我们战术的长处有所领会，在这些人员中赢得了一定的威信。这些成

果可能很容易由于在冯^①不在的情况下最高指挥人员的因循守旧和上层政策的保守而化为乌有。

6. 我们今后工作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冯这个人物的评价,取决于他在战役之后的地位的稳固程度。如果北京中心^②的评价是正确的,如果冯同我们和国民运动的联系仍然是真诚的,而他去库伦只不过是对对手采取的一个外交步骤,那么在他的部队进入内蒙境内之后,教官工作虽规模会有所缩小,但也将是一项长时期的重要工作。

但是应该说,冯在目前出走是想放开政府和自己下属对中国北方革命力量的手脚,并让他们断绝同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和物质利益方面的联系。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个时期的军事工作就结束了。

7. 无论以后同国民军第一军的关系如何,我们在中国的教官人数都不需要像现在这么多。留下的教官不能超过10名,并且不论从熟悉情况和工作方面,还是从个人品质方面说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其余的应在近期内召回。

8. 留下的教官只能在同军队司令部就他们的实际任务和职责达成全面协议后着手工作。选派每一个新的工作人员都要根据十分明确的具体工作要求来进行。

9. 从事工作的教官应完全配翻译,以便使他们个人的工作是满负荷的。挑选翻译时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可靠性和敬业精神。

10. 将来应该在开展国民革命组织在军队中的工作和加强它们的影响的同时开展我们的军事工作。

在军事工作中,必须特别注意创建模范部队,哪怕是小部队

^① 冯玉祥。

^② 指设在北京的领导苏联驻华代表整个军政工作的中心,其领导人是 J. M. 加拉罕。该机构是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1925 年 4 月 17 日决定成立的(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1 卷(1920—1925)第 548 页)。

也好。这些部队在接受政治教育的同时可以作为扩大和巩固国民党和党^①的影响的实际支柱。

11. 考虑到过去的经验, 必须使作为整个军事工作领导人的武官, 有可能根据本军队中的情况, 并在中央和全权代表所拟定的总政治路线范围内, 独立地确定军事工作方法和完成任务的途径。

武官要为自己领域内的工作结果负责, 应该能为军事工作人员确定他们同地方司令部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关系, 拟定他们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针。

12. 为了在形势发生变化时能够顺利开展我们的工作, 必须预先着手培养军事方面和军政、工会方面的像样的东方工作人员。为此需要在中心举办严肃认真的和长时间的培训班。

13. 鉴于国民军在北方遭到失败, 我们进一步加强广州军队的工作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反动派在北方暂时得到加强后, 广州可能受到新的进攻和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我们教官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 即在广州军队中建立起巩固的核心, 并把以前分散的军事集团联合在它的周围。广州政府对教官和物质支援的要求应尽量予以满足。

核对无误: 维纳格拉多娃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3, 第 47—52 页。

打字稿。会议记录为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指中国共产党。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4 月 22 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鲍曼、多加多夫、克维林、科肖尔、科托夫、洛博夫、米哈伊洛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托洛孔采夫、丘巴尔、施密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柳比莫夫、梅利尼昌斯基、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4 月 15 日会议第 20 号记录，决定：2—〔4〕），（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 〔1〕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1926年4月1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31.——采纳斯大林同志的以下建议：

（1）鉴于存在来自张作霖方面的直接威胁，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它作出安全保证。

（2）立即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去奉天，责成他要求张作霖作出保证，并向他说明，对我驻北京全权代表机构的胡作非为他个人要承担责任。

（3）责成波多利斯基同志立即退回张作霖的照会。

（4）让加拉罕同志视情况行事，但要告诉他，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他去张家口国民军营地是不能允许的。

（5）建议加拉罕同志同张家口保持联系，再通过张家口同俄国保持联系，以便向莫斯科经常通报北京的事态。

1926年4月2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5.——契切林同志关于根据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1926年4月19日电报^①采纳消除同奉天冲突的提法的建议（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通过。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57，第1、9、10页。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电报没有找到。

40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电报

1926年4月23日于上海

绝密

维尔德致维经斯基：

获悉右派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部分左派，达成了妥协，目的在于同左派实行联合。孙科从广州来到上海。孙科公开宣称他此行之目的，还称蒋介石同意他这样做。5月15日将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将对共产党人发动强大的攻势。您有必要来一趟，党没有采取很明确的立场。我们可能动摇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现在掀起了疯狂的反共反苏俄运动。必须给予有力而巧妙的反击。请按预算紧急电汇组织经费。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核对无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18 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副本。

41

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

1926年4月24日于广州

绝密

穆辛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

1. 蒋介石的3月20日行动是由广州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总的局势引起的；但它无疑由于俄国同志即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快、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加快了3月20日行动的到来并使之更加激化了。

2. 某些直接在军队中工作的俄国同志和中国同志所犯的错误，有可能形成在军队工作方面和在整個国民党中央，以及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总的错误路线。

3. 蒋介石的3月20日行动和此后出现的局势孕育着危险的后果。它明显暴露了国民党左派运动和广州政府主要领导核心的内在软弱性。以拥有强大力量的蒋介石为一方向以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破裂，有可能造成国民党左派的严重分裂，导致广州政府的垮台。这种关系破裂

在目前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北方又出现了强大的反动浪潮（吴佩孚、张作霖）。如果广州政府内部发生分裂和争斗，北方的反动派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来收拾它，占领广东和暂时抑制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

4. 因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政府中和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主要核心力量，重新使汪精卫复职，使这一派（汪精卫、蒋介石）联合和团结起来。现在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尽管他有种种主观上的缺点，将来有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麻烦。使这一派团结起来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争取巩固和健全南方的革命政权和反对北方军阀统治，这是目前在广州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内部和广州政府中的领导问题，只应通过团结整个这个派别来解决。排挤或不让蒋介石或汪精卫积极参与领导政治生活，这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在解决具体的领导问题时，始终要考虑到，现在在中国（也不排除在广州），人的问题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

5. 但是出现的危机不是仅仅通过国民党内部一种途径就可以消除的。这个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是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在俄国顾问与中国司令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二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问题上。如果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能够也应该通过纠正所犯的错误，通过改变俄国顾问团的人员组成，通过不加快军队集中管理和建立政委制的进程和通过更有分寸地对待中国指挥人员等而得到解决（已部分得到解决），那么第二个问题，除纠正所犯的错误外，必然还要提出整个国共关系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也成了广州整个局势中的一个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

6. 国共关系问题在广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广州现在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地区，在那里国民革命虽然是部分地取得了胜利但终归是取得了胜利，并且在那里执政的是国民革命党——国民党。现在尽管广东内部的国民革命还远未完成，但广州政府的主要任务，除在自己的地区进行革命改造外，则是准备以后在广东之外为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任何争斗都会削弱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并会使广东省内外国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泡影。

(2) 国共关系问题不是纯广州的问题。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成功，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尖锐，这是具有全国意义而不是一省意义的问题。

目前广州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困难，随着国民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影响的扩大也会在全国出现。现在在广州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助于解决在国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的第二天就会更尖锐地摆在面前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和矛盾。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广州应当成为全国的榜样和典范。

7. 国共关系问题也是以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为一方，以全体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商人和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阶级关系问题。如果中国无产阶级将在国民革命中起领导作用，那么一刻也不应忘记，国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不是孤立的，不仅不脱离农民，而且也不脱离构成全国城市居民绝大多数的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

现在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国民党不仅在国民革命过程中而

且在革命胜利之后的作用，我们应该制定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首先在该党已经执政的广州确定我们同它的关系。

8. 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因为国民党左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还只是处于创立过程中而难于做到。虽然国民党左派对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它本身还不能完全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以某种明确的组织形式完全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

国民党左派首领经常热衷于玩弄左的和极左的革命词藻，似乎试图以此来表明自己在“革命性”上超过中国共产党。极左倾向不仅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而且也可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人士中存在（多多少少已有表现）。鉴于国民党现在仅在广州是执政党，但正走在通向全国政权的道路上，这种倾向有可能带来特别危险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应当促进国民党左派的正常分化和自决，帮助它发展和建立组织。

9. 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既不能同共产党加入英国式“工党”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共产党人加入同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工会组织同日而语。在这两种情况下，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加入这些共同组织的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把他们从与我们敌对的党（如英国社会民主独立工人党、法国工团主义组织等）的影响下夺过来。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任务不是为自己从国民党那里夺取群众，而是相反，是同那些不能和不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对象的居民阶层和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盟。

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组织，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事业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

10. 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目前状况下，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这对国民革命事业来说是很不恰当的。但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组织后，应该像以前一样，完

全保留自己党的机构，其中包括组织机构，仍然是一个有铁的纪律的严格集中的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排除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中的危险，而在国民党得到发展和加强时这种危险肯定是会增大的。

11. 另一方面，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左派的一些首领，特别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有恐惧心理，他们试图取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权，鉴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是半合法存在的，这种恐惧心理尤为强烈，因为共产党组织不公开活动，甚至它的领导机关成员（至少在书面上）是保密的，它的整个外部工作，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这就会加剧国共之间的磨擦，致使国民党一些首领更加神经过敏，并会造成他们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监督的极其有害的对立倾向。

这种情况（除其他种种原因外）也使中共有必要在根据政治原因有可能实行合法化的地方坚持党的合法化方针。尤其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地方，首先是在广州，中国共产党应当转到合法工作的轨道上。我们现时的目标不是削弱和瓦解国民党，而相反是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就像巩固和健全国家机关和广州政府以及加强其军队一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保持地下状态（何况在目前情况下，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包括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外界都是很清楚的）。相反，共产党组织的半地下和半合法状态目前会造成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关系中的新危险和新磨擦。

我们应当努力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我们必须使国民党领导层真正相信，我们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

12. 现在国民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扩大它的基础，把城市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吸引到它的队伍中来，接近中等的非买办商人和其利益在客观上与外国在华资本利益有冲突

的那部分中国企业家。国民党不只是工农党。客观上它代表着中国社会中的那些反对帝国主义继续和加强对中国的压迫的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也代表着那部分不受外国在华资本左右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的构成应当扩大，应当把所有居民阶级和阶层中的那些准备和能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斗争，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化的分子吸引到它的队伍中来。

对商人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广州）的影响的垄断应当从国民党右派手中夺取过来。国民党左派能够也应该赢得那些不愿国家继续受到外国资本奴役的居民阶层的同情。

这样来扩大国民党的基础，同时也可以解决国民党左派中存在的右的思潮问题。如果说有些右派领袖至今仍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充当反动派和反革命的帮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脱离开党，那么至少跟随他们的群众可能也应该被左派争取过来。这也适用于南方国民革命军中和学生中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应该吸引这个学会的成员参加党内的日常工作，并且党应该通过日常工作帮助他们清除右的有害倾向和思潮。

13. 为此目的，不仅国民党本身，而且还有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建立起来的政府机关都应该设法同手工业者和中等商人以及企业主接近和建立联系。一些部下面可设立专门委员会（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成立新的工商部），吸收商会、手工业者行会、企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参加，这应该是广州政府目前的任务之一。

与此同时，为了使经济斗争的尖锐程度有所缓解（这种斗争在广州有时采取过于尖锐的形式，有可能在广州准备进一步进行反对北方反动派的斗争时造成不良的政治后果），应该认为在国民政府劳工部下面成立一个吸收工会和企业主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政府仲裁委员会是恰当的。该委员会可以调解经济纠纷，力求使其不发展到举行罢工的地步。该委员会的决定决不应是有约束力的，

它不应是强制性机构，而只是为使经济斗争有所缓解的协商性机构。

14. 另一方面，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应当比以前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要使国民党对自己有这个看法。共产党组织不应公开提出垄断工人运动的要求，而应力求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体工人群众中去。在这方面，应该特别加强对广州工人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对联合在机器工会中的五金工人的工作）和对目前仍留在香港的工人的工作。共产党组织应当善于把自己的一般政治活动同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学会领导他们进行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的经济斗争。只有这样共产党组织才能在这项工作中取得真正的成绩。在最近一个时期，工人运动应当是广州共产党组织注意的中心。

15. 香港罢工继续拖延下去有造成罢工工人涣散和香港同广州的斗争激化的危险，鉴于目前在国内外形成的总的政治军事局势，这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准备通过作出妥协来取消罢工，应尽可能使香港工人运动（和罢工工人群众）不受很大损失地退出罢工。

16. 对农民工作我们应给予足够的注意，同时还应力求把国民党组织比以前更加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农会不应由共产党人一手建立，也要吸收国民党的一定力量来参加这项工作。对于国民党来说，这也应该是它的重要工作之一。

组建农会武装必须特别谨慎，以便不造成它们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这项工作必须同国民政府的政府机关和军事机关进行交涉。

17. 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需要特别谨慎。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任务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战斗力和为未来的无产阶级红军准备干部，那么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中，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则截然相反。

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按国民党系统开

展政治工作来巩固和加强军队。

我们不把这一点作为今天的任务提出，但我们还是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独立的共产党支部，如果这些支部的存在是军队中发生激烈斗争的原因，因而不是有助于军队的巩固而相反却是加速它的瓦解的话。共产党人的任务是遵循国共两党共同指示在军队内的共同的国民党支部中做工作。

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我们的同志需要特别有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我们的同志应当牢记，他们的错误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因而会给我们党的整个政策抹黑。要求他们比任何人都要更克制和更坚定，从而为全军作出榜样和典范。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8，第 66—76 页。

打字稿，副本。

42

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

1926 年 4 月 24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陈同志：

从我三个月前离开中国时起，我们没有从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对我们来说唯一的新闻是关于您被捕的报道，好在后来这则报道是不确凿的，因为有人电告我们，您病了，但现已康复并又

开始工作了。

近两个月来，中国的局势急剧恶化。先是国民军第一军遭到了失败，而现在是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遭到了彻底失败，结果反动派在中国北方异常嚣张。我们相信，这只不过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暂时失败，它不会对工人运动、对国民党和对我们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新形势要求我们除了对革命动力有明确的概念外，还要有很明确的策略方针。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您关于北方反动浪潮的规模及其对华中华南有多大影响的详细通报，但我认为，我们还是能够对我们党有关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和联合反帝力量的策略和总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的。

首先我认为，我们党现在有必要通过自己的机关刊物对目前的局势作出冷静的分析，既不要低估反动派的力量，但也决不能因过高估计这些力量而造成恐慌。同时可以想像到，虽然在北方，奉直两个营垒中的反动派确实能把几个省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但是不应忘记，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磨擦会日益加剧，必然会造成冲突。帝国主义报纸在全世界蓄意造谣，说什么中国正处在通过这两个集团联合实行军事独裁来实现统一的前夕。我们应当明白，这不仅是谣言，而且这种谣言明显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计谋。他们千方百计要建立这样一个联盟，成立一个奉天集团将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稳定的政府”。这也是日英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统一战线。必须把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矛头指向这种联盟，同时要特别加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宣传运动。

其次，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并使其具有适当的形式。尽可能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同时一刻也不要忘记，必须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群众的各种局部的日常要求。我觉得，对铁路工人的工作现在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之一。我们去年的经验表明，由于对铁路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够，我们不仅在整個中国工人运动的成就方面，而且在农民运动

方面失去了许多东西。您比我更清楚，如果郑州铁路工会^①更强大，并在农民向它求援的时候能够援助农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湖南农民运动。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快就会成为中国许多省的典型事例。

当然，重要的力量不只是铁路工人，我们应该作出比以前多十倍的努力来在他们当中开展工作，对矿工的工作也很重要。绝对需要你们派遣最有经验的同志不辞劳苦地到矿区工作。顺便请告诉我，现在安源矿业工会在干什么^②？

我们应该努力着手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农民的工作问题。在来自中国的重要电讯中，有关于河南所谓“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③中的强大农民运动的报道。同时根据这条消息判断，在山东农民当中有强大的反奉运动。虽然去年，当国民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巅峰时，农民运动没有及时跟上，但目前展开的农民运动能对国内总的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能为国内整个革命运动赋予新的促进因素。绝对需要向这些省派遣一定数量的同志，同当地党委和国民党组织一起对农民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我们一天也不能从我们的计划中取消这项工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开展宣传工作，以期瓦解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军队。我很清楚，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我也知道，我们中国党在这方面只有不到一年的经验，但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勇敢的步骤，来克服我们党主观上存在的困难，利用那些肯定存在的便于我们在奉直军队中做工作的客观条件。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应当记住，不管它在军事工作中遇

① 指京汉铁路总工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成立。

② 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1922年5月1日成立，1925年9月被当局取缔。

③ 指由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农民自卫队领导的秘密会社。

到什么困难，它都应该本着上述精神进行这项工作。再过两周以后，将有30名毕业于“专门”学校^①的同志到你们那里去。他们现在具有较好的理论知识，有干劲，也勇敢。你们正应该使用他们来从事这项工作。

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在南方，即在广东等省，特别是在广州的工作问题。我们的广州地方组织去年所犯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广州的“三二〇事件”无疑与此有一定关系。如果我们有更好一些、更强一些、更大一些和更训练有素的党组织，那么我认为，我们是能够避免发生这种事件的。教训是，我们在广州需要有强大的共产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应当同它保持密切的联系，更直接地领导它，首先要坚持把更多的工人、先进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到我们广州的党组织中来。现在我们还应该明白，我们不能满足于仅在广州有一个组织，在汕头、厦门和其他港口也应该有党的组织。

需要我们党给以极大注意的第六个问题，是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您关于国民党二大结果的通报，因此也不知道右派在这次会议上猖狂到什么程度和他们如何顺利地取得了左派的一些让步，但我相信，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右派将开始在广州起重大的作用。我还认为，右派是“三二〇事件”的鼓舞者和思想领袖。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了问题，不仅是南方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在党的十月全会上通过的决议^②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但可能现在需要在我们的总策略中补充一些新的特点。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朝着建立我们党同国民党联盟的方向调整我们

^① 指苏联专门为中共培训军事干部的军事训练班。

^② 在中共中央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举行的有Г.И. 维经斯基参加的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87—491页)。

的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怎么做这件事呢？我认为，首先要使我们的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成为越来越独立和越来越强大的组织。其次，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

我们党的第七个问题还是少数民族问题。我们党应通过自己的北方委员会给予内蒙古和满洲工作以特别的关注。毕业于共产主义大学^①的几位同志将很快被派到满洲去，他们将从那里同北方局保持联系。

随信寄去以下材料：

1. 由殖民地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②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和决议；
2. 东方部为共产国际全会起草的提纲^③；
3. 给党的机关刊物的几篇文章。

目前蔡同志^④不能回中国。他还在生病，要去克里米亚两个月。他回来后 will 立即回国。不过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几名负责同志不久将返回中国。他们当中有亚诺夫斯基、拉法伊尔和舍尔斯京斯基同志^⑤。

我们早些时候请您派两名同志到共产国际的列宁学校^⑥来学习，现在这所学校的开学时间推迟到9月，因此您可以在8月派这两名同志前来。

最后我要对您说，很可能，在中国将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⑦。它会给您整个工作以很大帮助。我不知道，我能否很快到您那里去，因为在执委会改组以后，我需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月，安排

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③ 文件没有发表。
④ 蔡和森。
⑤ 分别为袁庆云、任卓宣和刘伯坚。
⑥ 即国际列宁学校。
⑦ 见第33号文件。

远东书记处^①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在夏天去同您一道工作。

我再次请求您，陈同志，至少两周给我写一封信。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寄信路上耽搁的时间太长，您就请我们的同志把信寄到海参崴。倘若我们不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和我们党怎样在进行工作，我们就无法帮助您做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5，第 209—213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43

拉兹贡关于广州 1926 年 3 月 20 日事件的书面报告

1926 年 4 月 2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3 月 20 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午 10 时，第五团的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在广州的驻地），把我们的警卫缴了械，不许我们同志中的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授权他们采取这次行动的命令。问及营长时，营长说他是奉蒋介石将军之命行事。但他并没有蒋介石的手令。该连在东山守到下午 4 时，然后把枪还给我们警卫撤走。

^① 1926 年 3 月 2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改组共产国际机构的决定，取代撤销的东方部成立了两个书记处，即近东书记处和远东书记处。

下午6时，我接到伊万诺夫斯基^①同志的指示，让我亲自去同蒋介石谈判。我发现蒋非常沮丧，他说他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他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他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要下令进行严格的调查，等等。过了两个小时，我又同伊万诺夫斯基同志一起去见他。蒋又把先前说的话重复一遍，我们同他商定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最近蒋介石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他行刺。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共产党员）的信，要他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他（信无疑是伪造的）。

对3月20日事件的评价。

这次行动如果不是在3月20日发生，那么晚些时候也会发生。对这次行动不必从俄国顾问领导层的错误或没有分寸的角度去看，而应该着眼于国民党内部表现出来的社会动向。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在军队中有反映。代表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早就同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在孙文主义学会，其主要口号是“共产党人滚出国民党！”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共斗争是希望同帝国主义和解的买办资产阶级用来同国民党左派作斗争的遮羞布。如果拿右派首领伍朝枢来说，他的本质则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他在香港有一些大企业，自然他想马上同香港和解和取消省港罢工委员会。早在去年12月末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右派就试图在代表大会上制造分裂。然而他们没有得逞，因为军队中的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在我们俄国同志影响下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说，他们认为目前国民党有必要：1. 组织工农联盟；2. 把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3. 同共产党人合作；4. 在国民党内加强党的纪律性。闭幕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给左

① A. C. 布勃诺夫。

派带来了明显的胜利，但勿庸置疑，国民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任务只是要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分裂充分做好准备。因此我断定，既然中国进入内战时期，而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正在形成，所以国民党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并必然要导致国民党的分裂。我把3月20日看作是一个警告，应该从目前联合在国民党中的那些社会成分发生矛盾的角度去看这次事件。现在国民党还没有群众。罢工显示了蕴藏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巨大革命潜力。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暂时（如果不算军队停止掠夺的话）给居民带来的实惠很少。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党，不仅不得不联合农民和工人阶级，而且在中国的条件下和在国民革命运动的目前阶段中，还不能让基本的时而是决定性的力量，即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中等知识分子摆脱自己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或更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特点揭示不够，这已经造成了（同孙文主义派的冲突）而且还可能造成无数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从“三二〇事件”中得出结论时，我们应当考虑某一军事工作人员的错误（不否认他们也可能有间接影响），但主要应当考虑在国民党内进行角逐的那些社会集团的力量对比。不否认在我们顾问团的工作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认为，总的来说顾问团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如果说在1924年和1925年上半年，我们不得不依靠部分将领，我们工作是旨在通过在他们之间左右逢源和使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来向军队中渗透的话，那么现在则应该改变工作方法。集中统一军队的管理和供应，组建政治机关，这是国民革命军真正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必要前提。

结论：

1. 在中国的条件下，国民革命运动能够以农民群众运动的形式取得胜利，也许这与刻板公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但

就是这样。

2. 农民、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种力量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力。

3. 必须认真着手组织农会和工会（我认为《真理报》引用的数字是夸大的）^①。此外，要考虑到这些数字的实质。现有农会和工会在活动中没有得到任何指导。

4. 如果我们做军政工作，也就是在广大劳动群众中为国民革命运动打基础，那我们的军事工作就可能是无懈可击了。

5. 不要分散我们的力量和经费，而要把它集中在我们认为具有国民革命运动基础的地方，这就是广州。

6. 加强广州团的人员组成，不仅要充实军事人员，而且要增加党务、工会等方面的工作人员。

7. 要把吴佩孚看作是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危险敌人，因此无论如何要争取同张作霖协调一致。吴佩孚不仅个人有实力，而且有他所代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

8. 必须扩大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因此准备进行北伐的工作应当提上我们军政工作的日程。

9. 对派往广州的工作人员要逐一进行严格的挑选，并要预先进行培训。

10. 必须懂外文。

11. 部分（经费）要转到用于支付顾问团费用的中国预算上。

12. 要准确规定军事团同驻华总政治代表之间的关系。

13. 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

拉兹贡

① 可能指以下文章：A. 伊文：《中国的农民运动（北京来信）》，载1926年4月1—3日《真理报》；M. 拉非斯：《“左翼”社会党人如何“捍卫”中国革命》，载1926年4月18日《真理报》；M. 阿尔斯基：《广东的工人运动》，载1926年4月25日《真理报》。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129，第 26—29 页。
打字稿，副本。

44

维经斯基给契切林的信

1926 年 4 月 26 日于莫斯科

绝密，亲启

致契切林同志，抄送斯大林同志。

我完全赞同您在 4 月 24 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信^① 中阐述的看法，由于国民党右派与部分左派之间搞的把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局面，我认为有必要告知，今天已打电报直接询问中共中央有否补充情况。

您援引的电报^② 是维尔德同志发给我的，他只是联系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5，第 21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见第 40 号文件。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 会议第3号记录^①

1926年4月27日于莫斯科

出席：维经斯基、罗易、片山潜、金^②、蔡^③、谢马温、福京、太洪、亚诺夫斯基^④、多比索夫同志。

听取：1. 蔡同志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通报。见附录。

具体建议：(1) 鉴于我们党政治领导薄弱，共产国际应当加强在中国的领导工作。

(2) 应尽快成立远东局。

(3) 应在最近而不是在8月召开中共五大。

(4) 应发出指示不允许广州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

(5) 弄清国共关系问题。

(6) 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

(7) 确定在同广州联合的省份中进行工作的方式。

(8) 确定北方进行工作的方式和内容。

决定：1. 鉴于党员人数大大增加，因此与会人数要达到几百

①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② 金成树（音）。

③ 蔡和森。

④ 袁庆云。

人，现在不要召开中共五大，因为目前按合法的条件在中国没有合适的地点（广州也不合适，因为它地处偏远，很难向那里集合代表），所以暂时不召开代表大会，在5月中或5月底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上可以提出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

关于“北伐”问题，应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角度来说，广州号召同北方作战会被解释为广州不愿意维护和保卫和平，而愿意打仗。

从宣传角度来说，它会给工农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共产党人是战争的预言者。

一旦收到补充材料时，书记处会议将就其余问题采取具体措施。

听取：2. 关于蔡同志动身问题。

决定：2. 给蔡同志两个月假期，此后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他将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返回中国。

东方国家书记处^①

[附录]

蔡同志在远东书记处 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

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目前的形势。

现在在中国北方，有三个不同的军事集团：1. 日本支持的张作霖集团；2. 英国支持的吴佩孚；3. 美国支持的孙传芳。这三个

^① 原文如此。

集团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国民军撤离天津时，由于北京归属问题，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但是，鉴于英日之间建立的统一战线相当牢固，所以要考虑到，它们会迫使张作霖和吴佩孚建立联合政府，这样一来，这种冲突暂时就不会爆发。

这个时候，孙传芳在继续展开攻势，向山东推进。在上述三个军事集团当中，孙传芳集团是最强大的，他比张作霖和吴佩孚都强大。因此我认为，他将在中国以后的政治事件中起很大的作用。将来他的行为可能有三种发展趋势：1. 如果吴佩孚成功地组成联合政府，不触及孙传芳，那么他可能会采取中立立场。2. 如果吴佩孚或张作霖想把中国北方统一在自己的政权之下，并向孙传芳进攻，那么后者就可能同国民军或者广州军队联合。3. 如果张作霖和吴佩孚认为不需要进攻孙传芳，而要同他联合，那么很可能，孙传芳将参与组建联合政府。倘若美英帝国主义者之间达成妥协，就更会如此。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我们敌人之间的妥协趋势在增长，可能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现在在中国，第一，有英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第二，国民军还没有被消灭，第三，无论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预先做好准备彼此都不会交战，第四，孙传芳虽然比张作霖和吴佩孚都强大，但他也不可能单独同他们交战。

现在来谈谈中国西南部的情况。我已经说过，在北方反动势力眼下还在增强。这对西南有影响，西南各省试图联合起来对付北方反动派。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和四川东部都要加入这个联盟或有加入的意向。它们正逐步地联合在广州政府的旗帜下来反对北方。

现在我向你们简单地谈一谈党内情况。据同志们告知，党员人数已达到 1.2 万人，而中国共青团有 15 万人，其中在北京有 2000 人，在广州有 3000 人。

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代表会议^①，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北伐）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眼下发动这样的攻势对于革命运动来说是很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西南部巩固和聚集革命力量。我们党在南方也犯有错误，在广州，由于同国民党有磨擦，发生了“三二〇事件”。在湖南，我们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在唐生智将军推翻赵恒惕后发表一个宣言，要求废除赵恒惕颁布的宪法。这个要求无疑会把唐生智推向反动派方面。一句话，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同志如何对待国民党及其活动家的态度方面看到许多错误。

我有以下具体建议：

1. 鉴于我们党政治领导很薄弱，共产国际应加强对我们党的领导，因为后者的错误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可能是很有害的。
2. 尽快成立远东局。
3. 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而不是在8月。
4. 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
5. 应该调解国共关系。
6. 提出农民运动口号。
7. 应该研究如何在那些要与广州联合的省份做工作的问题。
8. 确定在北方进行工作的方式和内容。

问：中共全体党员是否都加入了国民党？

答：平均90%。在上海这个比例还要低些，因为有关于不希望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②。

问：在中共党员中是否有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这种情绪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① 指中共中央1926年2月21—24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

^② 文件没有找到。

答：有这种情绪，但是是个人性质的，不能说这种情绪有什么社会背景。

问：如果帝国主义者组成统一战线，它们可能想搞垮广州，这样远征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们现在能设法同孙传芳取得联系吗？

答：为了建成反对广州的统一战线，需要时间和力量。因此我们不认为，现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可能对广州采取行动，广州现在也没有准备以“北伐”的方式来进攻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至于孙传芳，他现在持观望态度，当然需要设法使他同他们断绝联系。

维经斯基：我要对蔡同志的报告作一点补充，我们收到一份电报，内称国民党右派现在在加强反对我们的活动。我认为，我们在收到我通过电报征询的补充信息后，将对国民党右派问题作更详细更认真的讨论。至于蔡同志的建议，我认为，现在不能召开代表大会，因为我们找不到能集合代表1.2万名党员的2、3百名代表的合适地点。在广州，也不能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因为它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代表大会的条件会很困难。需要最近在5月中或5月底召开有50、60人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我们将写一封这样的信，作为对上一封信的补充^①，在那封信中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7，第 1—5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信没有找到。

4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 1926 年 3 月 20 日事件的书面报告

1926 年 4 月 28 日于莫斯科

关于广州的三月事件（简况）

今年 3 月 24 日我离开广州，以下所述涉及那个时候的情况。

3 月 20 日事件

事实方面。3 月 18 日，海军政委（李之龙，共产党员）收到以蒋介石名义通过电话下达的命令：调派“中山舰”去黄埔候用。李之龙派出了“中山舰”，但他向蒋介石要手令。蒋介石说他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

就在这时，蒋介石收到一封由李之龙署名的信（也是伪造的），信中建议蒋介石在三天内通过政府把广东企业收归国有，并威胁说，如果蒋不这样做就逮捕他，把他流放到俄国去。

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向蒋介石解释说，派出“中山舰”和写这封信明显说明，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蒋介石驱逐出广东。

蒋介石没有根除的军阀“怪癖”、“拿破仑主义”（“在我们的时代能有中国的拿破仑吗？”这是蒋介石不止一次向顾问提出的问题

题)、军队集中管理实行得太快、实行集中管理时的普遍整齐划一使蒋介石权力受到的削弱(以前蒋介石在接受各种使命时都受到特别的优待)、顾问对蒋介石本人及其部队服务的明显变化、蒋介石的自行其事,所有这些致使蒋介石落到搞挑衅的地步。

3月20日上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军队)逮捕了海军政委李之龙、第二师所有政委(第二师是广州卫戍部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山(俄国人占据的广州驻地),不许俄国人离开东山;解除了(由我们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

后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坚决要求,当天除海军政委李之龙外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

附带说一句,蒋介石在给占领东山的第五团团长的手令中命令对东山严加“监视”。蒋介石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他把罪责推到团长的错误行动上。

当然,三月事件首先明显反映了(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同大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然,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不能不与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发生冲突,但要知道,上述矛盾不是出乎预料的新矛盾,以前这些矛盾就曾以对我们更为不利的形式存在过(如粤军司令许崇智在广州的实际统治时期)。

这次我们的错误(罢工拖得太久,突出共产党人,对孙文主义学会活动注意不够,军队集中统一工作速度太快,忽视为将领们而首先是蒋介石“提供服务”的必要性,等等)为这些矛盾提供了暴露的机会。

3月20日,蒋介石觉得自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在政治委员会中看到他的行为受到彻底谴责后,觉得自己的“拿破仑式”想法遭到失败,从右派对他的同情中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但他无法找到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

蒋介石的声明^①证明,右派未能通过利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争吵来动摇政府,进而取消罢工。

蒋介石能靠牺牲部分左派(汪精卫、谭延闿等)和共产党人同右派达成真正的和解吗?

似乎“三二〇事件”和最近的一份关于(国民党右派)孙科带着蒋介石的这种委托去上海的电报,说明达成这种和解是可能的。但我还是认为不大可能达成这种和解。我的看法是:

1. 蒋介石不能不意识到(如果还没有意识到的话)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仍和政府共事,他的沽名钓誉梦想也许会得到满足,因为他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毕竟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

我从蒋介石说起不是偶然的,因为我认为他现在是一个力量,没有这个力量右派就一事无成。

2. 政府的实力如何呢?它会得到其他军的支持吗?

在6个军中,只是在(驻扎在离广州600俄里的汕头地区的)黄埔第一军中和(驻扎在广州的)黄埔第二独立师中没有右派组织,即孙文主义研究组。

如果说李福林的第五军就其政治面貌而言不太可靠(这个军较弱,组织性差,我们只是从今年2月开始在其中做工作),那么为了所有其他军(特别是由广州人组成的第四军)的利益,(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都是北方人^②),就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然而这种独裁却是右派能用以留住他的唯一手段。

由于想为国民革命运动留住蒋介石,20日(我们)对蒋介石

^① 可能指1926年3月2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蒋介石同中央通讯社记者的谈话(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州1982年版第367—368页),以及1926年3月29日同《广州报》记者的谈话(见《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翻译资料),由M.拉菲斯主编,莫斯科1928年版第278—280页)。又见1926年4月22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蒋介石痛斥国民党右派——驳挑衅性捏造》一文。

^② 指来自广东北面省份的人。

作出了让步,这样做同时也为其他军进行必要的改编提供了时间。

3. 在整个罢工期间,政府向罢工工人提供了物质支援和政治服务,因而赢得了4万罢工工人的支持。

4. 只有到蒋介石奉行能为他树立威信的政策时(组织和巩固农会),农会才会跟他走。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他失去右派,继续奉行政府对农民的政策,或者是他同右派站在一起,失去70万有组织农民的信任。

5. 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整顿税制,从城市中清除一切强行征收非法苛捐杂税的小股队伍,把从军队手中接管的整个财政机关移交和集中到财政部手里,保护物资,等等)之后,在广州政府历史上,商界第一次开始同它一起行动,并给予全面支持(商界关于罢工问题的声明^①、在运动时期对政府的财政支持等)。

实行取消罢工的方针保证了商界对政府的支持。

6. 我记得只有一次部分有组织的学生捍卫被政府免职的(后来参加北方会议^②并被二大开除出党的)大学校长邹鲁(右派),现在甚至这部分学生也同所有其余有组织的学生一道同政府站在一起,拥护它举行反对北方会议,反对上海中央等抗议示威活动。

以上所述使我得出结论:在纠正我们在广州的政治工作方针(取消罢工,进一步明确中共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安排中国党内的教育工作)和军事工作方针(在实行集中管理,出主意和使用工作方法方面更加注意当地的条件)之后,广东仍然是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根据地,毫无疑问也是值得我们在华工作时给予极大关注的对象。

罗加乔夫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在北京郊区西山举行的会议。会议自称为党的四中全会,并通过决定把共产党人和同他们合作的一些党内人士(其中包括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解除鲍罗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的职务和在上海组建党的新领导机构。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129，第 21—25 页。
打字稿，原件。

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2 号
（特字第 16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4 月 29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4 月 22 日会议第 21 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拉狄克同志）。

决定：1. — [1] (1) 不接受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的建议^①。

(2) 等冯^② 到莫斯科来时再讨论冯的决定问题^③。

(3) 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

① 建议没有找到。

② 冯玉祥。

③ 看来是指冯玉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会见塔斯社记者的谈话。他在谈话中说：“我决意到莫斯科后去工厂当工人，在劳动者当中经受实实在在的政治训练并全面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我希望在苏联呆上 7 年”（见《冯玉祥论中国》，载 1926 年 4 月 3 日《消息报》）。冯玉祥于 1926 年 5 月 9 日抵莫斯科。

4. 因此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危险的。

5. 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

6. 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

7. 如果在当地查明，主张在组织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的运动很强大，并且两党关系有严重冷淡的危险，那就同意把这个问题尽快提交共产国际讨论。

8. 建议国民党向莫斯科派 1、2 名常驻代表。

9. 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

抄送：

契切林同志—（1）、（2）；

季诺维也夫、维经斯基同志—（3）、（4）、（5）、（6）、（7）、（8）、（9）；

温施利赫特—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3）、（4）、（5）、（6）、（7）、（8）、（9）。

听取：〔2〕——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1）认为可以拨出 7500 卢布经费，用于派遣在中国学校^①结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国，让他们从事军政工作。

（2）为审查继续中国学校工作所需经费的数额，成立由鲁祖塔克和温施利赫特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① 指中山大学。

抄送：

温施利赫特、鲁祖塔克、布留汉诺夫同志——全部。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55—5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8

胡汉民就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 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摘 录)

1926 年 5 月 3 日于广州^①

胡汉民使团^②就与第三国际有关的问题 提出的报告

报 告

1926 年 2 月 3 日，我同第三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

^① 日期是根据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台北 1960 年版第 233 页）标出的。

^② 从 1925 年 10 月 14 日至 1926 年 4 月 20 日在苏联逗留的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有：胡汉民、李文范、朱和中、杜成志和胡木兰。

也夫进行了交谈。同他讨论了中国国民党与第三国际建立密切联系的必要性问题，因为该组织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还请我出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并在会上作报告^①。对此我表示赞同，此外我还根据党的决定向第三国际提交了两份声明。其中一份声明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过去的革命斗争史^②。在另一份声明中提出了我们中国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建议^③。2月14日我同第三国际东方部中国分部主任维经斯基同志进行了交谈，同他谈话的时间很长^④。17日，即执委会扩大全会开幕日，我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致了贺词。全会上的情况我在18日电报中已作报告^⑤。19日我同联共中央委员斯大林进行了另一次交谈，也同他谈了这些问题^⑥。3月8日收到第三国际对我们声明的正式答复，第三国际认为中国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还不到时候，但是如果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需要加入，那么国际主席团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第六次全会^⑦日程，并且它真诚地希望，中国国民党派代表参加讨论这个问题^⑧。鉴于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与我党有直接关系，我决定于3月13日回国提出报告。以上所述是跟我与第三国际同志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会谈有关的事件。至于我们提出建议的原因，在两份声明中以及在第三国际的答复中和我同各方面同志的交谈中都作了明确的说明。随报告附上各次谈话（记录）以及我希望你们也给以注意的材料。

致政治委员会^⑨

① 1926年2月17日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致了贺词〔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8—9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18号文件。

④ 谈话记录没有找到。

⑤ 电报没有找到。

⑥ 谈话记录没有找到。

⑦ 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⑧ 见第22、23、24号文件。

⑨ 根据中国的公文处理，在报告结尾指明收件人。

所附材料^①：

1. 同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谈话。
2. 向第三国际代表会议提交的声明。
3. 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声明。
4. 同第三国际东方部中国分部主任维经斯基^②的谈话。
5. 致第三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贺词。
6. （1926年2月）18日电报。
7. 同联共中央委员斯大林的谈话。
8. 第三国际答复我们声明的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9，第 30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3 号 （特字第 17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5 月 6 日子莫斯科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温

^① 除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外（见第 14 号文件），胡汉民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报告的其余附录材料都没有找到。又见第 9、18—24 号文件及本文件注（见本书第 239 页注^①）。

^② I. H. 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主任和东方部下属远东部主任。

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 (1) 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

(2) 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

抄送：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57、5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4 号 （特字第 18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5 月 6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 外交人员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1. ---〔2〕（1）允许维经斯基同志等到布勃诺夫同志回来时再动身。

（2）同意加拉罕同志就国民军代表同张作霖谈判问题提出的意见^①。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维经斯基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60、6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5 号
（特字第 19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5 月 13 日于莫斯科

听取：4.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
（1）关于奉天的建议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4——〔2〕（1）批准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为同张作霖谈判拟定的以下指示：

①就张作霖建议^②的第一条说明，他的表述带有非国家性质，

① Л. М. 加拉罕的建议没有找到。

② 建议没有找到。

我们以苏联政府单独声明的形式提出另一种表述，说明它过去不干预，将来也不会干预中国和满洲的内部事务。

②接受关于交换外交代表的第二条，采用张作霖的表述，把这一条作为条约的第一条。

③关于第三条，认为在北京政府不反对的情况下，可以从应付给中国的中东铁路纯利润中提取 500 万卢布给张作霖。认为不能满足张作霖关于从中东铁路利润中再给他提取 500 万卢布的要求。

④关于第四条，出售武器问题不写入条约，只作如下口头声明：这是商务活动，张作霖可以同苏联有关经济机构就购买武器事宜进行谈判。

⑤在谈判中我们要提出以下要求：(1) a. 终止为苏联公民制定的特殊制度；b. 中东铁路地区的工会机构和文化机构彻底合法化。

(2)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时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同日本开始谈判，为此要利用我们作出的让步和我们同张作霖在奉天进行的谈判。

(3) 让克拉科韦茨基留在奉天。

(4) ①认为有必要提取中东铁路利润中属于苏联的那一大部分用于苏联的国家需要。

②责成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弄清这部分利润目前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及这部分利润可在多长期限内和多大数额内用于实现全苏联的目标，并向中央政治局作出报告。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马克西莫夫同志（劳动与国防委员会）——（4）；

温施利赫特同志——V. 15 全部；

波斯尼科夫同志——（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64—6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2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

1926 年 5 月 17 日于莫斯科

〔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①

一、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的两条发展道路

1. 近年来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发展，把提出和解决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近期发展前景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这方面，近来相当明朗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起了作用。在过去的 1925 年，由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华南（广东、广西）成立并巩固了左翼国民党政府。

国际形势的变化表现为：欧洲出现了稳定局面，签订了洛迦

^① 文件标题是根据 A. C. 布勃诺夫 1926 年 5 月 17 日给斯大林的附函标出的（俄罗斯总统档案全宗 3，目录 65，卷宗 563，第 122 页。）

诺协定^①，英帝国主义在华作用受到削弱，而日、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却得到加强，这些变化将来有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改变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因此，不能不考虑国民军遭到失败和像吴佩孚这样的中国军阀统治中的中心人物取得胜利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情况目前向有组织的国民革命力量提出了中国的两条发展道路问题。

2. 中国的两条发展道路问题是在近年来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提出来的，它是中国革命政治的基本问题。

广州不仅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巨大成果，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国民运动的这样一种发展类型，一旦它推广到全中国，就能保证国民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广东革命斗争刚开始时，工人阶级作为决定性力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今举世闻名的香港大罢工为成立和巩固由三种力量（即工人阶级、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组成的政府创造了条件。香港罢工捍卫了广州左翼国民党政府，使之免遭香港帝国主义的侵犯，并使广州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加强，使国民政府能够站立起来。工人阶级在广东同香港代理人的战争中也起了突出作用。它还推动广州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深入到广东的农民群众中去。

现在国民革命政府已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展到两广地区，它得到了三种力量联盟的支持，而在这个联盟中工人阶级起着这样一个组成成分的作用，它没有要求现在就实行自己独立的阶级纲领，而是无条件地支持华南的国民革命政府。与此同时，由于吴佩孚取得了胜利，中国反革命势力的组织越来越锋芒毕露，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改变，因而出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① 见本书第194页注①。

如果说第一条道路已在广州有体现，那么第二条道路则可能在中国北方和中部的某一个核心军阀人物（吴佩孚、孙传芳）身上得到体现。

如果说第一条道路只能是国民革命在工人阶级、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民实行联合（三种力量联盟）的情况下取得全面胜利，那么第二条道路则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靠与世界帝国主义的最主要集团串通一气（两种力量联盟）取得胜利，而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必须着重指出，华中的情况与北方具有基本上共同的特点，同时也有区别。

华中集中了大工业企业，有两个工商业中心（上海、汉口），集中了大量无产阶级，有相当发达的工人运动和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这里还集中了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利益冲突，民众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这就使中国的这一地区成了国民革命基本力量将来发生冲突和军阀集团（孙传芳、吴佩孚）将来进行角逐的场所。

现在就可以预见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两条道路的竞争，会在某种程度上给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发展时期打上烙印。

两种政治局势（北方和南方）

3. 中国的被肢解决定了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政治局势：一个是（包括华中在内的）北方的政治局势，另一个是与它不同的华南的政治局势。

弄清楚（北方和南方）这两种政治局势中每一种的实质，是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华南集中了国民革命的主要有组织的力量。这里有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在运作并在日益得到加强。华南政治局势的基本点是，华南已经度过了某些中国军阀（军事买办）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时期，走上了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化的道路，也就是渡过了买办战争的时期，走上了开展国内

战争的道路。

与此相反，在中国北方，至今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仍接连不断，这些军阀都是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在客观上代表着一些阶级的利益，但总的来说他们与这些阶级联系薄弱，同时它们也受到帝国主义的某种左右。现在中国北方还经历着买办战争的时期，这种战争不易将基本民众拖入进去。中国北方国民革命的发展必然要经历把买办战争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战争的时期。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将广大民众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逐步加强国民革命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前提。

国民革命的困难

4.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与胜利问题有赖于克服国民革命运动道路上存在的困难。

主要困难是：（1）中国经济落后；（2）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经济成分；（3）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太发展的产物，中国居民的阶级分化不甚明显；（4）国民革命的基本社会政治力量组织性不强。

在中国土地革命胜利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一些大的困难也属于主要困难。中国的整个经济极其落后，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百分之五十是佃农和半佃农，农业技术原始，农业人口过剩，同时商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也为中国土地革命设置一些障碍。

中国的土地革命，由于客观形势，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制度、大土地占有制（在中国有其残余）、小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所谓的豪绅，以及商业高利贷资本和农民中的富农上层。

中国的土地革命只有在基本农民群众团结在土地革命口号周

围并同工人阶级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发展和赢得最后胜利。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并有大量半封建残余，实现这种工农联盟是有阻力的。

在中国，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的困难，一方面是产业无产阶级人数少，组织性差，工人运动不够发展，另一方面是农民在政治上落后。

国民革命的矛盾

5.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基本矛盾问题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

在中国北方，中央的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垮台，买办战争连绵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矛盾是正在觉醒的中国的利益同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在这种矛盾范围内，也有中国军阀制度与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发生和发展。

在中国南方，存在着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矛盾则是：（1）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制度陋习之间的矛盾；（2）在国民革命中一起工作的基本力量之间，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3）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同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4）日益发展壮大的产业无产阶级同有外国帝国主义撑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特别重要，应该专门谈谈城市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于，无产阶级参加南方革命，无条件地支持广州政府，同时力求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充分保证它取得彻底的胜利和进一步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但常常向买办资产阶级方面摇摆。

三种力量联盟和“左”的危险

6.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革命胜利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加强（工人阶级、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民）三种力量的牢固联盟。

一分一秒也不应忽视这样一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不仅能够率领农民基本群众前进而且还能保证城市小资产阶级跟它走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来说，主要危险是“左”的危险。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尽全力在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过程中保证这场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和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不应在目前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

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会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并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制度的陋习，这些都会加剧国民党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矛盾，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的危险。

因此，目前对于国民革命来说最大的问题是：1. 国共关系问题；2. 国民党内部左中右关系问题；这致使我们必须对国民革命的主要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作出估价。

二、国民革命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

广州

7. 这些力量是：（1）广州；（2）共产党；（3）国民党；（4）工会；（5）农民组织。

8. 现在广州还处于过渡时期。同香港公开代理人的直接内战已经结束，但创造一些基本前提来充分保证国民革命政府能够完全着手建设国家机关、整顿经济等工作还远未结束。广州的预算充分反映了这种状况：4/5 经费用于军队，1/5 用于官吏和国家机关的整顿等。

尽管如此，广州毕竟是国民革命的巨大成果。实质上它是中国历史上近十年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真正成果。广州的左翼国民党政府是以（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种力量联盟为支柱，但它与广东农村的联系还很薄弱。

现在政府正在作很实际的尝试，向建立（国家机关、税务、财政等）机制性工作过渡。国民革命政府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广州国民革命军。这是一支很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它对国民革命的发展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果不注意到广州政府目前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那就不能对广州政府的稳定性作出正确的估价。3月20日行动极其尖锐和明确地暴露了这些基本矛盾和困难。它突出说明，“左倾”危险是领导国民革命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广州之所以是国民革命最主要的有组织的力量，不只是因为在广州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而且也是因为广州是个中心，集中了国民革命的主要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

共产党

9. 共产党是最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造就着自己的干部，并率领群众前进。现在共产党的工作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相当稳定的组织形式。近半年来，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党员数量已增加到一万人，而且主要是靠吸收工人分子增长的。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它不遗余力地协助国民党向农村渗透。共产党的农民党员数量不大，但是它现在就在做农民的工作，而且工作范围在不断扩大。

毫无疑问党热衷于搞军事工作，而且将这项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中。与此同时，党对发展党内教育工作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广州政府的国家机关工作也没有给予应

有的注意。

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和深化、改进和加强党内教育工作。

党在组织共青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近中国共青团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在许多工作领域十分活跃。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存在任何重大的意见分歧。但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有某种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尽管取得一些成就，但还应该指出，它还是个年轻的尚在形成中的组织。

3月20日行动再一次突出说明了国民党组织的软弱（下面再讲）和中国共产党不太善于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利用自己的影响。

基于业已形成的局面，对3月行动本应在没有群众和武装力量参加的情况下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但这绝不排除施加有组织的社会压力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现在在这次行动中再一次暴露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缺点。国民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止一次地使国共两党面临这种任务。而这种任务只有内部团结的、联系群众的、同时能够运用灵活的政策和善于利用各种策略手段的组织才能完成。

国民党

10. 国民党左派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它的实力不大，国民党左派至今还是一个上层组织，内部组织性和同群众的联系还很薄弱。

国民党过于迷恋军事工作，应该把它的力量集中到巩固（广州的）国家机关方面，以及对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工作上。

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国民党左派做工作，现在不仅应该争取在国民党左派中加强共产党的影响，而且还要通过对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直接加强国民党本身。如果说国共关系对于国民革命的发展

来说是一个极重要问题，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则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问题。国民党已经不统一，现在右派肯定试图把国民党中央拉到自己方面来，并走上单独组织自己力量的道路（试图建立自己的中心：在西山举行会议，今年3月底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①；试图通过孙文主义学会在军队中扎根；试图影响国民党著名军事领袖等）。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阻止国民党右派同国民党左派彻底决裂和走上组织独立的道路的任务还没有失去其意义，因为独树一帜的国民党右派将是吸引反革命分子的中心。但与此同时，必须坚决制止右派的反革命企图，要把最活跃最顽固的右派分子开除出国民党。

现在就应当采取措施取消国民革命军中的孙文主义学会。取消方式应视情况而定，但考虑到广州的现状，最合适的方式是学会自行取消^②。

工会

11. 目前中国工人运动正处于为日常的利益进行小规模激烈斗争的时期，这种斗争往往超出纯经济纠纷的范围（例如近几个月在上海就是这样）。

工会组织还处于其发展的起始阶段，还不是很稳固。工人群众时而涌向工会组织，如在去年5、6月间的上海事件时期和在天津，当国民军进入该市之后；时而离开工会组织，如在上海，当罢工结束以后和在天津，当国民军离开该市以后。

工会组织的群众工作和同群众的联系还很薄弱（不了解群众生活，不了解群众的日常利益，往往不善于“抓住”这些利益等

^① 1925年11月23日一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附近的西山举行会议，然后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党部”，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这批分裂主义分子在上海举行单独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与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正式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相对抗。

^② 1926年4月20日孙文主义学会宣布自行解散。

等)。在广州，工会组织几乎不领导工商企业的日常经济斗争，不做工会组织的联合统一进而组成更大单位的工作。作为工会工作的重大疏忽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广州工会中心忽略了对那些加入机器工会^①的大企业的工作，把机器工会让给了国民党右派。

在这方面，必须把所谓的中国“工会中央理事会”^②从广州迁到另一个城市，因为它设在广州，同全国职工运动完全断绝了联系。

农民组织

12. 中国的农民运动同封建主义时代的农民战争有许多共同点。

农民运动席卷了数千万农民群众。加入各种秘密农民会社（“红枪会”、“元老会”、“大刀会”等）的人数大概不超过一百万。但农会（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速度很快，秘密会社（老的农民组织形式）（部分地，有时是全部地）加入了农会。这种情况表明这种新的群众性农民组织形式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虽然这种组织形式还不很明确，在政治上还没有定型。

农村大私有者、地方当局和军阀不仅试图通过摧毁农民组织来扼杀农民运动，而且利用一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依靠所谓的民团。

民团与吸收大量小农业生产者（主要是佃农和半佃农）参加的秘密会社不同，多半由农村的堕落分子组成（雇佣关系）。

在中国农村展开的阶级斗争中，民团是农村上层（地主、豪绅、农村资产阶级）统治的武力支柱。

在中国农村起很大作用的是土匪，近年来土匪活动已很普遍。

^① 广东机器工会成立于1921年4月，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

^②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译者。

目前，国共两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掌握农民运动（广东也是这样）。

国民党需要把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拖入国民革命运动，同时，应尽最大努力掌握农民群众及其组织。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党。国民党作为革命党，其未来取决于它的农民政策和它的农村工作开展情况。

三、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

国民军

13. 国民军是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它客观上扮演着国民革命运动一个因素的角色。一年来，在同奉直反动联盟的冲突中，它扮演了这个角色，表明了自己的作战能力并且现在仍保持着这种作战能力。但是国民军的内部状况，特别是它的政治面貌，它的领袖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它的将领和军官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不能使人认为它是符合国民革命运动武装力量的所有要求的。此外，目前国民军正处于很困难的战略地位，没有很广泛的物质基础。

冯玉祥

14. 冯玉祥是中国北方和中部国民运动最著名的军政人物。他不同于中国的那些只把军队看作是有利可图的商业企业的平庸军阀，但是他的意向不明确：他与国民革命运动有联系，但他对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是一样。虽然冯断定国民军第一军是统一的，但不符合实际；他的右手张之江（张家口督办）是个敌视政治工作以及我们教官工作的反动分子，此人被牧师包围，吸引着部分将领。

同国民军的关系和当前的措施

15. 应该认真研究冯和他的军队，为此需要：（1）在冯周围安排自己的人，向他提供著名的政治顾问；（2）改组和认真安排教官工作；（3）把军事工作和向国民军的渗透工作作为国民党的当前任务；（4）力求在军队中建立模范部队（师和黄埔类型的学校）；（5）继续提供我们的物质援助。

当前改善国民军状况并使之符合国民革命运动目标要求的措施是：

（1）守住南口阵地以保住察哈尔、绥远和甘肃省地盘；

（2）改组这些省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机构以增加来自地方的经费收入；

（3）调整军队人数，使之减少到与所占地区资源相适应的数字，办法是裁减部分新建武装部队人数，部分人转到劳动岗位；

（4）改编军队，加强军队的作战训练；

（5）本着国民革命运动精神在军队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并制订军队的政治纲领；

（6）根据国民军司令部顺利实行所拟措施情况，提供射击武器（首先是弹药和部分机枪）方面的物质援助。

广州军队

16. 广东的国民革命运动使广州国民革命军在同部分军阀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这支军队，就其性质而言，与中国其他地区武装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即（1）国民革命军中设有政治部、政治委员和本着国民革命运动精神有组织进行的政治工作；（2）有集中统一的管理和供应，虽然国民革命军的兵员补充也和中国其他军队一样，是通过将领招募雇佣兵形式进行的。

广州今后的军队建设

17. 在中国目前形势下，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企图扼杀中国国

民革命运动，它的下一个打击对象将是日益发展的华南国民革命运动。

因此，鉴于国民革命军比较弱小，为保存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必须采取两个互为补充的办法：把与广东相邻省份和长江流域省份的军阀，特别是孙传芳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同时要积蓄力量，建立一支能够进行北伐的军队。

四、对我们工作的评价和实际结论

总的结论

18. 使团对我们在华工作安排进行调查后得出以下结论。

在我们的政策方面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部分在华工作同志有对现有力量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展速度估计过高而对国民革命道路上的困难估计不足的倾向，其表现是，对国民军这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因素估计过高，试图在1925年秋成立国民党（委员会）政府并拟（在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调一个广州师去同张作霖作战。

(2) 必须有步骤地（对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实行积极灵活的政策。在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国民军的同时，不要忘记，国民革命运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运动中的有组织社会政治力量的发展。无论在我们在华工作同志那里的某种“军事倾向”，还是在国民党那里的这种倾向都必须加以根除。

(3) 要注意到，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由于国民革命运动力量的发展和运动规模的扩大，正在改变策略，试图把中国反动派组织起来，积极促使张作霖同吴佩孚达成妥协。

我们的政策是积极加以阻止。

力求通过同日本和张作霖的谈判打破日英之间以及张作霖吴佩孚之间初步达成的协议，防止将其变成哪怕是临时性的妥协。取

消香港罢工将有助于这项工作。

(4) 考虑到最近中国各军阀集团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要特别注意整个直系派，特别是吴佩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展，以及买办资产阶级一军阀反动派的发展，目前这个反动派比毫不掩饰的军阀张作霖要危险得多。

使团认为国民军同张作霖实行妥协并同其余军阀(孙传芳)进行谈判的方针是最适宜的。

(5) 根据我们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的总方针、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危险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嚣张，要坚决放弃在中东铁路上实行最后通牒的政策，争取与张作霖和日本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解决有争议问题。

(6) 考虑到，一方面是广东内部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中国其余地区事态的发展(吴佩孚力量的增长)，必然会推动广州积极参与，而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领导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争取扩大和加强广州对相邻省份的政治影响，阻止吴佩孚在这些省份的势力的扩大和加强。通过同部分省份和军阀的谈判和协商，特别是同孙传芳的谈判和协商，为防备直系人的进攻或进行所谓的北伐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7) 要提醒我们在广州的同志注意，必须更广泛地把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及其组织中来，必须加强共产党在工人阶级群众及其工会组织中的影响。

(8) 结束香港罢工。香港罢工是在国民革命运动高涨时发动的，现在它一方面变成了同盟歇业，另一方面变成了封锁香港的手段，没有明确的发展前景，一旦发生内部磨擦，它可能成为对国民政府的一个威胁。

组织结论

19. 在组织方面，必须十分认真地注意以下方面：

（1）争取使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工作（共产国际的工作、军事工作、商务代表处工作、领事工作等）更加协调一致。

消除全权代表处工作的无计划性和手工作业方式。

（2）对广州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把对它的领导工作与我们在全中国的政策结合起来。

（3）要在我们全权代表处在中国所奉行的政策问题上（如在军政工作中、在同部分军阀的谈判中）同国共两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4）除派军事工作人员外，认为有必要派一些民事部门的顾问。

要紧急向广州派遣财政、经济管理、国家机关组建、养蚕业和市政建设方面的顾问（5人）。

如果同冯的谈判有好的结果，要根据他不止一次的要求，向他那里派去我们一名很有威望的政治顾问。

共产国际的工作

20. 使团认为成立远东局是恰当而适时的措施，必须特别重视挑选该局同志的工作，以保证有真正坚强稳定的政治领导。

除成立远东局外，应该承认有必要派遣一些同志去加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首先向广州派遣）。责成组织局筹备此事。

情报侦察工作

21. 应该承认，对整个情报工作，特别是对侦察局、外事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侦察工作的组织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侦察机关对满洲和蒙古情况的介绍还是令人满意的，但对我国其余地区情况，对那里正在进行斗争的集团情况的介绍则是很不令人满意的。

全权代表处的政策和我们的军政工作往往是以一些时断时续

偶然得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为依据的。

此外，在北京也没有组织好对材料的整理工作和对这个国家情况的研究工作。

侦察局花大量精力研究总的经济状况，外事局根本不整理材料，而全权代表处对目前事态的通报要晚一个半到两个月时间（全权代表处通讯）。

此外，必须指出，在侦察局和外事局的工作中有许多重复现象，在不必要的浪费外汇。

以后必须：

(1) 对（侦察局、外事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侦察工作作出这样安排：对中国北方（满洲、蒙古）情况，要从苏联防卫利益的角度作出介绍。而对整个中国情况的介绍，要着眼于我们所实行的积极对华政策的需要和研究那里的斗争力量的需要。

(2) 在全权代表处设专门机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

(3) 建议军事部门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就进一步协调工作和排除重复现象进行协调。

领事工作

22. 现有领事网不能比较令人满意地覆盖我们在华的工作。它根本不符合我们现实政策的需要。

领事馆的人员组成，除少数例外，都是很弱的，不能成为我们的信息来源和决策机构。

必须承认，领事网应在最近期间（按使团拟定的计划）予以扩大，而人员组成应尽快予以加强。

商务代表处工作

23. 使团认为，对我们商务代表处在华工作的政治意义确实

估计不足，为了实行我们的对华政策可以利用这项工作（同商界的联系，同农民的直接关系等）。

外贸人民委员部必须认真注意驻华商务代表处的工作。应当加强商务代表处的领导机构。应当给商务代表处提出有步骤地领导我们在当地的商务工作的任务。鉴于在我们的在华商务工作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深入到地方经济中去”的问题和“内部储备”（北满大豆、汉口地区茶叶）的问题，建议外贸人民委员部专门研究这些问题。

鉴于我们在广东的贸易进行得很不正常，损害了广东民众对苏联的信任，建议石油辛迪加向政治局提出报告，说明目前我们在广东的贸易状况。

五、军政工作

北京领导机关

24. 应该承认北京军事中心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它对中国总的形势，对国民军各军之间的关系和每个军内部的关系分析得很不清楚，不会安排教官组的正常工作并给它们提出切实可行的任务，教官组的工作大多是放任自流和碰运气。

在第一军中，过高地估计了通过军事教官的工作向其中渗透的实际可能性，在第二军中，采取了实行统一军队的方针，而实际上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军队，这就把我们的工作引上了歧途。

北京领导机关的结构和职能

25. 北京中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同教官组和政治领导机构（全权代表处和鲍罗廷）没有明确的业务关系，几乎始终处于不固定的中间地位，没有明确的职责和同全权代表处的职能分工，这对工作的组织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工作的开展。

教官组工作

26. 由于偏见和缺少北京方面的领导和指导，教官组开始工作时就向中国司令部提出了广泛的改组方案和参与军队管理工作的要求，在第二军中还提出了参与省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的要求，这立即引起了中国将领的警惕，妨碍了后来的工作。教官组没有考虑到，它们工作的基础应该是消除相互的隔阂，接近一些指挥官和赢得工作上的信任，哪怕是在很小的实际工作中，它们也没有考虑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向更重要的组织工作和业务工作过渡。

教官问题

27. 北京按照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要求派遣教官的申请，从原则上讲这些申请是同中国将领协商的结果，但实际上，从教官的数量和专长来看，这些申请没有反映出军队的需要和将领的要求。

此外，在同我们谈判时，中国将领的主要考虑是争取物质援助，他们把教官看作是附带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安排教官的工作。

由于急于派遣，教官的选择带有偶然性。在一些组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口业务，没有统一的处理工作方法和固定的工作程序。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都缺乏事先的指导。

教官组里的高级指挥官过多，没有足够数量的射击专家，如机枪手、军械和炮兵技术专家，这些人可以立即在军队中派上用场。

国民军第一军

工作成果

28. 教官组赢得了工作上的信任；根据它的倡议，成立了中下

级指挥官培训和进修学校（约有 700 名学员毕业），还为 700 名学生开办一所学校，后来变成了黄埔军校。如果不算骑兵的话，教官没有被允许参加组织工作，教官组参加业务工作也不是全部，不是在所有场合。中国军队司令部的业务会议，没有吸收我们的顾问参加，也很少向教官组领导通报中国司令部在组织方面和业务方面的考虑和计划。由于参加作战行动和第一军政治方针的改变，我们的工作组织上没有得到加强。

军队离开北京后，指望得到我们的物质援助，因此教官工作有可能恢复。

国民军第二军

29. 教官组不了解军队的内部派系情况，它希望同司令部保持良好关系，但没有找到正确的行为方针。教官组由于同反对派和张之江有来往而在督办那里名声不好，并遭到吴佩孚派将领的敌视，它未能也不可能同国民党人和军队的基本核心建立联系，帮助组建和巩固军队。应该承认军事工作和教官的成果是微乎其微的。

随着第二军的被歼灭，教官组工作自动停止。

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

30. 在第二军中政治工作被完全取消。

在第一军中为鼓动工作和（在学校里的）部分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鼓动工作不是经常性的，而主要是在作战期间作为提高部队士气和激发民众情绪的一种手段。

没有建立政治机关，也没有政治工作组织。

广 州

31. 在广州，我们教官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国民革命军

在黄埔军校和黄埔部队中的产生、同反革命将领作战的顺利进行、军队在领导和供应方面向集中统一管理过渡、武装力量的改组、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建立，总之广州的整个军事生活都是在我们教官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教官们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以致他们取代了中国的司令部。许多教官由顾问变成了总部、海军和一些管理部门的首长。

除了成绩外，还必须指出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是：

(1) 没有预料到国民政府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

(2) 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程度。

(3) 不善于预先揭示和及时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失行为，而这种行为在三月行动中暴露得很清楚。

(4) 军队集中管理（设总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暗中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制度所特有的习惯做法。

(5) 在将领们周围有过多的监督他们工作和对其工作施加影响的机关（在作战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权签发每道命令，在军事机关中，政治委员有否决权，俄国顾问常常把自己突出到首要地位，而在某些场合，甚至直接发号施令）。

(6) 在诸如帝国主义、农民问题、共产主义等问题上没有始终正确指导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这些过失行为歪曲了基本上正确的军事工作方针，并给反对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反对派在将领和军官阶层中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过多的口实。这些错误无论如何应该加以克服。首先应该消除顾问突出自己的做法，更不要说直接发号施令了。同时，应该削弱政治委员对将领的监督，在宣传鼓动工作中，也应该表现得更谨慎些。要争取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为对军队管理制度作出一系列

修订做好准备。这项工作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进行，理由是军队已经巩固，其中的政治工作已得到发展，军官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并在完全捍卫国民革命的利益。

在以后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官组的任务并制定教官条例和在华工作条例。

党的军事工作

32. 党的军事工作^①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还在探索组织形式。

这项工作的最大缺点是，除部分联系外，缺少正确提出的瓦解敌对派别的工作，缺少同农民武装的更牢固的联系。

在党内有采取掠夺和恐怖措施的倾向，在目前条件下，毫无疑问应该承认，这是危险的和有害的。

物质援助

33. 物质援助是我们同中国将领之间关系的基本因素之一，应该把它看作是我们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而在有利的形势下，也是向国民军渗透的一种手段。

我们在拨出器材时，实际上只考虑在政治上是否得当。由于对中国司令部的组织计划和作战计划了解的不够，以及军队的实际状况，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援助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否得当，对这种援助的分配和使用是否正确。

34. 在多数场合，我们的援助在时间上赶不上需要，提供的速度不是很快，原因是：

(1) 我们不了解中国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组织计划以及它的

^① 指中共的军事工作。

意图。

(2) 我们对同国民军联系的可靠性和它们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忠实程度没有把握。

(3) 器材调拨没有计划性，而根据北京^①的要求在逐渐增多。

(4) 北京的申请是总量，实际上是机械地转递中国将领们的申请，没有加以审核。

(5) 我们运往库伦的运输工具和中国司令部运离库伦的运输工具安排得不够。

35. 在我们的年度工作总结中，必须承认，物质援助措施在政治上是得当的，实际上加强了国民军第一军这个反帝的，客观上促进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力量。

同时必须提出，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物质援助来加强我们和国民党在国民军中的影响。

附带应该指出，北京的同志们滥用了对中国将领的物质援助的承诺，在后来的关系中造成许多严重不正常现象（冯、岳维峻、张之江滥用鲍罗廷、格克尔和沃罗宁的承诺）。

36. 应该承认对广州的物质援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提供时间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今后必须加以克服。

建议

37. 尽管有许多大的缺点，我们的军事教官工作和物质援助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在聚集和改组它的武装力量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为了整顿和正确安排将来的工作，必须：

在北京建立非常有威信和有工作能力的军事中心。

制订关于驻北京军事领导人的职责及其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

① 指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机构。

的条例。政治领导人要为所实行的措施在政治上是否合适承担责任。军事领导人（武官）要为对军事教官工作的领导及所提出的措施和建议在军事上是否合适承担责任。

在北京领导机关与各教官组之间，特别是与广州之间建立定期的联系和通报制度。

使团认为今后，只有在有具体要求并说明要做什么工作的情况下，向中国派遣教官才是适当的。

所有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必须预先接受训练，至少要在军事学院东方部上短期学习班熟悉中国情况。

挑选教官应严格逐个进行，要考虑其专业技能、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

最近要制定在华教官的工作条例。

对全体军事教官要进行一次审查，拟定对他们的更新和充实方案。审查工作要在布勃诺夫同志使团工作的基础上进行。

鉴于教官工作只有在配备可靠的和相当熟练的翻译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有益的和有很高效率的，责成拉狄克同志特别注意在中山大学培养翻译工作。

使团认为向国民军提供物质援助以及将来向其他集团提供物质援助，只有在有以下保证时才是适当的：这种援助能被用来加强我们的影响和为国民党的工作和影响创造相应的条件。

在党的军事工作方面，（通过共产国际）建议国共两党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

组织对反动军阀集团的瓦解和宣传工作。

同农民武装建立联系，以便为国民革命运动利用它们。

赋予工人纠察队以工人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的自卫工具性质。

以布勃诺夫同志使团的材料为基础，为中国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制订克服业已暴露

出来的缺点和正确安排将来的工作的具体建议。

布勃诺夫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 3，目录 65，卷宗 563，第 12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7 号 （特字第 21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5 月 20 日于莫斯科

听取：1——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1）伊万诺夫斯基同志使团报告（报告人：布勃诺夫、列普谢、契切林、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同志）。

决定：1——（2）（1）布勃诺夫同志报告备案待查^①。

（2）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同时建议它加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实行孤立国民党右派的方针。

（3）给俄国驻广州共产党员发去联共（布）中央反对监护中国工作人员的秘密信^②。

（4）中央保留我们目前对张作霖的政策方针仍然有效。

① 见第 52 号文件。

② 信没有找到。

(5) 建议冯^①同意暂时同张^②接触，并利用这种接触作为改组国民军的喘息时间。

(6) 建议冯到军队中去。

(7) 告诉冯，我们现在不能向他提供他要求我们提供的援助，我们只能给他最低限度的援助（其规模应由政治局确定）。

(8) 同冯的会面不见报。

(9) 在同张谈判时要利用我们同冯的接近，以加快这次谈判进程。

(10) 立即解决火油问题^③。

(11) 针对佩京的电报^④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进行调查，并在政治局下次会议上提出报告。

(12) 中国委员会要研究我们在华军事工作人员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

(13) 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14) 责成组织局为领事工作和驻华顾问工作挑选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

(15) 建议中国委员会研究布勃诺夫同志使团的材料，作出一切必要的具体结论，并向政治局报告。

抄送：

布勃诺夫、温施利赫特、伏罗希洛夫、契切林、维经斯基同志——全部；季诺维也夫——（2）；莫洛托夫——（3）、（12）；加米涅夫——（10）；组织局和格伊——（14）。

① 冯玉祥。

② 张作霖。

③ 可能这里谈的是取消火油专卖问题，见第 31、53 号文件。

④ 电报没有找到。И. П. 佩京时任西伯利亚军又司令。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74 - 7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8 号 （特字第 22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5 月 27 日于莫斯科

听取：〔3〕——关于中国问题。（2）国际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李可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批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见附录 1）。

抄送：温施利赫特、戈尔布诺夫、布留汉诺夫。

听取：（3）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5 月 20 日会议第 27 号记录，决定：1——〔2〕——（2）〕，（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3）——①重申政治局今年 5 月 20 日对冯的决定〔第 27 号记录，决定：1——〔2〕——（2）〕^①。

① 见第 53 号文件。

②特别要告诉冯，对他的援助体现在什么地方(政治局今年5月20日的同一个决定)，为此，中国委员会要在星期一以前向政治局提出明确的决定。

③责成温施利赫特和契切林同志会见冯，弄清他在能否很快返回军队问题上的真正意图。

④扣发冯的声明^①，责成温施利赫特和契切林同志同他交谈在中国实现他的任务的另一种方式。

⑤由温施利赫特同志负责对冯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周到服务，还责成他在星期一^②以前向政治局提出关于我们向冯那里派驻政治顾问的人选建议。

抄送：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即1926年5月31日

第 28 号记录，决定：

1—〔3〕（2）

附录一。绝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李可夫同志
委员会 1926 年 5 月 17 日会议
第 11 号记录（摘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6 年 5 月 27 日批准）

听取：1. 关于补偿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给“K”^①的物资的价值问题。

决定：1—（1）批准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出 225 万卢布补偿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给“K”的物资。

（2）认为需要按照政治局委员会 1926 年 4 月 28 日决定在本预算年度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出 325205 卢布用于结束向“K”运送物资的工作。

（3）认为在以前向“K”运送物资所耗费的 1309096 卢布中有 985899 卢布 64 戈比的数额应同交通人民委员部结算。

（4）建议政治局，在除上述用于部分补偿发往“K”的物资的价值的数额外，必须在本预算年度中再给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 500 万卢布，用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的出口奖励贷款支出，这 500 万卢布用于军事订货，其性质和规模由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管理局商定。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77—78、80—81 页。

^① 原文如此，按意思是指中国。

打字稿，原件，斯大林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55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①

(摘 录)

1926年5月30日于广州。

亲爱的米哈伊洛夫^②同志：

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是同冯玉祥谈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被建议休假一段时间，如果能办得到的话，要预先拿走他那里的档案。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这样一来，可以认为对危险的右派集团的打击已成既成事实。5月30日，即逮捕吴铁城之日，不只是对3月20日的补救，而且对国民党中央全会5月15日决议^③的涵义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右派把3月20日理解为向右转，而中央全会是完成这次转变的手续，那么今天他们会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全会关于调整同共产党人关

① 据Ф. С. 鲍罗金娜1926年7月3日给加拉罕的附函判断，这里发表的文件是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的摘录。鲍罗金娜写道：“您可以从密电中了解信的结束部分，而其详细内容随下次邮班寄去。”信的结束部分没有找到。

② И. М. 加拉罕。

③ 指1926年5月15—2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旨在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作用的《整理党务案》(见《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翻译资料)，第318—323、325—326、335—339页)。

系的决议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人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他们无法利用这些误会来达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

其实，今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右派软弱无力的具体体现。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他们反对我们，似乎是为了挽救党使之免遭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控制。这是一个使他们得以把一些诚实的国民党人集合在他们周围的口号，因为这些诚实的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上述决议通过后，这种害怕心理大为减少，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再说一遍，他们被剥夺了用来反对我们的主要的和很方便的武器。现在他们受到打击，也无法诱过于共产党人。

决议通过后，右派对待这些决议很认真，把它看作是履行3月20日政变的手续，以为他们在党内的权力会增大，将在党内占据相应的部长职位，同时他们在政府中的权力也会增大。但是他们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捞到，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如宣传部落入顾孟余之手，农民部落入原青年部部长甘乃光之手。蒋介石负责组织部。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对待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出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伦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

可以对情况作出以下说明：中央全会调整了同共产党人的关系（缩小了他们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地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全会结束后，中央随即举行了讨论各种问题的会议，包括讨论任命党内各部部长问题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多数左派因为不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什么准备，自然抵制对中派的一切任命。只有共产党人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准备，但也

不是全部。我不想对他们作出详细说明，怕他们泄露天机。我想，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和左派一起来参加中央全会时，会有另一种心情。他们会更清楚中央全会决议的涵义，不会再阻挠同中派的合作。

5月30日我们对右派采取了一些措施，同时还颁布了满足民众要求的法令^①。我已电告这些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是我拟定的，并在我抵达后不久就提交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等人审阅，以便巩固3月20日后在广州已经发生动摇的政治地位。这些要求大约是在两周前以商人、教师、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的^②，先是由出席这次会议的部分代表提出的，结果看上去这些要求似乎来自下面。围绕这些要求，居民中的各个阶层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旨在使其具有严肃性和引起政府的认真对待。这场宣传运动以民众通过中央向政府请愿的方式而告结束，5月27日中央将请愿书交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因为需要使答复这次请愿的法令在5月30日，即逮捕吴铁城之日颁布，所以政治委员会很快就接受了这次请愿要求，今天城里到处都张贴了答复这次请愿的法令。今天对右派所做的事情完全被成千上万游行者，被居民对法令的普遍满意心情湮没了。

上述要求分两类。一类是民众现在的迫切要求，另一类是民众希望将来实现的要求。属第一类的要求是：(1)取消火油专卖，用捐税来取代，税额未定；(2)命令外交部立即就结束罢工问题同各有关方面进行谈判；(3)更加积极地继续同土匪作斗争，在3个月内应在这方面做一定的工作，为此财政部要拨出50万元经费；(4)为解决劳资纠纷成立仲裁法庭；法庭将由两名资方代表、两名劳方代表和政府任命的一名仲裁法官组成；这不是常设法庭，它将为审理每一起纠纷临时组成。至于“民团”、豪绅与农民之间

^① 见《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翻译资料)，第378—379页。

^② 决议没有找到。

接连不断的武装斗争，法令禁止任何一方以武力来解决冲突，而由它来解决这些冲突；（5）要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根除有人经常在省为散布恶毒谣言，以破坏政府的威信、稳定和财力的现象（吴铁城第一个受到惩罚）；（6）对于民众关于杜绝侵吞公款行为的要求，法令回答说：①为更好地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行政法庭将进行改组；②答应为 500 名年轻人建立一所学校，以培训他们做民事工作。最后，对于改善教师生活状况和增加教育经费问题，法令宣布，随着土匪和受贿行为的消灭和对整个行政管理机关的整顿，政府将能抽出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教育事业。

属于另一类要求的是：建设黄埔港，建成粤汉路，修筑公路，等等。

伍朝枢未出席今天的政治委员会会议。据说，他去澳门了。但是他还没有提出辞呈。孙科从吴铁城被捕之日起表示很愿意同他的信徒和朋友们分手，完全同我们合作。他对逮捕他的朋友采取这种态度可能改变我们最初要让他去俄国一段时间的决定。如果他留下来并举止得当，就不能否认这对政府是有利的。问题在于广州人越来越少了，失去了朱培德所说的“重心”。但也没有办法，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这当然与民众无关，与一般广州人士也无关。这与广州的一批 15 年来腐蚀了这个英勇共和国的政客有关。

例如，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极可尊敬的市长伍朝枢在香港拥有财产，其价值达 50 多万元。而三民主义创始人的还比较年轻的儿子^①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分钱遗产，走出校门后，（除了市政府工作外）也没有从事过任何其他工作，但是他却有 20 多个港湾，简陋的舢板到那里停靠，要交纳贡赋。据说，国父的这个继承人

① 指孙科。

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有各种财产。他居然还在建造他父亲纪念碑上捞了一把。我这里有材料证明他是个假币制造者。除了汪精卫、廖仲恺，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在政界或军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个广州人可以说是比较诚实的。在广州人和最高尚的哲学家将军谭延闿这类湖南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广州与香港毗邻的80年，彻底腐蚀了广州的知识分子，只给他们灌输了一个理想——捞钱，不管来路如何。吴铁城就是受腐蚀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始终以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孙逸仙的信徒而自傲，实际上他只关心一点：在上海，即在法租界或英租界，拥有更多的房产。孙逸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掩饰他所作所为的一个幌子。就是这个吴铁城一直在国民党内鼓吹反共，就是他传播谣言，说什么国民党已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的以“公安局”名字著称的组织的成员参与了对继孙逸仙之后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廖仲恺的谋杀。在这个国民党中有多少败类呀！

逮捕吴铁城暂时没有在城里留下任何印象。或许这件事还不为人所知，但鉴于上述法令的颁布，居民未必注意逮捕这件事。

在香港，也还有人希望，从3月20日和5月15日（即中央全会作出调整同共产党人的关系的决议之日）起广州会向右转。但是在香港的某个地方和特别是在上海的《字林西报》^①上，有人开始说向右转只不过是一个策略手腕，旨在迷惑帝国主义者。这家上海英文报纸问道：“如果这是真的向右转，那么为什么广州政府不制服罢工委员会呢？”这家报纸不满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一些决议。对它来说都是空话。它在等待逮捕罢工委员会，之后应该用武力将罢工工人赶回香港。

至于罢工，现在情况是这样：伍朝枢通过香港或广州的某个商人团体进行的谈判破裂后，也就是政府不想为封锁承担责任，拒

① 1850至1941、1945至1951年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日报。

绝同香港政府进行谈判后，只好为同香港政府的直接谈判做准备。准备什么呢？第一，要打破香港所谓给罢工工人补偿就意味着加强和传播赤祸的宣传。香港当然不会给国民政府和罢工的布尔什维克提供资金传播其影响。从5月15日起，这种宣传已失去意义。香港报纸本身就说，“赤色磨擦”已经消除。现在民众松了一口气。当然要结束这场罢工。第二，负责进行谈判的伍朝枢和傅秉常，对待香港比对待自己的同胞更友善。有理由推测，他们已同整个右派集团一起向香港暗示，在广州现时政权执政的情况下，罢工根本不会结束，但当他们右派掌政时，会很容易达成谅解。他们与其说是谈判罢工工人同意返回香港的最低条件，不如说是谈判给国民政府的两笔贷款：一笔1000万元，另一笔1亿元。香港准备立即提供第一笔贷款；另一笔需要通过银团提供（在香港就是这样说的）。答应提供1000万元贷款的条件是，这笔资金将用于铁路建设，当然要接受英国人的监督，一分钱也不能用于罢工工人身上。这是什么圈套啊！香港说，问题不在于罢工工人。他们有足够的工人，要多少有多少，因此他们根本不关心罢工工人是否返回香港。问题在于抵制，而只有取得广州政府同意才能进行抵制。因此，如果给政府提供1000万元贷款（加上将来给1亿元的大诱饵），那么第一，这些钱不会白费，因为将用于在英国人监督下进行的铁路建设；第二，政府得到贷款后，不会继续抵制香港。而罢工工人呢？没有考虑他们。香港不需要他们。

只要能搞到贷款这样的财路，伍朝枢、孙科、吴铁城之流就垂涎三尺。但怎样取得贷款呢？在政府中有人清楚这些贷款意味着什么，他们明白在目前情况下，为1000万元出买罢工，这是最卑鄙的背叛。如果他们本人不很明白，那么他们有顾问，会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所以需要摆脱这些人。摆脱他们的顾问——这就是为什么右派极力散布旨在破坏政府本身的财政稳定的流言蜚语。由此也清楚为什么伍朝枢之流对发生3月20日事件这

么高兴，为什么现在他们死气白赖地建议蒋介石要以彻底摧毁罢工委员会，打击共产党人和顾问等行动来结束“三二〇事件”。这是最一般最简单的事情：在罢工委员会、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的影响的废墟上同香港讨价还价，并得到一笔1000万元贷款，而他们可以从中索取100万中饱私囊。

随着伍朝枢、傅秉常、吴铁城等人的离职和陈友仁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种交易即告结束，在罢工问题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今后我们直接向香港政府提出公开建议，就结束罢工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如果我们的建议遭到香港拒绝，那么大家都会清楚，香港只要求一点：国民政府和罢工委员会彻底投降。那时我们就向民众提出投降不投降的问题。如果民众对我们说，绝不投降，可以作些让步，但不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那我们就继续进行斗争，不但继续而且要千方百计加强这种斗争。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迫使香港改变其决定。

为什么香港会拒绝同我们进行直接谈判呢？有两个基本原因：1. 在广东发生许多纠纷和内讧。居民对劳资冲突不满。在农村，到处爆发内战，土匪猖獗。火油专卖给穷人造成很大损失，因为火油是第一必需品。尽管有国家的监督，但滥用公款行为仍未杜绝。在大的城市里，特别是在广州，即便在最好的军队即黄埔军中，孙逸仙分子同共产党人也在争吵。学生运动分崩离析，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在中国国耻周年日^①要举行两个游行，而不是一个共同的游行，两个游行将会以互相殴打而告结束。鉴于以上情况，香港要向处于这种混乱状态的政府作出让步。这个政府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消失并由那些容易商量的中国人占据它的位置。2. 吴佩孚在进攻湖南，唐继尧在向广西进军。在发生这种内讧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军队能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吗？在这种情况下，

^① 指1915年5月9日，当时中国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21条最后通牒式要求的大部分条款。

香港的幻想增强，认为现政府垮台的日子为期不远，到那时没有什么比结束抵制更容易做到的了。

为了消除香港的这种幻想，首先必须向它说明，广东的混乱是暂时的，采取某些措施就可以将其消除。中央全会决议起了很大的安抚作用。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还指出政府为什么以颁布5月30日法令的形式对民众要求进行必要改革的运动作出反应。这两个措施不只是安抚了居民，而且还使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有明显好转。法令在全市贴出后不久，出现了自发的奏乐和放礼花游行。居民甚至还在准备进行大型灯笼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感激之情。至于右派，他们本来要利用广东的纠纷争取更多的权力，进而同香港达成谅解，然而吴铁城的被捕，伍朝枢的逃跑，傅秉常的被免职，也使香港的其他幻想化作泡影。难怪英国总领事白利安跑到陈友仁处，惊恐不安地问：“现在你们这里发生了政变，我们将同谁打交道？”他还问：“既然伍朝枢和傅秉常不在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政府执政？迄今掌权的一直是伍朝枢和傅秉常，既然他们走了，就没有可打交道的人了。”陈友仁答复他说：“没有发生任何政变，今天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一致，更有力量；伍朝枢等人的离去没有任何意义。”看来，吴佩孚也不是诸事顺遂。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香港对我们提出的就结束罢工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作何反应。

你们知道，这次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给工人罢工期间的赔偿问题。香港准备提供1000万元贷款，用于铁路建设。我们把这个建议视为香港试图收买广州政府进而迫使它放弃抵制行动的一个步骤。如果在将来的谈判中，香港还是拒绝支付任何赔偿金，那么至少我们打算建议它购买1000万元广州政府为恢复广东的正常生活而发行的债券，实际上广州政府发行债券是为了给工人发放赔偿金，进而结束罢工。发行债券数额要多于1000万元，但香港

必须购买 1000 万元，剩余部分在自由市场上出售。

我们设想债券利息从 1929 年起开始支付，经过 10 到 15 年付清。从香港取得 1000 万元的这种方式与贷款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不对香港承担任何义务，不作出任何保证。在第二种情况下，有英国人在广东的监督。如果香港既不同意直接赔偿罢工工人，也不同意购买债券，那么我们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大批罢工工人怎么办？工人不投降，而我们又不能强迫他们这样做。因此加强抵制是必然的。需要采取某种办法迫使香港作出让步，或许，在打败吴佩孚从而消除北方对广东的威胁的时候，在内部状况变得更稳定的时候，同香港更容易达成谅解。同时不得不加强抵制行动。在准备尽量加强抵制行动的同时，也要考虑省内的各种经济发展方案，以便为罢工工人找到工作，比如建设黄埔港、建成粤汉路、修筑其他各种道路等等。但是资金暂时还没有着落。

近来罢工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除了他们每天从政府那里得到 1 万元外，他们的现金达 7 万元，还有源源不断来自海外华人的一些资金。香港的状况也有所改善。来自各地的新工人不断涌入和走私活动的猖獗，尽管有纠察队在努力工作，还是稍许缓解了香港的状况。如果关于香港航运量的数据正确的话，那么在罢工的一年间，它只损失了 1500 万吨或者是 1924 年的三分之一强，那一年的航运量是近 4500 万吨。英国政府拨给香港的 300 万英镑剩下 100 多万英镑或 1000 多万中国元，也就是说这个数额正好够提供上述贷款或购买债券。

明天或者后天将给香港发出照会，建议进行直接谈判，看它作何答复。

增援湖南唐生智和预防各方面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的远征行动，还没有进入实际实施阶段。

我已经报告过，北伐没有向前推进的主要原因是军队内部不

团结。现在军队中有三派：一派是蒋介石或所谓的党军；一派是由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和程潜的第六军组成；第三派，现在以保定派著称（因为部队指挥官都是在保定府军校受的教育），是由李济深的第四军，驻扎在广西的第七军、唐生智的第八军（现正在湖南同吴佩孚作战）和不久前在四川被打败的新盟友袁祖铭组成。至于李福林的第五军，只要它不参与争斗，对它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什么。但在过去，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我们更详细地来谈谈“党”军情况。这支军队有5个师，此外还有6000名学员。总起来说……^①这支军队是在同陈炯明进行最后一次战役之后发展到目前这个规模的。

可以认为这支军队只是在3月20日以前是党的军队，3月20日以后应把它看作是蒋介石的军队。这支私人的军队与某个将领的一般中国军队的差别在于，它的基本力量是通过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学员的招募也好，从这所军校成立之时起一直进行的政治工作也好，都给这支军队赋予了一定的、五花八门的政治色彩。这里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各种中派和右派。无论过去和现在蒋介石都不能无视党而随便调遣这支军队，但是他也一直不愿意服从党。“三二〇事件”表明，蒋介石比党更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比蒋介石更软弱。对“三二〇事件”党可以作出反应，采取一些惩戒性措施，可能蒋介石由于害怕军队中发生严重骚动甚至爆发事件而会顺从，到万不得已时他也会离开。但党没有这样做，它也不能这样做。它的领袖汪精卫一开始病了，然后彻底销声匿迹，因此党的威信丧失，蒋介石成了胜利者。他从军队中赶走了大多数政治委员，只留下忠实于他的人。结果必然是：至少由五种人（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中派、右派和被二大开除出党的一些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党不能领导军队，更不能对它发

^① 原文如此。

号施令。它只会以自己内部的深刻矛盾影响军队，瓦解军队。蒋介石想阻止这种瓦解进程，立即切断了把军队和党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组织形式。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非常高兴蒋介石采取反对党的行动。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未给军队带来平静。共产党人和左倾学员以及部分基层指挥官与蒋介石相对抗。中派和右派（孙文主义学派）要求蒋介石继续镇压共产党人甚至左派。蒋介石的处境因此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3月20日以后，他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这就是为什么他在5月15日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案，实际上这是缩小共产党人在党内权力的决议案，这些决议的目的实质上在于使军队保持平静。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派见蒋介石从3月20日走到5月15日，也就是从公开反党走到反共决议，就继续要求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可以说，他成了他们的俘虏，尽管他一再保证，他始终是革命者，永不背叛革命等，但实际上他不得不向中派和右派作出让步。所以他以保持军内团结为借口，现在已经在讲共产党人应该退出自己的党，以好的国民党左派身份工作了。当他在学员大会上提出这种想法时，左派和共产党人则更怀疑他右倾，更响亮地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他每天都向我抱怨，说什么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等等。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4，第 23—35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2 号
（特字第 24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6 月 7 日于莫斯科

听取：1——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6 月 3 日会议第 30 号记录，决定：4——〔4〕），（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1——〔1〕（1）把清偿加拉罕同志欠下的中国军政工作债务问题推迟到他提出核实材料时再讨论，责成加拉罕同志在最短期内寄来这些材料。

（2）为了核实从加拉罕同志那里收到的材料，成立由布留汉诺夫（有权由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一位部委委员替代）、布勃诺夫、斯托莫尼亚科夫和扬松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布勃诺夫同志负责召集。

（3）责成该委员会：①建立中国经费的严格使用制度和正确的开支报表制度；②审议清偿中国军政工作所需的开支和在苏联的开支问题。

（4）建议该委员会在工作中考虑工农检察院根据政治局提出的任务对同中国交往方面的开支进行的调查。

（5）责成加拉罕同志以后绝不能超越政治局批准的预算范围。

（6）中国委员会关于给军事部门拨款 210622 卢布 54 戈比用

于补偿中国人在我们军事学校里的生活和学习开支的建议，交由政治局根据本决定（2）项成立的委员会审议。

（7）同意中国委员会的建议，并向冯^①提供物质援助，向他转交按照基本计划尚未提供的其余武器和弹药，以及总额为4343617卢布50戈比的备件。

（8）责成温施利赫特同志在向冯转交物资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改编军队，加强其作战能力，减少军队人数和组成坚强的、有政治素养的干部核心，使其成为进一步加强军队的保证。

（9）责成中央书记处拟定驻华武官人选，并通过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的方式提交政治局批准。

（10）任命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为中国委员会委员。

（11）责成中央书记处在两周内给鲍罗廷同志物色负责的助手人选，以便在鲍罗廷同志不在广州时取代他。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布留汉诺夫同志——（2）、（3）、（4）、（6）；

布勃诺夫同志——（2）、（3）、（4）、（6）；

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2）、（3）、（4）、（6）；

扬松同志——（2）、（3）、（4）、（6）；

科肖尔同志——（9）、（11）；

格伊同志——（9）、（11）；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10）。

^① 冯玉祥。

1926年6月5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1 --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5 月 31 日会议第 28 号记录，决定：1 -- (3) (3)、(5)），（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 21 -- 批准桑古尔斯基同志为驻冯处军政领导人。

抄送：

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布勃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85--8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第二部分

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探索

从1926年6月到11月的这个时期，中国的事态发展，即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北伐的开始及其后来的迅速和顺利发展，又一次并且以极其尖锐的形式使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领导面临着确定和修改政治方针的任务。新的形势要求作出回答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业已开始的北伐，如何对待国民党。

对北伐的态度包括对它的军事和政治前景的评估、对它对国民党内以及整个中国今后力量对比的影响的评估和对国际局势的影响的评估。至于国民党，那么这里又出现了该党和中共的关系问题、对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态度问题。最后，事态发展进程还提出了制定中共的行动纲领问题及其在城乡群众运动中，在后方，在作战地区和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活动问题。

在各派历史学家的许多综合性和专题性著作中，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军事史和政治史（包括国民党史和中共党史）中的主要事件都有所阐述^①。这个部分的文件不仅为分析本文件集的主题——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而且还含有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起因和背景以及关于中共和国民党各种决议和行动的补充材料。同样重要的是，这里发表的文件略为说明了形成以莫斯科和中共为一方同以国民党为另一方之间关系的总的氛围。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总的说来一些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情况，对这些探索的进程和结局起着决定性影响。

客观上的因素是华南军政形势异乎寻常的迅速变化。实际上对于各种政治势力以及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决策中心来说，出乎意

① 见 M. Ф. 尤里耶夫：《中国1925—1927年革命》第323—423页；《中国现代史（1917—1927）》第241—279页；D. A. 乔丹：《北伐。中国1926—1928年的国民革命》，檀香山1976年英文版；C. 马丁·韦慕庭：《中国国民革命（1923—1928）》，剑桥1984年英文版第44—77页；《北伐战争（1926—1927）》，上海1994年中文版第102—313页。

料的是事态发展的迅速，而首先是国民革命军在北伐的头几个月取得的军事胜利：9月初逼近武汉，占领汉口和汉阳，10月上半月使吴佩孚集团遭到决定性失败，11月中又使孙传芳部队遭到决定性失败，结果敌军彻底瓦解并转到广州方面，而中国东部、西部和中部的许多大部队和军事集团采取了中立态度。正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文件（第78、100、129、131号文件）所表明的，在这方面莫斯科也不是例外，它对北伐的态度实际上直到1926年秋以前，除了其他一些考虑以外，始终顾及到国民革命军的敌人在华中和华东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其资源实力，顾及到敌人与张作霖和张宗昌集团结盟的危险性，以及英国和日本直接干预的可能性。

直到1926年11月在江西进攻孙传芳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前（起先这次战役被认为是保障广东和国民革命军在华中所占领的地区安全的一种手段），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以及中共的领导人都认为，考虑到南方部队取得这些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必要停止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和向东挺进（第93、96、101号文件）。一时对日新月异形势作出的评估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会产生某种惯性，并开始变成一种落后于事态发展的危险，这给探索政治方针的各种因素造成很大的困难。

在莫斯科、在其驻华代表当中和在中共中，给探索相适应的政策造成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因素，是这种探索的范围被框定在共产国际关于东方革命任务的一般理论原则上和根据这些理论原则制定的中国革命战略上。具体地说，决定（和束缚）这种探索的框框是：1926年7月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同“新反对派”的斗争中明确重申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以及在国民党内通过加强其强大的左派和建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的办法来改变国民党使其激进化的方针（建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是旨在保证左派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构中占居多数和党对

军队的控制), 换句话说, 也就是设法恢复“三二〇事件”以前的局面。

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活动特别有影响的一个同样重要的主观因素, 是想把根据俄国几次革命的经验得出的概念和结论照搬到中国。这一点的特别明显的表现是, 打算发展工农组织和群众性组织作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下而上”施加影响的基础, 打算建立民主政权的有威信的代议制机构。而与这一点, 以及与总的说来对中国工农运动的特点的不够了解相联系的是, 明显夸大了这些运动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盟领导下成为独立的政治因素的可能性, 而且这些独立的政治因素能够保证实现左的民主倾向, 即中国革命发展的工农前景。

事态可能朝着确立民族资产阶级独裁的方向发展。这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抉择。但事态的这种发展被认为是很不受欢迎的, 而支持这种前景的行为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 即“孟什维主义”的表现。

文件表明,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各代表之间以及他们和中共之间存在的隐蔽的和公开的矛盾给制定有效的政策造成了困难。在这方面和在所探讨的这个时期, 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内部的斯大林多数派与“新反对派”之间展开的斗争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首次发表的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活动有关的文件占了本文件集第二卷第二部分的大部分篇幅, 这个时期正是远东局工作最活跃的时期。

关于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关于远东局人员组成的决定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分别于1926年3月(第33号文件)和4月(第47号文件)作出的, 1926年6月19日远东局开始在上海进行工作(第59号文件)。

文献资料表明, 成立远东局是为了加强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

在中国以及在朝鲜和日本对中共的领导,是想让它作为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系统指导在华工作的机构。为此在被称为“俄国代表团”(与驻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名称相似)的领导核心成员中吸收了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第47、59、73号文件)。由于中国事态的蓬勃发展和一些其他原因(第73、106、138号文件),中共的活动问题占据了远东局工作的中心地位。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执委会正式参加远东局,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则参加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执委会的代表。

随着远东局在中国活动的开始,除了加拉罕在北京的机构和鲍罗廷在广州的机构以外,在上海又出现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

加拉罕在1926年10月离开中国以前一直是莫斯科其他代表的最高上级。鲍罗廷主要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以及广东的中共组织。远东局和首先是维经斯基把精力集中在对中共的领导工作和整个党的活动上。

因此,远东局的文件含有一些关于中共领导内部情况、它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以及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相互配合的性质和结果的新材料。例如,从这里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远东局对中共领导对北伐立场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第64、74、75、80号文件),它积极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7月12—15日)的主要决议^①,这些决议确定了党直至1926年底以前党的基本活动方面(第73、75号文件)。远东局与中共领导一起拟定和讨论了1926年10月上海发动^②的计划(第116号文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3—264页,关于全会的决议见B. H. 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期间的中国共产党》第2册第98—105页。

② 关于1926年10月的发动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87年中文版第5—61页;A. H. 阿本、A. H. 赫梅列夫:《三次上海起义》,载《中国问题》杂志1936年第2期第63—86页。

件)及其经验(第119号文件),随后又拟定和讨论了当时准备在1927年初召开的中共五大的文件和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交的建议(第122、123、126号文件)。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书信和关于远东局工作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军事工作方面和在工农运动中大力开展工作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的新资料。

与远东局使团1926年8月6日至9月2日广州之行有关的一组材料(第79—87、94、95号文件)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些材料大大补充说明了“三二〇事件”前后广东的局势,表明了广州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所持的立场,而主要是揭示了鲍罗廷和远东局在如何对待当时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实质。

远东局在上海工作初期就出现的这些意见分歧、远东局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党组织提出的指责,表明了当时对如何解决国民革命中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的基本方向。

上面已经指出,双方所抱的目的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恢复“三二〇事件”以前的局面,双方都同意,暂时保留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寻找消除他的军事独裁威胁的办法。双方都认为:应当利用北伐来最大限度地发展群众运动,以便在此基础上最终改变在国民党中央、在它的广东政权机关中和在占领地区左派和“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所属的“中派”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孤立和削弱右派影响的目的。

但是远东局认为,在这方面鲍罗廷在自己的计划中过分注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各种派系的“上层联合”,不相信有可能以非上层的,而是现实的、“由下面”日益发展起来的城乡群众组织为基础来建立强有力的左派,并依靠这些组织可以对蒋介石和“中派”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向左转。

同鲍罗廷的“这套观点”相对抗,远东局提出的方针是:通

过加速开展城乡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建立经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式的民主政权机构,维护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整顿税制,把捐税负担转移到城乡富裕阶层身上。据远东局估计,广东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土地改革并将反动官吏“清除出”地方政权机构的程度(第95号文件)。对中国情况更为了解的鲍罗廷在答复对他的批评时,十分准确的估计到了远东局建议的来源,他指出,对他的许多批评都是“误解,反映出对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了解不够……我们不能在这里采取我们在西方所采取的那些彻底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第79号文件)。

尽管在广州的会晤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但还是商定了在10月,即在占领湖北省的主要中心城市之后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将作出让汪精卫回国来领导党的中央执委会的决定并本着与广东的一些国民党左派所讨论的建議的精神制定党的行动纲领(第84、89号文件)。这被看作是限制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的一个具体步骤。但是,当时拟定的召开会议的方式、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党的领导机构的人员构成(拟定选入的左派占多数)表明,只有根据鲍罗廷的“一套办法”即“自上而下”的办法去做,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然而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通过选举代表的办法来建立国民党强有力的地方左派组织,这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①。

远东局回到上海并取得中共领导的支持后,在9月22日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明确表示,鲍罗廷的一套观点是与总的方针“相对立”的,并断然提出“立即撤换”他

^① 这个计划后来是以另一种方式,即在10月15—26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的方式实现的。关于会议的决议和旨在让汪精卫回国的措施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1985年版第1卷第264—296页;又见《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翻译资料)第432—451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1994年版第2卷第780—784页。

和任命“一位有影响的政工人员”来取代他的问题（第105号文件）。（莫斯科于10月15日收到这封信并散发给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维经斯基在9月25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指出，没有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和对远东局所实行的方针的评价，并表示相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在策略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他不得不承认，根据这些方针在国民革命军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碰到了巨大困难，首先是缺少经费和“中国干部”（第108号文件）。

10月22日，即国民革命军部队占领武昌之后和在准备“第一次上海起义”的过程中，仍然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远东局在给莫斯科以及给鲍罗廷、北京和汉口的电报中，提出了使工农运动口号激进化的任务，以便“开展”农民的斗争和工人的独立政治发动（第118号文件）。

远东局的这些建议和倡议引起了莫斯科的负面反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0月21日的决议中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第117号文件），而在10月底的决议中表示不同意远东局关于策略问题的一些建议。在10月26日签发的政治局致中国的电报中说：“维经斯基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是为时过早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在这份电报中，联共（布）领导，同意“土地问题应列入议事日程”，并指出“在同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战争正激烈进行的形势下，立即在农村发动内战，可能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建议向国民党和鲍罗廷提出农村行动纲领，并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意见报告莫斯科（第120号文件）。

政治局11月11日的决议给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的争论打上了句号，根据这项决议，在加拉罕离开北京后，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而远东局的一切决议和措施都必须同他协商（第127号

文件）鲍罗廷从而成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的主要政治代表。在这项决议中还谈到远东局的一系列错误，并责成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报告”。实际上，这是对远东局的不信任表示。

在没有关于基本策略问题的详细指示情况下，莫斯科的这些决议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正如远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所说，“政治方针问题连一个也不明确”（第114号文件）。

维经斯基在11月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信中，阐述了在试图完成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向中共所提出的任务时遇到的困难，同时谈到了这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旨在保证得到居民，而首先是农民对北伐和反对封建官僚制度斗争的支持的经济措施，可能导致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的削弱。国民党靠各种军事集团和资产阶级的加入而取得的发展，会使中国解放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得到加强，虽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中国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不是使资产阶级，而是使“人民民主倾向”取得胜利。中共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为了维护全民族战线不得不对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特别是在农村，而现在革命的胜利正取决于开展这种斗争。信中接着说：“你就会明白，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战线的危险”（第125号文件）。

在准备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前夕，远东局和中共领导寄希望于全会来解决这些难题。鉴于打算在1927年初召开中共例行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一封全面阐述现阶段所有主要政策问题的信（第122号文件）。在莫斯科，反对派的代表们也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第90、111号文件）。

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筹备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57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①

1926年6月7日于哈尔滨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和俄国代表团成员

敬爱的同志们：

我到哈尔滨已近两昼夜，有机会详细了解了这里在中东铁路冲突之后的情况。

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只是现在才破天荒地开始在哈尔滨本地和沿线地区的中国工人当中，而特别是在南部（哈尔滨—沈阳）和东部（哈尔滨—边界）地区的中国工人当中，有了真正的依靠力量。

从与联共满洲委员会执行局和领导党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最近几个月来，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准备了先决条件。

在哈尔滨有一些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到这里来的负责的中国同志。他们吸收哈尔滨本地的几十名工人参加党的工作。还吸收大致同样多的工人参加共青团的工作。在哈尔滨也有由我们的同志

^① 1926年6月28日此信副本送给：Г. В. 季诺维也夫、И. В. 斯大林、И. И. 布哈林、В. М. 莫洛托夫、Л. Б. 曼努伊尔斯基、А. И. 李可夫、Л. Л. 托洛茨基、Г. В. 契切林、В. С. 温施利赫特

组建的国民党组织，其成员有100多人。我们的中国同志通过这些组织深入到民族主义性质的社会团体中，这些团体尽管受到张作霖手下将领的迫害，但还是在日益发展壮大。应当给以特别重视的最主要一点是，我们的中国同志在俄国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真正地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了，主要是深入到铁路员工当中，并在努力组织工会。现在在我们组织的工会中虽然只有几十人、几百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今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铁路总工会中央委员、老工人^①秘密来到满洲，巡视了各个地区，并在哈尔滨秘密召开了第一次铁路工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18人，但都是许多路段的领导人。因此，在代表会议后正式成立了铁路工会，选出了理事会，为日常工作制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现在还在哈尔滨和大连的党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北满铁路工会和大连工会组织之间也建立了联系。下一步，同志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开展南满的工作。

我要再一次指出，我们第一次在北满着手做认真的工作，应当说，这里的工作条件是极端困难的。首先，这里只有几个较大的城市，工人居民即主要是铁路员工都集中在车站上，在这里除中国的军警外，还常常有为张作霖效力的旧俄宪兵和白卫分子。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成绩说明，我们将能在这里顺利地前进。

中共北满组织现在出版一种不大的刊物《满洲工人》，但不是作为自己的党刊。此外，我们还公开出版一份激进的小报^②，是在我们合法学生刊物^③的领导下着手出版的（已出了一期）。

在有一百多万入口的城市的中国人居住区，我们的同志开办一家不大的书店，它是在满洲进行联络以及同其他城市进行联络

① 王荷波。
② 中文名称不详。
③ 名称不详。

的合法中心。

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但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俄国同志在这里更多的是向他们提出建议，而很少在物质上给予帮助。足以说明问题的是，给整个党的、共青团的和工会的工作，包括两名同志的薪水，只拨给大约 200 卢布。而整个北满地区实际上是一个有相当多的工农人口和特殊语言的完整国家，这里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经费。中共中央没有这笔经费。从伊万诺夫斯基同志^①的报告中你们可以知道，中共在内陆省份的经费如何不足，自然，他们不能在满洲花什么钱。甚至有时派到这里来的中央代表在出差期间没有生活费。

我报告这些详细情况是为了争取最终给中共增加预算（从每月 6000 增加到 14000 卢布），并给满洲拨出每月不少于 1000 卢布的专项开支。请向预算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并将决定迅速通知远东局。这个问题不能拖延了，因为最近几个月还可能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满洲。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20—2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A. C. 布勃诺夫。

58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①

1926年6月11日于北京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

亲爱的同志：

寄上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李同志和陈同志^②在北方区委作的两个报告^③。

总的印象是，在莫斯科人们确实对反动派的力量有点估计过高，而对正在继续发展的革命运动估计不足。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军事胜利并没有像有一段时间在莫斯科所觉得的那样在北方造成了全社会的反动。我还不能说在华中和华南的情况如何，但是在这里，由于国民军的撤退，反动派是如此短命，以至它未能在我们已经扎根的任何一个据点摧毁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和国民组织。现在，即最近一个多月，革命组织要比北方反动军阀到来之前更加发展和巩固了。从报告中你们可以看到，党和共青团在最

① 1926年6月28日此信副本送交给П. Е. 季诺维也夫、В.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В. М. 莫洛托夫、И. С. 曼努伊尔斯基、А. И. 李可夫、Д. И. 托洛茨基、С. А. 洛佐夫斯基、Е. В. 契切林、И. С. 温施利赫特。

② 分别为李大钊和陈乔年

③ 报告没有找到。

近几个月内在北方的所有主要据点都大大扩充了。这最好地证明，所有关于革命离开了我们以及中国已进入革命运动低潮时期的预言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和情绪而已。

在当前时刻，尽管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在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拼凑一个集团并在两者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政权，但张吴之间的矛盾仍在继续发展。除了这两个军阀之间由来已久的争斗外，现在它们的矛盾集中在两点上，即谁同国民军作战，因为每一方都唆使另一方去行动，以便削弱“盟友”，而另一个问题是内阁将奉行谁的方针。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会引起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争吵。另一方面，现在已经很清楚，国民军利用了因这两个“盟友”之间的矛盾所取得的喘息时间，又将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因素。这里的所有报纸都对此纷纷扬扬。英国、日本和美国报刊上的文章都持十分悲观的论调。尽管根据报刊难以判断帝国主义者对形势的真实评价，因为它们感兴趣的是彻底摧毁国民军，因此它们蓄意夸大它的军事意义，但毫无疑问，它们现在确实开始担心，由于国民军抵抗能力的日益增长和它们在中国公众眼里道义影响的日益提高而会出现新的反帝运动高潮。

很说明问题的是，在张作霖和吴佩孚势力范围所及的地区，用我们中国同志的话说，不仅城市居民而且农民都希望和期待着国民军回来。

现在摆在我们北方组织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进一步扩大和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组织，而且是进行大量的党内教育工作。当然，这些任务不只是可以通过深入的宣传来实现，而且现在就必须开展两大宣传运动：（1）根据党现在掌握的大量材料，向群众说明日本和英国利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力量向解放运动发起进攻的意图；（2）向群众解释广州“三二〇事件”。需要说明，国民党右派是如何被英帝国主义利用的，国民党中派是如何在客观上把自己

的旗帜交给反革命势力的。这一点没有及时地做到，但是现在需要在党员中间和国民党左派中间说明这个问题。

党的北方区委已经切实着手做农民工作。眼下还没有取得很大成绩，但应当说，我们的同志是理解这个问题对于革命运动命运的巨大意义的，并打算在今年夏天利用数百名学生（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同情分子）来做这项工作。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最近我们的组织吸收上百名乡村教师入了党。

尽管我们去年和现在从莫斯科发出种种指示，但我们的同志在军阀部队中的工作很少取得成功。他们不大相信这项工作会取得成功。传单印了也散发了，但我要说这几乎是被迫进行的。我想我们终归能使我们的同志相信，像党的任何其他活动一样，这也是一项十分“光荣的”和必要的工作。

5月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从鲍罗廷的电报^①中可以看出，将中央全会推迟到我到来的时候确实是不可能的）没有完全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②。需要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便给华中和华北各省制定更为稳定的方针。

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

今天我将出发去上海和广州。

最后，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在我临行前召开的一次机关会议上，根据伊万诺夫斯基同志^③的报告作出了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见本书第272页注3。

③ A. C. 布勃诺夫。

给中共中央更多援助的决定^①。必须尽快履行这个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收缩。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29—3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会议第 1 号记录^②

1926 年 6 月 19 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会议第 1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和年轻人同志^③。

听取：制定远东局工作计划。

1. 远东局的组建。

决定：1. [1] 中共中央应当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

^① 见第 53 号文件。

^② 文件上注明：“内容已在远东局 6 月 18 日至 7 月 18 日的报告中报共产国际执委会”（见第 73 号文件）。

^③ 分别为：E. H. 维经斯基、J. H. 格列尔、M. I. 拉菲斯、H. A. 福京。

代表参加远东局的工作。

[2] 朝鲜共产党的代表不应由国外中心选派，而应由在朝鲜的中央选派。

[3] 为成立日本同志的常设代表处，召来三位同志（琼森、莫里和共青团的一名代表）。

[4] 只有远东局的成员（及其副手）参加远东局的会议。其他同志在特殊情况下邀请列席。

听取：2. 远东局总的工作性质。

决定：2. [1] 远东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日本和朝鲜代表团的身份作为集体机构领导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治、工会和组织活动。

[2] 远东局应作为切实指导各国（中国、日本、朝鲜）工作的机构，竭力避免把自己变成与中共中央并行的只从事或者主要从事中国事务的机构，避免在细小事情上干预中共中央的事务。

[3] 在解决日本运动的基本问题时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美洲书记处下属的日本书记处协商。

听取：3. 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决定：3. [1] 谢尔盖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应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参加它的日常工作。

[2] 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志应定期报告中央的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

[3] 远东局的俄国成员应帮助中央工作，为其部分工作部门负责人提供咨询。

[3] 建议让马克斯同志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①编辑部工作。

听取：4. 远东局书记处。

决定：4. [1] 远东局下设一个情报处，利用其他情报机关的

① 《向导》周报。

机构和人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情报部提供有关各国党政治生活和活动的综合通报和报告。

[2] 经常性地协助各国党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

听取：5. 工作分配。

决定：5. [1] 安排工作时要力求使远东局全体成员逐渐熟悉各国党的活动。

[2] 在初期确定以下分工：1. 谢尔盖负责对远东局工作的总的领导和代表处的工作；2. 教授负责工会问题；3. 年轻人负责共青团工作；4. 马克斯负责情报、宣传鼓动、组织和秘书工作。

[3] 远东局成员（和俄国代表团成员）各自在本领域开展工作时，要让远东局（和代表团）了解自己的工作。

[4] 远东局的公文处理由多同志^①负责，责成马克斯让她参加对情报工作的组织工作。

听取：6.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问题。

决定：6. 认为目前成立这个局是多余的，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重新审议它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成立远东局以前（一致）作出的这项决定。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1—2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M. B. 多勃罗谢尔斯卡娅

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

1926年6月21日于上海

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

出席：俄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小青年^①。

听取：1. 中共中央声明草案 [见附录1. (1) 和1. (2)]^②。

决定：1. 责成马克斯^③ 对指出的几个地方进行修改。

听取：2.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

决定：2. 基本上赞同谢尔盖^④ 拟定的方针。

[1]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问题在中共代表大会上加以解决。在中央全会上只解决刻不容缓的问题。

[2] 与国民党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视当地的情况而定。

[3] 认为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

[4] 认为有必要尽快结束香港罢工。

[5] 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要从国民党上层派系问题上转移到

① H. M. 纳索诺夫。

② 附录没有找到。声明的最后文本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44—159页。

③ M. P. 拉菲斯。

④ P. H. 维经斯基。

制定这样的政策上：暂时要使资产阶级感到满意，缓和对右派的打击（结束香港罢工），并要靠牺牲豪绅的利益来满足农民的要求，从而给国民党左派奠定农民的基础，并使共产党人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3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6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1926 年 6 月 21 日于上海

亲爱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

今天这封信我还不能从中央的观点来详细谈总的形势。因为我还未能完全弄清楚中央的观点。

看来，按警察制度的条件工作将是极其困难的，但所有这些“条件”也不是不可克服的。

我只向您谈几点总的印象：

（1）无论在北方，还是在汉口，我们的同志无疑都犯有军事倾向的毛病。而且这种倾向绝不是表现在要在敌军中做“政治”工作上，而主要表现在制定军事计谋上。

（2）中央开始理解这个错误和危险性，并将通过在整个党的活动中强调做群众性的政治工作来同这种错误作斗争。

(3) 中央和陈^①现在都不主张进行北伐，虽然据说他们在一个半月前曾坚决主张进行北伐。这种认识我是在没有太大的争论的仅仅一个小时的交谈之后得到的。

(4) 中央开始理解（他们确信他们一直理解）广州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其表现是国民党左派和我们没有在农民和工人组织中牢牢扎根，而指望：政府反正是“自己的”政府。

(5) 对蒋介石不只是需要像迄今所做的那样实行说服规劝政策，而且实际上需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会诉诸我们所依靠的群众的。这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为维护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深化斗争的问题。因此就要切实解决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不言而喻，“上层”的对话也应起很大的作用。但应当承认，同中央的谈话使我更加确信，鲍罗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做应该做的事。他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把他看作是广东最现实的力量（这是对的），他认为反对他是危险的，这就使蒋有理由认为，不管他对共产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的。由于鲍罗廷的这种政策，蒋介石的进攻野心越来越大。您已经知道，他提出了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的最后通牒^②，而现在我们的同志告诉我，他打算把共产党人撵出农会。后一点特别危险，不要忘记，蒋介石现在让著名的叶^③（《民国日报》^④前主编）来领导农民工作，这标志着开始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中央委员们也说，现在在政府采取“中立”态度情况下总的来说在广东开始了豪绅向农民进攻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

(6) 必须更加明确领事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我在汉口得出一个印象，我们的同志（俄国人）加重了共产党组织的军事倾向，

① 陈独秀。

② 蒋介石是1926年6月7日提出这个要求的，详见第64号文件。

③ 叶楚傖。

④ 指1915至1931年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

并使之完全适应自己的需要。在长沙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这方面哈西斯^①在汉口表现得特别明显。

（7）我认为把布罗夫派到这里来是失策的。首先是因为中央事先甚至不知道也不理解为什么派他来，其次是他不懂外语，不能成为对中央有用的指导员。布罗夫本人也不明白自己的地位。例如，他对我说，他是加拉罕驻中央的代表。天哪，我请他决不要再向谁说这种蠢话了，并答应他我要写信同您商量他的命运。或许，再等一段时间总还可以用他，不然的话，我想建议他回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3，第 68 - 6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A. B. 哈西斯：1925 至 1926 年任苏联驻上海和汉口总领事馆秘书，1926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后被国民党枪杀——译者。

62

拉狄克《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

1926年6月22日于莫斯科

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

1. 中国革命的源泉在于中国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农村的商品经济及其社会分化，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同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和它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赖的不相适应，在于群众的政治觉醒同由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省督们的专制制度的不相适应。在这个矛盾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革命力量，这就是工人阶级、数百万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贫民和农民。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同世界帝国主义有着联系并起着反革命的作用。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工业和银行资产阶级关心同外国资本进行的斗争，因为后者掌握着海关并给它们造成了竞争。但是它们害怕无产阶级日益展开的阶级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在利用资产阶级动摇性时，还应当记住，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它同手工业者、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和学生仅仅是这些阶级的代表。手工业者的斗争矛头是指向使他们破产的资本主义竞争，而首先是指向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竞争者，即外国竞争者。广大手工业者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起革命的作用。农民的革命作用要更为深刻些，因为农村人口相对过剩不能在城市里为过剩的劳力找到出路。

而城市的发展又受到外国资本的制约，所以农村发生的巨大社会分化会使它成为火药库。同时封建诸侯战争给农村造成的苦难又会迫使农村成为争取中国统一的斗士，其程度要比在西欧曾发生过的更大。

2. 中国革命是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而告终(而这个专政会使中国统一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但保持一段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还是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发展进程。如果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一系列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那么不排除中国革命会像俄国革命那样把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不管前景如何，工人阶级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主革命阶段可能以部分小资产阶级暂时转到大资产阶级一边，取消民主革命专政和成立资产阶级政府而告结束。那时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新的形势下寻求与平民分子的联合，而资产阶级会尝试依靠这些分子来建立自己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按俄国道路来解决中国革命任务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应当力求采用1848年的道路^①来解决问题，以便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紧张，加速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它的近期目标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民主革命专政。

3. 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合的必要性无论如何不能预先决定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在俄国革命中这种形式也是经常变化的。我们是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后来又同他们实行政府联盟，这种联盟以他们发起反对我们的暴动而告终，而现在我们又同农民实行结合，直接而向贫农和中农群众，不通过农民党的中介。

^① 指建立了第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1848年法国革命。

4. 在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形式问题已有自己的历史。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政党成立时，小资产阶级已有了自己先进分子的政党——国民党。这个党也和共产党一样，还没有同人民大众建立真正的联系。共产党人相对于国民党人的优势不仅在于具有从欧洲无产阶级那里取得的完备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于共产党人背后有苏联支持这一事实。孙逸仙开始转向与共产党人的联合，首先是出于对外政策上的考虑。他在对自由主义、对美国的帮助失望以后，采取了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方针，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的道路。国民党代表着孙逸仙信徒们的各种思想流派，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更为团结一致，因此能在这个联盟中赢得许多领导职位。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形成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有影响，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同时保持自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要理解这种特殊的情况，应当考虑到，与西欧不同，在中国我们不能把工人民主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中区分出来，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产党掌握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机构。

5. 这种状况能给共产党人带来某些好处，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还没有发展成群众性政党时，是能够长时期存在的。现在，这种状况有可能从发展革命的因素变成削弱革命的因素，有可能危害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或者危害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国民党一旦发展成群众性政党，就会对来自共产党人的监督感到恼火。它会感到这种状况不正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组织，参与这些组织的领导，而国民党人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没有对它进行监督。由此出现了不断的磨擦，造成了分裂的危险。共产党人从自己方面说，由于享有对国民党的正式固定影响，不用操心去赢得国民党群众的信任，可以通过发号施令或者幕后计谋来解决问题。由于这种情况就造成了磨擦，给广州政府的生存带来了

威胁，也给试图破坏与工人阶级的联盟的国民党右派提供了口实。要摆脱这种状况有两条出路。要么是共产党人放弃独立的政策，完全屈从于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徐谦在给我的一封信^①中，要求共产党人接受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并将其作为行动纲领；要么必须从目前的联系方式过渡到同国民党的联盟，即两个独立政党的联盟。

6. 这种过渡是整个政治形势所要求的。目前与国民党的这种联系方式必然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对国民党的幻想。工人政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条件是可以自由地批评盟友，这个条件我们不能放弃。国民党的社会构成是五花八门的，它含有部分国民党人转到大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的可能性，而且国民党左派也会同它中断联系，既便是在事情涉及到为了小资产阶级阶层（例如农民^②）的利益而要进行内战的时候。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也完全不理解为了把农民从地主和豪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而进行内战的必要性。只有共产党人的压力，而且不是密室中的压力，而是面对群众的压力，才能促使国民党向左转。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仅是在粉饰国民党的本质，而且在促使它采取伪装的政策：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人接受共产主义的词藻，甚至在工人群众中同我们进行竞争。现在已经存在是否让国民党人参加工会的问题。还有，我们不是去推动国民党根据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的实际利益去组织他们，而是关心让它接受不隐含任何革命政策的革命宣言。只有公开把我们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盟问题作为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联盟问题提出来，才能改变整个这种状况。

7. 我曾在执委会扩大全会^③前夕，在同领导我们在华工作的同志的谈话中提出过这些观点。当时，使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些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同志不接受这些观点。当国民党右派要求同共产党人分裂时，他们才出来维护这些观点。于是我在政治局，在捍卫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反对在右派施加压力的时刻加以具体贯彻，我认为，当洪水要把大车冲走的时候不能重新套马。但右派的进攻终于被打退了，而现在是应该提出改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形式的时候了。我们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应该把工人阶级和城乡革命小资产阶级结合的必要性作为中心思想提出来。为了这种结合，必须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与它结盟的形式应当考虑到它被激起的要求独立的感情。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应当有独立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它们之间的联系应该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联合委员会来实现，要弄清楚从目前状况向这种联盟过渡的所有形式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冥思苦想。这些形式应当在不断考虑到两个目的，即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及它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联系的情况下，在实践中加以制定。

8. 制定共产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具体纲领将对切实巩固这个联盟起很大的作用。制定这样的纲领和在群众中为其进行鼓动宣传，将迫使国民党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从知识分子的政策过渡到群众性的民主政策上去。

卡尔·拉狄克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1，第 66—70 页。

行字稿，原件。

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 第 2 号记录

1926 年 6 月 30 日于上海

远东局会议第 2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老头子、文学家、教授、马克斯和年轻人^①。

听取：1. 关于派遣两名同志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问题。

决定：1. 鉴于远东局方面没有提出异议，建议中央以自己的名义派遣。

听取：2. 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年限问题（鉴于学习俄语的困难，中央建议学习年限定为四年）。

决定：2. 建议中央起草详细的书面报告呈送莫斯科。

听取：3. 关于中山大学。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指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在大学里一起学习会使国民党员产生对中共和苏联的敌视态度。必须让共产党员退出中山大学。

决定：3. 建议中共起草详细的书面报告呈送莫斯科。

听取：4.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广州形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之

^① 分别为：П. В. 维纶斯基、陈独秀、瞿秋白、Л. И. 格列尔、М. П. 拉菲斯、Н. А. 梅京。

间关系的电报草稿。长时间交换意见，主要集中在北伐问题上，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反对对中央的观点作以下评价：“在北伐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两派：一派看来是少数，认为北伐是拯救广州的唯一办法，另一派理解北伐对广州的严重危害性，在‘三二〇事件’的影响下现在反对北伐。”

老头子说，他打算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此举博得一致赞同。

决定：4. 拍电报，不提上述评价，而要指出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①。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4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64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

1926年7月1日^② 于上海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核心小组，抄送中国委员会，以维经斯基名义抄送加拉罕。

^① 见第 64 号文件。

^② 日期是根据第 73 号和第 94 号文件确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 1926 年 7 月 21 日收到电报的。电文中的某些疏漏是根据第 94 号文件中引用的片断订正的。

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们的看法。中央报告^①的依据,以及在广州呆了两个月刚刚回来的中央使团^②的通报和所有报刊的依据使我感到惊讶,广州的形势要比我们在莫斯科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在7月初召开的党中央扩大全会上,广州问题将占据主要地位,因为比以往更加紧张的形势要求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作出回答。我们只好在不去广州的情况下立即积极参与对广州问题的评价和解决,因为不能拖延。每拖延一天都意味着加剧我们党的张皇失措并可能导致与国民党在中央以外^③的分裂。

对形势的估价是:(1)左派和共产党人在1月国民党代表大会^④召开之前对自己的力量 and 影响估计过高,完全没有估计到华北局势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在大资产阶级在港口城市的力量的一步集结方面的恶化。在代表大会之后至3月20日,他们在广东加强了左的空谈政策。而当时确实需要政府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制止突出共产党人的做法。

这就是为什么把过多的共产党员以及那些由于左派群众的信任而变成没有危险性的国民党右派安排进了国民党中央。

(2)拖延结束香港的罢工会造成人们对形势的误解,现在可以证实,罢工使有些大资产阶级集团得到了好处,总的来说使形势复杂化了,无疑也加强了右派的阵地。

(3)右派通过这一点(?)再次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地位,虽没有突出(自己),但经常制造分歧并拼命要在军队行动中扎下根^⑤,而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却没有在农民和工人组织中真正扎下根,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政府,而革命

① 看来是指陈独秀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起草的报告。

② 指由张国焘和彭述之组成的调查广州1926年“三二〇事件”的原因和后果的中共中央使团。

③⑤ 原文如此。

④ 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空谈政策没有切实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使政府脱离了基本的居民阶层。

(4) 这种实际状况与左的空谈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蒋介石的3月20日行动。这次行动揭示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地位的软弱，取消了左派形式上的统治地位，排除了汪精卫（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削弱了俄国人的影响，标志着反对共产党人的运动的开始。

(5) 蒋介石的胜利意味着中派的胜利。确实后来蒋介石又给左派和右派以迎头痛击：先是罢免后是逮捕右派警察局长吴铁城，并驱逐一名国民党右派^①，因为此人建议他向香港贷款2000万美元以结束罢工和转而在当地实行右的政策，还从广州驱逐了一名颇有威望的国民党右派、原广州市长伍西西^②。

(6) 3月20日行动毕竟在客观上对右派有利，右派竟敢于把兵工厂工人吸引过来参加拟于5月1日举行的反共行动。后来，打击的矛头直指向共产党人。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就是在蒋介石的专横领导下举行的，会上通过了你们已经知道的决议。

(7) 6月7日向共产党人最后通牒式地提出三者择一的建议：黄埔军校全体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或者是全体离开黄埔军校，或者是公开共产党员的身分。

(8) 蒋介石准备把共产党员赶出群众性的(?)组织，公然声称，只需要在广东建立一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或……^③领导下的新的国民革命政党，而不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

(9) 国民党中央形式上的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亲信、一个瘫痪的老人^④。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总的看来这意味着蒋介石个人

① 何人不详。
② 伍朝枢。
③ 原文如此。
④ 张静江。

独裁意图的合法化。为了限制蒋介石这个独裁总统的权力（？）曾设立一个由同蒋介石竞争的一些将领以及鲍罗廷组成的专门联合委员会，这个联合委员会现在没有权力，鲍罗廷的影响也被削弱了。

（10）3月20日以后在政府的整个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政治（？）转折。在政府采取中立态度的情况下，豪绅们转而向农民发动了攻势。扩大和加强与农民群众的联系的过程停止了。

（11）管理权集中在蒋介石手中，停止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这都便于准备北伐。为建立1000万元的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捐税，提前一年征收了税款，全部款项集中在总司令手中，500万收入中有450万用于军事预算。还有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广州在围绕着北伐……提出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①。

（12）广东的共产党人半年来都追随空谈的方针，没有就北伐和香港形势问题（？）^②提出独立的口号。所做的真正有益的〔事情〕是：成立工农商学联合会^③，提出一些具体口号和取消火油专卖，结束罢工，成立解决罢工冲突的仲裁委员会。

（13）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大大发展了。党和工会组织增多、扩大了，工作人员增加了，但中央领导软弱。政治路线不

^{①②} 原文如此。

^③ 联合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5月21日，起先是作为提出一系列经济要求的临时机构。后来保留了下来，中共把它看作是一种超党派的社会各阶层代表统一战线形式。关于它的作用和活动详见《〔中共〕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90—398页。

明确。

(14) 在中央内部隐隐约约有一种要退出国民党的情绪。在北伐问题上，中央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央委员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结论是：

1. 我们并不认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倾向已经取得胜利和不可能加以防止。尽管广州社会各界有其小资产阶级松散性，政府机关和军队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具有巨大意义，但总的说来，广州各界还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在工农群众中还有相当大的优势，即使在军队中也不能低估国民党左派的影响。蒋介石是中派之源，他试图使革命各界服从于自己，不得不寻求它们的支持^①。

2. 因此我们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竭力反对加强右派并要求他同右派进行斗争是正确的。

3. 顺利贯彻这一方针的基本条件是：从政治上加强广东的共产党组织，根据对形势的现实估计采取独立的政治路线，抛弃空洞的左的辞藻^②。

4. 坚决同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作斗争，从内部反对右派，同时逐渐摆脱无条件支持广州政府每个步骤的做法。

5. 为答复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经我们一致同意，中央决定发表一个声明：“为了军队的统一，中央决定解散黄埔军校的支部。”此举决不意味着我们在黄埔军校采取中立的方针，工作要继续进行。要求鲍罗廷同蒋介石谈一谈进一步对共产党人施加压力的危险性问题，[不然的话]，苏联的社会舆论、西方的无产阶级就要开始怀疑广州了。

6. 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共产国际或者中央、各党派的领导人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它所采取的方针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共产国

①② 原文如此

际不能容忍反对它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期待着声明同情共产国际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人友好合作。

7. 立即停止香港罢工，不提出香港不能接受的大量物质赔偿要求，绝大多数罢工工人已分散到农村，只剩下三万人，罢工工人在香港的岗位已由新工人顶替。

8. 考虑到对政治形势的总的评价，我们认为把我们的政策同北伐联系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顺便指出，孙传芳对广州持中立态度，但如果广州军队开进江西省，他会改变立场）。广州〔应当〕采取防御立场，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巩固和同邻省的密切关系上，以便建立南方的联邦。

9. 广东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基层工作，把它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提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此来加强为建立专政而进行的独立斗争^①。

10. 工作的重点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11. 大家都坚持认为，蒋介石在加强反对广东共产党人的行动^②，必须应付这种反抗，要具体地解决每一个问题，不要全面提出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应当赢得时间在群众中扎根，为解决整个问题要适当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这一点我们准备在过几个月之后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③。期待近日得到答复、指示。第5号。

核对无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38-40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②③} 原文如此。

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 第10次会议第4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7月4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第10次会议第4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年轻人^①。

听取：1. 教授关于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劳动大会（1926年5月）^②的初步报告。工会工作者^③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倒退，因为它根本没有讨论工会运动的现实问题，令期待解决许多迫切问题的代表们感到失望。

在讨论中提出以下问题：（1）关于同上海警察局企图在罢工中扮演仲裁人角色的倾向作斗争的问题；（2）关于在广州提出的阶级调和口号（6月16日第706期《广州日报》文章）^④和成立仲裁委员会等的问题。

决定：1. （1）中共中央全会应对第三次劳动大会作出评价，

① 分别为：Г. Н. 维经斯基、Л. Н. 格列尔、М. П. 拉菲斯、Н. А. 福京。

②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详见《中国历届全国劳动大会文献》中文版第40—154页；《中国工人运动：1924—1927年革命——工人运动文选集》俄文版第81—158页。

③ Л. Н. 格列尔。

④ 《广州时报》自1924年起在广州出版。

指出工会工作者所指出的主要毛病。

(2) 全会应谴责在工会运动中阶级调和的倾向。

(3) 向莫斯科电告对目前上海罢工运动的评价，以防止作出过高评价。

听取：2. 关于国民党中央与中共中央的谈判问题。

决定：2. (1) 远东局派谢尔盖^①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加谈判。

(2) 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即将举行的谈判，并请确认对谢尔盖的委任，以排除英国人^②参加和同他产生摩擦^③……

听取：5. 日常事务：(1) 谢尔盖报告说，老头子^④打算让印度人^⑤参加汉口区委会。

(2) 印度人请求给他拨款，订阅印度报纸，他必须编写每月综合通报。

决定：5. (1) 同意让印度人参加汉口区委会。

(2) 给印度人每月拨款 20 墨西哥元以订阅印度报纸，责成他给远东局和中国共产党编写综合通报。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7—8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C. B. 维经斯基。

② M. M. 鲍罗廷。

③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和日本共产党的第 3 项和第 4 项。

④ 陈独秀。

⑤ B. C. 弗雷耶尔（谢伊格尔）。1924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印度问题顾问，1926 至 1927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土地问题顾问。1927 至 1928 年任农民国际东方部副主任。

66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摘 录)

1926年7月6日于上海

第二封信

亲爱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

1. 从我们局发给莫斯科和您的详细电报^①中，您已经了解了我们对广州问题的提法。在这封信里，我只谈一谈中央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我说“一些意见”是因为直到最近，整个中央委员会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意见可以作这样表述：“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与其说在于制定调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高级机关中的人数的结构，不如说在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活动，靠吸收小资产阶级群众扩大基层组织，提高我们在这些群众中的影响”。这就是说，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我们应当这样对待国民党：少提一般组织问题，偶尔具体解决这类问题，以便腾出时间，把主要力量投放到基层去，加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必须吸收大量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加入国民党，在农会和国民党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各地为争取农会的独立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放弃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民党的思想。国

^① 见第64号文件。

民党的基层组织和地区组织至今还不能建立在严格纪律基础之上。国民党的社会构成和性质要求有更大的组织“自由”。您记得，我们在两年前曾谈过这一点^①。我们的同志现在自己感觉到，为了更多地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生产和经销民族商品）的某些阶层，必须放弃按一般共产党的模式，更不用说照抄联共的模式来建立国民党的思想。不言而喻，在广州，国民党是执政党，这里地方组织的管理必然要比其他省份更为集中，但是即使在这里，也必须吸收一些社团和社会组织（农会）的代表参与解决国民党组织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为此必须使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给自己提出在这些组织中加强自己的影响的任务，办法是实行符合它们利益的政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搞左的空谈，我们这样做已给自己、给国民党左派、给整个广州带来了不少害处。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必须放弃占据国民党组织中的机构、压制左派和中派的主动精神和以他们的名义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的策略。

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我们有些同志在寻找退出国民党的借口，他们把扩大国民党和我们在国民党以外的群众中从事新的工作，说成是可以提供在实际上退出国民党组织的可能性。为反对这种危险性，中央全会^②将首先严厉批驳主张退出的人，指出（北方区委）提问题的左倾幼稚病，说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现在就应该通过自己在国民党以外的党来领导解放运动”。其次，关于必须留在国民党组织内的明确决定，不是要占据机构，而是要切实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北伐，现在中央采取了广州的防御立场而不是北上以使全国革命化的立场。最近两周来的事实要比我们提出的所有理由都更加向我们的同志证

^① 详见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一文，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期第118页。

^② 指1926年7月12—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全会。

明，广州确实受到威胁，出现了保卫它的问题，因此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切实动员群众的问题上，而不是提出广州向北方军阀进军的冲锋口号。

2. 与鲍^①谈了几次。看来他在上海不仅同社会各界的某些代表（唐绍仪），而且同商会都有一定的联系。但要利用他得每月花费几千元钱才行，因为他已应酬（或者要应酬，说不准）一些秘书和办事机构，他打算通过他们来实施我们的各种影响。看来我们现在没有这笔钱。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为此花这么多钱，那就需要他们认真从事，百分之百地切实加以利用。这样做无疑是有某种好处的。当然，我不能全身心地来从事这项工作。依我看，领事无法适当地利用他。因此我认为，不能给他以希望，如果他呆在这里的目的是根据与几千卢布开销有关的庞大计划做工作，那么就让他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吧！随信附上他关于孙传芳的书面报告，是他昨天交给我的^②。报告未必会给您提供什么新东西。请来电告诉我，是否需要我对他说，他（关于办事机构、同美国人共同办报纸等）的整个庞大计划不能由我们提供经费。从他的话语中我明白了，一旦作出这样答复时，他就离开上海，到冯玉祥那里去。

3. 与钱有关的本地问题之一是《上海生活》^③今后的命运问题。报纸要求每月资助不少于500卢布。我们的管理机关对节省制度作了广义的理解，以致从《上海生活》上撤销了10卢布的广告。一句话，报纸只能靠全权代表的资助生存。需要您的明确指示，报纸今后怎么办，因为一个月就得给编辑部几百卢布，因为它欠工人人们的钱。我的意见是，在我们创办某种英文机关报之前，需要保留这家报纸。我打算给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对待报纸的这种

① 鲍世泽。

② 报告没有找到。

③ 指1922年至1926年在上海出版的《新上海生活报》。

荒谬态度，因为在苏联花钱做广告，而且花很多钱，这是一回事，而在国外，在唯一的一家苏联报刊上做广告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您同意这个意见，请立即电告我。

4. 我没有收到对我关于布罗夫的电报的答复，我知道许多多余的人要从广州撤走，还（从布罗夫的话中）知道，鲍罗廷有一次对他去广州出差一事作了否定的回答，我同意他去北京，虽然我认为最好是派他从海参崴去莫斯科。

5. 谢伊格尔明天去汉口。我认为他发生的意外事件完全处理完了^①。

恳请您有机会就我们在电报中提出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您的意见，并尽可能告诉我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谢尔盖^②

又及：有个个人请求：×^③同志据我了解现处境贫困。我曾向您谈起过他，他会是个有用的人，应当让他好好实习几个月。在这种时候我恳请您帮助他，哪怕不收他的房租也好。

谢尔盖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3，第 72—7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意外事件的细节不详。

② П. И. 维经斯基。

③ 这里勾掉了：多林，上面又写上了：多比索夫。

67

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 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①

1926年7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的形势

满洲的形势特别复杂和矛盾，在这里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利益同时发生了冲突。

最近几个月作出的指示，特别是关于同沙文主义和大国主义作斗争的指示^②，纠正了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方针，必然成为不再重演不久前冲突的保证。

但是，因此出现了同近来在莫斯科某些同志那里产生的投降主义思想作斗争的问题。这种思想可以归结为：建议立即无条件地将中东铁路交给张作霖，以便通过这种办法来避免今后在我们同中国和日本的交界处发生冲突^③。

此后我试图把这个问题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形势联系起来。

① 报告是根据1926年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决议起草的。

② 见第16、26、29、36号文件。

③ 1926年7月14至23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确认，托洛茨基提出了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的建议。全会通过决议，谴责了该建议，并认为它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投降主义”的表现。

国民军第一军的状况普遍反映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它从直隶撤退和放弃北京确实进行得很有秩序，没有任何损失。它驻北京代表唐悦良当着我的面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亲英和亲日的报纸也都对形势作了这样的评价。

同奉天在目前阶段的谈判已经破裂，也像过去同吴佩孚的谈判以失败告终一样，因为张作霖要求将察哈尔地区交给他，这必然会导致实际上取消国民军。加拉罕同志同唐悦良的谈判始终强调有必要同奉天签订协议，哪怕是临时协议也好，但谈判不是在我们的影响下进行的，客观上是被张作霖破坏了，张感觉到，任何争取时间的做法都对国民军有利。

我们还知道，向山西进军只会促进中国反动势力的结合，加拉罕同志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说服唐悦良放弃这次进攻。但是，丧失富饶都城地区的国民军的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迫使它不顾各种劝告和外部“合乎逻辑的”推论向山西进军。

在谈到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不要忘记，张作霖除了充当日本的走卒以外，还是主要关心农产品出口的满洲大地主的代言人，而吴佩孚则同长江流域一带的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业资产阶级有联系。

吴佩孚本人只代表中国社会的一个狭小阶层，他在居民中没有很深的根基。农民运动在吴佩孚地区即在河南和湖北的发展、秘密农民社团的建立和农民反对豪绅、反对地方官吏和反对士兵强暴的行动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国民革命运动不是按某些军阀的意志进行的。国民运动领袖的任务、国共两党的任务就是将这个运动纳入一定的轨道，把它同全国范围内的其他目标结合起来。

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和指望，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会有长时期的妥协。

当然，这两派军阀在同英国和日本在华报纸所鼓吹的“赤祸”作斗争的口号下可能暂时联合起来，但是使他们分裂的内部

矛盾太大，站在这些军阀背后的日本和英国的利益太不一致，以致使这种妥协不可能持久下去。

《远东时报》^①在6月2日的社论中说，在国民军撤离北京后，曾预测，反赤色运动将很快结束。然而这种期望没有应验，报纸不得不承认，国民军的战斗力仍处在充分的备战状态。在这家日本——张作霖的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针对英国人写道，“英国政府早就为自己的那些由于对中国人的傲慢和挑衅性行为而玷污了大英帝国名声和威望的公民感到羞耻。只要英国人不承认中国人享有平等的地位，英国的利益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英国在华的半官方报纸《京津泰晤士报》^②，在6月8日综述中国内外形势的社论中，断然得出结论：“满洲派和直隶派之间的角逐，也同孙传芳元帅的立场一样，使人想到，任何想要统一中国的认真尝试只能以目前为反对国民军而联合起来的力量的分裂和内部争斗而告终。”社论结尾说：“不可能制定一个使南北各派军阀实行合作并迫使他们承认中央政府的计划。”

日本对英国对华政策的激烈抨击，英国人在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可能性问题上的悲观展望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并表明，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尽管作了各种努力，但仍旧十分紧张，并且必然导致公开的破裂。

至于说到孙传芳，必须记住，他是吴佩孚的老战友，孙在1924年秋粉碎直系之后得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仍任浙江省督办。此后在1925年秋，征得吴佩孚的同意，并根据同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国民军的协议，向江苏省进军，反对张作霖，迫使后者退到北方，而自己成为东南五省（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的实际主宰者。孙现在一直希望再占领山东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张作霖的敌视态度，因此迄今为止尚不能恢复津浦线的铁路交通。

① 《远东时报》是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出版的日报。

② 《京津泰晤士报》是从1894年起在天津出版的日报。

同时，孙传芳已尝到了掌权的甜头，不愿束缚自己的手脚，屈从于吴佩孚。

孙传芳虽然害怕“赤祸”，但同张家口的国民军保持着联系，并同广州国民政府就共同反对业已垮台的军阀（首先是张作霖，其次是吴佩孚）问题进行谈判。

北方和东南方的形势就是这样。

南方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州怎么样呢？

广州国民政府主要代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目前阶段受到以工会代表为代表的工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

蒋介石将军的3月20日行动是由我们军事顾问们的错误引起的，他们把中国将领和政府成员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有权甚至就最次要和细小的问题向他们作出不可抗拒的指示。

季山嘉同志给军事组下达的命令使人感到很气愤和莫名其妙，他断然禁止接受中国人的礼物，引起了中国将军们无谓的抱怨和不满。此外，政治部还批准和颁布了军队中政治课教学大纲，规定几十个课时，其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但只字未提孙文主义和孙逸仙本人。

满腔的怒火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蒋介石这时就成了他们的客观工具。

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三月事件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不影响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

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国民政府，其中包括就结束旷日持久的香港罢工开始进行谈判，取消火油专卖，并就火油税问题同美国公司进行磋商，最后，成立代表人数均等的仲裁院，来调解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土地所有者和承租者之间的纠纷。为了消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某种不信任，共产党人声明，今后共产党的新党员将不从国民党员中

吸收，而从无党派的人民群众中吸收。

在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可以认为，广州的局势现在是非常巩固和稳定的，特别是如果国民政府能够结束香港罢工的话。

由于近一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国民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加强了。现共有党员约 334000 名，其中广州有 22000 名，除此以外在广东有 48000 名，在广西有 28000 名，在英属香港地区有 18000 名。其余党员大致平均分布在中国各个省，例如在北京，尽管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下也有 2500 名国民党员。此外，有近 6 万名党员生活在国外，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地。尽管在北方反动势力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国民党仍在发展壮大，正在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甚至在北京继续出版国民党的英文日报^①。

中国共产党也在得到同样的加强和发展，近一年来党员人数增加一倍多，现在达到一万人。出版两种党刊^②，近几个月来散发 20 多万份关于各种现时政策问题和生活问题的传单。

国共两党在农村中、在农民中间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广州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可能成为其他省份和地区的楷模。广东省 90 个县中有 67 个县有国民党领导的农会，而且有 28 个县的农会已联合成县的组织。广东只有 26 个县还没有农会。这样，在全省范围内有七十多万农民已经联合起来，这是国民党和农民实际结合的保证。为了扩大和加强广州农村的工作，成立的专门学校已存在半年多^③，从农会中选拔出来的农民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学校已培训了五期学员，有五百多名学生又回到农村继续工作。

^① 指自 1926 年 5 月 30 日至 1927 年 1 月 1 日在北京和自 1927 年 3 月 12 日至 8 月 28 日在汉口出版的《民众论坛》报。

^② 指《向导》周报和《新青年》。

^③ 指 1924 年 6 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自 1924 年 6 月至 1925 年 12 月和自 1926 年 5 月至 9 月在广州举办。

从国共两党国民革命工作的总的前景来看，农民工作问题日益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而带着什么口号（“不交租”等等）到农村去的问题应当十分谨慎和深思熟虑地加以解决。

对中国目前总的形势作出总结和结论时，我应提出以下几点：

1. 关于我们同中国和日本在满洲的相互关系的基本问题已由4月的指示性决定^①提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张作霖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进一步谈判。无论如何，放弃中东铁路不是摆脱现状的出路，因为这只会导致我们退出满洲的舞台，而中国社会广大阶层只会把这看作是对以张作霖为代表的中国反动派的支持。

2. 旨在反对华北和华南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和主要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结盟，没有带来所预期的结果，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国民革命运动必将重新高涨起来。

3. 国民军与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起，依然是中国唯一真正具有战斗力和严明纪律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国现实的传统生活条件，在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未发生必然的冲突之前，国民军未必会卷入中国内部的真正争斗。冯玉祥的观望政策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人们怎么劝说和施加压力，也不管他的物质和金钱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他在近期内是不会回中国的。再施加任何这方面的压力，都只会促使冯玉祥去德国，在柏林郊外某个地方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但这未必符合我们的利益。

4. 我们在中国事务上采取“灵活”政策的主要危险在于，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也会给接近我们的中国社会团体的广大阶层造成一种印象，苏联为了搞好自己西欧和英国的事

^① 见第36号文件。

情不给进行国民革命的中国以任何援助。当然，我们的物质援助可能非常有限，这是当家人的事，我们只应尽我们力所能及地给予援助，但决不能采取在客观上可能被认为是投降和放弃以往政策的步骤。相反，必须一再强调，我们在东方和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实际联系和援助民族革命运动。

5. 我们的任务是同张皇失措和修改我们在华工作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反动势力的暂时结盟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某种短暂的停顿决不是国民革命力量失败的标志，这种力量将继续增长和发展。只是必须考虑到新的因素和特别要认真注意在农村中和农民中的工作。

索洛维约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1，第 10—1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68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便函

1926 年 7 月 8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契切林、皮亚特尼茨基、温施利赫特、布勃诺夫、特里利塞尔、亚戈达、别尔津（工农红军总部侦察局）、隆格瓦、盖利斯、梅利尼科夫同志

广州成立了专门的“联络委员会”来调解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委员会将由五名国民党员和三名共产党员组成。维经斯基同志将是参加该委员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

请中国委员会批准此项任命。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1，第 75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 第 13 次会议第 7 号记录

1926 年 7 月 14 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第 13 次会议第 7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马克斯、年轻人^①。

听取：1. 政治和军事情报。

决定：1. 认为有必要加强各种游击行动。

听取：2. 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决定：2. (1) 请中共中央尽快呈送关于延长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限的报告。

(2) 反对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召回 C. T. Ю. 同志^②。

① 分别为：Г. Н. 维经斯基、М. П. 拉菲斯、Н. А. 福京。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3) 请求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给菲律宾人再拨出 5 个名额。

(4) 要求给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提供旅费。

(5) 要求给中国人 5 个空额。

听取：3. 工会国际代表团访问中国问题。

决定：3. (1) 认为中国和广州的目前时机，不适于代表团来访。

(2) 同中共中央商量这个问题。

听取：4. 给小青年^①的预付款。

决定：4. 预付 350 卢布。从青年共产国际的款项中支付。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11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H. M. 纳索诺夫。

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 第 14 次会议第 8 号记录

1926 年 7 月 15 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第 14 次会议第 8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和年轻人^①。

听取：1. 谢尔盖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的通报（根据同老头子和文学家^②的谈话内容作出）。

警察环境迫使全会加紧进行和集中在工作上^③。分歧没有暴露出来，因为大家知道，中央局的方针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协商过的。暴露出一些不大的细微差别，对工作报告的批评比较激烈。

关于国民党的决议，据文学家说，是作一些小的修改后通过的^④。中央局请将此决议电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广州的决议已转告由中央局和广州人组成的委员会，全会结束后将同他们一起工作。

① 分别为：Г. Н. 维经斯基、Л. И. 格列尔、М. П. 拉菲斯、Н. А. 福京。

② 分别为：陈独秀和瞿秋白。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174—178 页）。

在组织问题上通过一项未来得及事先协商的决议^①。它比组织问题报告更有意义，指出了加强基层支部及其独立性的基本任务，与企图用最高机关（中央或区委会）的分部作为上层机构来代替支部的倾向相对抗。

决定：1. 备案待查。

听取：2. 蒋介石关于派 100 名学生去黄埔军校的请求（是由国民党左派向北京的一名共产党人转达的）。

老头子解释说，这是蒋介石想抓住他所需要的优秀共产党员，然后把他们从中共中招募过去。

决定：2. 赞成谢尔盖关于派 110 名^②优秀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单独工作的意见。

听取：3. 关于远东局组织编写综合情况通报的问题。

决定：3.（1）认为有必要编写关于工农运动和党的工作的定期中国综合通报。

（2）委托美国人^③根据国内政治生活和军事政治生活的发展情况编写对在中国出版的帝国主义报纸的定期综述材料。

（3）编写关于日本、菲律宾（马克斯）、朝鲜（帕夫洛夫）、印度尼西亚（谢苗诺夫）的定期报刊综述材料。

听取：4. 来自广州的老头子的儿子的^④报告，说蒋介石与全国铁路总工会达成协议，为配合即将从长沙进军汉口等地的行动，将一批铁路员工交由他支配做军事工作。还说蒋介石要求在汉口武昌成立铁路军事中心，在长沙和汉口成立行动委员会。

附注：7月9日即占领长沙以前的电报^⑤。

决定：4.（1）认为有必要让中共中央给全国铁路总工会（和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9—187页。

② 原文如此。

③ J. 多尔逊。

④ 陈延年。

⑤ 电报没有找到。

所有在广州的与我党有联系的其他中心）指出，全国铁路总工会不预先征询中央意见就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是极不正常的。中央应该采取措施加强集中领导，鉴于党的团体有听命于蒋介石的危险，更应该这样做。

（2）必须明确，蒋介石向我们党的同志和团体发出的任何军事命令，必须事先经中央军事委员会审查。地方军事委员会没有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许可，不得执行蒋介石的这类命令。

（3）鉴于我们的组织在广州军队推进方面的工作有产生单纯军事倾向的危险，中央应当制定关于最大限度地扩大（首先是长沙和汉口的）地方组织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组织工作范围的详细指示。

（4）在成立汉口军事委员会（吸收当地党委代表参加）时，必须严格地把它的工作同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区分开来。

签字：

全宗 454，目录 154，卷宗 269，第 12—13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
第 15 次会议第 9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7 月 17 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第 15 次会议第 9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年轻人、印度人^①。

听取：1. 关于教授动身问题。

教授声称，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并且他认为远东局的大多数成员都有必要去广州，他要把自己的动身时间推迟 2 到 3 周，留在上海期间将同中央一起工作。

决定：1. 教授的声明备案待查。

听取：2. 关于去广州问题。

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整个代表团的到来会促使蒋介石提高警惕并可能对谈判产生不良影响，谢尔盖反对远东局全体成员去广州。

决定：2. (1) 认为有必要让谢尔盖、马克斯和年轻人同中央代表团一起去广州。

^① 分别为：Г. И. 维经斯基、Л. Н. 格列尔、М. Г. 拉菲斯、И. А. 福京、В. С. 弗管耶尔。

(2) 与中共中央商量此问题。

听取：3. 关于印度人问题。

决定：3. 推迟印度人的动身时间。让他临时（一个月）担任教授在工会国际工作方面的助手，费用从工会国际预算中支出^①。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14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72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

1926 年 7 月 18 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
核心小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抄送彼得罗夫同志^②

亲爱的同志们：

^① 以下删去关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第 4 项和第 5 项决定。

^② 即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该信于 1926 年 8 月 10 日收到。抄送：Г. Е. 季诺维也夫、И.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Л. Я. 曼努伊尔斯基、С. А. 洛佐夫斯基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全体委员。

最近两个星期以来，越来越证明，我们关于在中国的政治形势下会重新出现朝着改善解放运动环境方面的转变的看法是正确的。

首先，现在已经很清楚，英国和日本旨在加强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联盟，以便在此基础上成立政府并在击溃国民军以后转而“面向”南方的庞大计划，越来越失去其成功的希望。关税会议^①在进行8个月之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7月3日散会，就是最好的证明。会议的突然解散表明有两个有利于国民运动的主要因素：一是帝国主义者确信，现在通过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提供贷款也不能做到成立它们所需要的政府；二是英国和日本之间无论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优势问题上，还是在中国关税政策实质问题上的矛盾都加深了。

出席关税会议的日本、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在会议解散后立即披露了它们之间的一系列矛盾，特别是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美国在中国出版的半官方刊物《密勒氏评论报》^②，在今天的一期上对关税会议作出总结说：“中国人在关税自主问题上由于实行不明智的国内政策而给自己造成了损害，但企图通过某种途径利用中国的混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外国列强也确实是在玩弄甘油炸药，因为在解决关税问题上每拖延一天都会使要求废除一切外国条约的中国激进派更强硬起来。”^③

的确，关税会议的解散不仅在削弱吴佩孚的地位方面具有意义，而且比以往更尖锐地在中国社会舆论中提出了关税自主的问题。

^① 关税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至1926年7月3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中国的代表外还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

^② 指《密勒氏评论报》周刊，曾于1917至1941年和1945至1953年以不同刊名在上海出版。

^③ 见《关税会议混乱的责任》一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17日（第37卷第7期第153页）。

同时，无论在西北地区还是在表面上处于吴佩孚以至孙传芳影响之下的邻近诸省，国民军的军事政治形势都有明显好转。吴佩孚在6月底7月初曾指望利用外国贷款来对国民军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看来这种希望破灭了。不久前，表面上隶属于吴佩孚的田维勤部队和国民军第一军的接触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担心这种接触会被吴佩孚用来分化国民军，现在看来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这种接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对吴佩孚本身的一种威胁。不久前，这支军队的一个旅公开转到了国民军一边。另一方面，湖南省越来越在摆脱吴佩孚的控制。广州的盟友唐生智占领这个省的主要城市长沙后，给长沙以北的吴佩孚拥护者造成一片惊慌，这必然直接影响到吴佩孚势力范围之内的主要省份——湖北的军事政治形势。如果说我们南方的同志希望现在就能较容易地占领湖北省是估计过高，那么不管怎么说，吴佩孚在这些地区的基础已经动摇了。

张作霖的情况也或多或少在恶化。长城这边的居民在奉系军队驻留期间对他非常痛恨。不用说农民、城市贫民和工人，就连商人也在以大量军用债券和征用名目出现的苛捐杂税压迫下痛苦呻吟。

除此以外，由于在占领地区势力范围划分不均，张作霖亲信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某种分化。例如不久前，著名的李景林的部队被缴械。在长城外的东三省地区，张作霖的地位也恶化了：奉天元开始贬值，商人不满。加之今年大歉收，“盗匪”活动越来越猖獗。

立足于南京并且是上海最主要势力的孙传芳表面上控制了五个省^①。他曾宣布这些省实行联邦和自决原则，现在则在千方百计积聚力量，指望从同张作霖、吴佩孚、广州的矛盾中脱颖而出，成

^① 指江苏、江西、福建、安徽、浙江五省。

为上述五省的真正首领。然而，随着吴佩孚力量的削弱，他将越来越寻求同广州达成协议，如果广州不过分对他所控制的各省表露出侵略意图的话（但出于北伐的考虑，这一点并不能排除）。同其他军阀相比，孙传芳的优势在于，他与加入“他的”联邦的那些工商业最发达省份的最富裕中国商人的联系会越来越多，而这一点也给广州提供了同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他所依靠的商人绝不会关心他占领其他省份的军事计划或者对其他军阀的帮助。因此，使孙传芳对国民革命军和广州保持中立的问题，不仅需要提出，而且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迄今为止广州在这方面还没有表示出足够的主动，而有些行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冯玉祥通过由两名军人和一名政治代表组成的常驻代表团与孙传芳保持着联系^①。例如在上海，近来冯玉祥的代表公开进行有利于国民军的宣传鼓动工作。而孙传芳对此却不加阻挠，尽管英国报纸暴跳如雷。

所有这一切在华中和华北各省造成了一种对解放运动无比有利的形势，甚至比今年夏初更为有利。从种种迹象来看，改善国民革命力量处境的这种趋势将占居上风。

几个月前由帝国主义者、军阀和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买办分子、国民党右派和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青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赤色运动现在几乎消声匿迹，并且由于广大社会人士对这场运动的反感而使我们得以更加有力地开展反帝运动。自然我们还要顺便揭露上述那些中国组织。

广州国民政府和英国代表团就结束抵制和罢工问题开始进行的正式谈判，不仅会引起全中国的极大兴趣，而且肯定也会加强广州政府本身和解放运动左翼的地位。谈判的开始表明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想要通过中国的反革命力量使广州屈服的希望破灭

^① 鲍世泽是其中的一名代表。

了。在众所周知的“三二(一)事件”发生后，英国人不想再听到谈判的事情了，而只希望国民党右派上台执政，这样香港当局就可以同它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包括同吴佩孚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国内的解放运动。在3月20日到5月中旬期间，即国民党中央全会^①以前，帝国主义者同国民党右派一起不遗余力地准备在广州搞右派政变。但是蒋介石没有使他们的希望得逞，因为他不仅反对共产党人，而且也反对右派。国民党全会以后蒋介石给右派的打击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在广州搞政变的希望，从这时起它们开始作出大的让步。当然，这决不应成为谈判的出发点，理解为我们可以再拖延结束抵制和罢工。中共中央征得我们的同意后指示广州的同志切实根据以下条件结束抵制行动：要求香港的中国商人、广州商人、香港政府和广州政府支付300万中国元，以便一次性地分给罢工工人。要求保证香港的中国工人有结社自由和部分罢工工人可以返回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宣传运动，让曾经企图用反革命计谋迫使广州投降的香港承担拖延抵制和罢工的责任。

总之应当说，广州政府虽然经受了各种内部摩擦，虽然存在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和中派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虽然军事集团之间存在着日益尖锐的矛盾，但是它对整个中国来说还是在起着越来越多的革命作用。此外，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越来越重视广州了。不过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不使上述矛盾占居上风而压倒华南总的革命发展形势。

日内将闭幕的中共中央扩大全会将通过一项决议，随信附上。它的意义在于，通过组织革命的社会团体和加强我们（国民党左派和我们）在其中的影响来对抗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②。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同广州日益扩大的矛盾作斗争。不言而喻，修改

^① 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② 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国民党机构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组织关系应当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只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能改善广州的状况的。下周，可能中共中央代表团和我们一起去广州参加解决组织问题的两党会议。也许由于中国解放运动左翼的地位有所改善，我们能较容易地在广州达成协议。

中共代表大会可能于今秋召开，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利用时机来加强国民党左派和扩大国民党组织及其地方机构，那时右派和中派就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将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强加于我们。且看最近两个月的情况如何发展吧！可能在代表大会召开前，还需要中央的某个同志和我一起去莫斯科预先解决整个国民党的问题。目前我们将根据通过的决议行事。关于国民党的问题，还决定在代表大会后立即通过党的秘密通讯^①在全国范围内的党员积极分子中进行讨论。

总结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不能不指出在进步社会人士中越来越流传的关于联邦制政权和关于以联邦制国家中心与现在形式上存在的北京中央政权相对抗的意见。看来，在这一点上社会人士，从国民党右派到南方冯玉祥的代表，都是一致的。例如昨天，冯玉祥驻南京政治代表^②在同我的谈话中说，他给目前正由莫斯科去广州的冯玉祥军事代表团提出了同蒋介石谈判的以下计划：（1）在广州的盟军或者广州部队本身占领汉口，而国民军抵达湖北省时，应当成立以武昌为中心的联邦革命政府。参加联邦革命政府的（他是这样称呼这个政府的）应有国民军的代表、广州的代表和表示同情的军事力量的代表，即国民军第二军和孙传芳的代表。对于不愿参加联邦的省份，则根据形势需要或者同其建立友好关系或者同其作斗争。（2）向北京的中央政府宣战。（3）在武昌召开国民会议。（4）军队隶属联邦政府，由大元帅（冯玉

^① 指1926年8月至1927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② 指鲍世泽。

祥）和两名副手（蒋介石和孙传芳）统领。这个计划不知道是这位政治代表的臆想，还是冯玉祥从莫斯科暗示给他的。不管怎样，这种构想无疑会在社会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它反映了对于中国政治生活来说近期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位代表的计划，我已电告加^①。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的另一个重大现象是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所需要的经费来利用这一运动。在这方面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在军事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将率领这支规模较大的农民队伍，并且一般说来他们在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同时，也还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地位。但这是后话。

从报刊上你们可以了解到上海日益发展的罢工运动，这场运动已波及数万工人。五六月份爆发的罢工的直接原因是米价上涨。这些罢工来势之迅猛和它们所具有的规模证明，一心想争取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权利的工人们是多么地精力充沛。最落后的群众也参加了运动，甚至在去年还没有参加过罢工的丝厂女工也参加了运动。上海的镇压以及几个月前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的总进攻不仅没有吓倒工人，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他们。全国社会运动的活跃无疑又引发了其他地方工人运动和罢工运动的高涨。

根据这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和加强党；（2）一次又一次地到城市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去，并通过国民党，通过各种同乡会、街道协会等组织，到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去；（3）无论如何要同农民运动建立联系，派人到一些省去；（4）将各省通过选举产生民主机构的口号作为战斗口号，并在军事政治形势能为推翻某些督军创造条件的省份建立行动委员会；（5）加强军事工作。

^① 加拉罕。

最后谈一个具体问题。在上海必须创办一个英文和中文的专门刊物。我在莫斯科曾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在中国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一个合法的机关刊物。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创办这个刊物。有一位美国记者同志^①已经来到这里。他同几个中国民族主义者可以组成一个由我们控制的编辑部。我们计算了一下，这项工作开始时每月需要 2500 卢布，以后则可以少一些。恳请解决这一问题，并给我们提供 4 个月的经费。最好电告结果。

附上远东局的工作报告^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谢廖金^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79，第 50—59 页。

打字稿，原件，最后一条建议和签字为亲笔书写。

① 指 J. 多尔逊。
② 见第 73 号文件。
③ T. H. 维经斯基。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1926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8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 (摘 录)

1926 年 7 月 18 日于上海

远东局的工作报告

(1926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8 日)

来自莫斯科的远东局全体成员于 6 月 18 日在上海聚集^① 并立即着手工作。

总的意见

我们都认为，在远东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最主要危险，是它可能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因此，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远东局的工作性质问题，并决定：

(1) 在列入远东局活动范围之内各个国家开展工作时，吸收各国党的代表参与共同讨论各个党的问题；(2) 对中国只限于根据中央向远东局所作的报告进行总的领导；(3) 谢廖金作为共

^① 谢廖金即维经斯基，在此以前曾访问哈尔滨、奉天、北京、汉口，并同那里的党组织领导进行了交谈。

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4）远东局的俄国成员帮助中央的工作，直接为各个工作部门负责人提供咨询和指导。鉴于中国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代表党中央参加远东局的一名成员外，还吸收一名候补成员^①。

总结一个月来的工作，必须指出，确实远东局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②

同中国党中央的联系

解决中国运动的问题自然占居着远东局整个工作的中心地位。中央工作的外部条件不可能提供经常同中国同志举行广泛会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只能举行我们远东局的三次全体会议，而中央全会^③是在没有我们的代表直接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与中央政治局及其一些委员一直保持着最紧密的接触。谢廖金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马克斯^④与从事组织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保持着联系，季米列夫^⑤经常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布林斯基^⑥接触，塔拉索夫^⑦定期与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会晤。从广州来的、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代表团成员^⑧向远东局成员们作过长时间的报告。一些决议、决定、声明，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起草的，都经过详细讨论，互相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尽管工作条件艰苦，还是建立了牢固的同志式的关系。

① 见第59号文件。

② 以下删去关于日本和朝鲜共产党的部分。

③ 指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

④ M. P. 拉菲斯。

⑤ H. A. 福京。

⑥ 任弼时。

⑦ J. H. 格列尔。

⑧ 张国焘和彭述之。

我们在解决中国一般政治问题中的作用

正如我们在7月1日的长篇电报^①中所指出的，广州的情况要比莫斯科所描绘的复杂得多。这里的真实情况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的。中央局对那里形成的关系不完全了解。只是在听取了中央的个人报告后，情况才完全弄清，而我们只是在来到这里后过了两星期才得以在这篇内容丰富的电报中对形势作出评述和提出具体的结论和建议^②。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涉及一个问题，即广州的形势问题。

在这以前，中央局还有些不知所措，前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们的意见分歧更加重了这种情况。我们远东局起了领导作用，并在全会期间既同中央达成了共识，也对中央内部统一意见的形成施加了影响。

有利于形成统一意见的因素有许多，我们仅指出其中的几个：（1）党的北方委员会提出“左的”报告，建议退出国民党^③；（2）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主席，其个人独裁倾向越来越明显；（3）一致认为必须有条件地支持靠革命舆论上台的蒋介石。

我们在起草这个报告时，中央全会已经通过了三个主要政治文件，即（1）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附上）^④，该决议坚决谴责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同时对与国民党的以往内部关系形式提出一些修改意见^⑤；（2）党关于政治形势和目前任务的声明^⑥；（3）以我们的电报为基础起草的关于广州的决议，该决议

① 见第64号文件。

② 这份电报是7月1日用密码发给北京的。7月9日我们得知，通过邮班寄到哈尔滨去了，因此到达莫斯科就很晚了（文件原有注释）。

③ 报告没有找到。

④ 决议没有公布。

⑤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4—178页。

⑥ 同上第144—159页。

是基本文件，尚须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专门委员会内详细加以讨论^①；（4）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②。

如果远东局早到这里来，哪怕是早两个月，就可以根据党的错误对中国事务作出许多提醒。即使现在，远东局的存在也起了巨大作用，它提醒了由于广州和国民党内发生变化，党不知所措，在党内可能发生的麻烦事。可以说，今天的中央全会给党制定了在新的情况下的政策方针，而且这个方针也会被全党接受。

在筹备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将全面提出关于国民党和我们与它的关系问题，供党的干部讨论。在这方面，远东局也定会起很大的作用。

中国党的组织问题

由于远东局的到来，中国党中央就各个方面工作准备了一系列详尽的报告，即关于组织建设、宣传鼓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的报告，合在一起有15个印张的厚厚一本。但这些报告都是用中文写的，上星期才给我们送来俄译本或英译本，我们还没有研究^③。由于时间不够，也因为中央局还没有准备好，在中央全会上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提出来。

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逐字逐句的译文我们还没有收到）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向党提出了由于近一年来党的发展而产生的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即必须加强和发展党的基层支部的独立性，基层支部应当成为党的真正基础，同时要加强纪律性和党的集中领导。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275—281页。

② 同上第179—187页。

③ 经过与原文核对后，将通过下一次邮班寄去（文件原有的注释）。

远东局的各部门

上面已经说过，迄今为止我们尚未了解中共中央的所有政治组织活动问题。妨碍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中央全会，部分原因是我们忙于处理一般政治问题，这在工作的初期是很自然的。远东局决定专门分出三方面工作：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和情报工作，最后一项工作由远东局书记马克思同志负责。随着国际妇女书记处代表^①的到来，我们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就近地从事妇女运动。

我们打算利用美国人和法国人^②的到来，顺便建立起情报工作。

我们是指定期地编写关于工农运动、党的工作的简要综合通报以及中国、朝鲜和日本报刊的综述材料。综合通报也将送共产国际执委会。

现已弄清，这里可以广泛地和比较廉价地出版中文和朝鲜文的列宁主义文献和一般共产主义文献。朝鲜同志现已准备付印4本小册子。其中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③

青年运动问题

青年运动问题正由季米列夫同志为远东局做准备，他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布林斯基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我们还吸收了查里同志^④参加远东局的工作，他是由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到这里来的，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一年时间。

① M. Ф. 库兹涅佐娃。

② 分别为：J. 多尔逊和J. 杜克鲁。

③ 以下删去关于菲律宾的部分。

④ H. M. 纳索诺夫。

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已有两次研究青年运动问题，听取了季米列夫的详细报告（报告提纲附上）^①。我们同意同志们制定的总的方针和工作计划，并就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作出一个决议。下面援引这个决议：

“（1）建议中央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在工会运动中坚决支持青年的要求的必要性。

（2）不提出关于吸收共青团员参加工会理事会的问题。

（3）中央全会的决议要谴责建立左翼学生组织的企图，如果在中央委员当中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支持这种想法的话。

（4）要注意到中央把学生运动置于自己直接领导下的决定已被错误地解释为排斥共青团，并且中央本身对这个决定执行不力的情况。

（5）不要过份强调儿童运动的集中统一问题。要把工人子弟联合在工会的队伍里，根据我们的精神来进行教育。参加领导和组织国民党的童子军。在儿童运动集中统一的情况下，让工会的儿童团加入童子军总会，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整个儿童运动的政治思想是进行国民革命斗争和同工农群众建立联系。”

当我们认真地了解中央的整个日常工作时，我们自然也要很好地研究调整党和青年的相互关系问题。

顺便说一下，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季米列夫同志就向我们提出了在这里成立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问题，这是今年春天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的决定。我们一致认为，在决定成立我们远东局以前通过的这项决定，现在不宜执行。与我们并行的这样一个远东局在这里是完全多余的，因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加我们远东局的工作^②。

^① 报告没有公布。

^② 见第59号文件。

工会运动问题

召开中央全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①从广州迟迟来到，以及塔拉索夫生病，使得远东局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从最初的几次报告中可以看出，今年5月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党犯了一个大错误。大会不是去认真研究一年来工会运动的广泛发展所积累的大量问题，而是满足于发表一些一般性的宣言，甚至不听取地方上的报告。

远东局决定建议中央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这些缺点。远东局还研究了从广州方面强加给工会运动的新的阶级调和思想：限制要求，以便不破坏民族（乃至省的）工业，建立必要的仲裁，等等。党应当同这种思想作斗争^②。

军事问题

党的军事工作开展起来了。各地都设立了由中央军事部统一领导的全权代表和委员会。不仅建立了情报工作，而且深入了军队，还同游击队保持了联系。谢廖金非常关心这件事。

详细报告下次邮班再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主席 谢廖金

书记 马克斯

共两份：一份送皮亚特尼茨基，一份留远东局存档。

全宗 495，目录 151，卷宗 269，第 2、5—1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刘少奇。

^② 见第 64 号文件。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 第 17 次会议第 11 号记录^① (摘 录)

1926 年 7 月 23 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第 17 次会议第 11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马克斯、教授、年轻人、小青年和印度人^②。

听取：1. 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预先讨论情况）。

决定：1. [1] 鉴于华中和华北部分地区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解放运动的变化，必须制定一些具体措施，以便（1）围绕着争取各省自治的口号把各革命团体（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阶层）动员起来；（2）通过成立城市行动委员会和由城市来领导农民运动直接为推翻督军制度而斗争；（3）在我党实行独立政策情况下，全力支持南方部队，坚定不移地采取在各解放区成立支持国民军的独立的工人、农民和国民党组织的方针，并在反对豪绅和买办，争取集会、结社、出版充分自由的斗争中利用这支

^① 文件上有批注：“在 1926 年 7 月 30 日的信中已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报告，记录第一项已抄送 J. M. 加拉罕和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分别为：П. Н. 维经斯基、М. П. 拉菲斯、Л. И. 格列尔、Н. А. 福京、Н. М. 纳索诺夫、В. С. 弗南耶尔。

军队作保护；(4) 在从北方军阀手中解放的地区和在即将开展斗争的地区扩大和巩固党和共青团。

[2] 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央应当向各区委发出指示信：(1) 说明过去的错误在于，我们在组织群众以便为争取政权民主化而展开斗争的方面没有很明确的独立政策；(2) 指出有必要尽快成立行动委员会、独立的工农组织，扩大和加强我们党和国民党。

[3] 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根据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决议^①，确立与国民党的正确工作方式。

[4] 此外，中央现在应当派两名中央委员去湖南和湖北，并挑选几名积极分子去华北和华中。

听取：2. 关于远东局广州之行。

决定：2. 出发日期定于7月26日。在出发前召开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远东局会议^②。

[附]

谢尔盖在俄国代表团 第17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纲

1. 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对问题的初步讨论)

谢尔盖的报告

沙赫^③认为北方的形势有利于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担心拉长南方战线和广州军队向北面粤州推进。吴佩孚正在长江集结海军力量(那里没有出现分化的征兆)。中央军事部已开始在水兵中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4--178页。

②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的第3项决定。

③ J. M. 加拉罕。

工作——派去了负责工作人员，提供了经费，准备了传单和……^①。北伐的困难在于军需食品和用品的供应。进一步向北推进会造成立反动军阀势力聚集在孙传芳周围的危险。过去国民军第一军可以通过陕西、河南和山西向河北施加压力，也可以利用依靠农民运动的樊醒民。但是国民军第一军已被调往南口，因此，冯^②的将领们在争取使广州军队向北推进。沙赫的方针是正确的：在湖北、湖南采取支持广州军队的方针，而在广州则有节制地行动，抑制进一步向北推进，把全部工作集中在巩固广州基地上。中央向广州发出的关于蒋介石而向农民的政策有变化的指示，鉴于有产生反革命的 danger，是完全正确的^③。正如在老头子的报告^④中所说的，在中央的方针中，必须纠正关于农民运动的错误指示：我们不要阻碍农民运动，而相反要促进其发展。老头子的说法，即似乎蒋介石代表大民族资产阶级，未必反映在对广州军队的态度上——现在需要支持广州，在这一点上必须使中央取得一致意见。

具体任务是：在地方上成立行动委员会（关于它的人员组成和具体任务必须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商定）；城市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不应掌握在我们党委会的手里，而应由城市的一般革命机构或许是行动委员会来进行领导。主要任务，特别是从革命军队到来之时起，就是最广泛地、自由地建立独立的革命社会团体，建立工人、农民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将以自己存在的事实来加强和利用革命的形势，同时与军事独裁倾向作斗争。在有利时机建立起来的行动委员会应当在打破和推翻督军制度、建立地方自治机构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必须坚决与某些同志放弃夺取政权口号的企图划清界线。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现时条件下切断

① 以下有一个词辨认不清。

② 冯玉祥。

③ 指示没有找到。

④ 指陈独秀 1926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执委会七月全会总结的报告。

同正在进攻的革命军队的联系，是与整个方针背道而驰的。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16—19 页。

打字稿，经过手笔修改，原件，无签字。

75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1926 年 7 月 24 日于上海

第三封信

亲爱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

1. 对于您给我和尼古拉^①的有关在军事行动地区和其毗邻地区积极开展我们的工作的电报^②，我只能作以下简要说明：根本谈不上由于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原则性意见分歧我们没有适当地利用一切机会来全力支持广州和广州的盟友来同吴佩孚及其盟友作斗争。相反，从我们对争取国家民主化的斗争的性质问题的整个提法中可以得出，应当在各地组织群众来为推翻督军制度进行斗争，将城乡群众越来越多地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因此，正当现在一些省的军阀集团在瓦解的时候，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怎么能不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上述组织群众和瓦解军阀的方针呢？问

^① 中共中央执委会。

^② 电报没有找到。

题只能是党是否有人力。在湖南和湖北，中央全会^①的代表已经回到湖南和湖北去了。中央要挑选一些积极分子派到这些省里去。在吴佩孚的舰队中已着手进行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您给广州的电报^②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定不移地说，您的方针确实已经得到贯彻。我很高兴，我们给广州的关于在后方存在危险的电报与您在最近给我和尼古拉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即应当在广州阻止进行远征，也是不谋而合的。

2. 随信附上远东局就我的政治形势报告召开的会议的记录和就该问题通过的决议^③。此外我还附上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党的决议^④以及我们关于全会结果的通报的前半部分。其他决议和材料还在整理。以后再寄去。但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我想您也可以对中央全会工作的性质有个概念。

农民工作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中央全会以后都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央的报告（篇幅很长）即将翻译完毕，以后可以给您寄去^⑤。反过来，我们也认为完全有必要把您所掌握的和广州那里有的有关农民运动的材料复印后集中在中央和远东局这里。根据陈^⑥的要求，将在远东局下面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在现时日常工作中如何具体运用以往的农民运动经验，并尽可能地对源源而来的材料作出归纳。

3. 关于鲍^⑦，我已经发电报和写信给您^⑧。现寄上本应由克里

① 指中共四届三中扩大全会。

② 电报没有找到，参见第54号文件。

③ 见第74号文件。

④ 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4—178页）。

⑤ 中共中央执委会向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中文本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3—173页。

⑥ 陈独秀。

⑦ 鲍世泽。

⑧ 见第66号文件。

莫夫在7月6日带给您的信^①。您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从一开始是怎样提出鲍的问题的。我认为在上海这样的社会里是可以利用他的，但要花费比您所拨给的多得多的钱。关于同美国人一起办报的事，我现在不能说任何肯定的话。鲍同密勒德在进行谈判，而那人一直说，美国人会给15万，但要求中国人至少给5万。很明显，据我所知，现在我们不可能帮助“中国人”。但鉴于我们的美国人^②的到来，我向我们的同志提出了创办（上海的）“论坛”型周刊^③的问题，这家周刊将由一批同情国民党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出版。现在正在物色人选。我们算了一下，办这样一个刊物需要每月花2500墨西哥元。请告诉我，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笔钱。

4. 谢伊格尔还在这里。您的电报^④到来的太晚了，是在星期日，即航班离开前一天才收到的。谢伊格尔在这里很有用，我想，目前中国中部的工作很需要人，不应把他从这里调走。应该让他抛弃他所拥有的这些形式上的权力，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让他回到最初任命的地方去^⑤。这将是合理的，无疑也是正确的。

5. 下星期初我将去广州，在那里要呆两个多星期。 此致敬礼

谢廖金^⑥

全宗17，目录84，卷宗1073，第77—79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J. 多尔逊。

③ 见本书第333页注①。

④ 电报没有找到。

⑤ 根据1926年5月31日Г. И. 维经斯基给Г. Р. 契切林的信判断，计划任命B. C. 塞格尔（弗雷耶尔）为苏联驻汉口副领事，经费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支付（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76，第7页）。

⑥ Г. И. 维经斯基。

76

鲍罗廷同蒋介石的谈话记录

1926年7月26日于广州

鲍^①同蒋介石在蒋出征前一天夜间的谈话

蒋^②：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鲍：没有，一切都清楚了。关于后方的事情，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蒋：后方的军事问题，不需要作任何改变。至于政治问题，我已经对李济深说了，让他同您商量着办。请告诉宋子文，目前他在钱款问题上对前方扣得太紧，需要改变这种情况。用于北伐的非常开支数目原先估计300万元，但宋只答应给250万。现在我认为需要350万，宋答应给340万。债券^③收入足够抵偿后方和前线的开支。但宋对银行^④过于担心。现在在市里没有给银行制造麻烦的坏人。

鲍：银行的储备金有多少？

蒋：300万。

鲍：我估计约有30%^⑤。

① M. M. 鲍罗廷。
② 蒋介石。
③ 指国民政府为北伐发行的债券。
④ 指广州的中国中央银行。
⑤ 原文如此。

蒋：为了对后方和前线有利，应当占领江西省。

鲍：我赞成占领江西，否则我们的战线狭窄，不能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但是北方来的同志坚持认为，我们在结束对吴佩孚的战役之前不应进攻江西。如果我们决定进攻，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向江西发起攻势呢？

蒋：大约在8月中旬。

孙传芳部队的指挥官向我这里派来了几个代表，他们很关心我们对浙江和江苏的态度，一位代表^①说，如果我们答应不进攻江苏和浙江，他们就不反对我们占领江西。我回答他说，我们应当占领江西，首先它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其次它是吴佩孚的领地。这位代表还说，在我们占领汉口后，孙传芳希望参加我们未来的政府。

鲍：唐绍仪想必与李鸣钟和刘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他已去南京。因此，当李和刘来到这里时，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确切的情况^②。进攻过三个星期就开始，那时我们就会弄清形势。打败吴佩孚以后，我们就能占领江西，不用担心孙传芳进行干预。

我们不需要进攻江苏和浙江，因为这会使我们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

蒋：已为两位将军准备了专门的住所。他们来了，请通知李济深，他会照顾他们的。

鲍：他们什么时候来，应同谁会谈？

蒋：同谭延闿、张静江，李济深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钮永建参加。

鲍：如果他们建议成立联邦政府，那我们应该如何回答？您的意见如何？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冯玉祥的代表刘骥和李鸣钟于1926年8月22日到达广州。

蒋：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您同他们一起谈谈这个问题吧。

同一天，在同留守后方的将领们会见时，蒋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应该向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静江，孙中山尊敬他要比我们尊敬总统更甚，他在最困难的时期始终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鲍罗廷，是总统推荐给我们的，自总统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96，第 23—24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77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26 年 7 月 27 日于上海

秘密

维经斯基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皮亚特尼茨基

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扩大全会日前已结束，几乎各省都有代表参加。主要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和农民问题上。可能导致从组织上脱离国民党的极少数人的立场受到了谴责。采取了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方针。留在国民党内，不监护左派，也不取代左派。全会发表了告广大民众书，号召组成反对军阀的统一战线，支

① 文件上有批注：“皮亚特尼茨基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持广州，把工农、市民和贫民的力量组织起来^①。告广大民众书提出了政治行动纲领，阐明了广大群众的要求。鉴于华中和华北的运动日益活跃，党和共青团在动员力量加强河南和湖北的工作。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将会得到加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关于广州问题的最后决定要在我们从广州回来后作出，我们将于28日去那里。

核对无误

全宗514，目录1，卷宗180，第42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5号 （特字第33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8月5日于莫斯科

听取：2.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2. [1] (1) 郑延禧关于召回加拉罕同志的照会问题推迟一星期再议。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44—159页。

(2)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通知张作霖：向他提供贷款问题应与奉天总的谈判联系起来。

抄送：

契切林同志

听取：[2] 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7 月 1 日会议第 37 号记录，决定：1— [1]），（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契切林、索洛维约夫同志）。

决定：[2] (1) 建议于右任目前撤销关于建立对华北所有国民革命力量的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建议冯^①和于右任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统一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时（红军的经验表明，这样做是合适的），建立统一的机构来领导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是个按党的系统隶属于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机构，但不干预国民军司令部的行政管理工作和作战工作。

(2) 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②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

(3) 推迟对香港罢工问题作出决定，就此问题征询国民党中央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

(4) 允许拨款 3—4 万卢布，帮助冯购买汽油。

(5) 认为不宜在让冯尽快去张家口一事上给冯施加新的压力。

抄送：

① 冯玉祥。

② B. K. 布留赫尔。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100—10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

1926 年 8 月 9 日于广州

鲍罗廷同志论北伐及其政治前景^①

当我们谈论北伐时，应当注意到**这个思想的两种提法**。孙逸仙本人起初设想这次北伐是对北方军阀的纯军事讨伐。后来俄国人来了，给这个思想提出了新的革命的提法：北伐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商人群众革命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有其明确的要求和纲领，其体现者是正在北上并要在那里根据上述革命要求协助把这些群众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军队。

3 月 20 日以后，北伐的思想在失去这种革命的性质。在蒋介石的政治提法中根本没有明确提出某些居民阶层的革命要求。他

^① 本文件由两部分组成：带有两处空白的主要部分和以《我们的策略》为副标题的经过删节的部分。本文件集援引的是综合稿，并注明了空白范围。

谈论的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是抽象的中华民族。他统率的不是由于有这些一致的要求而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部招牌的纯军事组织。

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进行北伐（在他看来这是汪的主要罪状），我4月底回到这里时，我发现北伐已经准备就绪。当然，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国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因此，我在同蒋介石和同其亲密助手们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申明，我认为像他所策划的**这种北伐**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事情。我对他说，我们俄国人将密切注视这次北伐。如果它最后取得成功，我们会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与我们的观念相抵触的。

同时我还补充说，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将给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能不这样做。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北伐的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①。

总之，在3月20日以后，我们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和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都不能充当蒋介石的反对派，因为蒋介石本人在他对北伐的非革命的**解释中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〇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例如，若是共产党人因逮捕陈森（与右派有联系的工人组织的首领）^②问题而举行反蒋总的政治罢工；蒋介石就会枪杀罢工者，然后与左派彻底分道扬镳，并会迅速向右转。

如果我们由于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

① 以下是第一段空白。

② 广东工会主席陈森是因工会积极分子杀害两名官员而被捕，但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获释。

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①。

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军事权威们非常了解整个形势和吴佩孚、孙传芳及其他所有地方军阀的军事实力，他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的方案，得出了有利的结论。了解各派军阀底细的中国将军们也认为吴佩孚在任何方案下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你们问是否估计到了孙传芳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当然，估计到了。这个方案也是作了研究的，我们的和中国的军事权威都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胜利也是有保证的。我们已经获悉，孙传芳派来反对我们的将领当中，有一名^②通过北京告诉国民党说他愿意转到我们这边来。

现在在蒋介石和保定派^③之间就谁应进军湖北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的摩擦。这些摩擦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并将影响蒋介石在某一方面的政治上的失败。但是，不管哪些部队进入武昌和谁将统率这些部队，吴佩孚的军事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这个结论是从投入北方的大量军事力量中和我们对敌人军事力量的估计中得出的。

占领武昌将在中国军事史上开辟新的纪元。但是从占领武昌那一刻起就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政治混乱。现在一路上已经有许多将领加入我们的军队。占领武昌后，这些将领就会在武昌提出兑现承诺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求给一个省，可是占领的省份少于将领的数量。

如果蒋介石是占领武昌的那个集团的首领，那么其他力量就

① 第一段空白处到此结束。

② 何人不详。

③ 保定派联合了国民革命军内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其首领被认为是唐生智将军。

会纠集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一致进行斗争，蒋介石就会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这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灭亡的第一种可能。

但也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蒋介石预见到在武昌的这种灭亡，现在就向保定派作出让步，不去占领武昌，率一部分部队向江西进军，并急忙回师广州。这样只会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回师广州和不去打武昌，蒋介石就不得不宣告北伐失败。他的回师也就意味着北伐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意味着重新审查蒋介石迄今所采取的整个政治立场。这会给蒋介石所有对手的发难造成极其有利的局面，首先是左派和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5月15日^①以后根本没有参与蒋介石所策划的北伐，所以他们能够考虑蒋介石这一政治失败的后果^②。

现在在弄清了蒋介石及其整个政策可能遭到失败的两种情况之后，我们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呢？

我要预先说明，我看不出派系斗争的结果会是军事上的失败。这取决于军事力量对比。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蒋介石率领部队进攻武昌时，将领们的各种打算都会直接向他提出。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决定，那时应当在武昌召开广泛的国民党代表会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同汪精卫保持经常性联系。我曾同一些开赴前线的将领们交谈过，我明白了，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代表会议应当代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商人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当然，对将领们来说，这个纲领是无所谓的，但是他们会声明同意这个纲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纲领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蒋介石下台。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然后可以在这里广泛地完成在广州曾经做过的工作，逐步解除可能对国

^① 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

^② 以下是第二段空白。

民党左派构成威胁的那些部队的武装。

用这种办法我们在目前就能达到自己的基本目标：**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从前线返回广州，让保定派进军湖北，那么共产党人就会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利用蒋介石及其北伐在政治上的失败，立即毫不迟疑地完全公开地发起反对蒋介石和要求汪精卫回来的运动。

遇到的问题：这里有三点：(1) 对北伐军事前景的估计，这个估计是在绝对乐观的话题中提出的——只能根据专门的调查来加以验证，可把它放在一边；(2) 政治上的展望，这里注意到通过上层军事派别的简单政治游戏和力量配置来改变3月20日结局的可能性。但没有分析导致蒋介石集团在“三二〇事件”中得逞的社会政治原因，也没有分析在远离广州达2000俄里的武昌，在只有一条细“香肠”把武昌和广州连接起来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会造成社会政治条件；(3) 共产党人以上层集团的力量格局为基础构筑策略的方法。

鲍罗廷的回答：你们知道，我本人并不认为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可是现在，我是以你们的共同看法为出发点的，你们认为存在国民党左派，在军队向北推进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直在群众中做认真的政治工作。武昌代表会议可体现这种政治工作。因此，我把一切都只建立在上层集团身上是不对的。

我应当指出，这里对我提出的反驳意见，有许多是误解，反映出对我们在中国的政策了解不够，我们的政策应当考虑到也不能不考虑到所有这些派系和它们之间的斗争。我们不能在这里采用我们在西方所使用的那些纯布尔什维克方法。

全宗514，目录1，卷宗190，第89-94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 关于广州局势问题的初步结论

1926年8月9日于广州

第×次^①会议（广州第一次会议） 第×号^②记录

听取：关于广州问题的结论^③。

决定：1. 认为关于广州问题的决议草案和7月1日给莫斯科的电报^④正确地说明了形势、三二〇事件的实质和以后一个时期的政策，同时也为国共两党的政策提出了正确的结论。要为决议补充以下几点：

2. 要指出，便于政权转到以军队为后盾的蒋介石集团手中和广东省地方政权机关中反动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革命人士很少深入两省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民众的组织性不强，国共两党的影响不够。应当用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政权很容易从左派手中转到军事集团手中。

3. 要指出，政治组织的这一弱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孙文主义的错误思想影响造成的，孙文主义常常夸大军事因素在革命建设

①② 编号没有标明。

③ 文件上有铅笔写的批注：“尚未核准”。

④ 见第64号文件。决议草案没有找到。

中的作用，很少注意组织社会革命力量。

4. 要指出，普遍迷恋于不切实际的和有害的北伐思想也是夸大军事因素的极端结论之一。

5. 要指出，广东的共产党人也染上了这种迷恋于军事的毛病，这证明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够坚定，也说明在总的革命建设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缺乏独立的政治方针，他们把北伐描绘成万应灵丹，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帮助向北推进的一种手段。

6. 要指出，国民党左派在政变前和稍后时期未能建立某些基层（当然比共产党更自由的）党组织，他们几乎只是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

7. 要指出，阻碍两省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积极性和组织性提高的并使所有政治组织的上层性质凝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迄今为止没有代议制（在社会各阶层代表基础上）的政权机构，这些机构本可以支持政权的革命政策并成为它与主要革命阶层之间的联系纽带。在与群众的联系没有固定形式的情况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决不能保证政权的革命稳定性，也不能阻止军事集团的胜利。

8. 要向地方委员会^①指出，它的关于在不久的将来政权会重新回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手里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不长期坚持不懈地在基层做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巩固工作，想要立即夺取政权，这只能有利于反革命分子。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任务应当是在实行独立的政策和提出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基础上在基层进行广泛的工作，而不是试图立即夺取国家政权机关和党的机关。我们党应当利用每一个时机来加强和扩大一切革命组织，抛弃上层集团

^① 中共广东区委。

的那些指望在上层简单地转移国家机关的阴谋诡计。

9. 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中央的立场，就像老头子^①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②中表述的那样，这样来准备条件，使党能在有利的时机提出具体的口号，制止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因为这是与向农民征税和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有联系的。

10. 党必须同这样一种错误的和极端有害的观念进行严肃的斗争，即似乎在广东和整个中国不存在建立国民党左派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和革命积极分子。这种看法也助长了一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和有害的观念，即在中国没有国民革命，共产党人能够承担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全体农民的直接领导。这种错误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在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工作中造成国民党左派分子而决不是非共产主义分子充斥我们的党组织。

11. 国民党左派在广东和广西两省的社会基础是：(1) 城市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2) 知识分子和革命学生；(3) 基层和中层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4) 多半是农民（在这里我们的任务应是在促进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作用，包括在国民党农民组织内的领导作用）。

12. 国民党左派在组织上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是个坚强的和有纪律的组织。它的模棱两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共产党人必须坚决抛弃在国民党左派内发号施令的想法。共产党人的参与无论如何不应突出表现出来。必须自下而上地帮助从上述社会阶层中推出新的分子，把他们团结到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分子领导层中，逐渐地消除其上层的清一色知识分子现象。必须帮助国民党左派建立起俱乐部式的组织，在其主要核心周围建立各种行会式的地方机构。在某个组织的上层加入国民党左派的

^① 陈独秀。

^② 指陈独秀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见《向导》周报上海1926年7月7日第161期第1584--1585页）。

地方，必须使整个这个组织纳入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以便日后它完全可以宣布自己是支持左派集团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应当到行会中去，帮助它们提出自己的要求，等等。

13. 最近（可能在我们还在这里逗留期间），要召开国民党左派的会议，以便在会上在对时局进行评估后向他们提出按上述精神建立组织的问题。

关于结束香港抵制罢工的问题，决定过几天，在与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得到新的情报后再讨论一次。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2—4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 与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议记录

1926 年 8 月 12 日于广州

与中国同志的会议

（1）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

在我们与陈^①、张太雷和沃罗夫斯基^②同志举行的会议上，我

① 陈延年。

② 黄平。

们向当地的同志们指出，他们的方针是错误的，例如他们不愿意也不善于同国民党左派共事。他们提出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使这些国民党左派成为像共产党人那样的坚定不移的和彻底的革命者，并使他们在共产党人的指挥下工作。区委^①书记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这些国民党左派是些什么人和共产党人如何竭力设法同他们一起工作并支持他们。

陈：先讲一些事实。3月20日以后，这里的左派当中谁都不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不愿忍受蒋介石的压力，跑来向共产党人求教和求助。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间，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劳的走狗。这是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国民党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而左派自己提不出任何建议。5月15日左派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以为，国民党左派会在中央全会上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但他们却投票赞成这些提案。我们曾帮助左派，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由谁来担任部的领导等等。左派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希望自己来工作。我们曾在各方面帮助他们：考虑到他们的愿望，我们退出了他们的机构或者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晚些时候到来的顾孟余说：应当把情况搞清楚，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不过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和组织。国民党左派在这方面的情绪很大。各派都集合起来。成立了两个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两派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党团，蒋介石和顾孟余都参加了。他们讨论了3月20日前发生的一切。甘乃光和吴耐罗（音）^②过去是我们的同志，被开除出了共青团（不知为什么），现在他们想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他们说：“不要回来，在左派那里工作吧！”他们总共有20人。还有陈公博，曾经有一段时期和陈炯明在一起，他有个小集团，在国民党里谋求职位。顾孟余带着20名从上海和

^① 中共广东区委。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北方来的学生。他说他的团体是最秘密的。只有一个人同我们有联系。甘乃光曾得到我们的帮助。另外一些人自己组织了自己的小集团。他们想要建立纯粹的左派，把中派开除出自己的集团。他们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他们说，这样不好，应当在理论宣传方面把所有人都联合起来，但不是组织上的联合，因为蒋介石反对这样的组织。鲍罗廷在5月份召开了清一色左派（顾孟余、甘乃光等）会议，并由他们成立了出版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还召开了一些吸收几位同志参加的非正式左派会议。一个月以后发生了分化。

陈公博公开反对群众性的工农运动。

谭延闿^①声称，蒋介石是唯一的首领。

甘乃光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虽然不同，但我们也应当在群众中进行活动。

顾孟余说，只有知识分子能进行革命。群众不识字，只能进行罢工。分化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

蒋介石建议举行左派和中派的联席会议。多数人是中派，左派将为中派服务。

结论：左派在分化。一些人明白了，应当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另一些人在为蒋介石效劳。过去有个纯左派组织即左派和共产党人。后来就成了左派和中派。他们的理论是：左派应当有独立的理论和组织，要重新审查在农民和工人问题上的立场。在这里，他们已经都是中派。他们到处说，应当保守秘密。

马克斯^②：对谁保守秘密？对谁搞阴谋？

陈：对共产党人。关于工人运动，他们说，应当打倒左派痞子和右派。扶植另外什么人，他们没有说。他们秘密付印14份自己的决议。但排字工人是我们的人，我们给自己又印了第15份。

^① 可能是邓演达。

^② M. Г. 拉菲斯。

这些左派的生活要比3月20日前少^①。有两份他们会议的记录，他们不再进行工作。他们越来越分崩离析。

甘乃光现在在农民部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决定不发表关于工农运动的报道。但农民报（省机关报）^②编辑甘乃光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始终参加集团的会议。他来同我们商量，然后按我们的意见写文章。顾孟余则常说，哪里有共产党人，那里就什么事也搞不成，因为他们把什么都揽到自己手里。后来北伐开始了。顾孟余和邓演达说必须禁止罢工。甘乃光每天在报纸上反对这样做。在选举蒋介石当总司令那天^③，他还在报上发表一篇尖刻的文章。甘乃光有一个30人的精干集团，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在我们的同志动身去参加中央全会^④的前几天，我们决定同左派谈一谈，并对他们说，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在同香港谈判期间脱离群众（他们没有参加支持香港罢工的示威游行），他们也没有参加为进行北伐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我们硬把他们推上了台。现在来谈谈国民党的组织。人们现在不到中央那里去，你可以在那里坐上4个小时，也没有一个人来。而国民党省党部却有人去。我们不能同他们一起宣传北伐，因为我们持不同的态度：他们主张禁止罢工，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只是同意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不积极。为了进行北伐召开过一次全市大会（300人）。我们的人也去了。蒋介石说，国民党需要有革命的领导。别的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任何作用。国民党左派的群众活动组织者说，应该让汪精卫回来。群众反对国民党。不能在他们当中进行北伐宣传。参加支持香港罢工示威游行的有3、4万人，商人也参加了。而参加欢送蒋介石出征的只有3千人。3月20日以后，当蒋介石

① 原文如此。

② 看来是指1926年1月至1927年1月在广州出版的旬刊（后改为周刊）《犁头》。

③ 1926年6月4日。

④ 指中共四届三中扩大全会。

采到黄埔军校时，学生们公开问他，我们的政委汪精卫在哪里。黄埔的一名学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你总是说，你领导着党。但我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党。我不是共产党人。但在南京有一名共青团员对我说，共产党人有纪律、有平等。他们的中央作出决定，陈独秀应与妻子离婚，因为她妨碍工作，于是他就离了婚。我们也应当有平等。我作为一名学生对你说：‘你做得不对，可你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但这是不对的。孙40年都沿着一条道路走，而你摇摆不定。’^①这封信发表在校刊上^②。蒋介石悲伤地承认说：“他的意志摇摆不定，但他现在和将来都将忠实于孙的思想”。

3月20日以后，在6月份（还是在6月7日以前），黄埔军校内进行了选举黄埔军校国民党组织领导人的活动。共产党人根据同左派的协议提出了9人名单：3名共产党员、3名右派、3名左派。蒋介石表示赞同。右派提出了清一色右派名单。左派的名单被通过了。右派简直是丧魂落魄。你们可以看出，我们是和左派一起工作的。这以后，学校里的右派声称，共产党人要退出国民党。左派有些担忧。他们说：“迄今为止共产党人一直在帮助我们，在同右派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如果共产党人要退出，就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党里去，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因为北伐，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撤销了所有左派政委的职务，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来替代他们。当他得知学校内存在非法的左派集团时，他颁布一道命令（用影印形式登在黄埔校刊上），禁止组织任何集团，因为这会破坏“黄埔精神”。蒋介石成立了黄埔学生会，以此来吞噬所有集团和派别，学生会像共产党那样有极严格的纪律，并秘

^① 在这封信里还说：“你脱离了革命，一天比一天越来越成为军阀。如果我们过去跟着你走，把你看作孙逸仙博士的追随者和学生，那么你要知道，一旦你背叛人民，我杀死你时我的手也不会发抖。”（引自A. H. 切列潘诺夫《一个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11页）。

^② 看来是指1926年7月起在广州出版的《黄埔潮》周刊。

密进行工作，这是建立自己（第三）党的尝试。

蒋介石与学生委员会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它的任务：将通过学生会来进行军队中的一切任命和提升，委员会成员应完全献身于军队，谁也不得参加其他政党。学生会委员会是通过全体投票选出的：22名委员中有14名共产党员。然后委员会选出了宣传鼓动部和其他部的负责人，结果选出的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地区委员会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将听从他的指挥，但地区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他，他们依然是共产党人^①。

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在那里占多数）有自己的委员会，每周在市内秘密聚会一次。他们对共产党员说，跟他们一起走吧，虽然他们（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已经退出国民党。在左派的激烈反对下，右派（黄埔军校国民党委员会掌握在他们手中）通过了抗议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文章^②的决议。现在我们也可以黄埔军校领导一切。三天前，在（联合了过去和现在的黄埔学生）的黄埔军校学生会里，一名学生再次谴责陈独秀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痛击。左派要求国民党中央解散黄埔军校的这个右派国民党委员会：黄埔学生拥护工农，拥护革命，不能忍受身边存在右派委员会。黄埔军校的学生打算近日在这个口号下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并向（驻广州）二十师的指挥官，原黄埔学生质问：黄埔学生是赞成还是反对革命。中共地区委员会劝他们不要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建议他们发表一个宣言，要求禁止以北伐为借口镇压工农运动，并用同样的精神给蒋介石写一封公开信。学生是否听我们的，不得而知。

结论：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同地区委员会、同中央各部负责人一起工作，这从我们列举的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我们履行国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见本书第375页注②，决议没有找到。

民党中央的决定。

他们想让一名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地方党部工人部的领导，我们表示不同意并建议让一名国民党左派来担任。孙科从地方党部赶走了孙文主义分子^①和右派，我们建议不要委派共产党人，而要委派国民党左派。孙科请“南洋”烟草公司的经理^②来领导商业部。他要求一名共产党员当秘书，我们不好拒绝。我们的陈同志^③作为工农商学联合会的委员在这里成了中心，商人们都来找他，把他当作纠纷的仲裁人。

（2）关于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的党际间会议

陈：国民党想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宣传工作的展开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上层的主要内部关系问题（围绕蒋介石的斗争）上转移开。我们的处境将是艰难的。如果我们的地方组织犯错误，这还不那么可怕，如果中央犯错误那就糟糕了。或许将这个会议拖延一下为好。

谢尔盖^④：主张召开会议，以便消除关于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敌对的传言和担心，并申明自己必须同广东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立场。

陈：这是有好处的。但我们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问题。我们只明确了一点即国民党的独立性。但不清楚我们如何对待国民党。对于会议，我们应当随机应变，以便弄清国民党中央内的中派想通过这个会议达到什么目的。看来，他们希望向舆论界表明，共产党人不是中派的敌人。但是我们党对中派的态度应如何呢？这里不应存在幻想。

① 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

② 简琴石。

③ 可能是陈其瓌。

④ I. H. 维经斯基。

马克思：我们是否应该在会上阐述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要求，以期纠正蒋介石的政策或者表明对中派的敌对态度呢？

陈：第一个方针是正确的。第二个会是有害的，尽管我们应当知道，中派不会履行自己的诺言。

谢尔盖：或许在全国范围内对中派也采取这样的方针。

陈：这只能在会议以后作出决定。

谢尔盖：难道不能早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同中派作斗争，然后与国民党中央召开和平会议，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斗争。

陈：我不知道怎么办。

谢尔盖：我们不是责怪您没有立场。这里的处境是艰难的。

陈：我想，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

(3) 组织问题

陈：俄国同志参加农民委员会很有好处，尽管他们暂时还没有提出原则性问题，只提出一些组织问题，如建立农会。我们没有为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履行手续，认为这事将由阿莫索夫^①来做。

现已商定，由地区委员会为此作出决定。

陈：在我们这里一般说来工作安排的比北方好。区委受到信赖。虽然我们这里都是东大生^②，但这一点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从我们方面说，常有些工作我们没有同他协调一致。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同志在这里发号施令。另外，我们过去的一些老同志对我们组织中的平等关系不满意并在北方反对我们。彼得罗夫^③在中央说，这里

① 张国焘。

② 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

③ 彭述之。

的书记太一手包办了，但这是不对的，而且中央已经不提改组我们的组织和进行调查的问题。阿莫索夫在给蒋^①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建议要对北方来的同志更客气一些。

谢尔盖：我们对广州没有这种印象。我们只是想同你们谈一谈原则性问题。这里用不着客气。我们应当了解实际情况，消除中央的意见。

（4）农民问题

陈：农民运动现在处于防御阶段，豪绅、地主、一切反革命势力在进攻。但农民对土匪和民团的防御正在转变为武装斗争。对农民来说，主要问题是武器。在县城里，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各有不同。在同土匪进行斗争的地方，小城镇和农村站在一起。学生对农民运动表面上漠不关心。但有50%的学生从社会地位说是反对农民的，因为农民在为剥夺世袭的土地而进行斗争，而学生希望维护世袭的土地。广州的城市手工业者在为农村制造鞋、衣服和陶器，他们同农村有联系，拥护农民运动。（民族的）“南洋”烟草厂只为城市生产烟卷，它（对农民运动）是漠不关心的。小的银钱兑换商和高利贷者反对农民运动。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城市商人反对农民运动。有些小地主希望加入农会，但害怕大地主。概括地说，可以把顾孟余算作是他们的思想家。太平天国起义的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定为洪^②建立纪念碑。秘密社团在不断发展，其中有一个叫“三点水”，这是洪的姓氏中的汉字旁。农民中说：“杀地主，分田地，没有罪。”共产党人希望这样。有个农民在回答谁是领袖的问题时说：“有三个领袖：列宁、孙中山、彭湃”（后者是我们的一个同志，有声望的农民领袖）。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陈延年。

② 洪秀全。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11--14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 会议记录

1926 年 8 月 15 日于广州

第×次（广州第 2 次）会议^① 第×号记录^②

三人都出席^③。

听取：关于党际间会议，关于我们离开日期。

年轻人认为，推迟党际间会议会给国民党左派造成某种负面印象，好像“我们方面在玩弄阴谋诡计”。这个会议本身目前对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举行这个会议，我们就可以使问题摆脱僵局。在英国人^④和区委^⑤对党际间会议以及对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都采取否定态度的情况下，我们从这里离开就可能在最近三周内完全破坏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党际间会议本身再过六周就会失去其意义。因此必须电召中央代表团到这里来，而谢尔盖要在这里呆到会议结束，不能把整个事情再拖三周。

①② 编号没有标明。

③ P. H. 维经斯基（谢尔盖）、M. P. 拉菲斯（马克思）、B. A. 福京（年轻人）。

④ M. M. 鲍罗廷。

⑤ 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

马克思认为，鉴于已经弄清，英国人在这里继续逗留明显是有害的并威胁到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解决所有问题并执行谢尔盖的计划，或许是最正确的，那就下个航班大家（我们所有人）都离开这里，把英国人带走，让谢尔盖和英国人到沙赫^①那里去，在那里了结一切。年轻人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事情可以事先防备：可以让区委在地区机关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以缓和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的口气欢迎党际间会议；可以发电报请中央也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同样的文章；谢尔盖可以正式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他的参加是国民党中央全会关于党际间会议的决议规定的），讨论两党会议的可行日程——通过所有这一切可以强调我们对会议的认真态度和消除因推迟而产生的谣言。谢尔盖和英国人离开的问题应当从如何对近日内可能发生的围绕蒋介石和其他觊觎权力者的斗争作出评价的角度来加以解决。在重要关头，我们不能让英国人轻易离开（他可能正这样想），以便不使这里的各级苏维埃机关失去领导，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可能出现严重的事态，我们也不能让英国人一个人和现在的区委在他们实行错误政治方针的情况下留在这里。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事先弄清总的形势：能否指望在最近一个月内有个月局。

谢尔盖：党际间会议的意义可能是很大的，但只有在这次会会议不是孤立的，而且随后同国民党左派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和确立对蒋介石现政府的正确态度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如果情况相反，在会议结束后，广州这里的关系还像现在英国人和我们的区委阻挠建立合作那样，那么国民党人就会责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耍滑头和不真诚。现在可以认为确凿无误的是英国人在指导区委的行动方针。他们对党和我们在国民党问题上的立场显然都

^① J. M. 加拉罕。

持否定态度：我曾建议英国人在有我参加的头几次会议举行之后还要召开与国民党的会议，他坚决拒绝了。与国民党的正确关系只能在英国人和区委领导人从这里调走后才能建立起来。在此以前，会议应当推迟并尽早与中共中央和沙赫商定，毫不拖延地把英国人和区委领导撤换掉。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这里会出现尖锐的麻烦。前线将领之间的斗争可能会拖延很久，不致尖锐地提出权力问题。可能很令人担心的是这里的将领们由于对全省的农民运动发起进攻而采取反革命的方针。他认为，现在应该将两党会议大约推迟六周，因此大家可以乘下一班航船回去。

决定：1. 同英国人举行一次会议，结合中央的来电^①和当地的报道讨论一下整个政治形势问题。

2. 由谢尔盖在近日内与国民党左派会晤。

3. 由谢尔盖同中央谈一下即将举行的党际间会议的任务。

4. 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一篇欢迎会议的文章。

5. 在讨论了总的政治形势后作出一项关于启程和推迟会议的正式决定。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19—20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电报没有找到

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 与鲍罗廷会议记录

1926年8月16日于广州

秘密

会议记录

出席：鲍罗廷^①、谢尔盖、马克斯和年轻人。

鲍罗廷提出三个问题供讨论：（1）北伐。（2）如何巩固和扩大国民党左派。（3）召开国共两党党际间会议的日期。

谢尔盖建议，我们在这里商量好之后再同区委^②一起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关于对北伐的态度问题：

鲍罗廷：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这项工作，以便使群众了解我们的态度，同时不过早地引起蒋介石和我们之间的冲突？现在我们支持北伐，甚至广泛宣传北伐，但同时又对它采取批评态度。从陈独秀的文章^③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立场就是这样，国民党也了解这一点。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他们的行动不能不给国民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反对

① 以下分别为：Г. И. 维经斯基、М. Г. 拉菲斯和 Н. А. 福京。

② 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

③ 见本书第375页注②。

北伐。我认为，这种方针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因此应该防止这种冲突的很快到来。我认为，北伐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失败成为事实，我将提出一个在群众中开展运动的计划，以便让左派重新执政。那时我们将说，造成失败的原因是：（1）3月20日事件；（2）5月15日二中全会和（3）国民党回到了1924年改组以前的立场，即抽象地谈论“国民”和“国民革命”，而不把运动同群众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

现在任何使立场尖锐化的行为都会被用来谴责共产党人，似乎他们同左派一起促使北伐遭到了失败。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人们很容易把我们搞垮，那时就没有人来利用北伐在政治上遭到失败时候的形势了。陈独秀的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从北伐被转移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了。昨天，黄埔军校教育长^①跑来，真是跑来找我，建议我今天去他们那里讲讲话，以平息校内的激烈情绪。他说，共产党人表现很好，但“激进”分子（后来他直截了当地说左派）很不安。他说，校内情绪发生了大转折，孙文学派^②处于少数。我们的任何批评都会导致冲突。

同时，对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对北伐，对在后方和在农民中进行的工作）持反对立场的人在增多。应当占领阵地。国民党左派不会主动承担对反对派的领导。他们希望我们来做这件事，这样我们就又会同蒋介石发生冲突。他们等待着时机。在对他们来说最坏的情况下，可以把他们的这种立场解释为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反对派，应当注意到，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的整个政策总的说来不是对共产党有害，而是对国民党左派有害。共产党在广东得到发展。共产党人本来乐意领导这场反对派运动，但我们没

① 邓演达。

② 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有力量来承受不可避免的打击。因此我说：“如果老头子^①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那么它是错误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同蒋介石发生冲突。”

谢尔盖：问题提得很明确。但我们请求您用前线和这里的力量对比情况来加以补充。

马克斯：您在一周前向我们描绘了总的力量对比情况^②。是一切依然如故呢，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鲍罗廷：今天的情况和那时的情况完全一样。

谢尔盖：国民党中央里面谁指望蒋介石失败？

鲍罗廷：首先是左派和共产党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是右派。至于孙科，他既同左派调情，同时又不同蒋介石搞坏关系：他认为可能出现左的高潮。谭延闿和李济深反对蒋介石。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直爽和坦率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曾对蒋介石说过，我不相信北伐，像现在从政治角度组织的那样，会取得成功，但我将支持北伐。国民党左派有防备蒋介石遭到失败的计划。他们对我们率先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感到高兴。我和顾孟余毫不隐瞒，我们期待着汪精卫在蒋介石失败后回来。至于谭延闿，他也希望汪精卫回来，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彻底离开。我也认为，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共事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

马克斯：您在上次会议上说，前线将领之间的斗争不会影响军事形势。现在军事形势如何？

鲍罗廷：在湖北前线，总的情况可以说没有敌人。那里的敌人正在被埋葬。北伐在那里就是“埋葬敌人”。军人们会说，这是收缴敌人枪炮的讨伐。在孙传芳战线，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主要战线。在这里应当指出，加拉罕、我和中共中央对这条战线的方

^① 陈独秀。

^② 见第79号文件。

针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前线将领之间的斗争，可以说他们的关系反映了后方的情况。保定派^①的胜利对我们是不利的。蒋介石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中间作出选择：或者同我们作斗争，如果我们反对他的话；或者走向政治上的失败。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现时的方针，不同蒋介石搞坏关系，维持黄埔军校的统一，那么一切都会照旧。如果我们改变方针，那么同蒋介石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谢尔盖：您是怎样理解蒋介石的这个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的？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又如何到来？

鲍罗廷：在所谓党的军队^②中有许多人不了解北伐两种提法之间的差别：一种是同人民大众的革命压力相联系的北伐；另一种是3月20日以后蒋介石组织的纯军阀性质的北伐。蒋介石想证明，他蒋介石和他的北伐方法确实可以解决中国的整个国家问题。蒋介石要让这些人相信，他不取得胜利就不回家，或者宁可在前线阵亡。这是些什么人呢：（1）士兵群众；（2）军队领导人。至于后者，这就是孙文主义分子、蒋介石所理解的北伐的思想家，这些人不值得一谈。但士兵群众真诚地相信蒋介石和他所许下的解决国家问题的诺言。他们的这个信念能得到证实吗？随着这些士兵越来越明白，敌人是软弱的，因此就不能把所有国内社会政策问题搁置一边，蒋介石的立场就会失去支柱。群众意识中的军事危险心理就会消除。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从黄埔军校学生因为错误增补校委会这个小问题就制造一场冲突的事件中可以看出。陈独秀的文章反映了这些群众的意见。

马克斯：您是怎么想的，是否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在您所说的这些变化和他不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危险的影响下，自己会向左转变立场，以便与跟着他走的群众找到共同语言？

鲍罗廷：蒋介石开始明白这一点。我们是从他在前线的行为

① 见本书第370页注③。

② 党的军队指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

的变化中知道这一点的。在他到达长沙以前，他断然拒绝向群众发表任何讲话，如果不得不讲的话，那也只是简短地谈一谈北伐的重要性，北伐将导致全国的解放等等，等等。他对我们的态度也很谨慎。但是当他越过广东边界，了解到保定派的计划，听到黄埔军校内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猜想），了解到邮电工人罢工和逮捕他所保护的广东总工会的领导人时，特别是在逮捕陈森事件上^①，他讲话的调子就变了，在群众集会上开始谈论群众，同意发表新的宣言，改变了对俄国人的调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是能够向左转的，并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而我们没有给他以口实认为，我们不会给他这种支持。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稳妥的。蒋介石的这一转变能否使他摆脱失败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里许多事情不仅仅取决于蒋介石，或者与其说取决于蒋介石，不如说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他周围的这些人是否允许蒋介石向左转呢？

谢尔盖：总的说来，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同意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即不要在广东围绕这篇文章展开广泛的斗争战线。我们应当围绕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围绕防御口号，围绕同可能来自孙传芳方面和帝国主义者正在策划的新军阀联盟方面的危险的斗争，详尽地阐述我们政治宣传运动的方针。我们绝不要说，北伐是不需要的，而整个宣传鼓动方针要转到保卫革命成果上。蒋介石会不会对这种做法说，这是“背后插一刀”呢？我们的做法不是反对蒋介石，而是反对蒋介石周围的人。我们应当说，当北伐军打击反革命时，这很好。我们决不应

^① 见本书第369页注②。

该公开地进行反对北伐的鼓动宣传并在我们的敌人强加于我们的一些问题上接受挑战。如果我们想采取坚定的反蒋方针，那么我们确实应该展开反对北伐的广泛战线。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不言而喻，我们的同志只有在他们自己摆脱了过去的错误方针后，才能对北伐采取正确的立场。

鲍罗廷：我认为需要在这里作一点说明：关于党对北伐的立场，你们应该不仅根据当地的机关报^①，而且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

谢尔盖：不管怎么说，显然不久前我们的同志在北伐问题上太不会应付了。群众很难领会他们的新立场。这就更需要我们在言行上讲究策略。

马克斯：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北伐问题上它使党的注意力转到内部反革命的危險上。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不接受这篇文章。若是我们大刀阔斧地开展反对北伐的斗争，那就会产生危險。但文章中没谈这一点。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导到内部的反革命上。为什么鲍罗廷觉得反对反革命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对蒋介石呢？我们在这里也能够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谈论反对反革命，而是制定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并同国民党左派一起争取使政府承认这个纲领是自己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历史问题，为什么蒋介石不能公开地赞同我们的纲领并承认它是自己的纲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将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并把蒋介石同他周围的人分离开来。全部问题就在于要制定出这样一种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现在可以拟出这个纲领的几个基本点：由于前线的形势好转（或者某种其他理由），政府认为有必要重新广泛实行各种自

^① 指1926年2月至1927年4月在广州出版的《人民周刊》。

由，包括工农组织争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保护农会免受豪绅和地方当局的进攻。重新审议税收制度，解除某些农民阶层的税负，等等。

鲍罗廷：既然你们谈到广东省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分歧了。顺便说一下，这些事情也正在做。政府已经颁布了四个新的法令和宣言^①。诚然，在通过这些法令和宣言时，与会者中有些人曾讥笑这种做法，很怀疑这些决定的诚意。但是可以抓住这些决定，为使它们不成为一纸空文而进行斗争。遗憾的是，你们没有回答我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我要向你们指出一个难题，并尽量说得更具体一些。当你们在这里发表讲话和谈论反革命或者保卫革命时，在军人群众和非军人群众的意识中，“反革命”这个概念必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从一定的时间起，即从3月20日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行的。因此，你们的言论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如果你们说些一般的话，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们，因为在群众中已经对蒋介石的政策产生怀疑，这是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正如共产党人曾经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蒋介石是不是反革命？”了解在东江所发生的事情的群众也会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能为蒋介石作辩解呢？要知道你们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对群众说话。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难题。

谢尔盖：您似乎是这样提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只要我们一说反对反革命，那就会被理解为反对蒋介石。但要知道我们也可以使我们的讲话被解释成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可说，国民革命军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北方赶走了反革命将领呢？

鲍罗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保定派将领做的，这又会是

^① 见第55号文件。

反对蒋介石的言论了。

谢尔盖：我承认我们讲话中最不加修饰的是第二部分，即反对反革命的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反革命分子企图利用北伐，这样就不会使人想到反对蒋介石了。我们可以把何将军^①最近在东江地区采取的行动，即逮捕孙文主义分子首领派的头子并请求我们党组织给以协助，与反革命将领对立起来。

鲍罗廷：蒋介石把这件事说成是我们试图把赌注下在何身上并使何离开他。

谢尔盖：请问您认为宣传鼓动运动在这里有什么重大意义吗？

鲍罗廷：宣传鼓动运动的意义在这里是很大的。但是当地条件的特点是：在这里不能辩证地阐述问题。当您向群众发表讲话时，您必须明确说明：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北伐。

谢尔盖：必须这样开展宣传运动：决不要打击蒋介石，可以写些文章来反对地方当局的受贿情况，等等。

鲍罗廷：反对反革命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这里有一个顽固的习俗，任何一个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另一个习俗是，如果你们想打倒领袖，那你们就要先反对他的下属，因为蒋介石对3月20日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要负责，因此你们反对基层政权代理人就意味着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也正是这样来理解的。拿最近几天里的一个小例子来说吧。蒋介石迄今为止还没有掌握的唯一一个方面就是财政方面。现在，当蒋介石集团想要攻击财政部长^②时，他就广泛地开展了反对财政部的一些下属机构的运动。在进攻反革命时，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1）把蒋介石同所有纵容反革命的人区别开来，把事情说得对蒋介石有利；（2）把蒋介石同真正反革命的罪魁祸首区别开来；（3）把蒋介石同他所保护的、真正想打倒蒋介石的集

^① 何应钦。

^② 宋子文。

团（古应芬、胡汉民）区别开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袒护蒋介石的任务？总得有人来承担袒护蒋介石的这种责任。最后，怎么保证将在基层进行这场运动的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能够巧妙地进行这场运动而不致去反对蒋介石。

马克斯：我以前向您提过一个问题，能否通过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来使他的政策向左转？您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难道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某种策略，不是用于袒护蒋介石，而是尝试推动他向左转？我提出两种办法。不久前，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发表一封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与蒋的策略有关，他得到了蒋的答复，登在黄埔军校的校刊上^①。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找一些这样的学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左派，他们还相信蒋介石但开始对他表示失望，让他们给蒋介石写一封大致如下内容的公开信。**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并列数蒋介石以往的各种革命功劳，相信他有最好的动机。**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爱戴的领袖蒋介石在犯错误，被内部反革命利用。**第三部分：**我们希望蒋介石纠正所有这些错误，并考虑到前线的胜利，恢复国内的革命秩序。这个举动定会迫使蒋介石作出反应，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台阶来向群众阐述新的观点。不管怎么说，这个举动对于从政治上教育黄埔军校广大学生和更广泛的人士是很有好处的。鲍罗廷会问：我们是否想反对蒋介石？我们回答说：现在我们不想反对蒋介石，但我们认为，在一定的時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形势，蒋介石变得更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反对蒋介石。今天的任务是：利用各种方式从内部来向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他向左转。我认为，在最近，应同国民党左派一起组织与蒋介石集团的会议，从内部尝试促使他向左转。

^① 见第81号文件。

鲍罗廷：所有这些意见就其本身而言或许是正确的，但离开了主要的问题：我们在开展运动时，应当十分明确地对自己说，这场运动可能会使我们同蒋介石发生公开冲突。而这种冲突在目前恰恰意味着我们有丧失广东的危险。迄今为止我们实行的反对反革命的政策是来源于上海，而这里说的是同反革命作斗争，其根源是蒋介石搞的“三二〇事件”。

马克斯：我觉得您说的这些意见多半都属于狭义上的策略，我不清楚，您自己是否从您所说的这些情况中得出了什么特别的结论。您是如何设想我们近期政治工作的任务呢？

鲍罗廷：我要谈我作为苏联代表所面临的²任务，对于地方党组织来说行为方式可能有些不同。我认为，如果蒋介石在最近不向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进入这场斗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任务就在于不要错过这个时机，要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准备可能有两种途径：（1）单纯地等待有利时机；（2）根据今天在这里制定的方针进行，一旦蒋介石不转向我们，这个方针就会使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过早冲突变得不可避免，那时我们也不会受到打击^①。

等待决不意味着单纯的消极态度，我还有一定的军政方面的工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根据一定的方针同也在等待的国民党左派一起进行。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在这里是指防止从六个方面对广东进行的威胁，即（1）上海人登上海南岛；（2）登上虎门；（3）从中山方面进攻；（4）从福建方面进攻；（5）从江西方面进攻；（6）从云南方面进攻，最后还有土匪。关于北伐，我们不该说任何话了。

至于共产党人，这种等待的方针对他们来说也不意味着消极态度。他们应当集中精力在工会和农民当中做工作。共产党人应

① 原文如此。

当知道，蒋介石现在在前线作战，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要支持蒋介石。他们应该对北伐完全放心。

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始终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工人之间的斗殴问题^①。我们找到了答案，斗殴停止了。

最后我要像当时请求伊万诺夫斯基^②那样请求你们用书面形式，以最明确的指示信方式或像伊万诺夫斯基所采用的那种书信方式^③，告诉我你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如果是信，那么我从自己方面保证，我将在我所采取的总的立场允许的范围内遵循它。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23—28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4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

1926 年 8 月 17 日于广州

谢尔盖^④同“学者”^⑤的谈话

军事形势。前线的形势是这样，看来武昌是容易占领的。麻

① 见让·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年)》莫斯科1969年版第408—410页。

② A. C. 布勃诺夫。

③ 见第34号文件。

④ P. H. 维经斯基。

⑤ 原文如此，指顾孟余。

烦的事只是在这以后，在前线与吴佩孚作战的14个军中只有8个军可以认为是革命军（其中包括唐生智）。在北伐期间归附我们的其余几个军，进入湖北后会进行掠夺。它们都会作为胜利者向我们提出自己的打算。各军的总的情况将是很糟糕的，因为大家都将挤在两个省里。

政治前景。占领武昌后不应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相反，应当承认和服从在广州已有的国民政府。否则，如果在占领武昌的同时，冯^①在北方也取得胜利的话就会形成政治条件。就是在冯参与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汪精卫回来重新执政也是可能的。冯宁愿支持汪精卫也不支持蒋介石，冯与蒋介石可能会发生冲突。随着对武昌的占领，必须迅速召开国民党的广泛代表会议，会上左派的胜利和汪精卫的回归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在长沙召开代表会议是很不合适的。

关于蒋介石。很难指望和期待蒋介石向左转。很可能他会进一步向右转。蒋介石在广大居民和国民党眼里已名誉扫地。这不是因为他对北伐作了军阀式的阐释，而是因为他妄图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不仅是军权，而且还要夺取国民党并使它服从于自己。在广大人士的眼里，他是个**倒霉的人**。蒋介石试图到处安插自己的机构，但都没有办到。如果蒋介石在前线取得胜利，他的名声将会更坏，因为他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来攫取无限的权力。

关于汪精卫回归。很难认为可以使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起来，但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汪精卫怎么能回来呢？即使他没有任何军事支柱，单靠舆论的压力他也能回来。国民党和广州已经摆脱了只靠军事集团才能取得一切的阶段。蒋介石不敢对得到舆论支持的汪精卫采取什么行动。怎样准备汪精卫的回归呢？通过党组织。现在正在开展广泛的运动，这场运动将越来越扩大。

① 冯玉祥。

党际间会议。这种会议的意义是很大的，必须加紧开始做会议的工作。我很高兴，您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这会大大便于会议的工作。我想，会议应当讨论以下四个问题：（1）国民党内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间最好的合作方式；（2）占领武昌后的行动计划；（3）对现时广州国民政府的态度；（4）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之间的某些误会，如关于陈独秀的文章^①问题，现在不可避免地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次这样的会议应持续一周左右。然后应当规定，这样的会议每年召开4次，紧急情况除外。

国民党内的状况。在国民党内，左派和共产党人几乎到处都占据优势，只是在有些地方，领导权掌握在右派手里，现在蒋介石集团中的中派也算作右派，他们是“新右派”。国民党内的基本斗争方针现在应是争取党内民主反对小集团独裁倾向。（在这里，谢尔盖完全赞同“学者”的这种提法，并指出，左派和共产党人，而且还有右派都应享受这种党内民主。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向全党表明自己）。在国民党内，左派在组织方面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右派有自己的组织。

共产党人也有自己的很好和很牢固的组织，他们在国民党内常常与左派一起工作。但是，最左的一派不愿仿效右派，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组织。您问，我们能否在半年内广泛提出组织力量的口号，在国民党左派周围聚集50万人？我认为是可以的。

我们应当寻找我们与共产党人关系的最好组织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两个党并列存在，其中一个党在另一个党内有自己的党员、自己的支部（在这里，谢尔盖指出了英国共产党人和英国工党之间的关系及美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有过的这种关系，并补充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支持国民党左

^① 见本书第375页注^②。

派)。不过我并不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我觉得，我们的主要不幸在于，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过于布尔什维化了，过于迅速地布尔什维化了，这也是没有先例的。请看一看所有的口号、标语。您随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精神，而不是民族的精神^①。有很多革命的词藻，但没有特别的革命行动。一切都很革命。我们的声明，我们的报纸，都很革命。当你阅读共产党人的报纸和宣言时，你可以看到，他们常常要比国民党左派还温和得多。我在这里看到了“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的标语。就拿我们的汪精卫来说吧：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而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他们把一切都建立在开展阶级斗争上。我们不能带着偏见看问题，不能把一些阶级推开不让它们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应当号召各个阶级。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民党左派比共产党人更左，而另一方面又常常不得不感到惊讶，为什么某个人被算作是共产党员而实际上离共产主义很远。我们不能持有阶级的观点。谁主张国民革命，谁就跟我们在一起（这里谢尔盖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只能建立在劳动群众的斗争基础上，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要捍卫在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这一切都是对的，必须以更加团结和互相支持的精神来进行工作。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35—36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原文如此。

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执行 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8月19日于广州

同中央代表团的联席会议^①

文学家：中央把如何评价目前政治形势问题作为悬案，希望在广州收集情报，然后讨论国民党内部状况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举行两党会议。应当为占领武昌的时刻做好准备：拟定行动纲领、口号。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三周前发表一个宣言，其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口号，连召开国民会议也不提^②。党际间会议应该举行：今天国民党对此感兴趣，而在占领武昌后我们也将感兴趣。然后必须同本地组织谈一谈，以便消除两个中心。

谢尔盖通报了同区委和英国人^③的主要分歧的实质（对当地的同志和对“左派”能否发动某种总的攻势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马克斯建议先讨论两党会议问题，以便弄清楚其他问题之所在。

① 参加会议的开始有：I. H. 维经斯基（谢尔盖）、M. P. 拉菲斯（马克斯）、张国焘（阿莫索夫）、瞿秋白（文学家），后来还有陈延年和张太雷。

② 宣言没有找到。

③ 分别为：广东区委和 M. M. 鲍罗廷。

文学家：国民党是怎样提这次会议的：是宣战会议还是和平会议？

谢尔盖通报了他同“学者”^①的谈话，通报了两党会议的任务^②。

马克思问，中央对最近一个时期同国民党的关系是怎样设想的，是交战还是合作？

文学家：同中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争取国民党左派掌权。就连商人的代表（“南洋”烟草厂老板）^③在这里的农民会议上向农民致敬时也说：农民是老大哥，工人是老二，商人是老三，对农民征收的赋税不堪忍受，不要相信诺言，要进行斗争^④。

谢尔盖：这是不是为了争取右派政府而玩弄的手法？

文学家：不，这是为了争取左派政府。

谢尔盖：首先必须解决，到底我们认为会议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应当是一种手腕，以便利用时机在群众中扎根。为此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处理关于相互关系的第一个问题。

文学家：我们同意这一点。但是，除了正式会议以外，还需要同国民党左派开一些会。而更重要的是要检验一下当地组织的看法。

谢尔盖：难道中央对广州的形势没有一致的评价吗？

文学家：从同志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5月15日以前，他们在这里一直在同国民党周旋，后来在组织内搞内部斗争。他们未能对广州的形势作出统一的评价，一些人把广东的形势说成是红色的，另一些人说成是绿色的，还有一些人说成是白色的。我

① 顾孟余。

② 见第84号文件。

③ 简琴石。

④ 看来是指简琴石在1926年8月19日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讲话。

们到这里来的主要任务是弄清这个问题。

问：为此我们也请您留下来。

阿莫索夫：我是提出“在广州左的空谈占居统治地位”这个说法的第一人。但我们这里毕竟有力量（如果在中国可以说力量的话）。

文学家：我们在委员会的具体结论上意见一致，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理由。我们同意在这里左的空谈占居统治地位的说法，但是应当知道，这里的客观形势如何，哪些力量在进行斗争。在中央，在负责人当中，存在着不同意见：彼得罗夫^①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同它（即同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而老头子^②认为，看来（这个想法尚未完全形成）可以利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军事独裁或许还对发展革命有利。这些问题需要弄清楚。

同中央代表团的会议（续）

有陈参加

文学家提议讨论两个问题：（1）总的政治形势（鉴于国民党打算在占领武昌前后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行动计划，发表什么样宣言等）；（2）党际间会议。通过。

文学家通报：汉口不会被占领，这是个坚固的堡垒。吴佩孚正在瓦解，张宗昌正在撤离。战争的目的谁也不清楚。国民党中央三周前发表的宣言谈到农民、工人和商人，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连国民会议也未提。但是当提到冯^③可能占领北京时，他们吓破了胆。从北京接到有几个人签名的建议书，建议与冯一起

① 彭述之。

② 陈独秀。

③ 冯玉祥。

发表宣言^①。昨天国民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定改变过去的宣言草案，重新起草一个宣言。然后决定在一个月內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关于在哪里和由哪些人参加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在北京还是在广州，由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人参加还是所有省党部的人员都参加。这样或那样都考虑到左派占多数和汪精卫回来。鉴于这里的形势，他们回避广州作为会址。现在从老头子那里得到消息说冯出击北京未成。

谢尔盖建议，现在确定这里指导性政治工作的程序，以便消除某些行动的不协调和独立性并预先获得情报。为此，在这里逗留的时期要定期召开会议，吸收“专门委员会”人员（包括中央委员）和远东局人员参加。

这项建议被通过。

文学家：围绕着北伐，北方在进行一场斗争。如果领导北伐的是右派，右派就支持北伐，右派劝（河南）樊钟秀说，他是代表孙^②第一个北上的，他有权来领导。

陈通报说，本地国民党员当然同意发表宣言，但要早些同蒋介石商量。**文学家**：宣言可能由冯和蒋介石签署，这会给人以很深印象，因为连资产阶级也已经脱离了反赤运动。什么时候发表宣言，不得而知，看来是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后。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国民党中央工作报告；（2）国民政府工作报告；（3）广州军队工作报告；（4）国民军工作报告；（5）成立国民政府和确定它的组成人员。

谢尔盖：中共的宣言将是宣传鼓动性的。而国民党的宣言必须考虑现实的力量对比。就像在去年10月一样。那时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联盟，因此打算让孙传芳的代表参加。现在怎么办呢？是否可以成立纯国民党的政府或者让某某人参加？其次，还有一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孙逸仙。

个问题，由谁来召开成立政府的预备会议，由国民党还是由什么人？

文学家：政府不可能是国民党的政府，而必须依靠两支取得胜利的军队。我们应当尽早解决国民党代表大会本身的问题：有多少人参加，等等。一切都取决于由谁在内部领导国民党，其中也包括政府的组成人员。国民党左派中央可以成立有国民党右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政府，但要在它的领导之下。

谢尔盖：所以你们要提出准备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但有些同志说，现在甚至都不能批评蒋介石，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战争和失败。

张太雷：可以批评，但要谨慎。应当在军队中、在国民党内、在半红半黄的五金工人那里集合所有不满的人。

谢尔盖：你们的方针是推翻蒋介石并使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取胜。你们不害怕，这可能有危险吗？要知道那时中派会同右派一起依靠冯（冯也可能同蒋介石的心情一样）和孙传芳的支持，来给你们以很大的打击。你们不会因此刺痛国民党吗？不会使左派孤立吗？你们使左派和共产党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不会加速他们之间的斗争吗？

文学家：（在与同志们商量后）我们不说反对中派，我们不想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我们想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他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中央应当由左派来领导。中央将多数是左派，也有一些中派和右派，这样才能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很少，但是些大人物。右派同意参加。

马克斯：能否通过召开原班人马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像吴佩孚的国会那样）来建立对全国有权威的中心呢？右派会沉默吗？会不会出现新的“三二〇事件”呢？

文学家：关于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的形式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蒋介石已经名誉扫地，代表大会很容易把他清除。对于全国来说，汪

精只是更有声望的人物，他能够巧妙地应付各派。

谢尔盖：你们是否急于提出成立统一政府的问题？让冯先建立自己的政府不好吗？然后提出四个实际政府即北京、奉天、南京和广州政府联合的问题。

文学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排除这种做法。

马克斯：你们说国民党左派中央，这只是指另外一些人或者还指在农民问题上的另一种政策吗？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

文学家：当然是指另一种政策。在行动纲领中要有多处谈到农民问题。

行动纲领要准备两个草案：（1）给国民党中央准备一个草案和（2）给政府准备一个草案。给国民党中央准备的草案应当详细而具体：给佃农提供什么，农村应当撤销哪些机构，等等。给政府的草案由目前能实施的一些条款构成。如果政府不能实施，国民党将在群众中受到批评，国民党应当赞成成立国民政府，赞成召开国民会议。

谢尔盖：你们考虑一下从成立国民政府做起是否适时的问题。

阿莫索夫：要提出诚实政府的口号。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37--39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8月20日于广州

有文学家、阿莫索夫^①和我方人员 参加的“特别委员会”^②会议

主席——阿莫索夫

议程：

1. 中央代表的正式通报。
2. 党际间会议。
3. 关于国民党（这里包括占领武昌后我们的策略问题）。

中央通报

文学家：我代表中央作正式通报。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恢复

① 分别为瞿秋白和张国焘。

② 关于特别委员会成立的确切时间和组成人员的正式材料没有找到。根据彭述之的回忆，委员会是由中共中央执委会在接到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州三二〇事件的详细报告后成立的，即1926年3月底4月初。参加委员会的有：代表中央的张国焘、谭平山和彭述之，代表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和周恩来。特别委员会被责成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见C. 马丁·韦慕庭：《革命使者——苏联顾问和国民党中国（1920—1927）》英文版第270页。从已经发表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苏兆征也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别委员会”。我们在这里要在这个范围内来解决主要政治方针问题和党际间会议问题。我们离开后，“特别委员会”将撤消。它的职权问题交英国人^①处理。这里还将有一名中央委员，他的权力与北京的中央委员相同。

英国人：建议：关于“特别委员会”的问题要做专门讨论，现在讨论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

党际间会议

阿莫索夫：问题分为：（1）国民党提出的议程；（2）我们提出的议程；（3）这次会议的目的；（4）我方参加的人员。我们将事先同国民党会晤，商定会议地点、时间，然后开幕。

英国人：党际间会议是由3月20日至5月15日期间对共产党人的抱怨和指责引出的。要开辟一条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要造成一种印象，通过国共两党的会议是容易解决冲突的。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虽然已作出一些让步，还是值得怀疑的。召开会议的想法早就有了，早在孙^②在世时右派有抱怨时就有了，但当时打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参加下召开。“国际联络委员会”——莫斯科应当来解决冲突^③。我们提出这个想法是在5月15日以前，以避免作出其他让步，但这无济于事，他们的要求更多，但也没有拒绝这个想法。从那时起，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起先是缓慢的，然后是急剧的。5月15日以后，第一个抱怨来自蒋介石，他说，不能设想，在一个军队中，在黄埔，怎么可以有两个党进行工作。“如果还是这样，我就不担任总司令”。一般的问题他能够从容不迫地谈论，并谈过建立一个新党来取代两个党的问题。但

① M. M. 鲍罗廷。

② 孙逸仙。

③ 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卷第327—328页。

谈到军队时，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你们知道他的三个方案^①，知道意见分歧和解决办法，即黄埔军校和军队中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我们想把问题拖到召开党际间会议再说，但蒋介石最后通牒式地提出问题，作为是否接受总司令职务的条件。共产党人在黄埔退出国民党以后，左派开始更活跃了，承担了国民党左派的责任，不能责怪他们，说他们为共产党人工作。“没有人可以指望”。左派在黄埔的发展不能用这些原因来作解释，原因很多。我不知道基层对共产党人有什么严重的抱怨事实。相反，基层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变得更好了。广东省学生执委会选举时出了事^②，但这次争论在下面解决了，谁也没有要求召开党际间会议。就连陈独秀的文章^③也没有引起这种要求。在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选举执委会时情况也是这样^④。总之，从蒋介石派方面来说，谁也没有要求召开会议，特别是在第二阶段。中派对召开这样的会议来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因为如果提出这些冲突，那么就会以反对蒋介石一派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我们也就提意见了。至于另一个派别，即我们称之为左派的那个派别，在谢尔盖^⑤到来之前，我还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这种要求。现在事实是：“学者”^⑥希望这样做。如果他是代表一派，那么怎样来解释他们的这种兴趣呢？鉴于即将发生重大事件，左派希望同我们商量。但是他们不可能通过党际间会议做到这一点，有蒋介石的“耳目”^⑦在，他们不能自由地议论，他们只能站在正式的立场上。左派希望汪精卫回来掌握党权，但在会内不能为此做任何事情，而只能在会外。他们会你们的到来感到高兴，但不会对正式会议感到高兴。对他们来

① 指1926年6月7日关于黄埔军校内共产党人的建议。详见第64号文件。

②④ 事件的细节不详。

③ 见本书第375页注②。

⑤ П. И. 维经斯基。

⑥ 顾孟余。

⑦ 指张静江。

说，干吗要召开这种党际间会议呢？可能他们在搜集意见，希望把这些意见带到两党会议上，以便削减我们，把5月15日的工作做到底，达到改变共产党人方针的目的。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最近一个时期左派都试图使我们成为反蒋先锋，而在两党会议上我们将同“三二〇事件”的肇事者争吵起来。

谢尔盖：或许英国人来作结论。

英国人：先让我们再听听本地的消息吧！

宋^①：“学者”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并请我参加会议。他谈到罢工问题。“学者”说，如果政府是另外一个政府，中央是另外一个中央，在找工作方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阿莫索夫：刘^②来到上海，说有些县向中央控诉本地的共产党人，而书记处把他们调到省委，消除对共产党人的指摘，只剩下“一些国民党员”。这些县现在或者是回避磨擦和冲击，或者是不公开摊牌，以便来个突然袭击。如果消息属实，那就是说县里已经开始进行反共产党人运动了。在上海，右派中央出版了一本关于党际间会议的小册子^③。他们说：“这是日本和朝鲜或者英国和中国的会议。在委员会里，4个国民党员加3个共产党员，加顾孟余，加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即5个“英国人”对4个中国人。为什么享有主权的中国上面要有一个最高委员会呢？蒋介石背叛了国民党。”

文学家：我们去过张静江那里。他谈了很多（违反常规），说他忠于事业，他想表明他是个首领。他谈到总的目标，可以很快完成革命：2年内打倒军阀，10年内达到共产主义，要比苏联还快，主要的障碍是在实现共同目标时存在着两个党。他谈到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国民党，谈到冯玉祥。我们的印象是：他希望得到

① 原文如此，显然是苏兆征。
② 刘少奇。
③ 小册子的名称不详。

我们的支持来反对冯玉祥。

阿莫索夫：中派不想召开会议，担心各种诉怨对他们不利，而上海右派出版的小册子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糕了。可能他们担心，在会上当他们需要我们时，同我们的关系搞得更紧张。蒋介石说（这是我们从李^①那里得知的），他现在将不提出两党合并的问题。他们希望赢得时间，而目前指望把我们消灭。有三种情况：（1）两党合并，这一点已否决；（2）通过谈判缓和局势，这也不会；（3）通过代表会议来领导国民党，这也是空想。我们有两条出路：（1）或者是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加强我们的阵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对中派。

张太雷：在陈独秀发表文章后谁也没有提出党际间会议的问题。廖仲恺^②曾经提出过，但没有人支持她。张静江希望共产党人在进行国民革命的时候，放弃在中国争夺政权的斗争，而在占领北京以后，这场斗争将结束。但他知道，通过代表会议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对会议谁也不感兴趣。在群众中，对共产党人没有敌意。县里的诉怨是由国民党左派同那些叫嚷反对“共产党人”的市政官员之间的斗争引起的。

英国人：我的结论和建议是：（1）在会议召开前同左派就以下问题签订长期协议（当然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1. 筹备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的方式；2. 中央的组成人员；3. 筹备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纲领；4. 代表大会的地点；5. 如何在事实上（而不是在顾孟余的内阁中）确立左派的领导。前4项是全国性的，而第5项是专门指广东的：那里有群众，群众日益左倾，如何来领导他们。在商定召开会议以后，在那里要就一些小的条款进行工作，以便不暴露自己的底牌。在细小事情上要作让步。主要的是，同左派的协议，而会议并不重要。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应为：何香凝（廖仲恺夫人）。

谢尔盖：有三个问题：（1）谁是这里的左派？（2）我们是否现在就商定同中派作斗争？（3）这个协议也遵循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方针。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如果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那么会议本身就并不重要，可以只谈一些细小问题。另一个方案是：在对国民党左派进行一定的工作以后再同左派达成协议，以便使他们同群众有所联系。我们不对他们说协议，不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向中派宣战。那时，党际间会议就比较重要了，我们在会上既要巧妙地应付左派又要应付中派。

文学家：许多人作了通报。总的结论是：中派不希望召开会议。关于左派及其态度，我说不准确。他们有两派：顾孟余和其他人。顾孟余还不是代表，他希望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以便恢复汪精卫的职务，但他要求我们事先作出让步。他希望召开会议，以表明蒋介石的诚意并要求他作出让步。另外的左派反对召开会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现在有些惊慌失措，因为有些群众在向左转。因此要首先弄清我们的方针，同左派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同蒋介石作斗争（这一点已经定了）。

英国人：我建议同“学者”单独会谈，如果他代表所有左派的话，或者还可以同某人进行会谈（甘乃光）。

英国人：同左派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同中派作斗争，更不是向中派宣战。目前我们是否能够在同中派作斗争时把蒋介石隔离开，不打击他。如果这意味着同蒋介石作斗争，那么我反对向中派宣战。同左派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同中派作斗争，但不是向他们宣战。应当同左派谈的不是总的协议和相互关系，而是一些具体问题：关于代表大会的召开，关于中央，等等。这在最后将是对中派主义的打击。这是不是对蒋介石的打击呢？这要取决于他。而将来左派可能献给我们更厉害的孙文主义分子^①。对

① 指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同左派联合的工作的整个领导应当不是来自广州，而是来自上海。

谢尔盖：党际间会议没有独立的意义，这只是巧妙地应付中派和同左派接近的一种方式。问题的实质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因为左派（我不完全了解情况）把打倒蒋介石、打倒党内军事独裁的问题提到了首位。无疑他们主张打倒蒋介石，而我和英国人却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比国民党左派更右吗——我不知道。

英国人：如果左派问我们，我们说：根本谈不上打倒蒋介石。我们主张左派在国民党内掌权。这由代表大会来决定。我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同左派中央一起走。在拟定中央的名单时，如果他们不提名的话，我们提名，这不妨碍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把他撤掉，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而我们会得到多数。

阿莫索夫同意英国人的意见。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40—45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7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纪录

1926年8月26日于广州

特别委员会同中央委员和我方人员的会议

文学家^①报告由会议选出的委员会的决定。

关于党际间会议

委员会建议作出如下决议：

“鉴于左派目前在加紧敦促汪精卫回来，这可能引起与现时当局的过早冲突，推迟召开将有助于左派实现当前计划的党际间会议。”

决议一致通过。

决定：由中共中央的同志将这项决定通知国民党中央，理由是他们在这一方面已弄清楚，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问题，谁也没有提得像他们到这里来时所认为的那样强烈。他们认为，目前的形势要求集中一切力量来保卫广州，而不是放在派别之间的内部摩擦上，因此建议不召开会议。

① 瞿秋白。

关于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以下决定：

同左派就该问题的谈判推迟举行，以便不加剧形势，不使左派轻易实现立即召回汪精卫的计划。

为今后的谈判拟定我们的以下计划：

代表大会的地点——现在不确定。

代表大会的日期——大约再过六周，在10月10日左右。

组织方式——重新选举代表，而不是召集原先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准备使左派和共产党人在代表大会上占全体代表人数的60%左右，其中包括共产党人10—15人。

国民党中央的组成人员——20名左派，5名共产党人，8名中派，3名右派。

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上海秘密进行，为此左派要派两人去上海。

责成中共中央的同志同左派就最后一点达成协议。

关于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代表大会 召开前的行动纲领

委员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被通过。

1. 代表大会应宣布，在革命军队占领的所有地区将保证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自决权。革命军队将保护这些权利不受任何侵犯。

2. 自治机构通过社会组织准备全国国民会议的选举。

3. 全国国民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由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①。

^① 原文无第4条。——译者。

临时革命政府将为实现以下目标而奋斗：

5. 废除不平等条约：

(1) 废除租界；(2) 废除领事裁判权；(3) 将海关无条件地归还中国。中国关税自主。

经济要求：

6. 保证一切铁路、水路交通正常运转。

7. 工商业由国家补贴。

8. 调整税收制度：

(1) 废除厘金^①；(2) 建立统一的所得税。

9. 调整金融。建立统一的币制。

10. **在国民教育方面：**

(1) 保证国民教育所需的专项基金（国家预算的一定比例）；

(2) 宗教与外国传教士管理的学校分离，所有这些学校必须在地方当局的机构登记；(3)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4) 发展技术教育。

改善农民的状况

11. 临时政府将**帮助农民**为争取减租而斗争。

(1) 降低现有地租 25%；(2) 取消税收制度。

12. 确立统一的和公正的地租。

13. 废除非常税和捐税。

14. 使劳动农民摆脱高利贷的奴役。

(1) 确立最大限度的借贷利息，不超过月利 3%；

(2) 废除苛刻的遗产税；

(3) 废除各种奴役性的契约（如与出卖家庭成员有关的契约）。

^① 即厘金税，一种地方的税收。

15. 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和士兵。
16. 关于国家信贷银行。
17. 关于合作社。
18. 国家协助土壤改良和发生自然灾害时的救济。
19. **农民结社自由。**
20. 政府保护农会不受敌人的武装袭击。
21. 农民有权参加乡村的管理，驱逐卖身求荣的官吏。
22. 反对剥夺农民子女在学校受教育机会的制度。
 - (1) 由国家出资为农民成立免费学校；
 - (2) 靠社会基金成立的学校应广泛吸收农民子女。

改善工人的状况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作以下修改后通过：

1. 成立劳工部，同工人的工会组织共同工作；
2. 工作日——每周最大限度的工时确定为 54 小时。
3. 保护母亲在产前和产后享有由企业负担费用的产假（产假期限和方式可讨论）。
4. 成立职业介绍所，在工会监督下进行工作。

同左派的政治协议

委员会建议写上这样一条：

“认为争取确立左派在党内和政府内的领导是必要的。”

谢尔盖^① 建议补充一句：“这并不意味着组织上的领导。”

阿莫索夫^② 反对。**谢尔盖**问：这是否意味着只由左派来组成政府？**阿莫索夫**：政权的中心是左派。**谢尔盖**：因此还有一个共产党人参加的问题。我们将在中央讨论这个问题。

① L. H. 维经斯基。

② 张国焘。

委员会的下面一条：

“共产党人全力支持政府。”

谢尔盖补充：“通过社会团体。”

英国人^①反对，他指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政府，不能只利用社会团体而放弃其他方式。

马克斯^②建议这样表述：

“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和全力地支持政府并动员社会团体来进行这种支持。”

这一条通过。

年轻人^③建议补充一句：“保留对政府某些措施的批评自由。”

阿莫索夫和文学家反对。这个问题与共产党人参加左派政府的问题有联系。就是在那时我们也保留我党有善意批评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争议，但问题是批评的方法。我们担心，我们的年轻同志只进行批评，这样的决议会导致我们的同志去寻找材料来进行批评，我们就会从支持政府的党变成只进行批评的党。

谢尔盖：是否应当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由于你们将亲自领导左派政府，所以你们不需要外来的批评？

文学家：您担心缺乏批评，而我们担心批评过多。

马克斯提出新的表述法：“一旦发生严重分歧保留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

文学家：我们同意。能发生严重分歧这意味着政府转向中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由批评就意味着准备推翻它。

周恩来：我曾参加过汕头政权^④。有许多实际情况，我们的组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用不着担心没有

① M. M. 鲍罗廷。

② M. C. 拉菲斯。

③ H. A. 福京。

④ 周恩来自1925年11月底至1926年3月中曾担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行政领导

批评。

文学家：我们会很容易地引导群众实行进攻。对于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领导他们进行周旋和退却。

决定取消修改意见。

注：上述行动纲领是行动纲领的草案，它将成为同某些国民党左派进行谈判的基础，以便最后制定出能够把国民党左派革命分子联合起来的国民党左派的真正行动纲领。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73—75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9 号 （特字第 37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8 月 26 日于莫斯科

听取：3.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中国委员会的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3. — [1] (1) 推迟到星期——^①。如收到需要政治局作决定的消息时，通过电话征询意见。外交人民委员部须采取措施从加拉罕同志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情报，而中国委员会须讨论在中

^① 1926 年 8 月 30 日。

东铁路上应采取的措施，以维护我们的、属于中东铁路的船队，等等。

(2) 1. 认为有必要在需要时给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以武器援助，从库伦后备武器中拨出。

2. 建议人民革命党中央着手组织东部和东南部边境地带的防御工作。

3. 责成中国委员会详细研究在内蒙古地区和满洲北部组织游击运动的问题，并在外蒙古地区建立专门的小分队进行佯攻，以防张作霖进犯外蒙古。

抄送：

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鲁祖塔克同志——1；缅任斯基同志——全部。

听取：〔4〕布勃诺夫使团的报告（报告人：库兹涅佐夫、扬松同志）。

决定：3. 〔4〕（1）继续进行使团的工作。

（2）在布勃诺夫同志不在期间，任命扬松同志为使团团长。

（3）将温施利赫特同志从军事主管部门调入使团。

（4）使团应切实审查开支费用是否合理，更明确地确定哪些费用需要抵补，向加拉罕同志询问必要的情况。

（5）认为经济机关应对它们发放的全部非法款项负责。

（6）使团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缩减开支并防止以后超支，还应研究从哪些来源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补已经支出的费用问题。

（7）拨 10 万卢布给中国委员会使用，责成温施利赫特和库兹涅佐夫同志确定，应拨付多少外币、多少苏联货币。

抄送：

布勃诺夫（用密码）、扬松、契切林、李维诺夫、库兹涅佐夫
全部；温施利赫特——（3）、（7）；鲁祖塔克——（7）。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107—10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9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

1926 年 8 月 31 日于广州

谢尔盖同学者^①的谈话

谢尔盖：学者约我来谈谈。学者直截了当地从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谈起。不合作不行。国民党左派相信，不合作不行。共产党人应该表明他们希望合作。这也有助于共产党人加强自己的党。应当让汪精卫回来，这会给共产党人提供发展机会。

谢尔盖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① 分别为：I、II、维经斯基和顾孟余。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说，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

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¹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

（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

这是与垄断相违背的²，因为群众会由于夺取机构而离开国民党。共产党人应当像他们在西方工会里那样进行工作，即竭力影响群众，而不是夺取机构。

我对北方取得胜利的结果持悲观态度。但是形势对于国共两党在重新解放的省份中的发展是有利的。国民党目前的领导是个小集团。应当掌握他们。共产党人和左派应当结成联盟。

谢尔盖：他们有哪些人？

学者：领袖是汪精卫，还有甘乃光、廖仲恺（夫人）³、顾孟余。

谢尔盖：您对合作是怎样设想的？

学者：共产党人应当同我们达成协议，共产党人在占多数的地方放弃多数，只占1/3。

谢尔盖：在全国范围内吗？

¹ 删节号是原来有的。

² 原文如此。

³ 何香凝。

学者：在广东，中派反正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中派和左派都这么认为。结果会怎样呢？这要进行检查，而且是强迫的，这将会扩大中派的影响^①。如果我们商定，不宣布，自己来检查，那样会更好些。您对此是怎么想的？

谢尔盖：这要考虑考虑。这是你们的全部要求吗？

学者：我们希望共产党人允许我们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工作。

谢尔盖：他们怎么能妨碍你们呢？

学者：应当让共产党人给我们提供联系。因为中央常常收到对农会的控诉，说它们甚至将一些市政官员判处枪决。如果我们一起行动，那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谢尔盖：但是如果你们到农民中去，没有明确的方针，袖手旁观，不站在他们一边，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学者：（有点生气）那您认为国民党在农民中能有什么用处？

谢尔盖：我本人曾呼吁你们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列。到农村中去看一看。建立一些联系。同工人也一样，站在工人斗争的前列，与他们建立一些联系。

学者：建议在这里举行三天会议，在您参加下商定一切。

关于汪精卫回来的问题，我们有两种意见。有些人认为，应当等等。我认为，时候已经到了。应当让他回来。

共产党人进行反宣传，似乎我们是新右派，等等，这不好。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47—49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原文如此。

90

拉狄克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

1926年8月31日于莫斯科

致联共中央书记处

抄送：联共中央中国委员会主席温施利赫特^①

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三二〇”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任何报道。后来把共产党人逐出广州的许多军事和民事部门的事态发展也没有作报道。表现为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的整个力量变动，企图以黄埔军校来取代国民党的想法——这些我们的读者都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因为在一定的时候，我们的读者会在无法掩盖的事实面前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如果说连这种策略对于确定我们党的方针都没有什么危害的话，那么在中山大学实行这种策略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学生们阅读中国的报纸，接到家里的来信。上述事件成了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我们不能不对这些事件作出评述。否则不仅意味着放弃学校的任务，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学生们已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夏季，我度假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现在是我应该作出答复的时候了。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给哈林同志”；“布哈林同志：务必看一下，问题很紧急，敬礼，K. 拉狄克。”

困难在于蒋介石现在是国民党的正式领袖。我们没有与他断绝关系。对蒋介石的政策作共产主义的评述不仅会造成学生的分化，而且也会在广州引起反响。因此，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请中央书记处把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79，第 127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91

拉菲斯对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使团在广州工作情况的 材料的总的意见

1926年9月1日于广州

总的意见^①

根据我们到达广州后的决定，马克斯^②应在这里继续记日记和在所有会议上和会谈时作记录。由于所有会议和会谈都是用两种语言进行的，所以在翻译时记下了相当完整的谈话。不过记录

^① 在文件的右上角有 M. T. 拉菲斯亲笔写的批语：“附在广州的材料上”。

^② M. T. 拉菲斯。

既不要求完整，也不要完全准确。

遗憾的是，没有审定记录和由每个发言者对记录作初步校订的制度。英国人^①得到了所有材料的副本，纯内部材料除外，他强烈抱怨记录记得不准确，但他仅举出一个例子，援引了五次，认为没有正确转述他对香港罢工的意见，似乎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居民阶层都不能忍受罢工。这句话在记录稿上也没有，但他说的话的总的意思是转述得正确的。曾不止一次地建议他校订记录稿，但他没有这样做。

秘书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50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0 号（特字第 38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9 月 2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8 月 26 日会议第 49 号记录，决定：3.〔1〕），（报告人：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① M. M. 鲍罗廷。

决定：1. [1] (1)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苏联的报纸上和最有影响的外国报纸上发起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政策运动。

(2)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我们的报刊上系统地报道帝国主义者在整个远东的进攻情况和特别是张作霖对中东铁路的进攻情况。

(3) 后天公布交给中国代办的照会^①。

(4) 中国委员会应讨论加强在满洲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中的政治工作的措施，以巩固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影响。

(5) 征询中央远东局关于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满洲反张作霖的游击运动的意见；责成中国委员会为远东局起草关于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南满以及我国边境地带游击运动的指示信。

(6) 认为有必要让外交人民委员部就中东铁路上发生的所有问题给铁路工作人员发去政治指示信。

(7) 责成军事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局在两天内就加强保卫我国远东边界问题提出建议。

(8)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改善我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制定具体的外交措施并呈报政治局。

(9) 立即召科普同志来莫斯科，以便派他去东京。

(10) 提请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在工农中做工作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与广州毗邻的省份，并认为有必要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准备在远东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的问题。

(11) 交通人民委员部应立即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去解决中东铁路上出现的交通困难。

(12) 责成中央书记处指派一些同志来接待和联络前来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

^① 见《消息报》1926年9月4日；《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莫斯科1959年版第115页。

(13) 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任命林德同志为驻上海总领事、驻北京临时代办的建议。

(14) 责成组织局立即，不晚于一周内，指派一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去中国做政治工作。

(15) 建议冯^①提前采取一切措施不让国民军部队向外蒙古转移。

(16) 建议广州同孙传芳达成协议，以便取得他的支持或保持中立，并试探同张作霖达成不侵犯协议。

(17)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汉口和包头设立领事馆。

抄送：

契切林、温施利赫特、缅任斯基、库西宁、瓦西里耶夫、库比雅克同志——〔5〕〔2〕（15）（5）（用密码）；鲁祖塔克（6）、（11）；莫洛托夫（12）、（14）；格伊（12）、（14）。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第 110--11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冯玉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第 24 次会议第 18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9 月 11 日于：海

俄国代表团第 24 次会议第 18 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马克斯、切尔尼亚克、年轻人^①。

听取：中国总的政治形势。

鉴于广州与孙传芳之间发生战争和存在着英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提出该问题进行讨论。

在谢尔盖作出通报并长时间交换意见后，通过了以下决定：

决定：1. (1) 认为目前国民运动应当竭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在北方的侵略政策应引起国民运动的相应反应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特别是在北方。

广州部队、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整个政治行为，尤其是宣传鼓动工作，应当作出这样的安排，使得英国主张进行武装干涉的人难以建立整个资产阶级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国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应向英国政府和英国公众发表相应的声

^① 分别为：P. H. 维经斯基、M. P. 拉菲斯、T. P. 曼达梁、H. A. 福京。

明或正式呼吁书，强调同英国的和平意愿。

必须在英国国内组织广泛的运动，吸引自由党、工党、工联和左派参加（同时邀请连斯贝里^①、《曼彻斯特卫报》^②记者、工人代表团到这里来，这一切均由莫斯科酌定）。

上述一切将于近日内与沙赫^③共同讨论，然后向上级机关报告。

(2) 在占领武汉和湖北省以后，广州部队应停止继续向北进军。

鉴于在广州部队重新占领的地区以及中国其他地方在进行北伐，今后的整个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应以扩大和巩固国民运动取得的一切成果为目的。

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在重新占领的省份建立政权，巩固国民党在形式上和实际上的影响，以及解决在广州部队占领地区的政权联合形式问题，这些都应该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民族解放运动对全国的影响和把力量聚集在国民党周围。

党中央应该坚持不懈地监督各地区的所有党组织严格地遵循党进行国民革命的方针和全会关于与国民党关系的决定^④。

在广州部队和湖南部队占领的地区，共产党和国民党应该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来扩大和加强社会革命团体，以对抗军阀倾向。

党应该利用时机动员无产阶级力量和它作为国民运动的独立因素来进行有组织的发动。

(3) 为防止北方迅即发生进一步的斗争和孤立孙传芳，我们应该建议南方部队和国民党向张作霖及其盟友提出召开专门和平

① 乔治·连斯贝里(1859—1940)，1925至1927年间任《连斯贝里劳工周报》编辑。

② 《曼彻斯特卫报》是从1821年起至1959年在曼彻斯特出版的一家英国日报，从1959年起以《卫报》名称出版。

③ Л. М. 加拉罕。

④ 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会议的建议，以此来缓和武装干涉的危险。

(4) 在孙传芳占领的五省^①，整个工作的目标应当是破坏孙传芳的军事力量和使那些他用和平和有机工作的口号聚集在自己周围的大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离开他。

考虑到资产阶级在整个这一地区的组织性和领导作用，认为有必要使反对孙传芳的运动不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和公开支持广州的口号下进行，而是由该资产阶级中反对孙传芳的人士（部分是亲日派）来领导，在五省退出战争、建立地方政权等口号下进行。

我们党应该对这场运动从旁边加以支持，不抛头露面，也不谋求领导权。工会可以参加联合委员会。在支持这场斗争的同时，必须力求从领导人那里为革命团体和工人团体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考虑到张宗昌有可能占领上海地区，现在就必须在他现有的管辖地区加强内部分化工作。

必须做好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孙传芳败退与张宗昌可能进攻之间的过渡时期。

必须向党组织指出最大限度地吸收五省的农民组织参加总的斗争和组织力量的必要性。

听取：2. 关于远东局委员的汉口之行。

决定：2. 认为广州部队在武昌站稳脚跟后马克斯和切尔尼亚克有必要立即去汉口^②。

听取：4. 关于印度人^③的工作。

决定：4. (1) 认为有必要让印度人留在远东局农民委员会里工作。

^① 指江苏、江西、福建、安徽和浙江。

^② 以下删去关于日本共产党的第3项。

^③ B. C. 弗雷耶尔。

(2) 为了了解农民运动状况，认为有必要让印度人立即或者在拟议于汉口召开的农民会议以后去广州。

听取：5.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的款项。

决定：5. 业已收到的支持罢工等的专门款项应留作用来资助正在恢复的铁路员工组织等的后备金。

听取：6. 关于法国人^①的工作。

决定：6. (1) 利用法国人做码头工人工作、工会运动工作以及新闻工作（为中共编写国外新闻通讯方面的综合材料）。

(2) 用电报征询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是否可以在拨给相应补充款项的条件下利用法国人来成立港口局。否则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将法国人召回莫斯科^②。

听取：8. 关于俄国代表团的会议。

决定：8. 俄国代表团讨论政治问题的所有会议都请小青年、印度人和诺拉^③参加。

主席：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31—33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让·杜克鲁。

②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共产党的第 7 项。

③ 分别为：H. M. 纳索诺夫、B. C. 弗雷耶尔、M. Ф. 库兹涅佐娃。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 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 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

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

绝密

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 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

一、调查的目的

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没有通过关于广州问题的最终决议。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中央来说，显然都有必要在当地研究广州的各种关系。因此决定，远东局出3名成员，而党中央方面派两名中央委员去广州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

这次对广州各种关系的调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可归结如下：

1. 弄清“三二〇事件”后政府权力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和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2. 判明当地的政治形势，随着北伐的进行，它将如何发展。
3. 审查党在“三二〇事件”前后的政策方针，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并根据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精神修改这个方针。

上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由于预定在8月

召开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党际间会议，已经提到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为解决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而成立的新机构的议程上（见附件1和附件2）⁽¹⁾。

4. 了解农民运动及其在总的形势中的作用。
5. 就地研究迅速结束香港抵制罢工的方式方法。
6. 了解中共、共青团的组织状况和工会运动情况。

我们在广州逗留期间（8月6日—9月2日）正遇上由于消除“三二〇事件”影响和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而在广州政治生活中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提到了政治生活的议事日程上，与广州的同志们讨论这些问题以及在同国民党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这些问题，都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上面指出的任务。

二、“三二〇事件”后广东 发生的变化实质

蒋介石3月20日武装示威的外部形势起初给许多同志造成一种印象，它的基本原因是蒋介石对军队中的关系不满，即：多余的政委设置、军事“顾问们”的不知分寸，等等。但是很快就弄清，尽管这些细节有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三二〇事件”的原因实际上要更深刻得多。

蒋介石3月20日武装示威不是蒋介石和中派集团的孤立的偶然的行动。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行动，结果在5月底国民党的政府权力和国民党的整个领导权从（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和共产党人集团手里转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集团手里，随后他被选为总司令（鉴于战争，内阁各部听命于他）和国民党中央主席。

蒋介石取得这一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的制度同以前的制

(1) 附件没有找到。

度有很大差别，暴露出“三二〇事件”的真正实质。

我们在这里援引^①我们的同志在（有我们参加的）中共区委会议上对形势作出的一些评价：

张太雷（区委委员和当地党的周刊编辑^②）：在同陈炯明斗争的时期，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广泛，具有社会性。现在宣传沉寂下来了。大家日益感到不满。右派胆子大了。在东江，以前在蒋介石军队的保护下农民运动广泛开展，现在在农民当中强制分摊债券。谁不购买，就说他是反革命，说他反对北伐。当地的市政官员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实际上是反对农民的。广州的县长^③为了支持豪绅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处对农民发起攻势。或许不起义农民运动就会被击溃，但也有可能爆发起义。

以前国民党给群众提出了具体的口号。例如，为农民提出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要求。对商人也是这样。中派现在讲一些抽象的东西：讲三民主义，讲孙文主义，讲国民革命的利益，群众不理解这些东西。中派不相信群众，竭力在群众中制造分裂，互相诋毁。没有领导，群众中会滋长一种坏的倾向，纠缠在细小事情上。右派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在衰落，但在国内，地主、豪绅、官吏的影响在增长。

蔡温来（音）^④（区委妇女部长）：官吏们不仅不服从国民党，而且还枪杀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变坏了。他们都说，工人的斗争妨碍后方。右派竭力要控制对工会的影响。他们经常把农民组织称为土匪组织，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它们……^⑤所有经费都用在北伐上。发行了债券。这些都落到了农民

^①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鉴于没有速记记录在转述这些讲话时可能有些不准确的地方（文件原注）。

^② 指《人民周刊》（见本书第393页注①）。

^③ 关子文。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

^⑤ 此处和以下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头上。现在工作更困难了。过去，国民党员在群众大会上、在游行中发表演讲，而现在沉默不语，脱离了群众。

关守森（音）（区委组织部长）：广东省统一后国民党左派说，不需要农民运动。军人也反对农民运动，因为农会妨碍他们征收各种不正当的和不能承受的税款。驻扎在广州的李福林军长建议解散农民组织，说他们是土匪。债券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各地区清剿土匪的工作停止了。农民自己起来同土匪活动进行斗争，但政府不帮助他们。东部地区卫戍司令^①下令禁止成立农会。他宣布，他将把反对当地市政官员的行动作为反对国民政府的行动、作为反革命予以惩处。在北伐的借口下，他们想取消结社的自由。

彭湃（农民运动的最有声望的领导人）：“三二（）事件”是对国民党的致命打击。群众希望离开国民党。群众不知道“三二（）”这个术语，但知道它的实质。在我的那个区（东江区），原来的行政委员周恩来不得不离开，这以后那里又公开贩卖鸦片和进行赌博。后来从“孙文主义”学会来了一位新的行政委员^②。他撤换了许多原先的市政官员，以后“孙文主义”学会开始掌权，并直接发号施令。现在那里是豪绅、市政官吏和被收买的官吏的政权。群众不知道“五一五”这个术语，但是他们看到，蒋介石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占据了所有人的位置。在汕头，蒋介石的走卒何军长^③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演讲说，在北伐期间，罢工就是反革命。我们的一个工人^④站出来说，剥削也是反革命，从而改变了会场的整个情绪。在农村，我们的口号是自治，而孙文主义分子的方法则不同，他们希望通过官吏来进行管理。他们说，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一切纠纷都应通过法院

① 何人不详。
② 徐福（音）。
③ 何应钦。
④ 何人不详

来解决，我们则反对，因为地方上没有那么多法院。连地主豪绅的民团也支持这种做法。而现在，农民组织因提出这种要求面临着解散的危险。政府的行政委员^①命令农民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禁止提出减租的要求。

沃罗夫斯基^②（党内称呼，职工部部长）：工人之间的主要冲突是我们的“工人代表大会和右的广东总工会之间的斗争”，后者的领导人是富翁陈森，他跟反革命无疑是有联系的。在一次冲突中，我们的一位同志被打死，伤了两人。通心粉业工人和刷子业工人把这个陈森抓了起来并带到我们理事会里来，后来把他交给了警察局。但是蒋介石坚决替他辩护，于是他被释放了。

在这里我们也援引英国人^③的意见，他也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发生了变化。

英国人（绰号）：当我们谈到北伐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思想的两种提法。孙逸仙本人开始时把北伐设想为对北方军阀的单纯的军事征讨。后来俄国人来了，提出了新的革命的提法，即：北伐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商人群众革命运动的产物，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要求和纲领，它的体现者就是正在向北挺进并在那里协助以上述革命要求为基础把群众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军队……在3月20日以后，北伐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其革命的性质。在蒋介石的政治表述中，某些居民阶层的明确革命要求完全不见了。他谈的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是抽象的中国国民。他领导的不是与人民大众有着共同要求的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部招牌的单纯军事组织。

在附件1和附件2中，我们援引了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关于改变国民党内共产党人态度的决议。蒋介石曾想取得而现在

① 何人未详。

② 黄平。

③ M. M. 鲍罗廷。

已经取得的这些决议的主要实际结果，就在于让共产党人立即离开国民党中央各部的领导岗位，但要注意到，这些部在广东国民党的正式权力机关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蒋介石及其整个一伙的摇摆性反映在对这些反共决议的解释上，特别是反映在中央全会专门通过的声明上：一切都是旨在冲淡由于通过这些反共决议而在群众中造成的负面印象。且不去评价8条中每一条的意义（就这些条款本身而言，单独每一条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必须注意到，这些决议是在蒋介石直接施加压力情况下并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装示威之后通过的，不是根据同共产党人的协议，而是为了反对他们而通过的。

同时必须指出，蒋介石本人和他的那个中派在思想上决不仅仅是想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作用。整个中派在其公开的言论中都表示反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存在，并提出中国只有一个党将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个党应该是国民党，当然是中派所领导的国民党。一部分左派也是这么想的。

关于北伐再说几句。

不管北伐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孙文主义的整个思想和国民党的整个军事“方针”这一点如何之正确，还是必须注意到，1926年夏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就其具体的形式而言并非直接来源于孙文主义，而是来源于围绕“三二〇事件”所形成的具体形势。这次北伐使蒋介石发动的政变以及作为这一政变内容的整个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

蒋介石推翻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政权的这一事实使他背离了农民，他只能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来对抗原政权的革命民主思想（这使国民党回到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很远的时期），而同北方

① 见《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资料集）》第313—317页；《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86年版第1卷第570—573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文版第2卷第720—723页。

进行的战争为军事独裁(这是蒋介石在走上非民主道路以后唯一可以采取的管理形式)开辟了道路。

对北方军阀的征讨在客观上可以对全国起到而实际上也起到了革命的作用,几乎消灭了吴佩孚,为自由地开展民族解放运动清出了新的地区,在国民党的政治领导下统一了长江以南的地区。但是,对于广东省本身来说,“三二〇事件”后的这次征战,在某种程度上使社会和政治反动的倾向神圣化了并得到了加强。

这里还要加上为北伐筹集资金的老办法。在“三二〇事件”后,这些新的税捐的全部重负自然主要落到了农民身上。而强行收取这些税款和在农民中强制摊派军事债券又加强了豪绅、高利贷者和被收买的官吏们的地位,使广东省发生了大倒退,破坏了农民群众与国民政府之间尚未巩固的联系。

把上述所有这些导致社会和政治反动的“三二〇事件”结果归咎于中派和蒋介石的主观愿望,那是错误的。把中派的政策与国民党顽固右派的政策相提并论,那也是错误的。蒋介石本人事先采取一系列措施同右派划清界限并削弱它在广东的影响。对右派进行打击的最明显的事实是撤换和逮捕广州警察局长、国民党右派吴铁城,驱逐右派的著名首领伍西西^①等。

但是,由于蒋介石和执政的中派把主要打击矛头针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由于蒋介石武装发动的结果是左派和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政权,所以这就必然导致我们在上面所描述的社会和政治反动。在农村中以农民为一方和以地主、豪绅为另一方之间的农村社会斗争取得相当发展的形势下,汪精卫政府曾以保护农民运动而出名,汪精卫离开政权有利于一切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当权派的明显纵容下被他们所利用。

因此,从“三二〇事件”一切后果的对比中得出的第一个总

^① 伍朝枢。

的结论是，没有左派参加的国民党“中派”（浙江派）政权必然会给社会和政治反动开辟道路。

总之，由于发生“三二〇事件”，我们看到：（1）地主豪绅在地方当局的参与和军队的纵容下向农民组织和农民发起攻势；（2）地方政权机构转到与豪绅相勾结的卖身求荣的官吏手中；（3）企图取消工人组织的自由和反对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4）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组织普遍受到削弱，有搞军事独裁的倾向；（5）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机构中的地位被大大削弱；（6）国民党中的领导作用从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转到更为右倾的中派身上；（7）在工人组织中更右分子的地位得到加强，最后（8）加快了对北方军阀的调情式武力征讨。

三、“三二〇事件”的客观原因

既然“三二〇事件”不是某种偶然事件，而且为广东的社会和政治反动开辟了道路，因此必须仔细分析这一事变的原因。尽管广东省的社会结构具有种种特殊性，但是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该省革命建设的经验对于全国来说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无疑可以防止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重犯在广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但是首先必须分析造成广州政府整个政策向右转的客观形势。

就该地区的经济性质本身而言，广东政权的摇摆是不可避免的。广东省根本没有可能成为革命建设催化剂的工业无产阶级。城市带有封建时期的旧商业、手工业关系的烙印，行会充斥，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主要的居民阶层是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富裕的买办资产阶级对整个经济生活起着更大的影响，这些阶层与香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使众多的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从属于自己。国民党的领导人就是来自于这个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队伍。

广东省的特点是农民运动广泛开展。农民同土匪的斗争和争

取减租的斗争已经转变为农民队伍与所谓民团（即由地主和在城乡当权的居民阶层——豪绅组成的官方警察）之间的武装斗争。

广东省的革命建设过程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孙逸仙在世时和国民党1924年改组后的革命政权，实际上是靠在相互角逐的各派军阀之间左右逢源支撑着的，每次都是依靠它们其中的一个军阀来反对其余的军阀。但是在争取自身生存的斗争中，革命政权，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后，逐渐给自己奠定了独立的基础。这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了黄埔革命军并在这支军队内部相当广泛地开展了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试图集中军事力量并给军队提出了清除广东省的反革命分子和把广东省统一在广州政府政权之下的任务。

在清理广东省的这一斗争过程中，革命政权同农民接近了，农民首先关心的是清剿土匪，因此坚定不移地支持军队。随后政府采取了迎合农民的步骤，颁布了关于成立农民组织的法令^①。广州革命部队在许多地区在农民同民团的斗争中不止一次地站出来保护农民，帮助武装农民队伍，等等。总之，这样一来，在最近两年来，为巩固农民和广州政府之间的联系创造了某些前提条件。必须指出，这个过程也只是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而农民取得的这些初步革命成果毕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强烈不满和忿恨，从而产生了反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的革命各界处于极其分散的状态。它们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特点：带有反帝色彩的普遍激进情绪，社会团体易于激动同时又极其软弱，上层和下层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系，缺乏任何稳定的干部。国民党组织本身并非欧洲式的政治组织，没有明确的纲领、内部的团结和党员群众的积极参与。这多半是个上层组织，联合着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而在这个上层组织中，相互交织的大小派别和集团之间的斗争持续不断，这

^① 指1924年6月19日《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个宣言》。

些派别和集团有时是建立在同乡或其他特征基础之上。同时在国民党组织的上层人士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在各种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军人，而军队中的指挥人员又常常是根据同乡或其他派别性特征挑选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军队和以军队为靠山的政府是促进广东省革命发展的基本因素。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革命各界是较晚出现的因素。与此相适应，在革命建设的军事独裁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前者起着决定性作用。迄今为止，在广东省没有建立任何可以作为政府与民主居民群众的联络机构的革命代表组织，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尽管国民党向全国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在广东建立这样的“人民政府”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提出。1925年曾一度提出过选举和任命广州市长的问题，但围绕这个问题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倾轧，于是不得不放弃选举，从国民党中央任命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来当市长^①。

在上述情况下，由国民党左派组成、有中派参加并有共产党人全力支持和实际参加的革命政权，只有在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同以中派为另一方之间存在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才可能是稳定的。对中派的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政权的主要基础——军队掌握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手里。

有两个全国性因素使这种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导致了广州革命政权的危机：（1）上海罢工^②后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分化；（2）北方国民军的失败，反动派开始对共产党人发起总攻。1926年2、3月间，这两个因素在广东省的影响达到了最大程度，表现在国民党内三派的迅速分化上：（1）左派，走上了与农民联系的道路；（2）右派，明显倾向于同帝国主义者搞妥协；（3）以蒋介石为首的所谓中派集团。这个中派集团已经形

^① 伍朝枢

^② 指1925年5月30日的反帝运动。

成，只是在广东具有很大意义，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浙江人，即蒋介石的同乡、同商业资产阶级和江浙部分豪绅有联系的人。广州的中派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小集团。中派的思想在国民党内是一股强大的思潮，其理论家和思想领袖是戴季陶。当我们的同志把蒋介石称为穿军装的戴季陶时，他们是想以此来说明，与豪绅勾结在一起的中国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必然导致反动。

在反动派对民族解放运动发起总攻情况下，蒋介石3月20日的武装示威是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中派”为另一方之间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结果。这里我们就要研究左派和共产党人在“三二〇事件”前夕的政策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它起着导致“三二〇事件”和其后的事件与变化的主观原因的作用。

四、广州同志的政治错误

我们广州组织进行工作的客观条件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自决进程被大大延缓，既由于客观的原因，也由于当地同志的错误方针。在去年的秋季全会^①以前，整个广东省内（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进行工作）只有400名党员。1925年夏的全会^②谴责了区委的这种工作方针，并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在广东从组织上加强我们的党^③。党组织服从了，目前几乎发展到1千名党员，但这种发展有一半应属于3月20日以后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党组织被驱逐出政权机关，在群众中从事巩固自己的阵地的的工作。

在缺乏独立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条件下和在社会分化不甚明显的环境中求发展时，以及在国民党军阀派系经常争斗的政治氛围

① 指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

② 原文如此。

③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459—477页。

中，直接参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时，任何上层的计谋都将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公开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制度几乎不为人所知，因此任何一个独立的意见都会被看作是策划推翻当权派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是很难从事政治上和组织上自决的工作的。但是我们的广州组织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不间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这种领导的意义，不仅对于我们的组织而言，而且对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言，都不能估计过高，但它有可能是很大的，如果它能防止听取我们意见的国民党革命人士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孙逸仙—布朗基主义幻想的错误的话。

但遗憾的是，广州的遥远地理位置和一系列地方条件使得没有可能建立这种坚定不移的和统一的领导。在党中央和广东区委之间，从去年夏天起就存在着对区委整个政策的严重意见分歧。中央不止一次地警告过我们广州同志的错误言行。但中央未能警告广东区委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关系的彻底破裂，进而又导致了“三二〇事件”。

这个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7月1日的电报中说：

“左派和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力量 and 影响，完全没有估计到无论从军事方面来说，还是从港口城市资产阶级大规模形成的角度来看北方形势的恶化。代表大会以后3月20日以前，他们在广东加强了左倾空谈的政策，而当时实际上需要政府实行较为温和的现实政策，需要共产党人停止抛头露面。这也说明有过多的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右派（当时相信群众有左的情绪，认为右派并不危险）参加了国民党中央。”

“同时，国民党左派也没有真正地在工农组织中扎根，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政府，但没有切实改善群众生活状况的革命空

谈政策使政府脱离了主要的居民阶层。”

“实际情况和左倾空谈之间的这种矛盾决定了蒋介石3月20日的发动。这次发动暴露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地位的薄弱，废除了左派形式上的统治地位，排除了汪精卫（这一点对蒋介石来说特别重要），标志着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开始。”

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说，这里谈的是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同志们有意识地准备了这场广泛的“进攻”，没有考虑在极端不利时刻的实际力量，没有使农民群众做好准备，他们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以便迅速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措施。他们的这一愿望自然不可能对国民党其他派别保守秘密，因而造成了“三二〇事件”的后果和后来的一切。所有这些也可能导致广东基地的丧失，如果反革命力量组织得更好和“三二〇事件”后不能通过退却来纠正错误的话。关于这次退却我们在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整个错误观念还保留在口头上，这会使地方上的同志而且不只是地方上的同志头脑里更加混乱，进而犯新的政治错误。

广东区委书记陈同志^①在区委会议上阐述了关于“三二〇事件”起因的以下观点：

陈：我们对国民党的让步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在3月20日以前就作过一些让步。右派需要我们的让步并利用了我们的让步。我们放弃在国民党里担任一些职务，右派同意了。但是他们要求更多：要把中共撵出国民革命，结束工农运动。我们以前以为，右派的要求是个组织问题。而实际上是个深刻的政治问题。早在3月20日前，我们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策略就动摇了。“三二〇事件”是共产党人和左派软弱合作的结果。蒋介石这个穿着军装的戴季陶利用了这一点。此后国民党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

^① 陈延年

空堡垒。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国民党，即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密切联系和合作，这就是一切。

其余的东西，甚至孙文主义，都不重要。“三二〇事件”是缺乏密切合作的结果。我们曾经相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密切合作的条件下，我们谁也不怕——既不怕帝国主义者，不怕国民党右派，也不怕反革命。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在12月27至29日间，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局势^①。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分子号召进行武装示威，如果不对他们的要求作出让步的话……所有人都害怕他们的威胁，就连同他们商定，让他们提出“打倒上海中央！”^②的英国人也是一样。只有共产党不怕。我们不顾英国人的建议，拒绝参加示威游行，结果示威游行失败了。参加示威游行的总共只有8000人，而且一半是教会学校的妇女、业已解散的工会的工人和六团一个连的士兵——这是他们花一个月时间召集来的所有人，这表明，当时国民党是强大的，确实有着实际的影响。群众知道国民党中央的性质，尽管那里有伍西西和戴季陶，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小（就像我们现在这样）。3月20日以后，左派（和我们）没有权力。是我们自己把权力毁掉了。

我们毁掉了自己的权力是因为我们向右派作出了让步。我说的是广东。我们也因此破坏和动摇了同左派的合作政策。本来应当坚持左派和我们的权力。我们在向右派作出政治让步时，破坏了原先的局面。12月27至29日，汪精卫害怕了，因为我们要求打击孙文主义分子。去年10月，我本人在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③对我说，广州的政策是错误的，特别是在解除武装方面。总的说来中央是不赞成过“左的方针”的。在廖仲恺去世前，曾有一个

① 指1925年12月29日由于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而在广州出现的冲突形势

② 指在西山会议上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见本书第235页注②）。

③ 何人不知

很明确的和公开的政策方针：同左派合作，反对一切反革命。

谢尔盖¹问：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吗？

陈：我们大家都认为反对我们策略的人就是反革命。只是在12月27至29日间，在廖仲恺去世以后左派第一次动摇了。这是发生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总之，早在3月20日前我们就毁掉了国民党的基础，帮了蒋介石的忙。

所有这一切自始至终都具有典型意义。先是确定策略方针，同一部分左派即同汪精卫一派结成联盟，坚定不移地反对中派；在结成这种联盟情况下“我们谁也不怕，既不怕帝国主义者，不怕国民党右派，也不怕反革命”。然后得出结论，谁不同意这个政策，谁就是反革命，并采用军事手段将其解除武装（我们还补充说：将其逮捕和撤职）。采取这一政策的结果，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越来越孤立并又遭到那些还倾向于搞协作的中派的反对。当基地因此越来越缩小并导致“三二〇事件”时（中央曾谴责这种政策并坚持认为应考虑到业已变化的总的形势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广州的同志说，不是他们削弱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地，而是中央。

在广州同志的观念中，全部任务在于，使国民党和政府的整个机构无论如何要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联盟的手里，不能根据目前力量对比作出任何灵活处理和妥协。

在1925年12月27日即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副本送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广州的同志对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关于大会方针的联合指示^②极为不满，他们说：

“戴季陶辞职和承认自己无能，胡汉民虽被驱逐出广州但仍公

1. П. И. 维经斯基。

2. 文件没有找到。

开宣扬左的方针，北京会议失败后，左派在代表大会上占居多数，广东反革命分子的被粉碎，北方国民革命的必然高涨，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必须在党中央机关排斥共产党人。相反，应当加强……，那种认为共产党占居这种地位不应靠他们在省和中央机关中的数量，而是靠自己在基层的影响的反对意见现在已经过时了。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几乎是清一色共产党人。为了加强和开展这项工作，必须在中央和省级机关中有相应的力量，否则会给基层造成混乱。如果共产党人不去占领例如广东省党部中的主要阵地，那么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派到这些地方去从事反对我们的工作。广东有50万有组织的农民，我们不能把他们交给右的省党部。省党部由右派组成，而共产党人在基层，这就是没有考虑做工作的环境。

“在中央和省党部，由于缺乏共产党人团结一致的核心，我们没有建立起左派来。连汪精卫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也认为需要建立左派……”

“请讨论一下得到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支持的和汪精卫同意的以下方案，**第一方案**：国民党中央增加到3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共产党人。半数候补委员应是共产党人以便在省里进行工作。**第二方案**：国民党中央增加到40人，其中半数为共产党人，候补委员与第一方案相同。”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明确得出，广州的同志在12月底对**全国形势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看到反动派发起的总攻，而期待着不久会出现国民革命的高潮。认为戴季陶和胡汉民（从莫斯科）玩弄的花招是形势全面向左转的征兆，这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分析的典型体现。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电报只谈到两派，把左派（汪精卫派）与右派对立起来，**完全忽视了中派**。这就是整个立场

(1) 见本书第235页注释。

最致命的地方、政治错误的全部实质所在。正当整个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巧妙地应付中派，使他们跟右派发生分裂进而孤立右派的时候，我们同志和汪精卫的方针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中派和右派的联合，把中派推向右边，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在左派和共产党人之间瓜分政权。这也就是导致蒋介石3月20日武装发动的方针。

最后，关于中央组成人员的建议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在两个方案中，共产党人显得非常突出，在整个中央和候补委员名单中占了半数（或者按第二方案略微少些）。这里政治领导的任务完全被组织任务所取代，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关于由左派和共产党人完全占据中央的建议可能造成加速国民党分裂的后果，而且分水岭不是在中派和右派之间（应当加速这两派的分裂），而是在左派和中派之间，这只会对反动派有利，并会使广州在受到集中进攻的时刻陷于孤立。

中央关于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并未让广州的同志彻底实施他们所制定的由左派和共产党人不断进攻和占据国民党（当然还有国民政府）的方针，因此他们对中央及其方针忿忿不满，但是广州的同志毕竟在贯彻中央指示时作了重大修改，扩大了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作用。代表大会后，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反对中派的政策继续在执行，导致了左派和中派的彻底破裂和蒋介石的武装发动。蒋介石相信，通过此举他可以防止共产党人和左派对他本人和中派的进攻。

这场关于往事的争论，即关于广州的同志对“三二〇事件”的政治责任的争论，决不仅仅是关于往事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整个政策中的以下一些十分迫切的问题：

（1）对中派在广东省和整个中国范围内的社会政治“本质”的评价；

（2）广东政权的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派别构成（只有汪精卫一个左派、左派和共产党人，或者在共产党人支持下的左派和部分

中派)；

(3) 共产党人支持革命政权的方式和方法。

所有这些问题早在我们在广州逗留期间就出现了，当时就很清楚，我们要面临新的“政权危机”。

上面指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总的政策错误造成了他们同蒋介石派关系的破裂，从而导致了“三二〇事件”。在存在这些错误的背景下，共产党人和“顾问们”对军队政治工作采取的错误方法起了导火线的作用。给蒋介石造成的印象是：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政策目的是完全排挤他，不让他参加政权，这就直接导致了他3月20日的武装示威。

广州的同志往往指出，除了继续执行“进攻方针”以外，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来防止“三二〇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现在难以详尽地确定在反动派在全国实行总进攻的条件下应当采取的政策性质。但是十分明显，这一政策的任务不应是让城乡一切不满分子联合起来同革命政权相对抗，而是向城市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以便立即结束香港罢工和取消火油专卖，同时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迎合作为革命政府主要基础的农民；这样的政策就不会使农村的豪绅和地主同城市资产阶级接近，就可以破坏右派分子的支柱。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见广东区委书记陈的讲话，第15页^①），广州的同志一口咬定，向他们提出的巧妙地应付右派的建议，使他们误入了歧途，妨碍他们彻底实施他们的方针。我们必须较为详细地来谈谈这一点。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为了瓦解从上海“国民党中央”那里对广州和共产党人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右派，中共中央同部分右派的代表孙科（孙逸仙的儿子）等人举行一次会议，建议

^① 见本书第446页。

他们在谴责右派行为、开除少数右派和公开斥责其他右派的基础上同国民党中央言归于好。孙科派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报纸上向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愿意参加代表大会¹。这一行动当时在右派人士当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对右派队伍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一部分右派同孙科一起参加了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谴责右派行为并惩处他们首领的专门决议²。孙科本人被选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如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现在在中央和国民政府中工作。广州的同志现在激烈反对当时在孙科进入中央问题上同右派进行的谈判，但当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尽管在代表大会上改变了中央关于国民党中央人员组成的建议。此外，他们现在在讨论国民政府新的人员组成问题时也认为有必要把孙科列入其中。广州的同志（以及个别中央委员）指出，与其说是让孙科进入国民党中央，不如说是同右派进行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对于国民党内的力量组合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三二〇事件”。这表现在：（1）对于汪精卫的左派来说，这次谈判是出乎意料和完全不可理解的，是同他们的“直来直去”不灵活的行为方针相背离的。他们怀疑，共产党人同右派在搞阴谋……反对他们；（2）国民党内和广州的右派胆子变大了并成了对中派有吸引力的中心；（3）蒋介石本人也从共产党人同右派的这次谈判中看到了共产党人试图达成协议来反对他和他的那个派别。他更加感到自己被从左面和从右面孤立起来了，于是就采取了3月20日的行动。

我们现在不详细谈第一点。可以承认，对右派实行的这种策略确实应该事先同左派进行商量。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左派怀

1 文件没有找到。

2 见《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资料集）》第145—147页；《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中文版第1卷第562—563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文版第1卷第713—720页。

疑共产党人在搞阴谋，怀疑同右派结成联盟来反对他们，那么显然，广州的同志夸大了他们同左派的接近程度。不管怎么说，在“左派”采取“直来直去”不灵活的、“激进的”行为方针和共产党人采取必要的灵活的方针时，我们将来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策略上的这种差别。

五、共产党人在“三二〇事件”和5月15日 国民党中央全会以后的退让

蒋介石3月20日的行动以及随后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整个领导工作之外。共产党人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同政权机关和国民党的联系，但成了政府的反对派。

5月15日的中央全会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决议不仅是在左派参与下通过的，而且是由左派作为议案发起人之一与蒋介石一起签署的^①。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人员组成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其中多数是左派，但在6月的中央全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主席，而在这以前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就在中央内部确定了他的全部工作。左派被解除了某些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但劳工部和农民部以及宣传部等还留在他们手里。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同志离开了广州。共产党人也离开了一些部的领导岗位，虽然在5月15日以后的整个时期，他们还直接参与某些部的工作。

这里我们援引广州的一些区委委员同志对3月20日和5月15日以后的国民党和党政机关的一些意见：

张太雷：国民党三个部即组织部、鼓动宣传部和农民部的部

^① 详见《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资料集）》第318页。

长已辞职^①。在劳工部原来有三名共产党员^②，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劳工局”，广大工人对它都已习惯，而现在有三名不尽职的国民党左派^③。顾孟余教授现在主管国民党的鼓动宣传部，他害怕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主管《民国日报》的是陈瑗瑗^④，他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不知道），但他办报不行。国民党左派^⑤办的《农民报》^⑥办得更好些、更活跃些，但顾孟余不关心它。顾孟余曾召开由30名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但他不知道其中有16名是我们的同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过去的一位商人、左派、蒋介石的拥护者主管^⑦，但他跟广东省的组织没有联系。领导农民部的是甘乃光，他是国民党左派，在和我们一起工作，但共产党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工作不协调。领导劳工部的是左派陈树人，而书记是我们的同志^⑧。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央是无用的机构。每天都可以接到来自湖南、湖北和国外的决议和电报，要求汪精卫回来。现在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要比过去更加集权，但实际上各派都自行其事。过去是汪精卫和谭平山（共产党员）领导，由于缺乏领导，到处更多的是摩擦、混乱。不是搞运动，而是搞摩擦。学生中间，左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争斗，但中央不作决定。

邓^⑨：过去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中有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离开了，工作更困难了……中共中央的策略是帮助左派打击右派。

这在广州很难办，因为没有左派，无人可支持。我们中央全会的决议谈到建立新左派及其坚固的组织问题^⑩。目前这还只是一句空话。这样的左派还没有。而广州的国民党右派有组织。左

① 分别为：谭平山、毛泽东（代部长）和林祖涵。

②③ 何人不详。

④ 原文如此，显然是陈其瑗。

⑤ 甘乃光。

⑥ 见本书第379页注②。

⑦ 陈果夫。

⑧ 何人不详。

⑨ 邓中夏。

⑩ 指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派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在工人群众中只有我们有影响。

周恩来：过去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亲密的，而现在即使我们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们，他们也怕我们。也不存在左派这个特殊的派别，只有一些头面人物。一部分人公开投靠了新右派。有些人怕表态，但跟中派接近。中央工作不力，个人占了主导地位^①。在5月15日的中央全会上，右派很积极，竭力想改变对工农的态度。右派想把所有人——共产党人和右派都集中在国民党内，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但由于对共产党人的态度问题而未能得逞。右派反对我们，现在不仅要求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而且要求在党员登记卡上注明谁是共产党员。

关守森（音）：在3月20日以前，中央有个样子，似乎有权有势。5月15日以后我们的同志离开了国民党。组织部只是一个空房间。我们没有放弃农民工作。我们让农民去找国民党中央，但农民部没有了。不仅我们，而且甘乃光（国民党左派）也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了，并问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做工作：从工人运动还是从农民运动。

彭湃：3月20日是对国民党的致命打击。5月15日是国民党的死期。北伐是国民党尸体的腐烂。群众希望离开国民党。……群众看到了国民党和政府的工作。他们要离开国民党。可能有三条出路：（1）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即抬着这具尸体，到群众中去；（2）抛弃这具尸体，独自到群众中去；（3）找到一个药方来医治国民党。我主张医治国民党，如果可能医治的话。但是我们党能否找到这样的药方呢？

陈：3月20日以后，这里的左派当中，没有谁是个东西：他们不愿忍受蒋介石的压力，跑到这里来要求共产党人给以指教和帮助。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间，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

^① 原文如此。

劳的走狗。这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国民党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而左派自己提不出任何建议。5月15日左派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曾以为，国民党左派会在中央全会上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但他们却投票赞成这些提案。当时我们劝告他们，应该怎样做，让谁来担任部的领导，等等。左派接受了5月15日全会的决议，想要自己来工作。我们曾在各方面帮助他们。我们考虑到他们的愿望，退出了他们的机构或者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左派分化了：一些人明白了应当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另一些人则为蒋介石效劳……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人说，虽然他们根据蒋介石的要求离开了国民党，但左派将跟他们在一起。

（陈的这个长篇发言对形势作了评述，现全文附上。）¹

同志们的所有这些意见很好地说明了“三二〇事件”和5月15日之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情绪。但是在这种不知所措的背景下，还必须指出对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价值的普遍过高估计和他们的普遍失望情绪，在我们的同志看来这些左派似乎无可救药，毫无用处，不能进行任何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

对于我们党组织来说整个这一危机的积极后果就在于取得了更多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被迫离开政权机关和国民党机关后，更加深入到党的共产主义工作中去了，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如果说过去共产党人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工作的，那么在5月15日以后，我们的党组织虽然还没有公开亮相，但所进行的全部工作是旨在通过自己党的机构来加强自己的影响。

对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可以说是在他的步步紧逼下的无条件退让，没有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作出任何批评。这里必须估计到我

1 见第81号文件

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那种情况，即广东的整个政治组织和党组织是极其愚昧无知的，根本不了解欧洲政治反对派的斗争方法。在军事派系争斗的气氛中，特别是在独裁倾向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反对派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是很谨慎的行动，都会被行动发起者本人和它所反对的那些人说成是直接准备对政权采取武力行动。还必须指出，普遍惊恐不安的气氛无疑侵袭了我们的同志，有时使他们的退让变成了真正的投降。

我们的同志拒绝参加兵工厂的罢工^①，可以认为就是这种投降行为，这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兵工厂工人的影响。这次罢工是在准备北伐期间由经济问题引发的，但还在罢工爆发之前，当兵工厂厂长以准备北伐为借口要求工人无条件服从，因而工人不能享受罢工权利的时候罢工就开始了。对这次罢工的领导工作转到了“机器工会”身上，但在激烈的论战中，该工会具有工团主义情绪的领袖们却骂共产党人是“国民党的走狗”。虽然在兵工厂工会理事会六名成员中有五名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拒绝领导这次罢工，这是因为兵工厂工人的罢工会被蒋介石说成是公然反对他的行动，而共产党员断然决定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再来谈一谈围绕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发生的冲突。蒋介石对在黄埔军校和黄埔军队中存在着不从属于他的独立的共产党支部感到不满，他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在他所建议的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方案：（1）或者是取消共产党支部；（2）或者是所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3）或者是将所有共产党员开除出黄埔军校。在这种情况下，广州的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没有去迎合蒋介石。它选择了三个方案中的第二个方案，即宣布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此后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成立了独立的共产党支

^① 罢工是在1926年7月举行的。

部。

我们还要指出共产党人对北伐的态度。在3月20日和5月15日以后对蒋介石持反对态度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特殊的态度。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组织和罢工委员会参加了各种行动,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立场。罢工委员会为了减少失业,派出几千名罢工工人为前线搞运输,同时发表几个声明,其精神同蒋介石的声明相一致。共青团^①甚至成立了专门的青年军团开赴前线,也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立场。

所有这一切,一方面 是共产党人的某种惊慌失措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彻底实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退让的策略,目的在于防止在共产党人和蒋介石之间发生内战,否则会促使蒋介石向右转,有丧失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危险。

广州同志采取的正确步骤是成立了工农商学联合会^②。这里可贵的是最早把商人吸收到统一战线中,从而阻止了他们向右转。从这时起,在整个广东省加强了国民党在商人中的工作,从而消除了右派的影响。国民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商人工作部,这个部的领导职位交给了民族工业企业的领导人^③。

联合会向政府提出了近期活动的纲领,其基本精神是不说激进的空话,与总的政治形势相适应(取消火油专卖、尽快结束香港罢工、建立仲裁机构来解决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纠纷,等等)。

六、农民运动

如果我们不谈以下两个重大问题:(1)农民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村中的斗争(2)香港抵制罢工,那么我们对广东总的形势的分析将是不完整的。无论是农民的斗争,还是抵制罢工都大大

① 原文如此。应为“青年团”——译者。

② 指1926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工农商学联合会。

③ 简琴石。

加剧了广东省社会政治关系的紧张

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广东革命政权取得的总的成绩时所指出的，国民党当局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觉醒和对省内农民群众的组织。当局在清理和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帮助农民打击土匪。然后在各地成立农会，而农会又举行农民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成立自己的领导机构农民委员会。在国民党的机构中成立了专门的农民部，形式上领导了农民组织的整个建设工作。但运动还没有达到使农会真正成为群众性组织的阶段。农会多半是由国民党成立的农民委员会。

但是，国民党当局在宣布农民有权组织农会并大力帮助建立起农会后，就在维护农民利益方面踏步不前了。广州政府的军队没有像整个北方那样掠夺农民群众。但其余一切都跟过去一样。从农民身上征收大量各种各样的捐税。例如在中山县，我们的同志数出了向农民征收的18项各种捐税。广东省的官僚机构自然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被肃清，它们仍然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向大地主租地，大地主就强迫农民接受高额地租。广东省的县乡政权实际上掌握在与大地主勾结在一起的豪绅当权阶层手里。农民群众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后者收取高额利润。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领导职位。并有以所谓“民团”这个特殊的农村警察为代表的武装力量由这些统治阶层支配，民团是从土匪中招募来的，也是由这些豪绅和地主管理的。

扩大和加强广东革命政权的过程也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致使广大租地农民同与他们对立的豪绅地主发生了冲突。农会统一并组织了这场斗争，当然斗争的发展带有农民运动所固有的自发性质。在中央向最近一次扩大全会提交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广东农民运动的以下分析：

“广东农民运动到目前为止不仅仅限于争取实现自身经济要求的斗争。根据他们从斗争中得出的经验，他们明白，大声宣布‘打倒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层、贪官污吏、豪绅、显贵和大地主的反革命联合阵线！’口号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有意义的。现在已经可以把农民从他们争取建立阶级组织的斗争轨道上引导到国民运动的轨道上来了。凡对广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政治变动，农民都曾积极地参与，英勇地奋起，从而显示了农民的巨大力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这些变动中，特别是在东江地区的两次战争^①中，如果不是农民自己武装起来并开始瓦解敌人的后方，那么国民政府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农民在整个这一斗争中作出的牺牲是很大的。然而，他们都明白，参加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是争取自身解放的必要斗争。”

“农会势力的增长同时也引起了一切反对势力的嫉妒。特别是去年，在平息东江地区的战争^②后，反革命势力被彻底镇压下去，但它的根子没有完全消灭。他们不得不披上国民党的外衣。如果他们站在国民党和农会之外，他们就无法同农民进行斗争，因此他们开始加入国民党和农会，披着革命的外衣，来瓦解农民的队伍。”

“过去压迫农民的那些贪官污吏现在开始说：‘我们也是国民党左派。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纲领并将保卫工农，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显贵和豪绅也说：‘我们希望加入国民党，成立它的纲领所要求的农会。’首先，他们从事的是招募土匪，把‘人民军队’（即‘民团’）的权利交给他们。他们的说法是：‘国民党是老子，而农会是它的孩子。我们希望当老子来管孩子。’或者说：‘国民党是坐轿子的，而农民是抬轿子的，我们想当坐轿子的’。东江区

① 指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相应地在1925年2—4月和1925年10—11月）。

② 指国民革命军1925年10—11月的第二次东征。

的豪绅显贵争先恐后地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并同城市郊区有土地的地主勾结起来。他们宣称，孙文主义学会是孙中山本人的机构，它们可以解散农会。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致使农民不敢加入农会。留在农村的败兵和土匪，现在也怕统一在国民政府周围的广东开始实行清匪安民的政策。因此，他们都跑到农会，千方百计争取接受他们入会。

“与此同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要求，不能根除地主豪绅等人给农民带来的压迫和危害，因此农民渐渐地开始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丧失信心。这种倾向在参加两次东征战争的农民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两次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人员的伤亡，他们的领袖李老春（音）被反动派杀害，而今天他们依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中央的这个报告还描述了农会工作可能带来的以下一些危险：（1）农会极其分散；（2）一切都指望政府，而不是靠自己的斗争；（3）斗争异常激烈，以致逮捕和枪杀豪绅显贵；（4）农民武装的进攻行动也会唤起其他居民阶层；最后（5）土匪加入农会，利用农会来干各种违法乱纪的事。从所述的这些危险中就可以看出农民的斗争如何使农村的社会关系尖锐化了。

“三二〇事件”造成了这种关系的转变，引起了豪绅、地主、显贵和民团对农会的进攻。农会同其敌人之间的斗争变成了民团同农民队伍之间的武装斗争，相互残杀。在我们逗留广州期间，在离首都几十俄里的地方就发生了这种斗争，波及很大一片地区^①。正如农民委员会向我们报告的，引起武力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农会和民团之间围绕从广州得到的几十支步枪应该归谁的问题而发生的争执。民团把袭击农民队伍的时间安排在一个村举行大会庆祝成立农会的时候。这个村早就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由于在这里

^① 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中文版第4卷第1部分第595—601页。

成立了国民党的分部，它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民团的武装袭击。农会请求县长^①派武装来支援，可是他却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在这场斗争中你们中间谁对谁错。你们互相打吧，我要建议政府把你们都解散。’这种说法之所以恬不知耻就在于这位县长清楚地知道，民团手里有 600 支步枪，而农民队伍只有 100 支。在我们离开广州前，广州附近的民团烧毁 12 个村庄，还杀死 3 人。很说明问题的是，尽管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武装力量去镇压民团，但驻扎在广州的军长李济深（他本人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拒绝执行这项决定，理由同那位县长一样，即搞不清在这场斗争中到底谁对谁错。

对农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党员同志根据我们当地区委的指示进行的。中央农民部的督导员仍然都是共产党员。但不言而喻，工作不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的。至于说到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在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以共产党名义为农民出版小册子，不能在北方发行^②。反动派的反共鼓动宣传压倒了农民对共产党人的兴趣和同情。在东江地区，我们的彭湃同志在农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他也是国民党省党部成员。农民欢迎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围绕他的名字，流传着许多故事。

在我们逗留广州期间，在那里召开了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有达 80 名的地方工作人员参加会议^③。与事先发出的指示相反，还派来一些无党派农民参加会议，但与会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约占 80%。没有一名国民党员。整个会议都是在我们区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国民党中央以及连农民部部长^④都不重视这次会议。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 1926 年 8 月 19 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委员会执委会扩大全会。详见《犁头》周刊，广州，1926 年 11 月 19 日第 19—20 期。

④ 片乃光。

只限于致形式主义的贺词，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烟草工业公司经理、国民党商人部长^①所致的情热贺词，他代表商界祝愿农民在实现其社会要求方面取得胜利。

农民问题是最近这次中央全会讨论的主要题目，全会更加明确了这个问题的提法，特别是批准了广东农民要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的最低纲领^②。在这些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大的但对农民来说非常重要的条款，如统一的农业税，减征地租25%^③，确立统一的度量衡等等。中央制定的方针在农民委员会全会上得到了执行。上述口号将是在基层农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的运动的目标。此后将由农会以农民名义提出并提交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农民运动无疑将被纳入更有组织性的轨道。

七、香港抵制罢工

我们到广州的时候，结束这次抵制罢工的问题仍像14个月期间那样处于僵局。地方组织和罢工委员会的所有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将千方百计争取立即停止罢工，但又一直补充说，由于香港坚决不想作出什么让步，而广州也不会同意投降，局势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5月份成立的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要求之一是尽快结束罢工。随后，广州政府同香港方面直接进行谈判。7月，同香港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但实际上一无所获^④。

我们的同志在5至7月间对香港罢工的策略，正如广州的同志向我们所说的那样，可以归纳如下：

在“三二〇事件”以后形成的局势下，商人对罢工和罢工委

① 简琴石。

②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428—430页。

③ 在全会通过的《关于广东省农民运动的决议》中谈到减租到25%（见《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州1983年第428页）。

④ 实际上从1926年7月15—25日期间香港政府和广州政府代表举行了5次会议。

员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居民对罢工纠察队和征用外来货十分恼火。罢工委员会及其整个组织成了“眼中钉”。由此产生了一个任务：恢复居民对罢工的同情，在广东和全国人民的眼里提高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向居民表明，罢工委员会和政府正在竭尽全力结束罢工，但是由于香港方面的顽固不化而不能做到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目前同香港不能达成任何协议。这个结论是在征得香港和广州方面的同意通过专门的代表团同商界进行了各种私下谈判之后得出的。香港方面的顽固不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州右派人上在“三二〇事件”以后对它的支持，他们使香港方面抱有可能更替广州政权和右派取得胜利的希望，这些右派一直同香港保持着联系，无疑会同意达成协议。在“三二〇事件”后不久，香港通过一位国民党右派^①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向广州提供大笔贷款的建议，条件是全面改变政策方针，但这位中间人被蒋介石赶出广东地界。

从所有谈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无论如何不同意向罢工者支付任何赔偿，而这个赔偿要求是广州方面的主要要求，不满足这一要求，广州方面就会认为自己是投降了。然而对于香港来说，13万工人的罢工本身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具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香港已从各地（中国以外）招募了大量工人，它可能只需要一定级别的工人专家。但是香港贸易普遍的不景气大大缓和了罢工问题的尖锐性。对于香港来说，问题是结束抵制，这种抵制对它来说曾经是非常敏感的，也破坏了香港在东方的作用和英国在东方的声誉。然而香港也是出于维护英国声誉的考虑不愿支付赔偿金，在私下谈判中确定的赔偿金数额约为500万港元。

由于广州的同志不愿放弃自己的赔偿要求，因此他们正确地认为会议不会有什么成果，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整个策略是只想

^① 何人不知。

达到揭露英国，提高抵制罢工的威信和政治意义的目的。广州的同志懂得，把向罢工者支付赔偿金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会降低斗争的政治意义，因此在谈判过程中把对去年6月的沙面流血事件^①应负什么责任的重大政治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

在这样来进行所有谈判的情况下，自然谈判只能以平局而告终。罢工在广州和整个中国的政治道义上的影响确实有所提高。香港方面提出提供贷款的建议，条件是委托英国人来修建黄埔港和从广九线至长沙的铁路，总的说来也就是受到国民党右派欢迎的那些建议。实际上，香港的这些建议意味着，香港试图一举不仅结束罢工，而且打消国民政府想提高广州作为港口的独立意义的企图。从自己方面来说，广州提出贷款要求是为了弥补14个月罢工斗争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从而缓和赔偿要求，并取代这种要求提出提供带有特别保证的贷款的建议。

谈判结束后的第二天，罢工委员会发起了兑现会议政治成果和揭露香港新的计谋的运动。最后组织了专门的支援罢工工人周。同时明确强调了更加加强抵制行动的必要性。纠察队的工作得到了很大加强。政府又给纠察队发了一些武器。所有这一切自然是**极其错误的**。本来无论如何应有较长一段时间来等待香港方面对联席会议的决定作出答复，而这场新的运动相反却便于（在香港和伦敦的）那些主张惩治罢工委员会的人撕毁一切谈判。这个错误加上由于北伐的胜利而在全中国出现的普遍紧张局势加速了危机的到来。8月20日港督^②发表了一个有名的讲话，把罢工委员会污蔑为强盗，声称广州政府无力保证广州的秩序。而8月27日香港又通过其驻沙面总领事^③向外交部长^④声明，它将直接采取武

① 指1925年5月23日英国和法国租界的军队和巡捕在沙面（广州）枪杀反帝示威游行者的事件。

② 克萊門特

③ 德姆森

④ 陈友仁

力来惩治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以保障英国贸易利益。

我们在上面一直谈的是我们同志的策略，没有特别突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因为广州的共产党人和他们所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在对抵制罢工的态度上始终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立场。顺便说一下，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的是，广州的同志对这次罢工的整个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抵制罢工持续 14 个月意味着广州承受了力所不及的重负。这种旷日持久的抵制无疑使广州的整个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进而又使社会政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要求——得到香港方面给罢工者的一定赔偿。然而，香港抵制罢工在政治上的胜利即使在进行三个月和六个月之后都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想要结束罢工和抵制，本来是可以找到达到政治上满意的各种方式的（而对罢工者的物质赔偿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

香港抵制罢工的拖延无疑也在“三二〇事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无限拖延的罢工是对保留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实际威胁。

8 月份，在广州的总数为 13 万的罢工者剩下了不到 3 万 5 千人，他们每天得到 20 分的补助，有从得到罢工委员会分支机构支持的英国公司那里弄来的住房。应当指出，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实际上是某种“国中之国”，但决不能说是广州的两个政权，因为在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之间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尖锐的冲突。罢工委员会在政治上始终是同国民党左派联系在一起，因此，当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时，他也用军队包围了罢工委员会。在“三二〇事件”发生后的初期，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曾有些冷淡，但后来这种冷淡关系消失了，罢工委员会对组织北伐等活动给予了支持。现在罢工委员会及其整个组织和为数 4000 人的武装队伍也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柱之一。在数万名的罢工者当中有 1100 名共产党员，他们多数是熟

练工人，组织成许多党支部。分散在广东省各个农村的罢工者，在那里也起着革命的作用，他们是农会的组织者。由此可见，罢工委员会的整个组织对于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但从另一方面说，在这些罢工者的情绪中也蕴藏着一种严重的政治危险，他们被围绕香港抵制罢工所进行的政治鼓动宣传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方针弄得兴奋不已。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进行的整个鼓动宣传是建立在“斗争到底”和“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的。罢工者们也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教育：这次抵制罢工必然以英帝国主义的灭亡而告终。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场斗争中可能遭到失败或者作出部分退让。然而在这14个月期间，正如在8月份所显示的，可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局面：结束抵制罢工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时刻，始终相信会取得胜利和指望得到大量赔偿金的35000名罢工者乃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危险，甚至可能有一部分被挑拨者所利用。

我们并不想以此来说明，结束香港抵制罢工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我们的广州同志坚决地转变过来，要明白**即使没有香港方面的货币赔偿**，结束抵制罢工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笔赔偿金可以从广州和香港的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用英国人的话说，我们的任务还可以归结为：在对罢工群众所进行的鼓动宣传的整个提法上来一个转变，使他们对可能作出的退却有所准备。问题提法上的这种转变会迫使广州的同志去寻求尽快结束罢工的方法并会使整个这件事从多少个月来所处的死胡同中摆脱出来。

这个问题最后一次提交广州的领导同志（同中央委员们一起）讨论是在8月28日，当时广州已得到香港方面的口头最后通牒，威胁要对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直接进行武力惩处。这个最后通牒使广州同志的头脑大大清醒起来。在中央同志的促使下，在这

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其基本内容是：**认为有必要在不要求香港给予货币赔偿情况下结束罢工**，在这方面应当进行整个准备工作。不言而喻，这个决议没有明确规定结束罢工的**时日**，因为政治形势越来越复杂，不能在广州面临危险的时候给政治生活带来任何混乱。另一方面，由于广州军队在北部取得胜利，可以指望在这个问题上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无论如何，广州的组织应做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实行重大退却的准备。

同时还决定，为了避免英国方面的挑拨，纠察队应采取新的方针。

在我们写这份报告的时候，英国人在广州占领了部分沿江城区，广州政府表示坚决抗议，并威胁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抵制，英国海军舰队在长江上炮击了万县城。中国的所有国际处境问题都提得如此尖锐，以致结束香港抵制罢工问题虽然现在还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就同英国的谈判而言，实际上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何况现在必须完结这个问题。

八、职工运动。党组织

广东省的党组织近一年来发展到 4200 名党员，不算黄埔军校和军队中的党员（光是在黄埔军校就有 500 名共产党员）。在广州有 2000 名党员，分布在以下行业（数字不很准确）：

- | | |
|--------------------|------|
| 1. 香港罢工者 | 1100 |
| 2. 企业支部和工会 | 450 |
| 3. 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 | 400 |
| 4. 社会团体 | 100 |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大量香港罢工者在广州党组织的生活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广州本身是非工业城市，主要居民是商业—手工业者，它给党提供了 400 多名工人党员，其中有 150 名印刷工人，50 名军械工人。

广州党组织的全部党员分布在 58 个支部里，多数支部自然不是产业性的，而很可能是工会的党团。

党组织吸收新党员工作，各类组织都在进行，但这里有 300 名大学生是从国民党转到我们这边后加入党的队伍的。

党组织的结构还没有定形，带有明显的过渡痕迹：各支部还没有集中统一的、有组织的领导，党员是明显按职业特征划分的，而且他们几乎互不相识，在社会上比较进步的分子不能对党组织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影响。在党的整个工作制度中根本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机构未经任何选举，党员群众几乎不参加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都按照领导机关的直接命令行事。

广州党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的领导混在一起。区委下设的职工部实际参与解决工会运动中的所有大小问题（在这里，职工部主任^①本人甚至不是当地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这种组织结构，工会“代表大会”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它的影响就是在党组织内部也很少能感觉得到，然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即香港工人的实际领导人在党委会的整个领导工作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广州的职工运动保持着自己的分散特点，共有 130 个独立工会，分为三个独立的广州工会中心：（1）“代表大会”，是我们领导下的组织，联合了 130 个工会的 15 万会员；（2）“广东总工会”，联合了比较落后的工人以及小业主（总共有 30 个工会，3 万工人），是在明显敌视工人运动和同反革命分子相勾结的一些人领导下的组织；（3）“机器工会”，联合了 8 个独立工会，7000 工人。

“广东总工会”的存在反映了行会习气和同业联合会残余的存在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落后。争取清除这个广东总工会的斗争还将拖延较长一段时间，但这场斗争不会给党组织提出任何特别的

^① 黄平。

问题。

所谓机器工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问题在于围绕这个中心联合了军械工人、电厂工人、装配工人以及熟练的五金工人和电气技术工人。机器工会中有一些具有工团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思想的人，这个工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持断然否定的态度，它在捍卫广州工人当中的这一在社会方面先进的部分的狭隘行会利益。我们的工会对机器工会的策略迄今为止一直是错误的：不是千方百计地去接近这个工会并为两个工会运动中心的联合准备条件，而是把机器工会当作反革命分子加以蔑视，这就使它更加远离了我们的工会组织。从宣布香港罢工时起发生了变化，附属于这个组织的香港工会积极参加了罢工。现在这个机器工会与全国总工会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也开始同“代表大会”接近。职工运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认为，香港罢工大大推进了克服工人运动中的各种行会习气和孤立状态的工作，因此广东省和香港职工运动的联合过程即将最终完成。

这样一来，在作总结时可以说，在广东省整个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必须注意到，共产党的领导既没有由于在工会会员群众中进行认真的教育工作，也没有由于领导机关公开信奉共产主义原则而得到足够的加强。到去年为止，“代表大会”还处在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下。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现在，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共产党人领导着职工运动，该运动聚集在我们中心的周围，所有领导渠道都掌握在区委手里。

我们在广州和整个广东省的党组织在工农中、在青年学生中、在军队中，以及在黄埔军校中做了大量工作。它事实上是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有许多分支机构的组织存在的。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它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区委有自己的处所，和共青团一起占着整个一栋楼。但同时，区委从来没有以领导群众的党委会名义公开露面过。在广州经常举行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上，在

它领导下的群众都不打它的旗帜。只限于演讲人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一次演讲。区委所在的大楼也没有标志说明这里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所在地。大家都清楚知道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和它所做的广泛工作，但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

在广州（乃至全中国）的革命团体中，共产党人是最有组织、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政治团体。这一情况，在其他与革命团体有政治联系的团体极端分散、政治上不定形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分量和领导作用。

但不应忽视，在“三二〇事件”以后的时期里，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盟友——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团结削弱了，所以说我们的影响明显是建立在狭窄的根基之上的。可是我们的广州同志没有注意到这个危险，认为我们党和国民党同时发展和加强几乎是不可能的。

八^①、反对情绪的加强。关于新政权的问题

自7月中旬以来，广州和全省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军事独裁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开来，就遇到了有组织的公众舆论的反对。8月份，我们亲眼看到这个过程发展得越来越明显，到8月底我们可以肯定确实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

7月份，在广州进步人士的社会意识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来自广东各个地区，而主要是来自农村的社会和政治反动的事实。同时报刊也报道了越来越多的扩大军事形势影响的方案，直到禁止举行对北伐有损害的罢工的方案。

蒋介石同广州工人发生了第一次严重冲突。由于封建行会习气和同乡会的巨大影响，在工人群众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一些工会和行会之间因争夺地盘等等而发生的冲突加剧。工人之间的冲

① 原文如此。

突常常演变为公开的街头斗殴，而且工人使用了棍棒、刀子等武器。越来越清楚，这些冲突加剧的起因都来自于所谓的广东总工会，它联合了比较落后的工人阶层和业主阶层，由黑势力来进行领导，在这个黑势力中有一部分人同公开的反革命有联系，就是过去的“纸老虎”^①。一次殴斗打死我们一名工人，伤两人。据说造成这起伤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广东总工会的领导人陈森。

工人群众把陈森抓起来，带到我们当地工会（“工人代表大会”）驻地，从那里又把他交给了广州警察局。但蒋介石亲自进行了干预并下令把陈森放了。这个命令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

代表大会要求重新逮捕陈森。蒋介石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陈森的罪行，并亲口担保把陈森送来，如果调查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决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还是要求逮捕陈森，理由是：“我们不相信蒋介石的话。”只是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干预才防止了在广州宣布总罢工。但过了几天以后，当蒋介石出发上前线时，工人群众没有去送行。

过了几周之后，街头斗殴也没有停止。蒋介石已经到前线去了。当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讨论，并且作出两项决定：（1）通过关于成立仲裁法庭的法令，以解决工人组织之间的纠纷以及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纠纷；（2）逮捕10名广东总工会的右派领导人。此项决定过了几天后才得以执行，原因是李济深军长暗中进行抵制，尽管他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参与作出此项决定。只有陈森一人没有找到，他事先跑掉了。这项逮捕决定意味着蒋介石的权力削弱了，这一点国民党中央以及有政治组织的居民都注意到了。

导致形成公开对立情绪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在党刊《向导》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基调是由远

① 商团。

东局和中央共同拟定的)'¹ 文章反对北伐的整个进攻思想,把注意力转到对广东构成威胁的一些危险上,而这些危险来自于正在向农民发起攻势的内部反革命势力。文章的口号是:“保卫革命成果!”它的政治意义在于,以革命势力反对蛮横无耻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也就是争取消除“三二〇事件”的后果,从而消除“三二〇事件”本身的斗争,来与蒋介石提出的、掩饰“三二〇事件”后反动派无所顾忌的活动的国内和平口号相对抗。

文章提出了广州党组织的方针,围绕这个方针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文章引起了普遍的关注。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中央派领导集团反对这篇文章,要求国民党中央给以谴责。但是,从支持蒋介石的角度来说,黄埔军校领导人的这一行动使大家看清了学校十分不和谐的情况。多数学生最近一个月来都聚集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周围。校内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形成了对蒋介石的强烈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表现在3000学生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决议要求汪精卫回来。

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因黄埔军校提出抗议而讨论这篇文章问题时,再次暴露出蒋介石影响的削弱。有两名中央委员公开表示同意文章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两名委员是:左派顾孟余和李济深军长(此人是右派,主张推翻蒋介石,当然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

到8月20日,要求汪精卫回来的斗争就这样公开化了。黄埔军校的决议刊登在报纸上。中央接到了躲在广州以外地方的汪精卫的声明,汪在声明中要求解除他的一切现任职务,并允许他只从事党的工作。这意味着,这位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在被迫离开广州三个月以后提出了回到广州的问题,以便为消除“三二〇事件”的后果,为使政权从蒋介石手里回到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

¹ 见本书第37页下注。

手里公开做准备，以至公开进行斗争。这样一来，广东省政治生活的发展本身再一次极其尖锐地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全面地提出了近期的任务和策略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全国和广东省的总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广州军队顺利向北挺进，几乎没有遇到吴佩孚军队的抵抗。到8月中旬，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广州军队将会在没有敌军大的抵抗情况下占领武昌。当来自北京的消息提供了可以期待西北国民军即将取得胜利并占领北京的理由时，总的政治形势被描述得更加令人乐观了。徐谦（国民党中央委员，同时也是冯^①的代表），从莫斯科来到广州，带来了冯的建议：联合发表由蒋介石和冯玉祥签署的声明。该声明要确定两位联合的胜利者在分别占领北京和武昌之后的政治方向。但后来发生的令所有人感到震惊的国民军突然撤离南口和放弃张家口的行动，使人们更加清醒地对形势作出了总的评价。

然而，与冯玉祥的联盟，由于让他参加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驻西北军特使，还是得到了加强。

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至于广东省本身，“三二〇事件”前后的整个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已经使社会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使农民问题的意义显得如此突出，以致不立即肃清“三二〇事件”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反动，就有可能给革命政权的存在本身造成直接的威胁。从这些情况中可以十分清楚地得出，对于广东来说，整个政策的主要的和最近的任务是让汪精卫回来重新执政，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他是公认的左派领袖。

① 冯玉祥。

但是，这个问题是在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整个国民政府形式上的领导人在前线领导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汪精卫回来参与执政有可能根据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协议，也就是根据中派和左派之间的协议来实现，或者在旨在推翻蒋介石而同他进行的公开斗争中来实现，而在与孙传芳的斗争业已开始的时刻进行这样的斗争必然会造成整个军事和政治生活的混乱。

当然，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正确办法是中派和左派之间，即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实行和解。但是这种合作的障碍是“三二〇事件”本身，即强迫汪精卫离开政权的做法和国民党内政治派别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质。这两个政治派别，即中派和左派，同欧洲类型的政治派别大不相同，欧洲的政治派别与群众有直接联系，并能随机应变，结成暂时联盟等。在中国，这些派别更像是左、中、右三个小集团，因此发达的政治关系中的那种复杂的策略对他们来说是行不通的。前线将领之间的斗争又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由唐生智、李济深等人参加的所谓“保定派”就是这样一个派别。

从湖南军队合并到统一的广州军队时起，这个保定派特别得到了加强。唐生智在这个派别中身居首位并在前线领导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将领之间的争吵（随着各种部队加入取得节节胜利的北伐，将领的数量越来越多）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如何瓜分从吴佩孚和孙传芳政权下解放出来的省份的问题上。他们都想限制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甚至想把他推翻。从部队传到广州来的消息说，那里正在进行反对蒋介石要求……汪精卫回来的大规模鼓动宣传。不愿服从蒋介石的将领直接想消除他的军事独裁。他们之所以拥护让汪精卫回来执政的口号，是因为他的政权要比蒋介石的独裁更加放开他们的独立性。

在我们逗留广州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国民党内的各种军事和

军事政治派别增加了，这说明党内很不团结，暴露了我们在《三二〇事件的客观原因》一章中所谈到的在国民党的组织和生活中的那些消极方面。例如，曾有报道说以国民党左派政治局委员谭延闿为首的第三军和第六军军长^①之间达成了协议，其目的是限制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势力范围，给自己分得江西省和福建省，以便有可能独立通过厦门港同苏联进行交往。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存在着反革命的直接威胁。同孙传芳的斗争和在福建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都是与东江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跃有关系。“三二〇事件”后那里的陈炯明拥护者又活跃起来了。驻扎在广州的一个军的军长李济深（国民党中央委员）公开支持民团反对农会，因此他的行为也十分令人怀疑。再有，像李福林和加应夫（音）^②这些人同省内土匪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土匪也是直接的反革命威胁。

广东财政状况的极其紧张具有很大意义，到最近为止，广东省一省抵补了北伐的全部开支。国民党左派之一顾孟余曾指出，当年张作霖每年花费4000万元，而北京政府的预算是每月200万元，广州的预算已达到每月1400万元。但是由于征税制度，身负全部赋税重担的农民所付出的要比政府要求他们的多得多。顾孟余说，如果这种状况不急剧改变，农民就会以举行起义来作出反应。最近，在我们离开前夕，国民党中央已提出将战争重负转加给湖南和湖北的问题。

中派和蒋介石最近学到了什么东西呢？社会情绪的普遍向左转和“三二〇事件”反对派的增长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应当说，北伐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促进了蒋介石本人和其他许多人的这种向左转。在黄埔军校8月底召开的一次全体大会上，有许多从前线回来的指挥官讲了话，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

① 分别为谭延闿和程潜。

② 原文如此，看来是古应芬。

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一名指挥官说，农民带领他的部队越过了迄今人迹罕至的地区，而农民是知道这些羊肠小道的。另一名指挥官说得更明确，**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在这里重复了在广东省革命斗争中曾经说过的话。从前线传来消息说，蒋介石重新转向了社会舆论，他的政治行为又变得更明确了。国民党中央收到了蒋介石要求起草土地法的建议。

目前，左派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在前线的地位由于唐生智的崛起而大为削弱。但是在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时候，一开始就应当防止产生各种幻想。他和他的一派同意达成这种协议是迫不得已，是某种手腕。而他的一派及其周围的人在“三二〇事件”后不能实行在广东需要实行的政策。因此，即使达成协议，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务依然是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阵地，扩大和加强革命组织和社会组织。

就连唐生智也作出了这种“面向农民”的转变，他宣布广东关于成立农会的法令对湖南有效。也是这个唐生智建议共产党人在他的支持下在湖南全省开展政治工作（当然，他这里指的是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他不得不依靠革命舆论）。后来在东江地区，蒋介石的拥护者何将军^①，随着战线逼近汕头也向左转了，向共产党人寻求支持。

但是，还必须详细地谈谈“左派”本身。应当说明一点，共产党人同汪精卫始终没有联系，因此谁也不知道，汪精卫本人对广东和全国国民党政权的任务是怎么想的，特别是他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广州的同志毫不动摇地认定，汪精卫正是这样的左派领袖，他能够毫无畏惧地同农民结成联盟，加强农民组织及其影响，为了农民的利益进行社会改革。但是我们认为，对汪精卫这位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相当脆弱的政治家作出这种极其乐观的评价是

^① 何应钦。

过分夸大了。至少，我们与广州某些左派头面人物的交谈并没有得出这种夸大的乐观评价。

毫无疑问，在左派和他们当中的那些在今年以前还可以认为是忠诚的革命者的人的队伍里，农民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瓦解性的影响。他们都受到了戴季陶思想的很明显影响，都被阶级斗争的发展吓破了胆，都害怕共产党人。然而他们都懂得，没有共产党人就一事无成，因此长时期他们同意与共产党人一起进行斗争。农民运动的发展无疑迟早要从与农民有联系的基层推举出新的国民党左派。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这些左派。因此不得不过来谈论同那些将会非常迟疑和犹豫地迎合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左派达成协议的问题。

我们提出这些看法是为了强调指出，我们目前在建立国民党的真正左派领导和广东的真正左派政权的事业上面临着怎样的困难。但不管这些困难如何，很明显，只有共产党人有机地参加国民党及其全部工作，只有共产党人同左派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在目前把国民党的政策引上正确的轨道。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国民党迁都汉口的问题尚未解决。国民党今后的整个政治方针和党内方针问题都将推迟到召开国民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来解决，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已由定在10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广泛的党代表会议取代。代表会议由全体中央委员和省党部选出的每省两名代表参加。如果本月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话，这次会议的代表多半将由国民党左派构成，再加上少数共产党人、中派和右派。

九、广州同志的新错误

除了旧的错误观点以外，我们发现广州的同志还有许多新的错误观点，可能导致更大的错误。广州的领导同志实际上完全不同意上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上次中央全会的这个决议中说：

“去年（1925年）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义（见）是：（一）我们留在国民党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帮助他们发展国民党，并且反对右派，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二）我们自己的党政治上更加独立起来。

“这种决议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看国民党的性质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等工商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及小商人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并且仍旧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及我们参加国民党的指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之一。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他，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夺取国民运动的指导。

“如果有些同志，仍旧认为共产派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那么，这已经有广东的经验，

证明这种观点亦是错误的。”¹¹

广州的一位领导同志在我们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向我们阐述了相当合乎逻辑的国民党政治发展轨迹，它不仅应是对广州同志在“三二〇事件”以前所实行的整个错误方针的有力证明，而且也应是说明后来所犯的错误的根据。（我们把这篇讲话附在本报告之后。）根据这份“历史性资料”可以得出，共产党人在对国民党的策略上的主要错误就是：我们同能够依靠群众性工农运动的真正左派联系不够密切。诚然，这位同志说，我们同他们是有联系的并逐渐地把那些不同意与群众一起行动的人都抛开了，但毕竟这种政策贯彻得不够彻底。我们应当使这个派别相信，国民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未来在他们身上，然而我们却糊里糊涂地采取了同中派甚至同右派达成各种协议的方针。

这位同志从“国民党的发展史”中得出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没有共产党人对这些左派实行有组织的、最紧密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任何左派。中央全会决议说“以自己代替国民党左派”，这位同志认为这是左派的社会性发展不够和没有我们的领导就不能站立起来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我们是从理论上论证国民党中央人员构成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共产党人和左派在中央的整个人员构成中各占一半。我们对“左派”的概念很狭窄，完全没有估计到像手工业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学生这样一些国民党的重要社会阶层。最后，我们是想加强突出共产党人的一套做法，而共产党人丝毫没有使国民党左派站立起来。至于“历史的教训”，这与他们无关，我们只是论证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自发策略和阻力最小的方针。

对这种观点的更正确的评述是：完全不懂得国民党（我们也参与其中）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拥护这种观点的人

11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75-176页。

看来，国民党只是共产党人的一块招牌，共产党人通过它直接地和有组织地实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

但是这些同志也明白，现时的国民党甚至它的左派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国民党内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概念。“三·二〇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拥护国民党的这种机械镇压措施的人。因此，广州的同志今天已经无法彻底维护“从国民党历史中得出的上述结论”，转而采取了捍卫自己错误观点的另一种方针。上面我们在《广州共产党人的退让》一章中援引了广州同志对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本身的许多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最主要的是：“国民党不存在。国民党已经死亡。国民党左派不存在。只有共产党人在工作。”广州个别的同志在论证这些观点时甚至说：“国民革命已经完蛋。残酷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唯一现实的力量是共产党。国民党对于我们来说已不再存在。我们可以退出国民党。”

不要以为，所有这些观点都完整地溶化在广州党组织全体领导人的整个世界观里了。在进行北伐和提出争取将国民党政权扩大到全国的问题的时期，在广州很难说国民革命已经完蛋了，——始终不渝地坚持这种立场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在去年还顽固地反对中央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和扩大广东党组织的坚定主张的同志来说，今后也难以始终不渝地认为共产党是当前唯一的现实力量。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始终如一的情况。更何况，广州的同志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声称，虽然他们不同意上次全会的决议，但是他们将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决议中的所有具体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2，第 135—19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 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 调查结果和结论

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关于 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

1. 蒋介石3月20日的行动和后来对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进攻，致使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和共产党人离开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机构，而政权转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浙江派中派手中，蒋介石的这些行为不是偶然性的上层阴谋或者不大的个别错误和某些派别和人物的没有分寸所致，而是广东内部主要围绕农民问题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急剧尖锐化在政治上的反映。革命力量在北方遭到的失败使中国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变化，加重了反动派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促使国民党中央派采取了客观上反对革命的行动，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由于在自己的政策中没有考虑到总的形势变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加快和促进了这些行动的发生，同时也加大了左派和中派之间的裂痕。军事工作中的错误给蒋介石造成了准备彻底把他排斥在外的印象，这是促使他采取行动的直接原因。

2. 对“三二〇事件”政治意义的这种理解也为对广东今年4至8月间政治关系的分析所证实。这期间的政治关系只能说成是**社会和政治反动**，其最明显的表现应当承认有以下几个方面：统治集团和工农群众之间脱节；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和民族民主政权成立后放弃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宣传军事独裁的思想和借口危害北伐而准备采取禁止工人罢工和农民斗争的措施；采取一系列步骤使各级政权机关和国民党本身直接服从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恢复旧的征收重税的办法，把全部税负加在农民身上，结果加强了整个行政机关对农民群众的压迫；坚决停止实行以往保护农民组织不受土匪和民团侵犯的政策。在地方上，政府政策的这种转变和汪精卫离职这一事实本身导致了反动势力的猖獗、官吏的公开恢复原职、旧的管理办法的重新使用和购买官员充斥机关的现象，还导致到处出现了反动的“孙文主义分子”学会，它们在许多地方领导着地方政权机关的活动，导致由豪绅和地主领导的土匪和民团公开反对农会，引起农村内战，装备很差的农民不得不实行退却，在反革命的武力进攻面前捍卫自己的成果。

3. “三二〇事件”得逞暴露了广东省国民党革命建设的种种薄弱方面和消极方面。

从1924年以后到“三二〇事件”以前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政府整个政策的转变还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国民党本身在广东还丝毫没有成为群众性的革命的政治组织，而依然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因各派内部纷争而四分五裂并受制于各派军阀压力的上层组织。军队依然是革命政府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支柱，但把军队联合起来并使之服从于国民党的政治任务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虽然通过宣布成立工农组织和推动其发展，大大促进了工农群众的社会觉醒，但与此同时这些阶级组织还远远没有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农联合组织，而只不过是依靠群众同情的上层

组织。农会的情况则更糟糕，把它们称为国民党的农民委员会更为确切。群众的革命联合和政治教育工作，加强革命政府与工农和城市手工业、商业资产阶级群众之间联系的工作，还因为在中央和地方实行那种专横的管理方法，因为缺乏某种保持政府与支持它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经常联系的革命代议机关而停滞不前。

4. 指导国民党左派整个政策的广州共产党人的错误大大促进了“三二〇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至今仍对我们整个对华政策具有现实意义。这些错误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在扩大革命组织并把它们从一般的上层机构变为真正群众性的独立组织方面，工作做得很少；有意延缓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自决，因为想要夺取国民党的机关和不可避免地要突出共产党人；由此得出一整套支持国民政府及其政策的办法，不是在自己的领导下动员群众并保持共产党人所需要的某种独立性，而是经常地和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聚集在国民党左派周围和消除国民党的上层性质的工作没有做；缩小了国民党左派的基地；当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还只是一种上层的派别联盟，而不是真正的有组织的群众的联盟，而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以军队作后盾的蒋介石手里时，对这个联盟的力量估计过高；对中派实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加快了他们向右转的步伐并为后来对这个派别采取灵活的策略造成了困难。不理解国民军失败时国内总的政治形势并继续采取以往的进攻政策（这里也包括当形势要求必须转入防御，以削弱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错误方针）。广州的同志没有意识到这些错误，并以自己对“三二〇事件”主观原因的错误理解来加以对抗，他们的理解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实行与国民党极左派结成联盟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实行这种政策必然要突出充当国民党领导人的共产党人，然后由中央来同中派和右派周旋，进而削弱同左派的联盟。过去的这些错误由于犯另

一极端的新错误而变得更加严重了，这就是：完全低估了国民党的作用，说什么“国民革命已经完蛋”，企图同国民党决裂，建立对只是在共产党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斗争的领导。广州同志的错误使得在广东进行不正确的^①政治工作变得极其困难，并十分尖锐地向全党提出，必须通过组织程序，即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的事先讨论，来解决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当前时期的基本策略问题。并且这次代表大会就基本问题作出的决议必须事先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协商。

5. 广州对香港抵制罢工的政策也是错误的。长达 14 个月的抵制罢工无疑给香港带来了巨大损失，对国民党的整个经济生活有负面影响，阻碍了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了向广州输送产品的部分农民的利益，使商业阶层一直处于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监督之下，支援罢工者的大量开支加重了广州政府的预算负担。围绕这次抵制罢工开展的政治宣传运动在群众中造成了单是广州就可以一举“击败英帝国主义”的幻想。罢工在破坏英国声誉方面的政治效果早已达到，广州的同志把是否结束罢工只以香港方面是否满足罢工者的赔偿要求为转移是错误的。最近同香港的正式谈判变成了只追求宣传鼓动目的，因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②。抵制的加剧和纠察活动的进行，以及外交会议后开展的整个宣传运动，无疑便于香港在 9 月初对广州进行公开的进攻^③。

6.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由于彻底打败了吴佩孚和扩大了广东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地盘面对全国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关系的更加发展和紧张，无疑在开始时也具有负面影响。准备北伐的过程同时也为军事独裁倾向取得胜利提供了方便，大大加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正确的。

② 谈判是在 1926 年 7 月 15 日至 23 日在广州举行的。

③ 1926 年 9 月 4 日，英国军舰在广州的港口进行示威，试图对广州实行封锁。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陆战队从沙面驱赶走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并占领了船坞。然而，由于广州全体居民的抗议，封锁被取消，英国军队返回沙面。

重了预算负担，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活动，特别是在农村的活动。我们广东的党面对蒋介石的压力不得不实行退却，在初期没有对北伐采取独立的立场，容忍在群众中无条件地支持以武力方式进行的北伐。但是后来，广州军队同非常热情地欢迎军队的湖南农民保持了经常性联系，并且军队必须经常地去支持革命组织（而农民的帮助对北伐取得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这一切致使被占领省份的解放运动活跃起来，而随着蒋介石影响的削弱和参加北伐的其他军队的加强，又促进了广东反对派的发展。

7. 广州的共产党人在“三二〇事件”和5月15日的打击下未犯特别的错误实行了退却。他们正确地给自己提出了任务，避免同企图实行独裁的蒋介石发生公开的冲突，因为每一次这种公开的冲突都必然导致政策的进一步向右转，并会使我们受到丧失我们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威胁。这里也曾有过一些失误，这是由于在紧张的形势下和政治对立情绪异乎寻常的情况下，任何对立情绪即使是局部的对立情绪，都会被我们的同志自己和接近蒋介石的人上说成是公开的斗争，是准备武装发动。正是由于有这种情绪而没有对国内日益发展的反动方针进行任何批评。而这一点造成了断然拒绝以某种形式支持军械厂工人的单纯经济罢工^①，结果我们暂时丧失了在那里的影响。

8. 我们党组织工作中的“成绩”无可争辩地加强了我们的党组织，并在国民党影响削弱的背景下扩大了我们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诚然，脱离了国民党和政府机关（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广州共产党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国民党左派，更不用说整个国民党了；到重新活跃的时候，我们广东的党可能要比在“三二〇事件”以前起更大的政治作用。在广州本地，在我们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地方工会（“代表大会”）联合了绝大多数已加入工

^① 指1926年5月军械厂工人的罢工。

会的有组织工人(即总数为168个工会18.8万会员当中的130个工会15万会员)。香港工人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是从香港迁到广州来的香港工会理事会,它只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广州职工运动的薄弱之处是存在一个特殊的“机器工会”^①,它联合了军械厂工人和电气安装工人,但即使在这里也在采取联合步骤。广州的党组织拥有2000多名党员,其中一半以上(1100人)是香港罢工工人,因此我们有可能对还留在广州的全体(35000人)香港罢工工人施加影响。我们在担任纠察任务的这些罢工工人武装(4000人)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三二〇事件”后的时期里,从国民党转到我们党组织队伍里来的大学生达300人。8月份在广东召开了广东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当地积极分子的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派当地无党派农民来这里的建议没有执行)。同时必须指出,尽管党组织内部很团结,但领导职工运动的组织体制是不合理的,任命原则居绝对统治地位,没有任何党内民主的征兆,这是党组织还年轻、不够巩固的标志。

9. 相反,社会和政治反动时期在国民党队伍里造成了很严重的精神空虚。中央委员会从属于军事独裁的觊觎者蒋介石,这一点不能不带来内部的混乱。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国民党左派活动家接受了反动派的思想影响,被农民运动和农会以及阶级斗争吓破了胆。另一方面,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在国民党左派队伍中引起了要纠正过去的错误、要同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和要在国民党内部克服派别统治倾向的愿望。尽管共产党人有所担心,国民党左派还是声明愿意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来共同建设国民党,但他们提出的共事条件是赋予他们独立的作用,共产党人放弃从组织上控制国民党的意图。

10. 一方面反动派在广东的进攻,另一方面是军队在北方

^① 见本书第253页注1)。

取得的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新高涨，最后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社会团体中进行的工作，造成了社会情绪在8月朝着反对“三二〇事件”后确立的制度方向的急剧转变。必须指出，反对派运动的发起者是广州的工人组织，它们在7月底开始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倾向，反对派是在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发表的关于北伐的文章的影响下最终形成的，这篇文章的攻击性口号是“同广东的内部反动派作斗争”^①。这篇文章的影响再一次说明了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巨大作用，因为这使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也独立自主起来。到8月底，反对“三二〇事件”后确立的制度的反对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黄埔军校，与此同时，农村的武装斗争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为支持遭到民团和土匪破坏的农民组织必须进行干预的问题。

11. 反对“三二〇事件”后的制度的社会运动是在让汪精卫回来执政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蒋介石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军队来战胜这场运动，这可能促使他向左转，并在一定条件下同左派达成妥协。然而目前在军事斗争过程中，反对蒋介石的所谓“保定派”军阀唐生智（汉口）^②和李济深（广州）所指挥的那些军团的影响和声望得到了很大提高。唐生智虽然在湖南部队向北挺进的过程中也希望同革命组织合作共事，但他毕竟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的人，而李济深则并不掩饰对民团反对农会的斗争持同情的态度。这些“保定派”之所以同情争取让汪精卫回来的斗争，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一来会削弱国民党对军事的干预，并加强他们军阀的地位。由此可见，广东省总的力量对比，尽管有组织的居民阶层对“三二〇事件”后的制度持反对态度，但在目前还没有形成对于建立革命政权十分有利的局面，

① 见本书第375页注②。

② 见本书第376页注③。

虽然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必须建立左派政权的问题。战线靠近广东（从福建方面来说）和香港反革命分子在香港实行武装干涉必然打破抵制之后的重新涌入，也可能使那些在“三二〇事件”后时期得以加强的反革命分子活跃起来。

12. 在这种情况下，着眼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利益，也为了巩固广州军队向长江挺进过程中所占领的地盘，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即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思想上的中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协议；其基础是蒋介石放弃军事独裁企图，放弃对反动派的任何纵容，实行明确的民主纲领，保证工农组织和一切民主团体的自由发展，保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如果这种协议以某种形式成为现实的话，还必须防止产生认为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消除来自中派方面的威胁的各种幻想，因为中派同意这种协议只不过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有鉴于此，在达成协议之后，左派和共产党人应当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使之处于革命的领导之下。随着国民党势力范围的扩大，广东省应该更加广泛地开展社会政治斗争，保持革命根据地的性质和中国整个革命建设中的先锋队性质。广东省应该保留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府，面向广东内部的革命力量，但同时又与国民党和中国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与更发展的各种关系相适应，广东政权的任务必然是更先进的，必须拟定出中国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下一阶段的计划。

14. 在广东省，政权必须属于国民党左派，有中派参与其中，并有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在初期，这个政权的任务应是团结城乡一切革命力量，其中包括城市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提供^①革命组织的自由，实行一些措施来满足共产党人制定的最低纲领中提到的农民要求（减租和实行统一的农业税等等），预先撤换卖身

① 原文如此。

求荣的官吏。首要任务之一应当是召开常设的广东“国民会议”，“国民会议”是以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商业手工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组织的代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保证工农和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在其中占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必须着手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地方政权应交给地方的革命组织。清除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这些措施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15. 考虑到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这种斗争是以农民为一方和以豪绅和地主为另一方之间的夺权斗争，因此必须承认，广东省已进入革命斗争的这样一个阶段，革命的直接任务是为了全体农民的利益和朝着民主革命的方向来解决土地问题。长期不解决这一任务就会意味着反动势力的加强，而解决这一任务就可以由广东农民组成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各种阴谋的坚强堡垒。共产党人的任务应当是大力准备把这项改革提上日程。直接宣布改革的时机自然应当与全国总的形势相协调。

16. 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我们广东省的任务是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联合一切革命民主派别。国民党应当在个别加入和集体加入的基础上加以扩大，集体加入是通过吸收工农组织的方式。共产党人在帮助左派做工作和参与领导工作时，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试图直接从组织上实行领导。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工人、农民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便团结能够实行土地改革的真正革命派。这个革命联盟的行动纲领应包括详细的土地改革方案，而这个方案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加紧制定并要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 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2，第 206·21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26 年 9 月 12 日于上海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抄送中国委员会，远东局发。鉴于在占领汉口和汉阳，以及在南方和孙传芳之间开始交战之后形成的局势，我们准备给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建议：

1. 国民党的广州军队以及共产党人的整个行动方针，还有整个宣传鼓动工作都应这样来安排，使得英国主张进行武装干涉的人难以建立起整个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领袖的反华统一战线。我们准备让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向英国舆论发出呼吁，邀请英国政治活动家来访^②。

2. 占领武昌后，我们应当建议广州军队停止继续向华北推进。为了防止以后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为了孤立孙传芳，我们应建议广州军队和国民党向张作霖及其盟友提出召开专门的和平会议的建议，此举也会减少我们武装干涉的危险^③。

3. 为了反击日本在北方的侵略，必须开展鼓动宣传来反对日

① 文件上有一批语：“送莫洛托夫同志。”

②③ 原文如此。

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除了直接反对日本在华北的影响以外，还必须削弱英帝国主义的地位。

4. 国民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统一和加强国民党在新占领省份的影响的方式问题，要从进一步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和把一切力量聚集在它周围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5. 在孙的五省^①内，我们的全部工作应是旨在破坏军事力量，把他同他以前在和平口号下所聚集起来的大中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隔离开来。江苏省和特别是上海的特殊条件需要特殊对待，在这里反对孙传芳的工作不应在国民党的口号下和公开支持广州的口号下进行，而应由亲日资产阶级人士来领导孙的反对派。我们党和国民党应从侧面支持这一行动，既不突出自己^②、也不覬覦领导权。分化瓦解孙在上海的力量应当这样来进行：一旦张宗昌占领上海，就要建立一支由商人、街道委员会代表、大学生、部分工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并保障自由^③。

6. 在广州军队占领的所有地区，我们党和国民党要继续不遗余力地联合所有组织，巩固农工组织和所有儿童组织，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事上的胜利。

7. 加强联合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立即开展地区的宣传运动。在广州，这样的运动已在8月底进行，取得了很大成果。同时要准备开展工会运动，召开铁路员工代表大会，恢复京汉工会^④。请紧急作出指示，问题刻不容缓。

核对无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74 页。

① 指江苏、江西、福建、安徽和浙江。

②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应为：京汉铁路工会。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97

鲍罗廷给加拉罕、陈独秀 和维经斯基的电报^①

1926年9月15日于广州

绝密

致加拉罕、陈独秀、格里高里^②。抄送莫斯科。在格里高里参加的情况下，我们作出决定，一旦来自江西和福建方面的威胁^③消除就结束罢工^④，这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

随着对汉阳、汉口的占领，这种威胁可能会早些消除。因此我们正在准备结束罢工。只是反英运动的日益高涨可能妨碍这样做，这场运动是由于英国人对四川不设防城市万县进行炮击引起的，那里炸死许多中国人，摧毁许多房屋，这场运动也是由于英国人让水兵在中国领土上的码头登陆引起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同英国人进行斗争的方式问题应由上海中央在你们和格里高里参加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样可以更容易和更迅速地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则在认真做结束罢工的准备工作的。计划大致如下：停止罢工，将罢工工人分成若干组，以便每月可以遣散一个或更多的组，付给每个组一定数目的钱，使他们有可能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① 文件上有一批语：“送莫洛托夫同志。”

② Г. И. 维经斯基。

③ 看来是指孙传芳部队进攻的威胁。

④ 指香港罢工。

安顿下来。这笔费用将从进出口的特别税中获得。商人们没有异议。同英国人我们已经谈好。他们撤走自己的舰只和水兵，而我们将保护码头不受破坏。沿岸由警察来维持秩序。英国领事将在调查6月23日枪杀事件的会议解散前对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作出答复^①。答复的内容将是，英国人不接受中方建议，但从自己方面建议在中立地点开庭审判。到底是什么地点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英国人急于结束登陆事件。他们不仅无法破坏罢工，而且更加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的决议中要求将罢工扩大到华中地区。四个商会率先作出了很好的反英决议。“四川万县”事件向英国人表明，他们走得太远了，根据广州的情况判断，他们将鸣金收兵。但这一点不影响我们准备结束罢工。正如你们在第280和281号电报^②中所建议的，要结束罢工，这在广州人们是会理解的，尽管有种种说法，好像我们面对两三个被称作军舰的旧胶皮套鞋和几个水兵吓破了胆，只要军舰一撤走，明天就结束罢工，但这也可能会被解释成我们同英国人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把炮艇撤走，似乎我们就结束罢工^③。

英国人显然希望同我们达成协议。这一点从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关于6月23日枪杀事件的建议很快就作出了答复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这是恢复以前的谈判的基础。我们在谈判中的行为将取决于我们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答复：我们是否应当同英国人达成协议并且尽快达成协议，或者再次利用谈判来搞宣传。请对这个问题迅速给予答复。现在政治局^④通过了以下决议：国民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应同英国人达成协议（?）。党和人民应当掀起巨大的运动来反对英国反动政府的武力攻击政策。一旦对我提出的问题作

① 见本书第145页注①。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而我们似乎作为回报就结束罢工。

④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

出答复,我们就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同英国人达成有利的协议。广州的形势是稳定的。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他担心那里会出现政治上的麻烦。蒋介石在为自己寻求增援。他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他在前线的两个师在3月20日被搞得一蹶不振,因为他从军队中赶走了一些优秀的政委、指挥官和共产党人左派。加伦^①对这些师的战斗力表示怀疑。这些师开始分化瓦解,30%开了小差。蒋介石撤了三个团长的职务,其中一人是因为“三二〇事件”。他派左派来接替他们的职务。第四、七、八军带着怀疑的目光瞧着蒋介石的部队。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据最近消息,武昌已经包围,但还没有占领,卫戍部队只有在保留武器和在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肯投降,而且还要看维系着广东命运的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加强情况。与此同时,我们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蒋介石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②的全体会议。至于我去汉口的事,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去,但不会早于三个星期。在这期间省政府将进行改组(特别是内政部要彻底更新,那里有3月20日开始抬头的主要反动分子),省党部将准备承担对广东的责任。然而,很可能蒋介石把邀请去汉口一事不仅仅解释成他担心今后会削弱他在广东的地位。他声称要大力开展有利于汪精卫回来的运动,这很可能是他开始感觉到,

^① B. K. 布留赫尔。

^②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一些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会议于1926年10月16-26日在广州举行。

他受到了两方面的承认^①；在广东，有利于汪精卫的左派运动在发展，再者在前线主力部队不听从他指挥。也可能是他猜测到我是偏向于汪精卫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做法是对的，在汉口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宁要他而不要唐生智等人，而在广东我则宁要汪精卫而不要他。如果说上述方针是正确的，那么我不去会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应当想点办法来消除这种疑虑。让汪精卫回来的问题将在党代会上解决。

电报^②中还有陈友仁提供的一些详细情况，他转达了昨天同英国领事布雷纳德^③会谈的内容。这次会谈的主要之点是英国人反对征收进出口特别税，这对结束罢工的事十分有利。可以预计罢工将在两周内结束。

核对无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44，第 143—144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刊误。根据意思应为：受到了两方面的压力。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应为：布雷南。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9月16日于上海

由远东局局长召开的远东局俄国委员 和中国委员与中共中央当地委员 的联席会议第4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马克斯、切尔尼亚克、年轻人、老头子、文学家、彼得罗夫、布林斯基以及中共中央的事务秘书^①。

听取：1. 谢尔盖代表远东局俄国委员作关于广东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

2. 老头子作关于中国总的政治局势的报告。会议日程确定如下：先由谢尔盖作报告，然后单就广州党组织的错误问题交换意见，再后由老头子作报告并就近期任务一般性地交换意见。

讨论和报告占用了两次会议时间（7个半小时），讨论结束时通过一项决议，附在后面^②。

下面根据会议进行的顺序简要地叙述一下报告和讨论的内

^① 分别为：P. H. 维经斯基、M. D. 拉菲斯、T. F. 曼达良、H. A. 福京、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王若飞。

^② 见第99号文件。

容。

谢尔盖的报告

我们在这里不通过关于广州同志错误问题的决议，但是我想听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早在7月初我们在向中央全会所建议的最初的决议草案中就提出了广州同志的错误问题。在广州，我们深信，党组织在那里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但是这不应妨碍我们揭露过去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也深信，中央对广州的领导是薄弱的。

广州的同志对如何保持住广东省的政权问题有自己的一整套设想。他们认为，还在去年革命就使那里的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唯一的出路就是宣布实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专政，否则就必然会发生“三二〇事件”。他们为夺取政权发动了攻势。在这一点上中央妨碍了他们，于是他们认为中央要对“三二〇事件”负责。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虽然广东走在全国前面，是先进部队，但是不能把它同全国隔离开来。广州人认为，只有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政权才能为政府奠定社会基础。这是不正确的。对于广州来说，主要的是加强政治因素而不是军事因素。我不认为中派将反对社会基础。我同意说，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派将必定反对农民。我说“不一定”，意思是：这个派别中是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是有要使全体居民的利益服从于自己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但是我们应当在目前有这个可能的情况下，而不是根据将来经过一两年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抓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广州同志的想法是同解放运动的现阶段不相适应的，因而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和在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就是对于今天来说也具有现实意义。

广州人在去年采取了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纯左派和共产党人政权的方针。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还是孙逸仙在“纸老虎”暴动前后使用的那些方法，即：利用一些军阀集团反对另一些军阀集团。他们忘记了，这两三年来蒋介石及其军队已经变得比军阀集团强大得多，成了党的军队，而他们却想用旧的方法来推翻他。按照广州人的想法可以得出，如果说国民党左派应当实行统治，而共产党人应当领导他们，那么就不必讲究方式方法了：他们突出自己，赤手空拳地支持这个左派政权，而不是通过动员群众。由此产生了他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策略和对中央指示的不满，由此产生了他们12月27日的电报，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平分给共产党人和左派^①。

老头子：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

马克斯提供了关于这封电报的证明材料，他从英国人^②的机关里得到了电报的复制件。

谢尔盖：（详细地阐述国民党二大期间的政治形势）在反革命进攻的这种形势下，广州人只遵循他们省里的各种关系——这里也有孙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广州人说，我们（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因同叶楚傖和孙科谈判^③促进了“三二〇事件”的发生。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进行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些人脱离右派和保护整个广州不受反动派的侵犯。我们通过谈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在于，国民党还没有发展到搞如此复杂阴谋的地步，而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利用对左派的巨大影响，来消除他们对这次谈判的怀疑。

但可否在3月20日以前采取另一种政策呢？我认为是可以

^① 见第94号文件。

^② M. M. 鲍罗廷。

^③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同这两人进行的关于谴责“西山会议派”活动的条件的谈判。

的。本来应当发表新的纲领，在城市里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在农村打击土豪劣绅。这一点可以同蒋介石一起来做。不能借口我们促使他在“三二〇事件”后向右转来为自己在“三二〇事件”以前对他的态度进行辩解。要知道，“三二〇事件”表明，没有蒋介石，左派没有力量来单独进行统治。即使目前，左派将依靠谁呢，依靠李济深吗？难道同他可以从事革命事业吗？把军队从蒋介石那里夺过来？是的，但这样做需要时间。而他们着急了，太着急了，因而促使“三二〇事件”发生了。反动派的进攻不是因为破坏了社会团体，而是因为革命过去依靠的是军队，而当军队离开时，反动势力就冒出来了。从主观上看，蒋介石还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打击过右派，他需要我们，是可以同他一起工作的。广州人对我们说，“三二〇事件”在逐渐消逝。这从情绪上说是对的，但是已经消逝到这种程度了吗：社会力量可以没有军队、没有蒋介石，也没有反革命的危险了。

现在来谈谈汪精卫和蒋介石。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应当把反对^①独裁的反对派情绪汇合起来。左派曾比共产党人更左，而在我们同志那里，实践要比他们的理论更理智得多。我们曾说服他们只为汪精卫回来做好准备，但要表明，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北边占领了湖北，但在广州英国人公然用武力破坏罢工，帝国主义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同广州进行斗争，形势变得比8月份更糟糕，因此不能急于召回汪精卫。蒋介石也不可能激烈反对左派，因为他在前线的处境迫使他寻求支持。我们不应挑头来反对蒋介石，他也不会来进攻。应当保持目前的局面，并在群众中进行十分热情的工作。在代表会议^②前应当拥有

^① 以下有一个词辨别不清。

^② 见本书第495页注^②。

左派的多数，但不应在全会前把汪精卫召回。不应突出强调汪精卫的问题，而要强调政治问题，强调行动纲领。顺便说一下，经选举产生政权的口号和农民改革的口号就是这样的问题。

老头子：广州人的错误是：（1）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2）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3）他们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由此得出：从第一点看，他们没有考虑全国的形势，从第二点看，他们否认戴季陶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并认为左派什么都能做到，而从第三点看，他们只建立左派政权，把蒋介石推开。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广州的整个策略完全是左的，而中央试图使在西山开过会的右派^①发生分裂。我们说，“三二〇事件”是实行左的方针的结果。要知道，我们已通过同国民党右派在12月份的谈判使他们同意继续与苏联结盟，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我们同意只在领导机构中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但在5月15日以后^②我们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他们认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可以忽视不管，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思想会找到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洪水到来时有两种对付办法：（1）用墙来挡；（2）把水引到另一个河道里。广州人认为，同右派进行谈判导致了“三二〇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这里的谈判没有结束，因为我病了。孙科去广州是右派召他去的。其实同右派的妥协不是在广州进行的。但要知道因此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中央采取的让步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在5月15日作了更大的让步。广州人根本否认有必要对国民党作出让步，他们希望有一个左的国民党，他们希望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但这是全国共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③。

① 指“西山会议派”（见本书第235页注②）。

②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见本书第272页注③）。

③ 在陈独秀发言稿后面有维经斯基的批语：“老头子认为广州同志受‘英国人’鲍罗廷的影响犯了错误，这种看法表现在哪儿呢？”

彼得罗夫：我完全同意老头子的意见。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虽然他们可能已经纠正了。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也否定小资产阶级，他们只考虑工人和农民。对国民党，他们是这样想的，要么他们应当占据它，要么他们应当退出国民党（他们现在否定后者）。

想让汪精卫回来，就是想恢复“三二〇事件”以前的局面。广州的错误部分是由于“英国人”的论点造成的，就其工作性质而言他只看到了军队和国民党。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派到那里去了，我们把那里的人都吓坏了，而派到群众中去的人很少。第二个问题是独裁问题。“英国人”总是援引历史，他认为蒋介石将是军事独裁者。但中国经历着长期的革命，不需要军事独裁者。蒋介石是“英国人”的坏学生。

老头子：中央谈让步时提出了三点建议：（1）汪精卫应在上海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向他说明关于广州的全部谣传；（2）邀请上海代表团到广州来；（3）向国民党作出让步。他们履行了前两点，而抛弃了第三点。

彼得罗夫：广州人坚持孤立的广州的观点，拒绝同小军阀发生联系。“英国人”拒绝这样做，他指出，我们对付不了广州内部的局面。而蒋介石本人则同这些小军阀发生了联系。广州的力量对比也是这样，只是同群众的联系有所加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95--98 页。

打字稿，副本。

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

1926年9月16日于上海

远东局俄国委员和中国委员与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 决 议

1. 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

2. 因此，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①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表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

3. 因此，全会的主要问题应当是通过一个政治纲领，动员左派，不给蒋介石及思想上的中派提供反对左派的可能性。这个纲领应在全会召开前公布，并以这个纲领为基础进行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4. 老头子^②应根据以上精神对蒋介石向共产党人提出的请求作出答复^③。

① 见本书第495页注②。

② 陈独秀。

③ 指蒋介石向陈独秀提出的不要坚持让汪精卫回来的请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25页。）

5. 汪精卫回来的问题应当在国民党代表会议期间根据政治局局势作出具体决定。

6. 广东的整个工作应当由我们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帮助他们同豪绅、民团等进行斗争的名义来进行，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代议制的政权机构（广东国民会议）时，特别是在农村，首先要争取撤换那些卖身求荣的和反革命的官吏。

7. 在北伐参加者占领的各省，我们应当做工作争取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政权，召开省国民会议和实行民主自由。而开展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把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无论如何要把农村的运动同革命的中心城市联系起来。

8. 建议全国总工会，上海、广州和汉口的总工会以及广东和湖南的农会向国民党代表会议发表特别声明，代表工人和农民根据本决议的精神向会议提出自己的要求。

这些声明的基本内容应由中央拟定。

在广州的上述组织可以通过无党派的代表向会议提交这些声明。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2，第 221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53号（特字第44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9月9日会议第52号记录，决定：1. [1]），（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1] (1) 采纳契切林同志关于学校问题的建议^①，并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谈话，说明我们的政策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政策，与帝国主义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2) 认为广州同张作霖进行谈判是合适的，同时提醒广州防止卷入与广州政府的资源和力量不相适应的军事行动的危险。向广州指出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自己在已占省份的政治地位。

(3) 再一次确认内蒙古自治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建议人民革命党中央在内蒙古组织群众性运动，口号是“打倒张作霖！”

抄送：

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同志。

^① 见本文件的第18项内容，说的是中东铁路的教育处。

1926年9月13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8.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9月9日会议第52号记录，决定：1. [1]）。

决定：18. 同意契切林同志关于暂不拨出教育处预算款项的建议。

抄送：

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缅任斯基和鲁祖塔克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17，目录162，卷宗3，第118—11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01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①

不晚于 1926 年 9 月 16 日于莫斯科^②

同志们：

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同志（他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派我到莫斯科这里来，为的是取得共产国际对于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指导。

国民党和蒋介石同志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国民革命应当同世界革命的同志们^③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应当服从世界革命的领导 and 中心——共产国际。

我谨向你们作一简短的报告，谈谈中国近来的政治形势，并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同志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一、国际形势

中国国民革命应当利用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各国帝国主义者都同样地仇视反帝运动。但是它们利益的矛盾使它们不

① 在维经斯基 1926 年 9 月 16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谈到：“只应把邵力子看作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目前只应跟他谈蒋介石必须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问题，并建议他将这一点电告蒋介石（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75 页）。后来，从 1926 年 11 月至 1927 年 4 月，邵是国民党驻苏联的代表。

② 日期是根据东方书记处随报告寄给 J. 3 曼努伊尔斯基的信的日期确定的，信中谈到给他寄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蒋介石的代表的报告的俄译本”（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3，第 35 页），报告的中文本没有找到。俄译本有些地方译得不确切。

③ 原文如此。

可能组成统一战线。

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国民党不可能提出“反对一般帝国主义”以外的口号问题。但是在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不可能不对各种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加以区别。

自从1925年5月30日^①和6月23日^②发生事件以来，抵制英货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场斗争在除广州以外的各个地区军阀的压力下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广东，由于国民政府和人民大众的合作，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行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英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都不管怎样要推翻国民政府。

1925年9月，英国保守党内阁提出了武力反对广州的建议。这一建议未能实施不仅是迫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也是因为其他列强不同意这样做。

法国士兵也参与了沙面的枪杀行动^③。考虑到在当时法国人只是受英国人利用，而这次枪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英国人，我们暂时不把法国人牵连到这个事件中^④。

今年7月，香港政府试图解决罢工问题，并为此目的通过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英国人建议法国人参加谈判，国民政府拒绝这样做。由于这些分歧，谈判暂时停了下来。

由于抵制英货，日本和美国商品的销路得到很大发展。不仅在广东省，而且在国内其他城市，市场渐渐从英国的控制下转到日本人、美国人及其他人的手中。美国、日本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由于张作霖最终夺取了北京政权，日本在华北的影响已经达到如此强大程度，以致其他列强几乎都无力与之相对抗。

① 指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爆发的群众性反帝行动。

②③ 指广州英法租界巡捕在沙面向反帝游行队伍开枪事件。

④ 原文如此。

为了延缓革命运动和加强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影响，美国人采取了和平政策。

诚然，这两个列强（日本和美国）的面孔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想在中国市场上占据贸易统治地位则是一致的。

日本和美国目前暂时还没有同广州发生直接的冲突。法国希望延缓中国的革命浪潮。所有这一切说明，尽管英国人加强了干涉中国的运动，但是其他列强未必同意这样做。

国民政府对其他列强不得不采取和平政策。即使对英国，“在公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也准备采取和平政策，以便让英国劳动人民明白，反英斗争是保守党实行的对华政策的结果，并通过这种办法来加强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战立场。今年7月同香港政府进行的关于结束罢工的谈判正是从这个政策角度出发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国民党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而是希望同它达成和平的协议。这只是意味着必要的策略让步。

二、中国的军事形势

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军事工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糟糕的军队可能要比其他国家糟糕的军队做出更多糟糕的事。

相反，中国有一支好的军队就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

众所周知，华北的军阀正在逞凶作恶。目前整个国家，除国民政府管辖下的省份外，都遭受着军阀压迫的痛苦。广东在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下已取得一系列成就。由此看来，国民党不能不特别重视军事工作。

广州部队目前由6个军组成。从敌方转过来的部队（广东人、湖南人、贵州人等等）在今年7月前编成了4个军。这些军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训练好。

预计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归顺到国民革命军方面来的部队将会更多，这些部队都需要加以改编或彻底解散。

北伐的意义

首先，广东省统一后，湖南省转到了国民政府方面，并且国民政府也曾决定接受它。这时，吴佩孚向湖南宣战，下一步是打算进攻广东。因此，广州不得不支援湖南以求自卫，所以向北进军是防御性的。

其次，广东统一后，国民政府加紧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准备工作。因此，国民革命军迅速发展到了 20 个师，其给养每月耗费 400 多万元。在北方的形势日趋反动，吴佩孚本人打算进攻广东的时候，如果这些军队还不下决心出击的话，那么广东居民养着这么一大批军队干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居民就会失去减轻资金任务的希望。此外，国民党认为，广东真正的建设工作只有在全国统一后才能开始。

第三，自国民党二大以来，居民给国民政府发来的要求立即向北进军的电报接连不断。与此同时，国民军的处境^①很危急，又不能给它以支援。

蒋介石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②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③上作了报告以后，必须进行北伐的问题不仅为全体国民党员所理解，而且也为工人和农民组织所理解。劳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必须进行北伐，并为此向政府请愿。

考虑到自南向北进军可能导致北方军阀结成联盟，国民党在这次北伐中只提出“自卫”和“反对吴佩孚”的口号。对张作霖和孙传芳不仅不去触动他们，而且还同他们进行相应的谈判。北方的军阀本身已开始分化。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加深，而张宗昌对孙传芳十分敌视，一直念念不忘占领江苏省。利

① 指 1926 年春国民军在华北的失利。

② 指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2 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③ 指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用这些矛盾来开展反对华中军阀的斗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江苏省（孙传芳所管辖的五省之一），国民革命军可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无法避免同孙传芳发生冲突。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并不那么危险，因为（1）孙传芳后方的情况会使他的出击遇到麻烦；（2）在湘赣交界处有国民革命军的相应力量。

由于国民军撤离南口阵地，正在形成广州意料不到的局面，因为国民革命军未必能再向北面发起战役。而如果孙传芳转而采取攻势，国民革命军就不得不在业已占领的地区进行自卫。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要把四川省联合到国民政府的影响之下^①。要巩固中国西南并同国民军建立真正的联系，而国民军可能试图从甘肃经陕西逼近武汉地区，最后，要进行细致的工作来改编转到国民政府方面来的部队。

三、工农的状况

应当认为工农中的运动是中国人民大众中最发展的革命运动。同志们可能从其他消息来源的报道中已经详细地了解了这些问题。我只是从国民党方面简要地谈谈工农运动的问题。

国民党在一大以后就开始特别重视工农运动。同情国民党的工人和农民越来越多。这种现象特别表现在广东省，在政府同工农组织的合作中。

在北伐问题上，政府事先取得了工人和农民的协议^②，而工人和农民答应全力支持这一举措。在同香港政府就结束罢工问题进行的谈判（今年7月）中止后，工人组织和政府一致决定通过一项继续和加强抵制英货的决议。

农会会员的数目在急剧增加。在今年5月份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中谈到，在广东省已经有66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总数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把四川省置于国民政府的影响下。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同意。

超过60万人。

农民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几乎在全国各省都开展起来了。

在河南，农民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然而，由于国民军第二军对农民采取压迫政策，这个省里的“红枪会”组织被吴佩孚所利用^①。我们认为，这一事实证明这个省的农民觉悟还不高。在广州成立了工农商学联合会^②。这个组织在巩固本省国民革命运动根据地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对工人和农民做工作的过程中常常发生一些冲突。党和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些冲突^③。与此同时，已经开始修改《劳动法典》的工作，以维护工人及其工会组织的利益。

在广州成立了培养农村领导骨干的农民讲习所^④。然而应当承认，在农民运动方面，非常缺乏积极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蒋介石同志曾就土地问题同鲍罗廷同志进行一次长谈，谈到改善农民状况的计划，并通过一项决议^⑤，准备在必要的和适当的时候予以公布。

四、关于党

现在来谈谈党的问题。就这个题目我谈两个问题：(1)关于国民党自身的问题；(2)关于以国民党为一方和以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国民党已经走上了广泛发展的道路。它正随着广大群众革命意识的增强和发展而增强和发展。

目前，几乎各省都有党的组织。鉴于军阀的强大压力，这些

① 指“红枪会”队伍反对国民军的行动，这对国民军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

② 见本书第320页注①。

③ 委员会是根据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决议于1926年8月成立的。

④ 见本书第333页注③。

⑤ 决议没有找到。

组织在有些地方还只能进行地下工作。

湖南党组织是最优秀的（根据革命精神和党员人数）组织之一。它在国民革命军最近取得的胜利中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湖北党组织的工作也很有力和很积极。最近吴佩孚遭到失败时在汉口杀害了许多党员就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党已深入到群众中。广州国民党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工人。如果拿广东省范围内的组织来说，那么其大部分成员是来自农民。

反革命集团想要推翻广州政府的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此外，反革命势力在逐渐被消灭。去年11月由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①以及今年4月的上海会议^②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党在不断地经受着在侨民、工人、农民、军队和学生组织中发生意见分歧之苦，这些分歧无疑妨碍党的工作。

这些分歧的产生和持续不断首先是因为党组织的地位还不巩固，其次是因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事过程中，党员经常犯错误。此外，党内情况的复杂化还因为个别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常常直接影响到整个组织和整个党的工作。上面这种现象在中国的环境下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还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残余，国民党还没有严格的纪律。

去年12月底，广州党组织内的情况非常严重。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这种情况才暂时有所好转。但是祸根，即分歧的基本因素还存在。今年3月20日分歧爆发了。

“三二〇事件”的根源在去年10月就埋下了^③。因为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这期间，党未能消除存在的意见分歧，所以这些分

① 见本书第235页注2。

② 见本书第232页注1。

③ 看来是指1925年9月28日—10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在文献中被称为“十月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表现出中共想要独立领导革命的意见，致使中共和国民党的关系趋于紧张。

歧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

“三二〇事件”显然证明，一方面国民党还是强大的，另一方面它的队伍里的意见分歧可能损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

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①上，通过了两项决议：

- (1) 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
- (2) 选举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第一项决议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意味着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而只是防止党内情况的进一步复杂化，敲掉反革命集团手中的武器，敌人曾借助这个武器制造了各种危害革命斗争的谣言。

为了党内有一位领袖，需要有第二项决议。共产党对这些决议都是同意的。而反革命分子通常散布的所谓政府将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谣言^②，在中央五月全会后就不复存在了。

在7月4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上，蒋介石同志被选为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③。

作为国共两党之间关系基础的基本原则没有丝毫改变。共产党人依然在各个职位上工作。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国民党，如何进一步改善国共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如何消除或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

这些问题需要立即加以解决。

关于蒋介石同志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我还要说几句。

蒋介石同志认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意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也和世界

① 见本书第272页注③。

② 原文如此，显然是说，国民政府在执行共产主义的政策。

③ 原文如此，蒋介石是在1926年7月6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

革命一样需要统一。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①。因此，国民党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②。

在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国民党一方面应当集中一切革命人士在统一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的行动，另一方面它应当承认第三共产国际是自己的领导机关，因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从蒋介石同志的观点来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限制它的发展。然而在统一战线中，它（共产党）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

最后，我要谈一谈蒋介石同志对第三共产国际所表示的希望^③。

(1) 国民党应同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在国共两党代表会议上邀请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为会议的顾问参加。

国民党请求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给予指导。

国民党将经常地向共产国际派去自己的代表或者为了保持联系派驻共产国际常任代表。请共产国际派更多的人员来中国。

(2) 请明确制定我上面所谈到的对待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和军阀派系的策略，并要求共产党接受统一的行动纲领。

(3) 请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革命阵线、如何更加加强和巩固国民党以及如何进一步改善国共两党在进行联合斗争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上给予指导。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进行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强有力斗争。对于这种革命的声援和支持，我谨代表国民党向世界革命的领袖——第三共产国际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同志们可能就这份简要的报告提出的问题，我准备尽我

①②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领导者。

③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所寄予的希望。

所知作出回答,也准备在我们会面时同一些同志就这个报告进行交谈。

邵力子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33, 第 36—47 页。
打字稿, 副本。

1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会议第 19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9 月 18、19、21 日子上海

俄国代表团会议第 19 号记录

出席: 谢尔盖、马克斯、切尔尼亚克和年轻人^①。

听取: 1. 关于去汉口的問題。听取从汉口来的总“顾问”的代表^②的报告。

决定: 1. (1) 取消以前的决定, 由谢尔盖和切尔尼亚克去汉口。

^① 分别为: P. H. 维经斯基、M. P. 拉菲斯、T. P. 曼达良、H. A. 福京。

^② 总顾问是 B. K. 布留赫尔, 他的代表是何人不详。

(2) 对一般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坚持让蒋介石同汪精卫达成协议，同唐生智建立联系并保证国民党在唐生智军队中的影响。

(3) 不在汉口设立中央的任何代表处，请中央将所有派往那里的工作人员纳入区委。坚持立即派工会工作者^①去那里。

(4) 在汉口和上海之间以及汉口和广州之间（通过上海）建立定期的信使联系。

(5) 为加强共青团的工作让小青年^②去汉口。

(6) 请沙赫^③给去汉口和建立信使联系拨出专款。

(7) 认为有必要让谢尔盖在10月7日前回上海参加这里召开的会议。

听取：2. 关于去长沙的问题。

决定：2. 视情况让切尔尼亚克在从汉口回来后去长沙。

听取：3. 远东局最近几个月的工作计划。

决定：3. 中国共产党方面：

(1) 认为有必要在最近集中精力通过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加强总的政治领导，了解和帮助加强中央的整个机构。

(2) 认为有必要不晚于1月召开中共代表大会。这个问题要在最近几天向中央提出，以便弄清领导同志对代表大会本身以及对开会日期、参加人数（50名或150名代表）和议事日程的意见。

(3) 这以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派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于11月去莫斯科的问题。

(4) 立即着手起草提纲，总纲最好委托老头子^④起草，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提纲委托文学家^⑤，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提纲委托切尔尼亚克。

① T. P. 曼达良。

② H. M. 纳索诺夫。

③ J. M. 加拉罕。

④ 陈独秀。

⑤ 瞿秋白。

(5) 在近期内加强对中央文献工作、宣传鼓动工作的帮助,协助提出国际性的问题。在加强中央机构的工作上要给予帮助。推动农民委员会的工作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让马克思参加这项工作。

(6) 认为有必要特别仔细地研究一下工会、妇女、青年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安排问题。

(7) 委托马克思和年轻人检查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同时要注意对政治生活和组织工作反应迟缓的问题。

(8) 了解中共中央的预算情况……^①。

听取: 4. 俄国代表团关于广州之行的报告。

决定: 4. 批准报告和结论^②。

听取: 5. 关于英国人^③ ……

决定: 5. (1) 认为有必要请最高领导机构立即将英国人从广州召回, 并立即派其他重要人物来接替。

(2) 给最高领导机构的信要尽量同沙赫协商, 此事委托谢尔盖去做。

听取: 6. 关于中共中央下设立翻译局问题。

决定: 6. (1) 成立翻译局, 由 4 名翻译组成, 包括奥同志^④在内, 并为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服务。

(2) 从给远东局的款项中每月拨给中共中央 100 卢布作为这个翻译局的经费, 而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每月分别承担 50 卢布。

(3) 款项从翻译局开始工作之时起拨给^⑤。

听取: 7. 关于俄国代表团某些成员同莫斯科的信件往来问

①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几点。

② 见第 94、95 号文件。

③ M. M. 鲍罗廷。

④ H. M. 奥沙宁。

⑤ 原文如此。

题。

决定：7. (1) 一切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包括青年和工会工作问题，都应事先提交远东局（或俄国代表团）讨论。

(2) 除俄国代表团和远东局关于总的工作的总结报告外，青年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同志应定期就这些领域的工作向青年共产国际或工会国际写出总结报告。

(3) 同志们关于向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解放运动前景的建议备案待查，认为最好将这些信件的副本存档。

听取：8. 最近发往莫斯科的邮件。

决定：8. (1) 关于广州的报告由谢尔盖、马克斯和年轻人签署并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和工会国际主席洛佐夫斯基同志本人。

(2) 将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材料中的决议和老头子在远东局做的关于全会情况的报告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3) 关于远东局和俄国代表团7至9月份的第二个工作报告。

(4) 小青年的报告。

(5) 谢尔盖的信。

(6) 远东局和俄国代表团的会议记录。

(7) 关于英国人的信。

(8) 诺拉^[1]给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信。

听取：9. 关于农村青年工作。

决定：9. (1) 整个农村青年工作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吸收青年积极参加农会的工作，并帮助扩大和加强农会。

(2) 农会不应满足于青年部的存在和发展，而应力求以文化、体育小组的形式将外围青年聚集在农会里。青年部的任务是从组织上掌握和加强所有这些青年小组。

[1] M. Ф. 库兹涅佐娃。

听取：10. 关于青年的军事工作问题。

决定：10. 暂缓解决。

听取：11. 关于对基督教青年联合会所成立的工人扫盲学校的态度问题。

决定：11. 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学校，通过工会从组织上把青年工人吸引到这里来，以便从内部来同阻挠成立这些学校的军阀和帝国主义机构作斗争，并争取这些学校在中国当局那里注册登记。

主席：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34—37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10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补充报告^①

不晚于 1926 年 9 月 22 日^② 于莫斯科

对总报告的补充

自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开始工作时起，国民党在日益成长和发展。

与此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和分歧。这种现象无疑妨碍着中国革命工作的开展。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在这里谈论我们已经犯过的错误。然而，为了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对这些错误作出明确的说明不是没有好处的。

考虑到需要纠正本党党员所犯的**错误**，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部分地是由于没有领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承担的**基本任务****。

两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利用统一战线方式共同为实现中国国民革命而斗争，统一战线方式不是**两党站在一条线上的**

^① 在东方书记处给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们的附信中谈到：文件作者“请求删去最后两段”（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3，第 48 页）。

^② 日期是根据报告后面的批语确定的，批语是：“译自中文。1926 年 9 月 22 日。”报告的中文本没有找到。

联合方式，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一种方式。

这种解决问题的基础是，中国目前需要进行国民革命。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只能进行国民革命。而这一革命的领袖应当是**国民党**。因此，在国民党领导下集中一切国民革命力量来加强和扩大革命势力是十分必要的。

由此产生两项根本性任务，这两项任务对于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的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1）加强和扩大国民党，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也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目的。

（2）为了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强大的政党，党内应当有为工农利益而斗争，从而赢得工农信任的真正的左派。

因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最重要任务是，帮助加强左派，使它能够胜任完成领导国民革命工作的任务。

我不怀疑**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实行这种方针。但是在一部分年轻共产党人那里存在着与这些根本性任务相对立的意图和思想，例如：

（1）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共产党人说，它目前在维护工农利益，但将来会来压迫工农。他们想以此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既然事情是这样，既然工农群众开始怀疑国民党，那么国民党就不可能赢得工农的信任，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工人和农民不参加国民党，不同它一起进行共同的革命斗争）。

（2）共产党人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

选举时的激烈竞争有时促使左倾的国民党人士向右转。对于国民党的领袖们来说，工作中的最大困难是，在他们的领导下**缺少纯粹的国民党左派**群众。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常常和容易出现

批评意见，认为国民党左派只支持和维护共产主义派，他们（国民党左派）被共产主义派所包围，等等。

我相信，在有广大的纯粹国民党左派群众的情况下，国民党领袖们会更加加强消灭右派分子的斗争。

共产党人在为吸收一些国民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进行的斗争受到挫折时，有时就改变对右派的态度，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增加敌意。

我觉得，只有通过清楚地领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基础的上述两项根本性任务才能纠正这些错误，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在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工作时，应当千方百计地努力扩大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加强它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人引起摩擦的行为还有很多。例如，共产党人说国民党人是“非同志”、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不是革命的主义，诸如此类等等。所有这一切也应在纠正之列。

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派别组织从工作人员调动角度来说有时妨碍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一些误会和敌视。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不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

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在具体策略问题上同国民党采取一致行动，例如，在对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和军阀派系的态度上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以避免对方的统一行动。

至于在军事和政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如果不能加以纠正的话），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先要友好地指出，然后在拒绝接受的情况下才进行公开批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3，第 49—50 页。

打字稿，副本。

104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9月20日于上海

有远东局代表参加的中央会议记录

出席：老头子、文学家、彼得罗夫、阿莫索夫、谢尔盖、马克斯和中央事务秘书^①。

1. 对赴汉口代表团^②的指示

（谢尔盖和阿莫索夫前往）

老头子：通报给蒋介石的整个答复的内容（通过他的全权代表^③）：您应当同汪精卫一起工作。有三点主要理由：（1）国民党领导人中剩下的很少：廖仲恺去世，胡汉民变节。只剩下两人：您和汪精卫，应当一起工作；（2）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张静江执行的政策不好，因此你们失去了联系和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违背孙的遗训的。应当让汪精卫根据您的思想和指示来领导广州

^① 分别为：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F. H. 维经斯基、M. P. 拉菲斯和E. 若飞。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拟派去向蒋介石进行谈判的代表团。

^③ 胡公冕。

的工作；（3）汪精卫将是您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否则斗争会尖锐化，共同事业将遭毁灭。然后，我阐述了汪精卫回来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是要防止左派产生更激进的情绪：（1）我们主张让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2）汪精卫应当和他一起工作；（3）汪精卫不撤消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①。建议他首先提出让汪精卫回来的倡议，以便此事不是违背他的意志而是根据他的倡议进行的。

谢尔盖：对应否由我们方面提出保留5月15日决议的问题提出疑问。如果问题是向我们提出的，那么我们可以回答。而由我们方面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怀疑。关于成立新的军校^②的建议应予采纳，并切实加以执行。

老头子认为，蒋介石对我们可能有两种意图：（1）逼迫我们答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2）在前线召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际间会议。应当小心谨慎。

谢尔盖：我们不应在谈判中充当汪精卫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既不反对这个人，也不反对那个人。应当要求蒋介石肃清在军队中的孙文主义学会^③。

谢尔盖：光谈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合作方式我们达不成协议。今天的问题是谁服从谁。应当将权力按几个方面来划分，如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国民党中央主席是汪精卫，而军事权力，汉口的新军校归蒋介石。

阿莫索夫：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

老头子：必须使蒋介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冲

① 见本书第272页注③。

② 指在武汉成立黄埔军校的分校。

③ 见本书第18页注①。

突不可避免。

文学家：蒋介石想把事情看成是向我们作出让步。这不行。应当争取让他向左派作出让步。应当将权力分为军事的和政治的，中央的和省的。

阿莫索夫：我们不应亲自同唐生智取得联系，而应通过别的人。如果需要会面，那就不是作为党的代表，而是作为政治活动家。

彼得罗夫：一定要同唐生智进行对话，他可能成为大人物，成为第二个冯玉祥。

马克斯指出，基本方针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汪精卫在分配权力基础上达成协议。不过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蒋介石的反对程度，他当然同广州，同自己的一派有联系。10天后，当去汉口的人经过初步谈判作出情况通报时，问题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谢尔盖反对拖延解决，并对能否同蒋介石在分配权力基础上达成协议表示怀疑，因为这会把他排除在广州的政治领导之外。

讨论结束。没有通过专门的决议。

2. 中共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计划

文学家宣读已经拟定的草案，它将是给各级党组织下达的详细指示的基础。

马克斯建议给第12条（在中央草案中是第6条）^①加上关于召开联合工人大会的内容，这次会议可以阐明无产阶级在当前的立场。

老头子反对。

通过关于召开湖南和湖北两省工人代表会议及湖南和湖北两

^① 看来是指1926年9月22日中央通告第十八号上阐述的在北伐过程中中共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计划（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22—324页）。

省的代表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扩大会议的补充内容。

马克斯建议扩充第8条（在中央草案中是第9条），补充他在鼓动宣传会议上提出的内容，即：发表党关于时局的声明和散发一组几十万份的传单。

谢尔盖反对在国民党发表声明以前我党发表声明。最好发表我们支持国民党决议的宣言。

老头子认为有必要等到江西和北方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明朗的时候再发表宣言。

通过关于传单和宣言的补充内容。

谢尔盖问道，第4条（在中央草案中是第10条）是否要提出实际的抵制英货运动。

文学家解释说，这一条已纳入支持学生开展的运动之内，这场运动目前还没有赢得商人的同情。

谢尔盖说，已经为湖南开办党校筹集到1000元。

就在何地和如何建校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谢尔盖要求同**马克斯**商量指示信草稿，因为鼓动宣传部应当准备这些问题。

文学家指出一些困难。

谢尔盖要求提供中文文本。

3. 关于妇女工作

谢尔盖坚持认为有必要从预算中拨出一定款项用于妇女工作，特别是用于出版妇女机关报，指出排除这个项目是错误的和不合法的，并提醒了国际妇女联合会的坚决抗议。中央的这一政策会损害从事妇女工作同志的工作，更何況讲的是200—300卢布的问题。

老头子和**阿莫索夫**认为缺少经费，指出曾给妇女部三个月时

间利用社会团体的经费来翻译自己的杂志^①，但他们不善于做这项工作，也不去从预算中寻求经费。

经过热烈的讨论后决定，妇女部在最近几天内递交一份详细的报告，论证自己对中央拨款的要求。

4. 关于军事工作

根据赫同志^②的报告通过一些关于当前迫切问题的决议。

谢尔盖说，在军事工作中存在着很多严重缺点，不是全党在进行工作，而只是一些部门，在士兵中没有开展政治工作。

决定：问题提交中央专门会议讨论。

5. 关于上海的工作

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马克斯记录。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55—57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指《中国妇女》杂志。1925—1926 年在上海出版。

② A. J. 赫梅廖夫。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委员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代表团的信^①

1926年9月22日于上海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抄送加拉罕同志

在我们关于广州形势的报告^②中，我们曾指出，广州的同志在1925—1926年期间在对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的过早的尖锐分裂和他的“三二〇”武装示威，随之而来的是将汪精卫排斥在政府权力机关之外和对共产党人和左派的总进攻，这一切削弱了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广州的同志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些老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们坚持以往的错误观点，又在过去的错误上增加新的错误，不同意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关于国民党的决议^③，说明他们普遍不理解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務。

① 信是在1926年10月13日收到的，当天即送联共（布）、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其中有И. В. 斯大林、И. И. 布哈林、В. М. 莫洛托夫、С. В. 契切林、Н. С. 湯旋利赫特和Я. К. 别尔津（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70，第83页）。

② 见第31号文件

③ 见本书第326页注②

如果鲍罗廷同志依然作为苏联代表留在广州的话，那么任何部分地更换广东区委领导的做法（而由于人力普遍匮乏中央只能更换一小部分人员）都不可能取得所需要的决定性结果。鲍罗廷实际上领导着我们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并靠自己的威信加强了广州同志的所有错误观点。

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因此，尽管鲍罗廷同志试图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来进行工作，但他今后不可能贯彻这一政策，因此他在这个岗位上也将是有害的。

鲍罗廷同志由于自己长期的工作和对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对国民党的巨大功绩，无疑在国民党人士中赢得了极大的尊敬。他对国民党内部关系的了解，他对各种派别和领导人的广泛熟悉，当然对我们的工作会是有益的，但这只有在始终不渝地和坚持不懈地贯彻我们总的政策方针情况下才会如此。现在，由于他同中派和蒋介石的关系破裂，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他在国民党内的个人影响相应地也降低了。鲍罗廷同志或许不应该在3月20日以后回到广州，因为他必须改变策略，而这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左派的不信任。我们曾亲眼看到，国民党左派如何明确无误地藐视他，甚至在自己的筹备工作中回避他。目前，形势极其复杂，必须对各派实行非常复杂的灵活政策，鲍罗廷同志将不适于做他在做的工作，因为他过去过分地卖弄他只同极左派发生联系的政策，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今后他必然仍将执行这种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 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

核对无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6，第 79—80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06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1926 年 7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期间
工作情况的第 2 号总结报告^①
(摘 录)**

1926 年 9 月 22 日于上海

绝密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1926 年 7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期间
工作情况的第 2 号总结报告**

总的意见。在报告所谈的这个时期，远东局的工作十分紧张，这反映了中国总的政治形势。远东局的正常工作由于三名俄国成员去广州^②，然后是陈同志^③ 长时间生病和中共中央的两名成员

① 文件副本曾送 H. B. 斯大林、H. H. 布哈林、K. E. 伏罗希洛夫、П. М. 加拉罕、H. A. 皮亚特尼茨基、A. C. 布勃诺夫。

② 指 I. H. 维经斯基、M. J. 拉菲斯、H. A. 福只

③ 陈独秀

去广州^①而受到破坏。这次广州之行用了5周时间，而从广州回来后过了两周，总的政治形势又要求两名俄国成员去汉口，可能还要去长沙，这又会使正常工作受到破坏。显然，远东局成员的这种中国各地之行将是远东局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会给远东局成员指导中国的工作和直接了解情况带来很大的好处。

与各党的联系。远东局成立三个月以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一直是与日本党的联系问题。迄今为止，远东局的组成人员中还没有日本的代表。我们不止一次地电请他们到这里来。但是，远东局成员外出本身妨碍了建立定期的联系。在整个这一期间，我们连日本方面的一个报告，哪怕是一封信都没有收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同志在那里的工作情况。我们这方面已给日本寄去了关于远东局工作的详细报道，并附上了有关中国党和朝鲜党活动情况的材料（远东局通讯第1期）。

远东局或更确切地说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与朝鲜党的联系和对朝鲜党工作的指导一直没有中断。三名远东局成员不在，大大拖延了对建立朝鲜国民党问题（对于朝鲜工作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在朝鲜的党组织的被破坏以及合法的左派国民组织领导机构的被破坏，也把这个问题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救援被捕者的工作中以及在采取一些初步措施来恢复整个被破坏了党的机构时，远东局还是给予了朝鲜同志以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不言而喻，（远东局）同中国党的联系是最密切的。可以说，在党的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

远东局的工作制度。迅速而切实地与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一起解决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的必要性，在最近一段

① 指张国焘和瞿秋白。

时间促使我们不是去召开吸收各党一名代表参加的远东局会议，而是专就中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召开远东局俄国成员与中共中央成员或朝共中央国外局成员的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一些问题得到了详尽的讨论。最近两周内，我们和中共中央召开了两次这样的联席会议，和朝鲜同志也召开了两次这样的联席会议。同时中共中央全会^①的总结和朝鲜党的工作总结报告也是远东局会议讨论的内容。在即将召开的远东局会议上还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和成立朝鲜国民党的问题。

远东局的存在已经对彼此对党的工作的兴趣的提高产生了影响，结果各党的报刊都转载别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献资料以及党的文献和声明。

为了评价远东局和俄国代表团的工作，我们要在这里指出，在业经讨论的105个问题中有30个是远东局的内部组织问题（工作计划和分工，成立各部，建立联系），有45个是中国问题（其中讨论总的政治形势问题有8次，国民党问题有9次，广州问题有8次，中央全会问题有4次，上海问题有2次），有22个是朝鲜问题，有13个是青年运动问题，有5个是工会工作问题，有4个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问题，等等。

远东局的人员构成和机构。塔拉索夫同志^②已于8月19日离开远东局返回欧洲。他在远东局的位置由曼达良同志接替，后者是8月中旬来到这里的，现已参加远东局的工作。

三个月来的工作实践表明，远东局身边必需有一批负责的工作人员来帮助它建立某些工作部门和进行重大问题的准备工作。根据远东局的决定，已经成立了研究农民问题的委员会，我们专门选出非常熟悉印度土地问题的鲍里斯同志^③参加该委员会，另

①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四届三中全会。

② J. H. 格列尔。

③ B. C. 塞格尔（弗雷耶尔）。

外还有几位中国同志参加。陈同志答应亲自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搜集和综合北京和广州现有的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的资料（这里在鲍同志^①的机关里也有农民委员会，有大量广东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打算同中共中央一起研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中的政治派别。为了为中央和远东局服务，我们还成立了中译俄和俄译中的专门翻译局，在该局帮助下，我们可以了解这里有的宝贵资料。在安排鼓动宣传工作方面也需要大力的帮助。我们还要监督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中后来还发现，需要频繁地出差，需要有大量的开支用在建立电讯联系方面。

中央全会的总结。在反动派统治地带与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的高涨地区的交界处中央召开了扩大全会，这次会议由于确立了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而首先是在国民党问题上的方针而起了巨大作用，在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的高潮时国民党将起决定性作用。

陈同志在远东局7月22日会议上所作的报告^②阐述了全会决议的政治意义，报告涉及到全会议程上的所有问题。现附上这个报告和全会的主要决议^③，在评价这些决议时应当考虑到，决议是在7月初南方部队取得胜利以前通过的，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高潮的征兆。

广州之行。远东局三名成员参加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工作对远东局今后的整个工作将具有很大意义。这次广州之行正遇上北伐取得胜利的时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国民党内的各种复杂关系，也向我们揭示了前线和广东的一些关系中所蕴含的各种危险，有助于我们亲身体会广州同志的方针的错误。随着今后事态的发展还可能出现的各种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

① M. M. 鲍罗廷。

② 报告记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926年7月21日。

③ 决议没有公布。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63—264页。

内和广东省内的各种关系将具有重大意义。远东局三名成员在当地了解这些关系大大有利于今后对中共工作的指导。远东局已向
我们彻底提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发展问题，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关系问题，从而为在中共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决这些问题准备了材料。除详细的报告^①外，我们还掌握一些材料，等他们从广州回来后再送往莫斯科……^②

青年问题。筹备国际青年节的问题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同志提交远东局讨论的。在同日本没有联系而朝鲜党正遭受大规模镇压的时候，这个问题只能对中国提出。开展宣传运动的计划和口号已经制定，并已送交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这里随报告附上。

他们在广州逗留期间，对共青团和对国民党以及儿童运动的青年工作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当从广州寄来留在那里的资料时，将对所有这一切作出专门的详细报告。

所谓“青年国民党”问题至今我们远东局还没有讨论。在广东的调查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远东局的上次会议决定，这个问题将在同志们从汉口和长沙回来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加以讨论。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远东局面临着在农村青年中进行工作的方式问题。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同志们的建议，决定：

(1) 农村青年的整个工作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吸收青年积极参加农会的工作，协助扩大和加强农会。

(2) 农会不应当只限于成立和扩大青年部，而应当竭力以文化体育小组的形式把青年聚集在农会周围。青年部的任务是从组织上掌握和加强这些青年小组。

关于工会工作。迄今为止，上海和广州是职工运动广泛发展的仅有的两个中心。关于广州的职工运动，我们已在关于广东的

① 见第94号文件。

②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工作的部分。

总结报告^①中较详细地谈到了。

广州的同志认为统一职工运动的过程在那里基本上已经结束，但在运动内部的组织性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②。我们认为，即使统一工作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近来，围绕日本企业里纺纱工人大罢工^③暴露出上海职工运动的不正常现象。这次罢工是在几位中央委员不在上海、陈同志生病和我们去广州的时候由上海工会理事会发起的。这里犯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错误。罢工运动提出的经济要求与上海工人总的状况不相协调，因为日本企业的条件要比其他企业好，而在工业中已经出现萧条景象。工人们的情绪也不是很积极，罢工运动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抗议在日本商船上杀害一名中国人^④——这也是不合时宜的。结果罢工以工人失败而告终。

近来，可以指望在新的地区，特别是在汉口，职工运动有所发展。党打算在最近认真做好组织工作，恢复铁路工会的活动，在开滦煤矿的矿工中成立工会组织。

但是在职工运动缓慢发展的同时，党和我们远东局必须对工会的整个内部工作、工会的组织架构、罢工的策略等等进行认真的检查^⑤。

最近工作计划。在俄国代表团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我们拟定了远东局近几个月的工作计划：（1）通过党代会筹备工作，集中精力加强对中共的总的政治领导，了解和帮助加强中央的整个机构；（2）认为有必要不晚于1月召开中共代表大会，向中央提出起草议程上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提纲问题；（3）加强对中央文献工

① 见第94号文件。

② 下面一句话是手写的。

③ 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文版第286—294页。

④ 指的是在日本商船“万里丸”上杀害中国商人陈阿堂的事件。1926年12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给其家属支付了赔偿金。

⑤ 以下删去关于日本职工运动的片断。

作的帮助，协助在报刊上提出国际运动的问题，推动农民委员会和资产阶级研究委员会的工作；（4）检查党的组织网和安排整个组织工作；（5）研究上海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6）认真进行中共的工会、妇女和青年工作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对朝鲜党**，要准备成立朝鲜国民党的问题。**对日本**，要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并取得报告。

主席 维经斯基

秘书 拉菲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8，第 12—16、19—2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0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 录）

1926 年 9 月 23 日于索契

……（8）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的。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充当新的事态发展条件下的领导人，因为他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独立地理解这些事态，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

国的莫斯科……^①

好，紧握您的手。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书信（1925—1936）》

莫斯科1995年版第94—95页。

108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②

1926年9月23日于上海

绝密

共5份：

1份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份送彼得罗夫同志^③

1份送洛佐夫斯基同志

1份存档

① 此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信的副本于10月15日送交И. В. 斯大林、И. И. 布哈林、Г. В. 契切林、П. Е. 季诺维也夫、В. В. 罗米纳兹、С. И. 洛津斯基、И. С. 温施利赫特、М. А. 特里利塞尔、Л. З. 曼努伊尔斯基。

③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抄送彼得罗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几天前我们刚从广州回来，在那里呆了5个星期。现寄上关于那里的情况的详细报告^①。

根据我们从广州和从这里发给你们的电报，你们可以判断出我们和中央对当前政治事态所采取的方针。遗憾的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发来一份批示或指示，指明我们的工作是否正确。我们收到了最高领导机构的简要通报，并认为这些通报完全符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问题只在于，根据这些指示，在经费有限和中国工作人员匮乏的情况下，我们的整个工作究竟能够开展到何种程度。运动在日甚一日地扩大，波及到越来越多的、必须和可以进行工作的地区，但是党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开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经费。

关于总的政治形势，我现在没有多少可说的，因为你们毫无疑问可以从各种合法的来源得到各种情报，很难再补充什么。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是北伐今后的命运问题。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自中国革命以来，南方和长江流域一带最早处于国民党的影响之下。这种影响虽然在业已占领的各省是相对的和不平衡的，但是它现在却把中国分成了国民的和反革命的两个方面。目前在中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存在着按革命的南方和反动的北方两个方面进行区分的分水岭。整个政治生活，各阶层社会人士的同情都非常迅速地按这条水分岭区分和形成。帝国主义

① 见第94、95号文件。

报刊关于赤祸的蛊惑宣传可以说已经成为过去，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情南方人。只有沿海省份的部分亲英资产阶级，在阻止蒋介石进攻的口号下羞答答地反对南方。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发表和平声明和进行和平请愿，客观上在帮助南方，因为它动员社会舆论反对孙传芳和奉天人的备战行动。

帝国主义列强，除英国外，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就是在万县事件^①后，英国人也不能再向其他帝国主义者证明南方部队向北进军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从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归来的美国和日本记者不能不反映居民倾向于南方人的总的情绪和称赞新的政权。美国人的中央机关报^②《密勒斯评论报》明确地说，南方人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中国军队第一次向前推进时，有着明确的国民纲领。但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人现在急于向中国的国民运动表明，美国的中立能有多大限度。日前去马尼拉的美国驻华大使麦克米伦在这里发表谈话称，他的政府和人民同情中国的国民愿望，并认为谈论取消治外法权和其他不平等条约还为时过早^③。

日本人现在和去年秋天一样，对中国政治事态的参与或许是最积极的。但是这种积极性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的军事计谋方面，而缺乏对中国解放运动的广泛而富有远见的计划。日本人是否会建议张作霖同南方人达成某种协议，或者他们会唆使他去直接帮助孙传芳反对南方，至今还是一个疑问。看来，他们期待从北伐参加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来为自己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英国人虽然看来现在并不指望能够进行武装干涉，即便是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进行局部的武装干涉，但是他们在竭力创造这种可能性。他们对南方军队和外国人之间发生的微小冲突事件

① 指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城的事件。

② 原文如此——译者。

③ 指1926年9月15日麦克米伦在上海美国俱乐部的谈话。

都公开表示喜悦，每一次都公开强调自己关于外国人必须干预中国事务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趣的是，当地的帝国主义报纸对苏联没有采取像去年国民军逼近北京时所采取的那种蛮横的腔调。今天英国半官方报纸《字林西报》^①的社论在谈到蒋介石命令外国舰船撤离汉口以避免发生误会时说，他这样做是违背苏联顾问的指示的，因为苏联顾问懂得南方军队不应反对外国人。在另一个地方和在另一号上，这家报纸的记者从长江流域的一些城市报道说，值得群众欢迎的南方军队的行为是俄国指导的结果。

尽管居民对在国民党旗帜下凯歌行进的南方军队抱欢迎的态度，也尽管英国人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武装干涉者意愿行事，但是，由于其他帝国主义者持观望态度，南方的军事胜利还令人十分担忧。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和从政治上巩固这些成果。而这一点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做到：首先，如果南方盟军之间的关系不会发展到对抗的地步，否则将削弱对北方的抗击能力；其次，如果能够使蒋介石回到国民党左派一边来，迫使他放弃对国民党实行军事独裁的思想。另一个危险就是唐生智的崛起和保定派^②的加强。

我们党和国民党中央左派的政策完全是在解决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实行的。

不言而喻，现在在南方部队占领的地区，我们党和国民党应当利用前所未有的机会，尽最大努力来动员群众，以便给北伐奠定民主的基础。

今天我应蒋介石的邀请去汉口。去那里的还有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另外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③。除了我将单

^① 《字林西报》是1864--1941年、1945-1951年在上海出版的日报。

^② 见本书第370页注^③。

^③ 分别为：T. F. 曼达良、H. A. 福京和张国焘。

独同蒋介石根据上次发给你们的电报^①的精神进行谈判外，我们大家还将从事各群众团体方面的工作。

汉口区委已得到一定的充实，从北方调入一些工作人员，还要从这里再充实一部分力量。最近我们打算召开湖北和湖南两省的农民大会，然后到明春再准备召开全国的农民大会。对工人也必须进行同样的工作。对于我们党和国民党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反对南方军队而是同南方军队一起为成立省的民主政权而斗争。在这些省里，开展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竭尽全力把农民组织起来，无论如何要把农村的运动与革命中心城市联系起来。

很可能我还得从汉口到长沙去，那样一来我只有过三周后才能回上海。

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谈好召开党代会的日期，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必须不晚于1月就召开。鉴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讨论极其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和策略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莫斯科同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党中央代表和同远东局的我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现在谈几个具体问题：

1. 我们已发了几份电报，说明让中央委员蔡和森同志紧急到这里来的必要性。我在莫斯科期间，我们远东书记处曾作出决定，让他留在苏联两个月。这个期限到7月已经结束，然而他还留在莫斯科。当然，他会给你们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我要在这里断然声明，他继续不在会给这里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员而喘不过气来，特别是现在，因此我曾几次正式要求你们让蔡同志回来。我们认为远东书记处这样对待中央的合理而确实切合实际的要求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坚持要求让他立即回来。

此外，我们曾根据中央的建议请求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

^① 电报没有找到。

学和中山大学那里再派几个人来。我们也没有接到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答复。我们很清楚，不应打乱学习课程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首先考虑党的需要。现在，由于南方人占领了新的地区，我们这里有了开展工作的新的巨大可能性。因此，还需要一些工作人员。在莫斯科的一些同志结业之前，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一边或削减我们的工作，这是荒谬的。现在可以做的事，也许在局势稳定下来的时候就不能做了。因此我们坚持要求派工作人员来，关于此事已经发过几次电报了。

2. 拨给远东局的经费已经用完。我们曾发电报给你们，但没有接到答复。必须立即寄来经费，因为否则就无法继续工作。此外，必须增加我们的预算，至少每月增加500卢布，因为现在出差的次数比我们过去预计的要多。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3. 中共中央请求每月再追加3000卢布，因为工作增加了，这是第一；第二，过去拨给列·加^①的补助款现在已经停发。

4. 在朝鲜，尽管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我们还在进行工作，但根本没有经费。今年（10月）必须把朝鲜列入预算，每月不少于600卢布。

5. 关于法国人^②。你们没有答复我们的电报，而他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工作，我们得从我们的经费中为他支付费用，虽然我们并没有这笔款项。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的预算加上他的薪水，那他只好走人。

这都是钱的问题，请尽快作出答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① J. M. 加拉罕。

② 让·杜克鲁。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80, 第 60—66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09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

1926年9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谭平山同志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谭平山：我的报告只涉及中国最近的一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军第一军从7月到目前的情况。国民军第一军撤离北京去守卫南口山区关隘之后，吴佩孚的军队已经瓦解，张作霖在等待时机准备发动攻势，而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安徽这些非常富饶的地区，孙传芳将军宣布中立。吴佩孚处境十分艰难，他同张作霖达成妥协。结果是张作霖强攻南口，终于占领了这个城镇。这时孙传芳已不再保持中立。

在南方，我们有广州军队，它们已占领吴佩孚的堡垒——汉口。这一胜利自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可能会加速华北的转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为现在吴佩孚和张作霖又一次联合起来了，而英国、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会来支持吴佩孚。控制着中国最富饶地区但没有强大军队的孙传芳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军事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我们打算让他保持中立，不给广州军队造成大的困难。广州军队为

广东省进行讨伐所造成的困难可以归纳如下：

(1) 由于进行这场战争，增加了农民的赋税；国内债券也分配得不当，农民因此被搜刮殆尽，这引起了反感情绪，特别是在广东省东部，来自那里的报道说，农民中发生了骚动。

(2) 我们知道，香港政府——在香港是自治政府——只是在等待时机向广州发动进攻，而目前的形势可能给它提供这种机会。

(3) 在宣传上有很多夸大的地方，以致人民大众以为，广州军队的讨伐是解放他们的唯一手段。

(4) 至于广州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我们知道，他领导着国民党的中派。现在他想趁机把广州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5) 蒋介石将军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完全取代^①和部分限制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例如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这引起了人民大众对广州军队的反感。

现在来谈一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党应该做什么工作呢？

(1) 应当完全弄清这次讨伐的意义。我们应当承认，广州政府还没有可能，也没有力量靠这种军事讨伐来统一全中国。广州政府进行的是防御斗争，因为吴佩孚打算进攻湖南省。

(2) 由于这场战争的重负尤其要落在农民身上，我们应该为使战争负担不是由少地农民来承担而是由富裕商人来承担而斗争。

(3) 我们应该争取废除对民主自由的限制。

(4) 为了使孙传芳保持中立，我们将重新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

(5) 首先我们应该竭力使农民、工人、商人和学生联合起来，以便使这个联盟今后能够成为国民会议。

^① 原文如此，显然应为：完全取消或部分限制。

(6) 广州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省。

我们的任务在于，在广州军队所到之处提出具体的纲领，使人民大众了解广州人想干什么，以便摧毁想通过武装斗争来统一中国的老国民党的传统思想残余。

现在，广州军队已经占领汉口，我们党应当要求停止军事行动。我们应当让广州人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完成政治性任务上。我们知道，当广州军队向北推进到长江沿岸时，它们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特别是湖南农民的支持，还有工人的支持。甚至上海的商人也声称，他们希望和平，不希望再付出过多的税款。这种情况改善了广州军队的处境。但另一方面，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妥协，并由此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它现在在积极地进行反对广州军队的鼓动宣传。如果我们现在停止军事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的这些阴谋活动。与此同时，英国、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十分卖力地支持吴佩孚，从而也延缓了进攻。特别重要的是，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大。我们知道，广州政府在两广拥有士兵不过7万，如果加上唐生智的湖南军队，总共也不超过11万人。由此可见，如果广州人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遭到失败。

在政治方面，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应当以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艰难处境为基础；至于土地问题，在纲领中必须更加明确地作出阐述。

现在来谈一谈国民党。它在改组后大大地加强了。根据今年1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它现在拥有24万多名党员，几乎在各省都有党的组织。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组织是很不稳固的，代表大会上提到的数字也是有些夸大的。在“三二〇事件”期间，国民党在群众中丧失了领导作用。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总司令蒋介石想成为独裁者。在事件发生前，国民党内有两个主要派别即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

的中派在争斗。左派依靠的是反帝力量，即所谓民主人士，而中派依靠的是帝国主义在广州的影响^①、一批大商人和还存在的广州军事首脑的拥护者所坚持的老传统。“三二〇事件”是国民党中派和右派一起排演的。这次事件发生后，左派力量异乎寻常地增长了，但是由于左派领袖逃离广州，左派没有了领导人，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就投向中派和右派。为了使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不致四分五裂，我们党作出了某些让步，同国民党中派实行了妥协。右派领袖指责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由于我们同中派实行了妥协，这个说法就失去了意义。现在国民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大致是这样：我们知道，国民党可以称作政党，但作为政党它是很不稳固的，因为党内有各阶级的代表。我们可以说出代表党内不同派别的人物。

左派团结得不够紧密，特别是在汪精卫出走以后，在党内失去了自己的影响。

右派不仅在广东省，而且在广东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在广州和上海，都有影响。在右派领袖，如孙科、伍朝枢、吴铁城等，部分被逮捕，部分被驱逐以后，右派的力量确实遭到了破坏，但它仍在蒋介石的旗帜下悄悄地活动。

中派领袖蒋介石实际上是广州政府中的独裁者。全部政治和军事权力以及整个党都掌握在他手里。但是由于他想一人独揽党政领导大权，所以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和军队都反对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直接由他指挥，但其他军（从第二军到第八军）则与他敌对。左派对他不满，而右派同他也不完全一致，因为他在“三二〇事件”后在群众情绪的压力下驱逐和逮捕了部分右派领袖。但是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还在同他一起工作，当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黄埔军校是由他领导的，但左派学生反对他，何况共产党在年轻军官中享有很大影响。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的策略是，重新

① 原文如此。

巩固和加强左派，争取蒋介石向左转。因此，我们也同他达成了妥协。3月20日以后发生了以下一些重大事件：蒋介石不得不反对右派并逮捕其领袖；由于我们的宣传，左派开始同蒋介石一起工作。在广州军队向北进军以前，蒋介石发表一个宣言^①，论述了限制民主自由的理由。然而，由于我们的政策，我们争取到只是部分地贯彻这个宣言。

现在来谈一谈我们党和国民党两党中央的联席会议。我们早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就向国民党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并同左派领袖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只是在“三二〇事件”后才得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支持这一建议。5月15日会议^②的结果是：一旦两党发生冲突，由中央联席会议来加以消除。我们以前给自己提出了更大的目标；我们想利用这次全会来讨论和仔细研究国民革命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但国民党反对这样做。

现在来谈一谈国民党改组问题。当我们帮助国民党使它的纲领接近我们党的纲领时，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结果是国民党老党员反对这个纲领，因为他们仇视任何纪律。因此，国民党不可能成为我们想看到的那样的广大民众的党。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敌视军阀，但他们害怕国民党的激进纲领。在我们党的扩大代表大会^③之后，我们决定争取使国民党变成像英国工党那样的群众性的国民革命党（其实它应该成为这样的党），以便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组织和俱乐部都能加入该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才会真正成为劳动群众的党，把所有具有反帝情绪的人士都吸收进来。我们可以以这种共同纲领为基础，在国民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既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牺牲工人组织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大注意并竭力防止国民党分裂成共

① 可能是指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北伐军总司令就职典礼上的声明。
② 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③ 指中共四届三中全会。

产主义派和反共主义派。

至于农民问题，党已经提交了详细的书面报告⁽¹⁾。我只扼要地谈一谈最重要的几点：

(1) 组织问题。关于是否需要在除了联合所有农民阶层的农民组织之外再成立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的问题，党还没有解决。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对农会的领导权，但是党太小，有许多农民组织是在反对地主、土匪和政府军的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党还不能完成在这些农民组织中的主要工作。

(2) 地主问题。赋税的分担现在大致是这样：农民承担全部赋税十分之四五，地主承担十分之五六。我们的任务是确定赋税的最高限额。

(3) 维护农民权利的问题。在广州政府时期，加入农民组织的有80多万农民。他们在两年间，支持政府，反对压迫者，也就是反对卖身求荣的官吏、反对军队的舞弊行为、反对地主和土匪，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无力自卫。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制定和提出维护农民权利的要求。

(4) 农民在广州政府的势力范围内参与地方政权的工作。我们已经说过，地方上的政权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里。现在我们打算提出给予贫穷的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少地的农民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权利的口号，以巩固国家政权在地方上的基础。

(5) 联合农村中受压迫的人。在中国，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农村都受着土匪和政府军队的压迫。农民现在联合得还很不够。我们现在想把农村的革命分子，即少地的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学生联合起来，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组成广泛的无党派的联合组织。这一措施是实现国民会议口号的具体政策的一部分。

(1) 报告没有找到。

（6）武装农民以便于自卫。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受到压迫，而且受到土匪和士兵等等的攻击，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武装起来以便于自卫。

（7）广东省。广东省的民主派近三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有80多万农民组织起来了，并成立了很好的和很巩固的工人组织和工会。甚至在商人当中也发生了分化，小商人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团体在广东省起着主要作用，而有着左倾倾向的军队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广州的独裁者蒋介石将军有些害怕这个民主派。整个广州政府属于党的中派。另一方面，反革命分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香港政府。后者先利用叛徒陈炯明，后又利用买办势力——大地主和农村资产阶级，向广州发动进攻。此外，地方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右派手里。地方当局始终同富裕农民勾结一起，压迫贫农。所谓的广东省民团实际上不是什么人民的武装，而是富裕农民的武装。它是一支相当危险的力量。

面对整个这些情况，我们的政策可归结为：

（1）结束香港大罢工。罢工是去年6月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香港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反对广州。目前香港的形势是这样：外来的工贼完成十分之七的工作。因此，香港政府并不特别受罢工之害。但是我们抵制英货和封锁香港，迫使货船停留在广州的这些做法是对香港政府的重大打击，它迟早不得不开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虽然目前它还拒绝这样做。抵制英货的规模很广泛，在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在进行抵制。当我们占领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时，我们立即进行了抵制英货的宣传。

（2）促使被压迫群众如农民、工人等参与政府工作。我们打算通过这种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右派，因为香港^①的政权掌握在他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广东。

们手里。

(3)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事件之后，也就是在去年五卅事件之后，党发展很快。据提供给今年7月党的扩大会议^①的材料说，党员人数已达12000人，其社会成分是：工人占60%，农民占10%，士兵占10%，其余20%党员是各阶级人士。

至于党的成绩和错误，可以说：

(1) 党的政治领导有所改善。党在每个事件中都实行了切合实际的政治方针。

(2) 党员很有纪律。

(3) 在出现任何运动时，无论是政治性运动还是经济性运动，党都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事态变换很快，以致党跟不上事态发展。中央始终觉得自己太软弱。现在，党想把自己的所有积极力量尽可能集中在中央委员会。

(4) 党不仅已成为群众性的党，而且也已成为“行动的党”，但是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领导上。党应该竭尽全力来改善党的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在这方面它请求共产国际给以支持。为此它请求派富有政治素养的同志到中国来。

(5) 工农组织在最近一个时期发展很快。党的任务是扩大和加强这些组织。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是很革命的，因为资产阶级承认有必要进行国民革命。在去年的五卅事件中，无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党起了领导作用，但资产阶级不想容忍这一点。我们应当竭力加强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即具体地说，应当竭力吸引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跟着我们走。其次，我们应当设法巩固各阶级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首先是着手把农民、工人、

^① 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

小商人和学生组织和联合起来。

过去我们党，特别是在广州，在政治方面没有独立地采取过行动，而只是通过国民党采取行动。现在我们应当向群众表明自己的真实面目。在广州政府执政情况下，我们将拥有合法的条件来这样做。群众应当了解我们。

我们应当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左派缺乏基本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帮助它建立这样的基础。此外，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中派向左转；我们同右派作斗争将不像以往那样，而是采用新的方式，尽可能地同左派一起来进行，使右派无法利用其反共口号。为了能够巩固左派，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的，国民党应当成为真正的广大群众的党，并在统一的纲领基础上进行斗争。

中央还提出三个还不大明确但中央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1）党是否应当参与成立革命政府？

（2）工农是否应当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国民党内为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所谓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斗争，但是我们做的工作太少。很可能在广州将建立军事独裁，所以弄清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是否应当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3）关于武装工农的问题。为了保卫政权我们必须有武装力量。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武装工农。

在这三个问题上，中共中央还没有通过决议。

此外，党提出两点建议：

（1）关于农民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因为首先，国民党在广州给了我们进行这种工作的各种机会，其次，这样做使我们更容易解决财政问题。但是这样做工作从农民只了解政策的力量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角度来说是有害的。现在，领导国民党的已不是左派，领导权掌握在中派手里，掌握着地方权力的右派则可以利用有利的借口来破

坏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因此，我们想独立地继续进行工作，但这里出现一个经费问题，党无力独立地加以解决。有鉴于此，党请求共产国际给予帮助。

(2) 由于东方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党建议给予它向远东局选派第二位代表的权力。党的意见是一名代表太少，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情况不够。因此党请求增加自己的代表名额。

最后我要指出，我举出了许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这并不那么危险，因为中国居民中的下层阶级正在迅速发展，而国际帝国主义不可能在东方采取友好的行动。另一方面，中国军阀军队日甚一日地在分化瓦解，因此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有利。中国党面临着一些重大任务，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我希望听到与会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认真的批评意见。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8，第 354—356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10

福京给某些人的书信

（摘 录）

1926年9月25日、11月4日、12月18日于上海

书信摘录^①

1926年9月25日

……^②其余人（香港罢工者），即受到一定政治训练和赤卫队训练的几千人的一组大概可以调到北方去和调入军队（顺便说一下，迄今为止，军队、政权机关、党组织以至工会组织都感到缺少普普通通的人和普通的工人工作人员；而且这种看法适用于全国）。

1926年11月4日

……前线的形势暂时没有什么变化。占领上海的尝试没有成功，部分原因是转到革命方面的军事力量薄弱，部分原因是当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和不坚定。

然而，尽管北伐的直接目标——将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还没有达到，但它已经给国民革命运动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力量重组。

^① 标题是文件中原有的。

^② 此处和以下各处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北伐前，在全国出现了反动浪潮，在广东发生了“三二〇事件”。“三二〇”政变意味着与民族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的军人集团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共产党）以及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结盟的国民党左派）。由于无产阶级的软弱、我们同志的错误和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态度，这次政变得逞了，在广东揭开了一个反动的时期。早在一个月前寄给莫斯科的远东局关于广州之行的报告相当详细地谈到了这次反动浪潮^①。农会曾受到农村法西斯分子（民团、有组织的豪绅和地主）的欺压，在维护国内和平的借口下，政府实施了强制性仲裁，禁止罢工，等等。诚然，反动派的进攻还没有广泛展开，但它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

北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它对力量对比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有一些新的军事集团，以及大量与城乡有产阶级（豪绅、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只是由于个人利益而同革命军走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和国民革命运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军阀本身就是资本家，例如，现时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实际统治者唐生智就有自己的企业和大量的银行存款（据说是国外银行存款）。这种情况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右派。

（2）中国资产阶级转向国民党。在全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欢迎北伐和蒋介石这位国民领袖，即使在北方也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转向国民党的现象。在已经占领的地区以及在孙传芳还统治着的上海，工商界人士（除最反动的分子外）都对国民革命军表示同情。

在这方面，日前我们听到一则消息具有特殊意义，（遗憾的是尚未得到证实），这则消息说，领导着全国右派的上海国民党右派，决定解散自己的组织并合并到国民党里来。所有已被开除出党的

^① 见第93号文件。

国民党右派都支持北伐。

（3）北伐增大了军事因素的意义，这个因素其实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因素。

（4）国民党的基础（特别是它的上层领导和实际力量——军队）靠吸收资产阶级人士和资产阶级官吏的扩大，在党内造成一种新的倾向，即与帝国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军阀统治实行妥协和达成协议的倾向。我在汉口逗留期间曾听到关于同日本人谈判的情况和看到国民党专员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谈话：他们只字不提苏联，只呼吁那些据说理解中国的需要并愿意帮助中国的外国人充当国民政府的导师。国民党和美国人在汉口有一家共同创办的英文报纸^①，这个情况就说明，美国很积极，也不反对利用向它的求助。诚然，这一倾向目前还不大，但是它存在，它反映了准备以妥协为代价同帝国主义（如果说不是同英帝国主义，那就是同日本帝国主义或者美帝国主义）言和的资产阶级的愿望，（有意思的是，这些谈话是由被认为是左派的国民党人士发表的）。

（5）除了这些加强了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的变化以外，北伐还带来其他一些在客观上削弱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扩大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回旋余地的变化。军事领袖们之间、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以及其他小军阀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以致他们都不得不寻求同盟者，试图把工农组织以及共产党拉到自己方面。遗憾的是，军阀之间的摩擦非常之大，以致能够影响北伐的命运。如果蒋介石在江西被打败，革命军退回广东，那么罪过完全在唐生智身上，因为他有意不帮助蒋介石在前线取胜。

（6）**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整个地区，工会和农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越来越多的阶层纷纷起来，加入到社会运动中来。北伐在这方面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

^① 指《汉口先驱报》，自1923年起在汉口出版。

(7) 共产党正在发展壮大，一方面是由于群众运动在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国民党内部，对各派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它有可能巩固工农运动的成果。

(8) 北伐的结果是所谓“三二〇事件”的消除。以半年前被蒋介石赶下台的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握政权（这个消息稍后发现是不实的）。

(9) 无论是共产党的发展，“三二〇事件”的消除，还是工农运动的发展，都是由于有北伐期间的停战和我们取得的喘息时机才成为可能。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或者像人们所称呼的“新右派”）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不得不容忍群众运动的自由发展。其次，在北伐过程中，他们深信共产党是凝聚军队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们必须暂时放弃对共产党人的诽谤，而同他们合作。最后，敌对派别之间的摩擦有利于汪精卫即左派重新掌权（很说明问题的是唐生智拥护汪精卫回来，因为这样可以削弱蒋介石的影响）。

(10) 无论是资产阶级派，也无论是国民党的极左共产主义派，还是国民革命运动都通过北伐得到了发展和加强。而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却削弱了。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在湖北和湖南，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脱离国民阵线的某种危险。当其余的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还有工人阶级以至农民都从南方的军事胜利中得到一定的好处，即政治上的好处和部分经济上的好处时，战争却使城市小资产阶级破产了，后者正在受到赋税重负、纸币贬值等等的剥夺。根据目前的征兆，说湖南的唐生智无视国民党，湖南的资产阶级愿意同共产党直接结盟，说这些都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并意味着他们试图抛弃小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同它隔离开来，引导无产阶级走上阶级合作的道路，还为时过早。但毋庸置疑，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受到削弱这已成事实。

由此看来，北伐在削弱中派（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加强了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两个极端的派别。同时城乡阶级矛盾过去和现

在都增长了。这些矛盾也部分地反映在国民阵线的内部，但是只要军事行动没有结束，停战状态还存在，似乎对统一战线就没有什么威胁。全部问题在于，这种停战状态能维持多久，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能否同资产阶级保持统一。

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和在什么条件下这种统一能够和应当得以保持，谁是和应当是国民联盟的领导者，换句话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西方和在俄国（有时也在这里）我们的同志常常谈到和写到无产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如果从中国无产阶级是殖民地革命的倡导者、突击队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那么这是正确的，但决不应当说，它是领导国民革命，给它指引方向的力量。与此同时，毫无疑问，3月20日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了领导国民运动的尝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领导者。虽然还不能肯定地说，它目前就是领导者，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国民革命的最近一个阶段将在**两个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度过。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正式回来掌权决不能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新的力量对比已经形成，它与旧的根本不同，旧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这种力量对比中产生了两种危险：（1）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这可能由于资产阶级的向右转（与帝国主义妥协）或农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2）为了维护这个民族统一战线，放弃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根本利益。防止第一种危险的保障是加强同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并使它（还有基本上反映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学生）活跃起来；发展工农运动和加强我们的基础，善于巧妙地对待各种资产阶级集团；防止第二种危险的保障是党的独立而明确的工农政策。关于第一种危险我不再说了，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特别是在从这里寄出的材料中已经写得很多了。目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第二种危险还说得比较少，也鲜为人知，所以我较详细地谈一谈。

关于党的农民政策再说几句。这里有点不够明确：我们在湖南和湖北两地的同志人为地在抑制农民运动，降低农民的要求并常常成为农民革命发动的消防队，而中央全会^①的决议表示反对提“打倒地主”的口号，以维护农村的反对军阀反对“坏”地主而同“好”地主结盟的统一战线，这给党的农村工作人员队伍里带来了某种惊慌失措并造成了这些错误。现在中央正在纠正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

第二种危险存在于工人运动中，也部分地存在于我们党的工人政策中。

……在中央迄今为止尚未制定的工人行动纲领中必须包含工人阶级的以下政治要求：对反革命分子的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保证结社和签订集体契约的自由，实行社会立法等，以及武装工人，等等。还应该谈到工农联盟，谈到加强县城工会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会是团结农民的纽带，谈到对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产阶级等的态度……^②

1926年12月18日

近来总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广州军队占领浙江、吴佩孚手下三员大将（魏、田和靳）^③比较明显地转向广州方面，并与奉天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无力“讨伐”张作霖等等情况造成的。

尽管形成了这种对南方有利的形势，但由于一些内部原因南方军队要继续向北挺进并占领上海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内部原因是：一部分广东军团疲惫不堪，夏季服装短缺，力量损失和消

^① 指中共中央四届三中全会。

^② 以下删去12月17日信中的几段文字，因为它们同12月18日信中的内容基本上一样。

^③ 看来是指魏益三、田维勤和靳云鄂将军。

耗不成比例，而转到广州方面的另一部分军团——唐、刘、贺、李军团^①则员额膨胀，士气不高。光是江西一次战役，广州死伤就达15000人。关于北伐内幕和国民军内部的实际状况，下次信里再谈。现在只是在收集材料)。

广州军队向上海推进也不大可能。上海这里的内部力量可能在“上海自治”口号下实行变革，这是几天的问题。

在上海，形势有些缓和。总工会已开门办公(虽然目前对它进行了一次无谓的袭击)。近日内将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口号是“上海自治”。

政治生活的中心已转到汉口，现在那里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已迁至那里，新任英国大使、日本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也抵达那里，以便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格里高里^②和鲍罗廷也在那里。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我请求给我以明确答复的一些问题，不知你们和莫斯科权威机关对以下事实持何种态度：

(1) 邓演达——国民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左派)曾向蓝普森(新任英国大使)声明，南方政府将承担责任来**切实停止工潮**，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维护和平和良好秩序。蓝普森先生对此声明表示**满意**。

(2) 在新会(广东)，广州政府禁止工人、农民和商人举行反对英国人和抵制英货的示威游行。

(3) 香港报刊在讨论承认国民政府是模范政府的问题时，要求作为承认的代价是**镇压工人运动**。

被工人运动的活跃吓破了胆的国民党领导人准备作出让步。广州的共产党人采取缓和的方针，为此提出积极开展**仲裁委员会**工作的问题，把仲裁委员会视为防止工人和国民政府之间发生冲

^① 原文如此，可能分别指：由唐生智、刘佐龙、贺耀祖(或何健)、李宗仁指挥的军。

^② Г. Н. 维经斯基。

突的一种手段。

(4) 广州政府**通过仲裁委员会**命令英国和其他外国银行的职工复工。

(5) 最近一段时期里，从广州传出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说受到国民党中央（甚至国民党左派甘乃光）支持的反动派正在被动员起来反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组织。

事实是：

(1) 成立了左派的秘密组织，旨在对抗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此决定“不与右派进行斗争，而是利用他们”。

(2) 撤销了国民党的广州市党部，怀疑它同共产党人有联系，任命了以李济深和甘乃光为首的新党部。

(3) 解除了广州市公安局局长^①的职务，因为他不采取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

(4) 共产党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5) 下达了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命令，禁止进行纠察活动，禁止在重要的公共企业中举行罢工，禁止同工贼行为作斗争，成立了强制性的仲裁法庭。

(6) 12月15日上海的中文报纸报道说，李济深将军用武力解散了工会的代表委员会即我们的工会联合会（如果这个消息还不属实，那么我想明天是会这样做的）。

(7) 左派和政府贯彻25%的减租法持消极怠工态度。

(8) 甘乃光写文章要求工人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全民的利益。

国民党和政府的政策向右转是什么原因呢？已有两三周了，香港报纸不断报道说，广州政府决定结束工潮。早在11月30日，我党中央就收到来自广州的报道说，海员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和罢工委员会主席^②，与其他同志一起被捕，罪

^① 李章达。

^② 苏兆征。

名是纵火焚烧罢工委员会的驻所以掩盖财政上的舞弊行为。后查明，原来这是香港方面制造的挑拨性谣言，但是局势确实相当紧张，以致我们一开始相信了这个报道。

在政府和工人组织之间早就在军械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今年5月，当军械厂工人举行罢工时，我们的同志为了维护国内和平表示反对，结果军械厂工人离开我们而去。两个月以前，政府决定解雇军械厂所有500名工人，理由是他们不顾工作。我们的同志这一次站出来捍卫军械厂工人，并迫使政府把他们留在工厂里工作，这样又把军械厂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同时也引起了军事官僚的不满。这是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之一。第二个直接原因是12月6日爆发的银行罢工，罢工波及到广州的所有大中中国银行，其中相当一部分与香港有联系。职工们提出13项要求。银行方面认为这些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于是罢工开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政府的收入来源。在12月6日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开会，会上（在既有右派，也有左派参加情况下）决定成立仲裁委员会，要在48小时内结束冲突。政治委员会同时还作出以下5项决定：

1. 禁止工会随意进行逮捕。
2. 严禁在街头进行武装巡逻。
3. 禁止工人封锁工厂（在工厂进行纠察），而雇主不得无故关闭工厂。
4. 禁止工人夺取工厂的部分设备和其他物品。
5. 为了保卫革命和保护公共利益，仲裁委员会的一切决定都应视为是必须执行的，在以下部门，即军事装备生产企业、与财政和货币流通有关的企业、运输业和一切被认为是社会必需的部门发生劳工纠纷时，如有必要，可由政府以武力强制贯彻执行决定。

政府转向反动派方面的第三个原因，依我看是试图在与广州

调情的外国人面前显示自己有能力来维持秩序。更何况汉口当局也表现出同样的意图，诚然它没有如此激烈地反对工人组织。

广州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不能看作是一个插曲。如果说解散广州总工会的事件已经发生，那么这便是“三二〇事件”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的重演，这是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派的公开发动，他们认为这下可以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共产党人和工人组织应当退出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应当用铁钳把他们夹住。一个月来，外国报纸，特别是英国报纸一直在向广州政府暗送秋波，答应承认它，并在广州政府结束工潮的条件下答应作出各种让步。当然这对国民党的某些人士和政府产生了和产生着影响。依我看，这就是为什么在广州已经发生而在汉口正在发生仓促进攻工人组织的行动的原因。能否顺利结束广州事件，它是否会成为分裂的开端，目前还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预兆，说明国民革命运动内部发生新的分裂已为期不远，在最近几个月内中国将出现一个问题，即今后谁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是依靠军阀并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起来领导。

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争取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残酷斗争，面临着同在北伐期间业已巩固和壮大的对手进行较量，这个对手目前正得到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在上海大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正在发生转向广州的过程。

我们是否对这场斗争做好了准备呢？还没有完全做好。主要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和认识清楚提出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主要障碍是：存在一些幻想，幻想由我们来领导国民党，幻想资产阶级没有做好进行斗争的准备，它无力领导整个运动；再者是在我们党的队伍中还存在不少国民党的思想。而我们的俄国同志不去同这些幻想、同投降行为和在各种场合掩盖自己面目的习惯做法作斗争，而是在一方面工农运动正在展开，另一方面资

产阶级准备在小资产阶级地位受到削弱情况下出卖国民革命的时候，制造更大的混乱和怯懦地执行退却方针。在这方面，帝国主义者嗅觉很灵，他们宣称，“国民党这个鬼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可怕，民族主义者准备同外国人实行妥协，因此用不着害怕工潮，一旦局势稳定，政府是会来对付它的。目前它（政府）正在利用工农运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

寄上鲍罗廷在汉口 30 万人集会上发表的讲话^①。

对讲话的准确性不能加以怀疑，因为它用英语讲的，刊登在国民党半官方的报纸^②上，据汉口来的同志们说，是经过校对的。

像鲍罗廷这样的无所不能的银行家的这个讲话（由于命运的戏弄我们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神话和传说，令人可悲的是莫斯科也有这种神话和传说）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说明一个软弱的共产党人会堕落到何等地步，他采取了阻力最小、完全支持国民党的思想即国民党资产阶级派的思想的方针。这个讲话向银行家发出呼吁，对工人进行威胁，是在道义上对广州的卡芬雅克^③——李济深的行为的赞许。

布哈林同志在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④道路时发表的言论和执行的政策，是把赌注押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是收缩工农运动，是让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于中国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鲍罗廷说：“工人骚乱，财政骚乱。啊，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太好了。……我们不允许这样做。”这除了证实布哈林的上述思想以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国民党右派也从来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在我

① 指鲍罗廷于 1926 年 12 月 11 日在汉口群众集会上的讲话，详见 B. H. 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 年）》第 2 册第 223—224 页。

② 见 1926 年 12 月 12 日《汉口先驱报》。

③ 卡芬雅克是法国的反动将军，曾任陆军部长，在 1848 年血腥镇压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他的名字后来成为屠杀工人阶级刽子手的通称——译者。

④ 见第 135 号文件。

看来，这是真正的取消主义。这是把我们党和工会引入迷途的方针。这是在我们需要更明确地采取坚决发展革命的方针的时候给我们的队伍带来混乱和惊慌失措的方针。

李济深在广州通过仲裁委员会（他想用武力来执行该委员会的决定）迫使9家银行（4家英国银行和5家其他外国银行）的职员复工；与此同时，鲍罗廷则在汉口对工人们说：“工人们！继续组织起强大的工会吧，把你们的申诉和要求交给**仲裁委员会**吧，国民政府将注意使公平得到遵守。”

应当让莫斯科来说，它怎样对待鲍罗廷的这种胡说八道，怎样对待由此而产生的整个方针。遗憾的是，鲍罗廷不是孤立的，这尤其需要作出明确说明，我们现在把赌注押在什么地方，如果押在资产阶级革命上，那么现在也就谈不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彼得罗夫的提纲^①，虽然它不理解 and 没有阐明现在在这里发生的过程，虽然它毫不客气地支持国民政府，也能够得到通过，而鲍罗廷主义会被神圣化。但这意味着将采取收缩工农运动的方针，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害的。

莫斯科支持鲍罗廷。莫斯科拒绝接受我们关于解除鲍罗廷职务的声明^②。不久前，莫斯科发来关于“不要发动农村内战”的指示^③。这是不对的。他们说的正是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同志在执行的**任务**。要说的应当是相反。应当弄清楚如何更好地组织这场斗争，以便取得尽可能多的实际成果，使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工人和农民不至于说，“在吴佩孚时期我们还能进行斗争，现在国民政府来了，我们却不能进行斗争”。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这种或那种具

① 指彼得罗夫（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向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提交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

② 见第105、117号文件。

③ 见第120号文件。

体情况下，根据这种力量对比和客观形势采取灵活手段和作出让步，而在于由于鲍罗廷及其同伙的无原则性，我们的力量正在瓦解和涣散，不能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给步步紧逼的反动派以反击。我不知道，全会上是怎样解决中国问题的，但我将反对鲍罗廷及其同伙的主张。

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忠告和答复。如果贝索^①以某种方式在俄国代表团中提出问题，或亲自写文章的话，那将是有好处的。我同意贝索在《共产主义者同路人》11月号上所发表的文章（即其中国部分中的）《国际政策问题》一节的观点，虽然他也对在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时小资产阶级必然脱离的问题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因为小资产阶级对土地改革很感兴趣。

你们的旦科^②

参见附录^③

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94，第 11—21、116—12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B. B. 罗米纳兹。

② И. А. 福京。

③ 文件上附有载有鲍罗廷讲话及其俄译稿的 1926 年 12 月 12 日《汉口先驱报》剪报（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94，第 125—130 页）。

111

拉狄克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6年9月28日于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我在8月31日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第91/C号信^①中曾提请中央注意有必要给我作出指示，说明鉴于在中国因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与中国党之间的斗争而出现的形势，应如何对待学校^②里的学生。由于没有中央的指示，数月来我一直保持沉默。但是由于中国学校里的工作是由教学部分和政治部分组成的，阐明中国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事件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的沉默阻碍了学校的整个工作。共产党学生和国民党学生都向我们提出问题。他们从中国报纸上了解到斗争的全部细节。他们中间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因此，请政治局将这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学校具有意义。我们在这里向学生们讲的东西会传到中国去，可能对蒋介石与我们同志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以下是需要加以阐明的一些问题：

(1) “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产生和我们对它的

① 见第90号文件。

② 指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

态度。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蒋介石现在是受到鲍罗廷正式支持的国民党的官方领袖。反对蒋介石的言行在这里将具有尖锐的政治意义。

(2) 关于国民党在贫苦农民当中做工作的平衡问题。

(3) 关于国民党人要求共产党人不对孙中山主义进行批评的问题。

(4) 关于国民党应否在无产阶级的中间进行工作的问题。

(5) 关于我们如何支持国民党左派的问题。

(6) 关于中共中央全会^①最近发表的宣言中的半孟什维主义论调问题，其中谈到，我们只进行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如果可以把共产党的政策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话，那么所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中的布尔什维主义，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的布尔什维主义。

我认为有必要向政治局提出这些问题，以便得到正式的指示。

同时我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机关，或者说至少是它的一部分，与中国同志一起竭力不派中国共产党人到我们学校来，认为它是国民党的学校。我们曾就此事找到共产国际，瓦西里耶夫同志发了电报^②对这种方针“表示异议”。显然，这里谈的不是表示异议的问题，而是权威机关下达硬性命令给我们派来所需要的共产党员数额问题，因为学校里没有共产党核心，我们就无法改造国民党人。

请政治局召见我而陈。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530，目录 1，卷宗 10，第 87 页及背面。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指中共四届三中全会。

^② 电报没有找到。

1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布留赫尔 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的通报^①

1926年10月7日于上海^②

加伦同志对未来国民政府的看法

孙传芳必定被消灭，此后中国就只剩下两股势力：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动的奉系军阀，另一个是接近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国民政府。这两股势力将相互对立，并迫使人民作出支持谁的选择，而帝国主义要作出同谁进行谈判的选择。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假如除这两股势力以外还有同等的第三股孙传芳势力的话，那就相反，容易混淆革命阵线，因为大商人阶级、高等学校教师等对张作霖反动派不满，但同时又害怕国民政府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会感到困惑并定会投奔孙传芳。

国民政府可以安全地设在武汉（孙就将被打败），但事先应当整顿广东的秩序，迫使它建立一个左派党^③的政权比较巩固的地方政府。有消息说，目前代表贪得无厌的官僚、豪绅和名流的古

①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6年8月至1927年1月间在上海出版的秘密通讯《中央政治通讯》上发表的材料译文。作为该材料基础的原始资料不详，可能是B.K.布留赫尔给中共中央执委会的信。

② 这里是发表的日期。

③ 原文如此，显然这里和下面都是指国民党左派。

应芬已被撵出广东省的国民管理机关，被左派党的陈树人所取代。以后还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国民政府在同各省政府的关系中不应过分集中权力，因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只应选择各省自治政府联邦的形式。现在每省提出两名人选来共同组成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提出各部的负责人。各省的政治管理机关与广东相比自然要更右一些。

既然现在国民政府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那么今后它就应当通过自己的政策来放弃一些半政党的习惯。首先应当好好理顺国际关系。广东政府目前要尽快结束罢工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23，第 22—23 页。

打字稿，副本。

1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1 号（特字第 45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0 月 14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0 月 7 日会议第 58 号记录，决定；2. ——〔1〕（报告人：契切林、李维诺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认为有必要将加拉罕同志正式从中国召回。责成库兹涅佐夫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加拉罕同志坚持要求把他召

回，他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近期内将就此事专门照会北京政府，副本通知张作霖。

〔2〕认为有必要把所有谈判都集中在切尔内赫同志^①手里。

〔3〕禁止萨夫拉索夫同志^②进行任何超出章程和条约所规定的中东铁路日常工作范围的谈判，以及关于改变利润分配和现金保管程序等问题的谈判。

〔4〕催促列格兰同志^③尽快去哈尔滨。

〔5〕关于谈判内容问题仍按原来决议执行。

〔6〕认为加拉罕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发表答记者问^④是不能允许的。

〔7〕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书面材料，说明在中国领土上的法、英、日等外国铁路的表面上和实际上的情况，并将它们的情况与中东铁路现有的情况作个比较。完成期限为一周。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李维诺夫同志——全部；鲁祖塔克同志——〔7〕。

1926年10月1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9. — 关于米赫尔曼同志问题（政治局1926年10月9日会议第64号决议，决定：3. —〔4〕）。

① A. C. 切尔内赫当时为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译者。
② 萨夫拉索夫当时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副主席——译者。
③ 列格兰同志当时为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译者。
④ 可能作出这个决定的起因是，D. M. 加拉罕答上海《中国日报》记者问（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新闻处通讯》——北京，1926年9月10日—10月1日，第16期第11—41页）。

决定：19. ——批准米赫尔曼同志为冯^①的财政顾问，并保留他的蒙古银行董事会主席职务。

抄送

组织局；

莫斯克文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契切林同志；

舍伊曼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2、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冯玉祥。

114

拉菲斯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6年10月15日于上海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抄送彼得罗夫同志^①

亲爱的同志们：

说明目前政治形势特点的最重要因素是以下几点：

1. 南方人和孙传芳之间的斗争有些拖延，造成了政治关系方面的某种不确定性。
2. 广州在全国的影响在增长，而帝国主义集团以及较右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集团试图“包围”广州，“纠正”它不够明确的政治方针。
3. 国民军第一军发动新攻势的时机临近。
4. 奉系阵营中日益暴露出来的内部混乱可能不久就会变成公开的争斗。
5. 因汪精卫问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内部关系还不大明朗。
6. 社会政治力量（其中包括南方部队尚未占领地区的左派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本身）的普遍消极态度。

国民革命运动在不停顿地发展，已在全国范围内接近完成初

^① 即 德·拉斯科尔尼科夫。

步的胜利，即消灭反动的军阀势力，使国家统一在革命政府的治理之下。军阀没有牢固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立即暴露出它们的内在软弱性和在它们的组织中存在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同情者。第一次革命后15年来成长起来的新生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并在军阀的后方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这不仅会导致孙传芳的灭亡，而且也会导致张作霖的灭亡。

孙传芳建立的军阀“联邦”已经开始四分五裂。在孙传芳的前线和后方受到决定性打击情况下，要等待浙江省和上海采取行动，它们将宣布独立，不参加同广州的斗争。孙传芳的力量在于，他同聚集在商会内的五省资产阶级建立了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很不牢固，顶不住同更先进的广州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冲突。

我们已经有两周没有收到来自前线的任何内部通报了，这种通报会向我们说明，由于南方人阵营内部的不协调和矛盾而造成的对孙传芳的决定性打击的拖延会拖延到什么程度。这个因素（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的摩擦）无疑现在正在起作用，就像在夺取汉口和汉阳斗争的最初阶段曾起过作用那样。孙传芳的力量本身是比较坚固的，而他的社会基础也比吴佩孚更牢固。因此，孙传芳会比吴佩孚进行更顽强的抵抗。大约两周前，南方军队在前线曾有被击退的直接危险。不过这个危险时刻已经过去，现在谁也不担心会失败。当很有把握弄清孙传芳得不到北方的帮助时，南方人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了，虽然消灭孙传芳力量的速度问题还不能认为已经解决，甚至同他实行的妥协也是有争议的。这里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孙传芳后方的重大发动，但是会有这种发动吗？

在反对军阀的斗争中，现在军事因素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当南方军队在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时，那里就有社会力量出现在舞台上。只有在前线出现有利于南方人的转折时，一个月“坐守”武

昌的局面才会结束。坐守武昌的局面并没有被社会力量从内部打破。孙传芳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他的后方，在浙江和上海，有由亲日的大资产阶级到共产党人的社会力量建立的十分完备的组织，这种组织等待着前线的彻底失败。但是它总是在等待着……^①起先，采取行动定在占领九江的时候。现在又延至占领南京^②的时候，即攻克九江已有把握的时候。浙江等待着上海，而上海等待着广州人，谁也不想，也没有决心采取行动，以便通过这种行动使孙传芳失败之日临近。社会革命力量的软弱，甚至某种消极态度，是国民革命运动整个发展过程中最危险的因素。

上海的“反英周”^③被“反英周”开始前一天逮捕学生的事件所破坏。起先人们以为，运动的波折是由于前线形势的变化造成的，但各社会团体的消极态度和观望情绪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然而这个运动却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广泛地开展起来了。连英国报纸对此也有报道。目前对“反英周”还不能作出总结，因为没有收到各地的报告。

广州和孙传芳之间的斗争波及到了经济和社会关系都很发达的沿海一带。这里没有广东及其首府广州所特有的那种普遍的和多少比较一致的国民革命情绪。帝国主义者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买办在这里的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影响是很强大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直接处在这些反民族和反革命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领导反孙传芳势力的是一位明显亲日派人士^④，这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明确的帝国主义方针给了他很大的决心。但是他的决心还不够。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小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阶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应为南昌。

③ 指中共试图依靠学生于1926年9月底至10月初组织宣传运动和抗议集会来反对英国当局在1926年9月5日的万县事件中的立场，即英国当局用军舰炮击该市作为对地方当局“挑衅”的“报复行动”。

④ 可能是指虞洽卿。

层在政治上是同工人隔绝的。工会今天已不可能像去年那样把众多的小商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资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的作用一年来有很大增长并恶化了对于左的革命派和尤其是对于共产党人所说的总的政治形势。

上海共产党人同革命学生一起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把那些能够成为上海国民党左派的基础的力量聚集起来。提出了成立“市民革命联合会”的思想，最早参加这个组织的会是“街头商贩联合会”中的左派人士、学生和工人，部分工人以个人身份加入，部分工人以整个组织形式加入。只采取了一些初步步骤。但发起者一直声明，很难说这种尝试会有什么结果，新成立的组织会不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但上海的无产阶级是否会采取独立的行动呢？随信附上一份内容很广泛的关于上海工人组织的力量和共产党人对上海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的报告^①（也许翻译来得及的话还寄去第二份报告）。原来迄今为止工人运动基本上只涉及纺织工业，在这里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工会会员已达4万人。但是在对于政治发动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中，上海工会^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使当地的共产党人感到很不安，他们在最近一个月里一直在做工作，结果在电气行业、电车和装卸工人中有了立足点。但是从真正力量转移的意义上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自然不可能有决定性的变化。

你们从我们发去的电报^③中已经知道，根据计划在上海的发动中起带头作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发动应在独立、和平和与广州协商一致的口号下进行。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进行这次发动的基本目的是使组成孙传芳基础的所有资产阶级阶层脱离

① 报告没有找到。

② 指上海总工会。

③ 电报没有找到。

孙传芳。因此，这次发动——如果将进行的话——甚至将不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而是在独立的中立旗帜下进行。不过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犹豫不决，发动一直拖延下来。同时在各种谈判过程中，肯定可以弄清楚，虽然资产阶级领袖们公开声明他们既不害怕上海的工会，也不害怕共产党人，但是整个发动计划是旨在使工人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当尾巴，他们的发动要被资产阶级拖到“确有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做事都要走上层，采用同驻扎在上海的一支不大的军事力量的上层进行协商的办法。但是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请求罢工，但是它怕工人武装比怕火还厉害。

怎样才能激起上海的社会政治发动呢？无产阶级在这里应起什么作用呢？比较深入地了解问题后发现，原来在此地共产党人的策略方针上有一些错误。不久前这里发生的日本企业工人总罢工以工人的某种失败而告终^①，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大资产阶级的态度，都需要进行很仔细的研究，这也是现在最迫切的一项任务。

在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问题上，除你们所知道的蒋介石答复汪精卫的信所发的电报^②外我们再没有收到什么新消息。我们也向你们报告过中央对**英国人**就此问题所提出的询问作出的答复^③。这个答复的实质在于，认为蒋介石开始向左派作出让步并建议同意将汪精卫回来的期限推迟到现时军事行动结束的时候，同时又指出蒋介石建议的危险性，认为他试图仍让“中派分子”张静江（明显的右派政客）参加领导工作并要明确划清军事事务和

① 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北京1954年版第286-294页。

② 指蒋介石于9月29日接到的汪精卫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解释的信和蒋介石发给汪精卫建议他回国的电报。详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卷第528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英国人即 M. M. 鲍罗廷。

党政事务之间的界限，这就意味着要成立两个中心：一个在广州，另一个在前线。中央的指导性指示是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实行妥协。关于本应在今天召开的国民党代表会议^①，我们除了霍多夫带来的材料以外，没有收到任何新的材料。

英国人在一些电报中指出，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在结束香港抵制罢工时的任务提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我们没有从广州接到任何详细的报告，因此暂时还不能提供任何补充说明。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面对日益扩大的斗争革命民主力量如何搞好团结的问题。我们的广州之行提供了许多材料，谢廖金和切尔尼亚克^②还会带来很重要的材料，他们现在正在汉口（而查里^③去了长沙）。国民党的代表会议也应把问题搞得很明确。

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搞得很明确，而现在基本策略方针问题连一个也不明确。共产党人在消灭军阀势力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关于他们在南方人所取得的胜利中的作用正在准备一份专门的报告。在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中，他们的作用将是很大的。他们对军事问题研究得很多，遗憾的是有些片面，没有吸收群众参加。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但是，为了保证革命民主派的影响和胜利，共产党人必须表现出更大的顽强精神。

共产党虽然只掌握很小的力量，特别是领导力量，但它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在那里，在城市和乡村都在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关于河南，近日我们接到报告，说那里的共产党人召开了几个省的“红枪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专门的农民队伍的决议。

11月份预定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全会，有湖南、湖北、铁

① 见本书第495页注②。

② 分别为L. H. 维经斯基和T. I. 曼达良。

③ P. M. 纳索诺夫。

路员工、矿工等的代表参加。这次全会的政治任务是，面对日益扩大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提出它的阶级任务。同时，这次全会也还将讨论工人阶级“内部”生活的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预计将根据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经验讨论工会建设的基本方针，以及罢工斗争的策略，特别是根据上海、香港罢工和最近一次上海日本企业罢工的经验组织政治罢工的策略。

农民工作也有进展。在10月份要在湖南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但还没有关于会议的消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所有策略问题上都有像1905年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那种明确的方针。这也是11月15日讨论中国问题时的任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马克斯^①

全宗514，目录1，卷宗179，第148—152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M. U. 拉菲斯。

1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摘 录)

1926年10月15至18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出席：谢尔盖、马克斯、年轻人^①。

一、关于汉口的报告

格里(高里)^②做了简要的通报。

决定：在与现有中央委员一起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作总的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详细的电报。

二、总的政治形势

在即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老头子^③应作总的政治报告，而我们方面必须坚持：(1)中央在最近一周内发表总的政治声明，阐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现时的任务；(2)在组织上海发动^④时必须

^① 分别为：Г. И. 维经斯基、М. П. 拉菲斯、Н. А. 福京。

^② Г. И. 维经斯基。

^③ 陈独秀。

^④ 指准备在上海即孙传芳的后方组织起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试图于1926年10月23日举行这次起义，并指望夏超将军的部队进攻上海取得成功。

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3) 认真注意湖北同志对农民运动实行的有害方针。

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① 的问题

(1) 认为有必要让谢尔盖、马克斯代表远东局出席全会，就此立即电告莫斯科。(2) 认为很有必要让老头子代表中央参加全会^②。(3) 在代表团出发前，在这里讨论并起草关于党的方针问题，特别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

四、关于远东局

一致认为有必要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来加强远东局，并且为使远东局与联共中央保持更多的联系要派一名相当的联共中央委员来领导远东局。与远东局人员有关的其他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③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126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指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提出的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建议经联共（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后被否决（见第 117 号文件），理由是在当时形势下他们应该留在中国（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6，第 107 页）。

③ 以下删去关于卸船问题的第五项决议。

1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7号记录

1926年10月19日于上海

远东局俄国委员和中国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联席会议第7号记录

出席：谢尔盖、老头子、彼得罗夫、马克斯、布林斯基^①。

听取：（1）谢尔盖关于汉口和湖北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的报告；（2）老头子关于总的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

两个报告附后^②。

对两个报告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党在农民问题上和在对待农民运动态度问题上的政策；（2）无产阶级参加准备在上海举行的推翻孙传芳的行动^③。

老头子指出，中央七月全会讨论农民问题时曾发生意见分歧。有人建议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和在农村成立农民委员会。中央反对这些建议。老头子否认，在业已通过的决议中号召放弃过分的要求。但决议主张维护整个农村的统一战线。

① 分别为：П. Н. 维经斯基、陈独秀、彭述之、М. П. 拉菲斯、任弼时。

② 报告没有找到。

③ 见本书第580页注④。

就此问题决定：在本周内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印度人^①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然后发出专门的指示，这个指示要符合某些省份的要求，并要作必要的说明，以消除湖北对现有决议的解释。

关于无产阶级参加上海发动的问题是由中央和区委的决定引出的，该决定不要求上海全体无产阶级参加政治罢工，而仅限于举行装卸工、电车工和邮电工人的罢工以及电厂的罢工，即有助于瓦解敌军的那些部门的罢工。

马克斯不同意以下理由，即“不要太突出工人”、“工人政治觉悟不高，不能参加政治罢工”、“在上海最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小资产阶级，因为没有小资产阶级工人什么也干不了”。这些理由常被一些同志在解释中央的决议时所引用。

老头子和彼得罗夫指出，放弃总罢工的主要理由是，在反日罢工失败^②后现在工人没有斗志，哪怕举行一天的总罢工，我们都会造成对工人的镇压和大规模的失业，目前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中央和区委不认为目前的行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决定：中央和区委将再一次与上海组织的基层工作人员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斯建议中央发表一个总的政治声明，对整个斗争进行评估，并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目前面临的任務。这个声明应当“面向工农”。务必在最近几天内拟定好^③。

建议被采纳，责成彼得罗夫起草。

关于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④的问题。老头子代表中央前往参加。

① B. C. 弗雷耶尔（塞格尔）。

② 见本书第536页注③。

③ 关于声明的命运见第120号文件。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67，第 66 页及背面。
打字稿，副本。

1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3 号和 64 号（特字第 47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于莫斯科

第 63 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温施利赫特、洛佐夫斯基、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1）改组中国委员会，任命下列人员：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接替温施利赫特同志）；委员——契切林同志（接替加拉罕同志）和彼得罗夫^①同志。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同志召集。（2）建议中国委员会按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① П.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彼得罗夫同志——决定（1）（2）；加拉罕同志——决定（1）、（2）；

温施利赫特同志——决定（1）、（2）。

第64号记录

听取：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10月20日会议第63号记录，决定：1. ——（1）。（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 ——（1）批准就西北军行动计划问题作出以下指示：

（1）目前主要军事危险是奉系军队，特别是张宗昌的军队可能对疲惫不堪的广州军队发动进攻。

（2）有鉴于此，认为最好是冯^①指挥的军队同南方军队联合起来。

（3）不反对冯关于在包头保留阻击部队的要求。

（4）认为有必要协调所有国民革命军以及广州军队的行动。征询加伦同志^②和国民党中央关于这种协调行动的方式的意见。

（5）我们在华工作的军事人员要严格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自莫斯科的、根据对形势的总的估计提出的作战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束缚中国指挥部的自由，因为指导作战行动的责任完全由中国指挥部承担。

（6）现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加强国民党人对不久前归顺广州并只是在形式上成为国民党军队的这部分军队的政治工作。不在军队里大力加强这项工作，中国革命就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

（7）派给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军队政治部一定数量的莫斯科东

① 冯玉祥。

② K. K. 布留赫尔。

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同志。

〔8〕责成中国委员会在一周内制定派遣中国学生的具体计划，即：多少人、从哪些学校派、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条件下将他们派往中国。

〔2〕认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现阶段，广州政府继续同张作霖进行谈判依然是完全适当的，同时不反对同张作霖实行暂时的妥协，这既有利于军事喘息，也会给张作霖施加某种压力。

〔3〕不接受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同志的建议^①。撤销今年6月7日政治局会议（第32号记录，决定：1. ——〔11〕）关于鲍罗廷同志副手的决定^②。

〔4〕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向广州提供物资援助问题的以下建议：

（1）认为满足广州要求提供总数为2844026卢布的炮兵和航空器材的申请是合适的，条件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担保在1926—1927经济年度向军事主管部门补偿这些器材所需的费用。

（2）由军事主管部门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就此问题进行协商。

（3）关于向广州转交这些器材的支付条件，由军事主管部门同广州政府商定。

〔5〕向广州转交军事器材必须以得到广州政府的明确支付保证为条件。

〔6〕建议中国委员会和库比雅克同志一起具体拟定如何向广州运送武器的问题。

〔7〕鉴于中国日益复杂的形势，认为有必要确定驻北京领导人（大使），以便领导在华的整个工作。

〔8〕关于广州和日本的关系问题，政治局认为，日本政府要求国民党派代表去日本，以此来回避事实上或者法律上承认广州

① 见第105号文件。

② 见第56号文件。

政府的问题。

鉴于这种承认对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局建议争取日本方面同意，除了由国民党派代表以外，也由广州政府派正式代表。如果日本方面断然拒绝，则同意只由国民党派一名代表去日本。

〔9〕认为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是非常合适的。但政治局同时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

〔10〕征询国民党中央和广州政府的意见，他们是否认为任命苏联驻广州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是合适的，是否认为可以任命鲍罗廷同志担任这一职务。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全部；格伊同志——决定：〔1〕7、〔3〕、〔7〕。

布留汉诺夫同志——决定：〔4〕、〔5〕。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6—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18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电报

1926年10月22日于上海

绝密

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抄送加拉罕。谢廖金^①发自北京、广州、汉口。

南方军队最近取得的胜利致使孙^②开始崩溃，并在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人中间造成了很大的恐慌。湖北的军事形势很稳固，尽管唐生智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对抗。广州和国民党的影响遍及长江流域，并开始波及到浙江和福建。反孙的斗争正在上海广泛展开，12个月前采取的在争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帜下将孙逐出上海的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排除在最近几天内成立由商人和国民党人组成的、主张正式或非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权委员会。工人也准备起来反对孙。孙的五省联军开始瓦解最好地说明了在国内与民族买办倾向和军阀统治倾向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倾向是多么的强大。南方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采取独立行动，并且害怕国民革命运动的继续深入，但毕竟开始同情国民政府。在上海以及其他沿海城市，资产阶级现在到处都独立地起来反对北方的军阀。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民主派组成的这个人民政府委员会定将成为过渡政权的最通用形式。

^① Г. И. 维经斯基。

^② 孙传芳。

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已尖锐地摆着一个问题，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通过与参加北伐者——左派军阀结盟的方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考虑到南方军队的胜利还不巩固，而进一步挺进必然会使它们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在南方和长江流域，必须一方面不害怕发动农民斗争，一方面在城市里尽可能使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有觉悟的政治因素姿态出现。如果我们同时真正地继续为实现民主要求而斗争，我们是不会吓跑国民党左派和城市民主派的。

在最近几天里，中共将向工人、农民、士兵和小资产阶级发表一个声明，对目前时局进行评估并指出最近的任务。

核对无误：西年柯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565，第170—171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 第 8 号记录

1926 年 10 月 28 日于上海

1926 年 10 月 28 日会议第 8 号记录

议程：关于最近一次上海发动的报告。

布哈罗夫^①：上海的发动是我们早就做了准备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在即将举行的政变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应该是这里聚集在日本人^②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注意吸收聚集在街头商贩联合会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让无产阶级起首要作用，我们明白我们参加这次发动的任务是，积极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但是上海的运动越来越扩大。10月10日夏超的代表^③来到这里。当时国民政府的代表军人^④也来到这里。虽然他不了解上海的政治关系，但他试图把斗争的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里。我们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外交谈判。他对我们说，他同意我们发动的政治部分，但反对军事发动计划。军人直接与日本人发生关系，

① 布哈罗夫即罗亦农。
② 虞洽卿。
③ 何人，不详。
④ 钮永建。

从那时起发起工作和准备工作中的整个领导作用从日本人那里转到了**军人**那里。我们是在10月14日才知道这一情况的。日本人开始不参加工作，拒绝军事援助，拒绝发表呼吁书。他很害怕，一切都袖手不管。我们开始就军事问题去找**军人**，而去日本人那里只谈政治问题，包括成立“保卫和平委员会”^①问题。

夏超宣布浙江独立给上海全体居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们立即提出在上海发动起义的问题，但看来在技术上和组织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还没有武器，没有建立必要的联系。中央和区委作出了必须发动起义的决定。但**军人**说，没有准备好。然而群众已急不可待。我们提出以下四个条件，我们认为有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发动起义：（1）驻扎在广州^②的孙传芳军队中有部队转到我们方面来；（2）夏超向上海发动进攻；（3）海军方面给予支持和最后（4）居民积极参加。我们认为在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条，然而来自那里的消息却截然相反。

最后，**军人**下达命令在10月23日早上6时发动起义。这以前我已经得到消息，说杭州已占领。但**军人**表示怀疑，并说，上海的部队将在这一天转到我们方面来。我又问他一遍，真是这样吗，他再次予以肯定。我们向我们的武装工人发出了命令，让他们一听到炮声就行动，只是不要过早。拂晓我们分散到各处去。到了街上才知道，城市的西南部没有动静，于是我们决定不要发动起义。我们的这个决定只来得及告诉我们最有组织的队伍，他们真的没有行动。但发现**军人**应发动的那些队伍也都没有行动。出动的只是一批由我们的组织纠集起来的非工人武装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地区警察局。但是当他们走近警察局大楼时，发现警察已完全撤离大楼。显然，他们事先知道要来攻占大楼，就聚集

^① 曾打算这样称呼把上海反对孙传芳的力量组织起来的机构。关于这个机构的任务见本文下面内容。

^② 原文如此，应为：在上海。

在大楼附近。队伍中有4人被立即逮捕。早在行动前，警察就挨家挨户搜捕了许多同志，这些同志都是被指定担任某项任务的领导的。很明显，这里有人出卖。

现在区委正在对发动的准备工作和发动本身进行总结，弄清缺点和今后斗争的前景。缺点很多，但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军事发动。我们既不了解自己的力量，也不了解盟友和敌人的力量。我们无疑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机会主义者，把整个主动权让给了资产阶级，一再推迟发动。从准备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放弃了在军事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正因为如此遭到了失败。假如我们自己少些等待，无疑是会发动起来的，虽然没有预计到会失败^①。

从这次失败中我们得出了什么教训呢？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派别组成的。大资产阶级不准备发动起义，而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是不积极的。我们的结论是：（1）将来不能指望资产阶级，而自己要努力发挥领导作用，虽然表面上领导者可能是资产阶级；（2）国民政府的代表（**军人**）根本不是政治家，而是典型的旧军人；（3）我们学会了组织和准备军事发动。作为从上海发动起义的失败中得出的结论，我们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资产阶级作用问题，这是主要的。

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下一次发动的准备工作的。在上海，整个工作一直都是以迎接南方军队的进军和胜利的方针进行的。如果占领江西，上海就会一片情绪激昂，那时又会提出可否发动起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暂时的反动时期。反动派还没有大动干戈，因为孙传芳和当地的警察局还有些害怕，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有多少。警察局长^②公开说，国民政府正在同他进行谈判，要他转到那边去，但他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是个温和的人。当局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失败。

^② 何人不知。

目前还忙于军务，但很快他们就会进行政治镇压。我们不能持消极态度。我们准备加强反对孙传芳的宣传运动，要求他的部队撤出上海，并提出“浙江人的浙江”、“江苏人的江苏”的口号。将散发许多传单。我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内召开社会团体代表会议，发表反对孙传芳的呼吁书。还准备采取部分游击行动，不断地骚扰地方当局。

上海发动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人士的情绪低落了。日本人对我们说：“我警告过你们，但你们太急于发动起义了。”在中小资产阶级当中也出现灰心丧气的情绪。这里可以听到以下这类说法：“国民党没有力量，他们只会制造混乱。工人们情绪很好，他们准备进行新的发动。上海起义有400人参加。要是真正进行街垒战，会有2000到4000人参加。”

老头子^①：应当弄清失败的原因。有许多纯技术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应当弄清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群众希望国民党员（**军人**）手里有军事力量，而**军人本人**则以为，民众有这样的力量。发动政变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大资产阶级那里，他们受北伐节节胜利的鼓舞，也抱着胜利的希望。我们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想法，这是对的。但是**军人**一来，问题就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军人**把事情转到了靠武装力量搞纯军事政变的方面。结果怎么样呢？无论工人还是商人都不可能宣布政治罢工，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单纯军事斗争的一种可能。要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必须有有利的环境和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在政变的前三天，我们算了算力量，原来我们的敌人有5000名正规军和2000名警察，而我们只有夏超的3000名正规军，驻扎在离上海很远的地方，而上海内部总共只有1000名武装人员，而且组织得不够好。我们预见到必然要失败。

^① 陈独秀。

要取得胜利，夏超必须实行进攻，并确信在上海的部队会转变过来。23日早晨，我就写道，因为夏超在前线遭到了失败，那就不要发动起义了，但稍后有人转告我军人的话，说部队一定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怯懦和退却。为什么没有做任何准备军人就下命令发动起义呢？是因为他指望群众行动起来呢，还是因为他早就答应夏超发动这次起义，而现在已经不能退却了。从业已发生的事情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我们应当始终准确地事先告诉自己，我们去干什么：是举行人民起义还是进行单纯的军事发动。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很好地了解实力，了解军事组织等等。这一次，无论工人还是商人都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这就是说这次行动不可能是人民起义，而对于军事发动来说，我们的力量对敌人的5000人，当然是很少的。诚然，我们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但自然不能经常重复进行这种发动。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将来不应当夸大敌人的力量和贬低自己的积极性。但现在我们应当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

布哈罗夫：我们认为，即使将来也不是人民起义，而只是利用适当的形势。资产阶级人士不会跟我们一起走，中小资产阶级不积极，学生也不会跟我们一起走，而只靠无产阶级发动起义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因此，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

彼得罗夫^①：我觉得，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应纠正在湖南所犯的错误，那里在南方军队到来时，群众没有任何积极性。必须使这里的群众做好行动的准备。显然，我们这里不会有群众性的起义，我们只是根据前线的形势来发动起义，但也可能在群众的积

^① 彼得罗夫即彭述之。

极推动下举行政治罢工。

老头子：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发动只能促进政变，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来发动政变。而上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得不错，诚然它对税收不满，但这还没有使它达到极端不满的程度。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

彼得罗夫：我同意我们将进行单纯的军事发动，但需要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而不只是吸收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下一次必须准备更多的参加者，在几个部门宣布罢工，以制造更紧张的形势。

老头子：彼得罗夫说，需要准备人民大众的发动，但要补充一句，应当准备好军事力量。

彼得罗夫：我想对上海的资产阶级作一点分析。它的基本核心是买办和银行家。资本属于在国外的华人。80%的资本来自官僚。大资本属于所谓的“交通集团”^①。许多资本投入到轮船公司，其次是纺织工业。在纺织工业中许多工厂倒闭了。它们反对军阀，反对外国人，特别是把60%资本投到纺织工业的日本人。资产阶级的这一阶层期待着发生大的变革。钱庄业在上海占有很大的地位，其中每家有资本8万到40万。其次是丝织工厂主，他们也反对外国人，因为大多数工厂转到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手里。民族资本和小钱庄还没有政治力量。虞和德^②比较积极，因为他依靠的是流氓无产阶级，他同老的党有联系——他曾经是国民党员。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但不能低估它的作用。经过一段时期，他们会变得比较有觉悟。

谢尔盖^③：我们早在7月份就认为，上海的政治条件是特殊

① “交通集团”是中国官僚和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在20年代它的许多头面人物出身于“老交通集团”，这个集团依靠它成立的“交通银行”在10年中期控制着铁路以及北京政府的财政和外交主管部门。

② 虞洽卿。

③ I. H. 维经斯基。

的：这里有许多大资产阶级，上海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堡垒。我们同意基本的变革思想和计划：上海自治，驱逐孙传芳，把上海转到张静江手里，而且那时就打算依靠某个军人，确定为夏超这个人。我们是想把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和学生组织起来，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为此决定不丢弃国民党的旗帜，并把政变行动同反对孙传芳的军事斗争联系起来。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借助于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打击孙传芳的后方。结果怎样呢？孙传芳被拖入战争，遭到了一系列失败，他的组织开始瓦解。但是这时来了个**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针。他需要的是某种军事的东西。他不指望人民，而是按国民党的态度来看待人民，期待人民给予军事上的支持。结果发生了变动。资产阶级退到一边去了，而我们和**军人**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老头子：**军人**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第二个代表^①以为，这里的斗争应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他们把工人只看作是一种工具。

谢尔盖：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晚才看出由准备人民起义到单纯军事发动，由当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斗争的转变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分地忙于发动的具体准备工作了呢？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本身很少注意使人民大众参加这次发动。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布哈罗夫同志的某种不信任是对的，他说，资产阶级不会参加斗争。我们可能使无产阶级遭受血腥的屠杀，整个事情可能成为真正的冒险，因为我们认为中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只能起很小的作用，而对无产阶级本身，我们又只想当作一种技术力量来加以利用。

老头子：发生这种情况倒不是因为我们对资产阶级群众发动的意义估计不足，而是因为资产阶级本身退缩，不积极。我们曾建议日本人成立保卫和平委员会，但他拒绝了。

^① 吴稚晖。

布哈罗夫：在发动起义那天我们曾两次向日本人提出这个建议。在预定的发动开始前3小时，我们同他就成立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谈判，该委员会的任务是：一旦起义成功就在和平的口号下进行斗争，一旦起义失败就反对镇压。日本人拒绝了。

谢尔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人已经看到，整个领导工作已转到军人手里，当时他说：“那就等一等再说！”

老头子：但是这个转变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是因为资产阶级逃避参加斗争。

谢尔盖：但是你们对我们讲过，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决定性时刻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呢？

布哈罗夫：所有这一切都是骗局。

老头子：若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发动上，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若是我们一切都指望日本人，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日本人自己指望夏超的发动。军人倒说，他反正要发动的，不指望夏超，结果他没有发动。若是我们指望日本人，我们早就退却了——差别只是在这里。上海的资产阶级想掌权，但只把希望寄托在军事力量上。日本人和他的朋友们甚至拒绝给孙传芳发一封要求和平的电报。

彼得罗夫：我再举一件事：在发动起义的最后一天，一个很有影响的街头商贩联合会的主席^①对我说：“我们不是工人，如果我积极参加发动，我的财产会被没收。”他们始终是这样说的。

谢尔盖：然而英国报纸这几天却异口同声地说，上海整个商界和所有商人都反对孙传芳，它们把武装起义归咎于工会理事会。现在我言归正题。我们知道政变和准备发动的事太晚了，彼得罗夫同志在这里向我们谈到上海资产阶级，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当中有一小部分是具有民族情绪的。当然，它不会去参加街垒战。

^① 何人不知。

但它有军事力量，应当使它投入战斗，并唤起它的巨大积极性。而你们作出了这样的错误结论：只应当让工人和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去进行斗争。不该这样提问题：什么资产阶级不在考虑之列，将来也只能是军事发动而不是人民大众的斗争。应当既面向军事发动，又面向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老头子：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看作先锋队，它将是胜利后的一个政治因素。在资产阶级拟定的未来政府委员会的名单上有许多商界有影响的人士，但只有一名国民党员。然而，未来的政权形式将是另一种样子：资产阶级加国民党，当然，如果国民党军事力量取胜的话。

马克斯^①：首先必须指出，在发动的整个准备工作中存在着极不协调的地方，许多派别参加斗争本身必然会导致失败。从夏超的发动开始，这次行动与前线的形势是完全不协调的。然后是上海的发动，不是发生在夏超发动的时候，而恰恰是在夏超的力量已被击溃和他撤离上海的时候。上海这里制定了一套发动计划，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代表则按自己的计划行动。我们的司令部没有掌握任何有关真正同盟者和可能成为同盟者的力量状况的独立情报。在最后时刻，许多东西都是虚张声势。但是，我们的党委会如果不了解自己同盟者的力量，能吸引工人投入可能以遭到严重毁灭而告终的斗争吗？我们应当有独立的联系，以便检验我们同盟者关于他们的力量的报告。在准备下一次发动时，这一点必须事先认真地考虑到。在发动前的晚6时，我们接到布哈罗夫的一个便函，他写道，部队首长^②拖延发动，原因是等到他妻子从孙传芳那边回来。但在这个便函上，还有同一个布哈罗夫的批注，是与便函的整个内容完全矛盾的，说夜里发动，这里有点不协调。

① M. P. 拉菲斯。

② 何人不详。

如果下一次发动应与前线的形势相协调，那就需要立即与国民政府和前线建立联系，以便消除不协调的现象。

布哈罗夫说上海中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了斗争，这样说是不对的。更正确地说，它还没有接近斗争，它还没有决心。其实，这里所说的不光是中小资产阶级，而是在沿海地区以及上海市的这些阶层，它们完全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买办分子的影响之下。国内总的斗争必须非常激烈地开展起来，这样才能使这些阶层积极地参加斗争。这里还必须坚定地指出，我们党在上海的策略不仅无助于吸收这些群众参加斗争，而相反，党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斗争负有很大责任。在这里，党的政策过错不仅表现在斗争中的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而且表现在无产阶级的独立发动问题上。

在上海起义前一个星期，我们曾提出上海政治罢工的问题，当时有人对我们说，上海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这种发动的准备，没有必要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这次发动，只限于一些主要部门，如电厂、装卸工等的罢工就够了，结果最后没有时间来准备无产阶级更广泛的发动。但首先必须指出，上海工人群众没有举行任何政治发动。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月后可能发生的未来发动时，又有人对我们说，不会有群众的发动。党今天怎么知道，不会有这种发动呢？其实它今天无法估计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情绪，无法估计一个月后由于前线形势的发展和孙传芳必然采取的镇压行动，这种情绪会是什么样。如果区委和中央如此断然地说，不会有什么发动，那就是说，它们没有把赌注押在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发动上。

在这方面，从去年起党的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在全会

的决议^①中谈到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而现在不仅不谈领导权，而且甚至像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党也根本不把无产阶级考虑在内，在谈到无产阶级发动时，布哈罗夫同志（在我们这里所作的报告中）却说上海工人觉悟不高，政治积极性不高，甚至还说，无产阶级的发动会吓跑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迄今为止一直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会被吸引到斗争中来的，只能被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吸引到斗争中来。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在上海没有被一堵不可穿越的墙阻隔。甚至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在目前的斗争阶段也会是比较积极的，如果无产阶级起来举行发动的话。若是区委已在对上次发动进行总结的话，那么它应当重新审查它在无产阶级发动问题上的立场并提出准备政治大罢工的问题。我不想以此来说明，下次发动时，一定会举行政治大罢工，我们总是可以根据目的和形势来确定每次发动的日期和方式。但是我们生活在国民革命运动浪潮日益高涨的气氛中，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应当培养无产阶级的最大积极性，并使之做好准备，参加以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方式进行的斗争，即政治罢工。

老头子：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领导者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要运用这一理论既没有主观条件，也没有客观条件。**马克斯**犯了像英国人^②所犯的同样错误，英国人把中国的所有策略问题都建立在广州和广东的基础上，而**马克斯**则只谈上海。如果**马克斯**说，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的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

^①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举行的扩大全会的决议，详见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1册，第272—284页。

^② M. M. 鲍罗廷。

能举行发动。

马克斯：不能这样轻易地摆脱开英国人；问题不在于他只提出一个广州。与广州同志的争论归根到底是对如何对待农民的策略问题的争论。我也并不是建议孤立地来解决上海问题。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的作用，它的政治主动性，独立的群众性发动。

彼得罗夫：马克斯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将长时间的争论下去。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没有工人参加就没有国民党。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没有国民党。整个运动都有赖于无产阶级。但它不是进行直接的领导，而是对各种社会力量施加影响。

布哈罗夫：我在报告中已经谈到，从上次发动中我们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将来应当更使无产阶级做好准备。从准备这里的发动一开始，我们就是它的动力。如果马克斯说，应当更使无产阶级做好准备，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他认为，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那么这是错误的。

老头子：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无可争议的是，无产阶级对军事因素也有影响。但是能说上海对宣布总罢工做了主观上的准备并且这场发动符合客观形势吗？我认为不能。

谢尔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公式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和现在的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苏联和全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必将成为领导者，而这将意味着中国国民运动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失败。在上海和香港罢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无疑更接近于成为领导者。党的任务就是教育和推动无产阶级去实现它的领导者作用。马克斯在这里说得完全正确：每当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就应当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独立的斗争，以便使它为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做好准备。关于

中小资产阶级，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已经不把它考虑在内了。然而，你们自己说，资产阶级试图掌握政权，它对国民革命感兴趣。我不同意说什么中小资产阶级还没有接近革命，它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走近了，它们动摇，这是问题的实质。但是，还是**马克思**同志说得对：他说只有组织无产阶级的发动，我们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转到我们方面来。小资产阶级——这不是农民。农民只有一种发动方式，即起义。而在这里农民也可能姗姗来迟，就像1905年他们姗姗来迟那样，不能及时支援无产阶级。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直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容易使它积极起来。我们应当记下主要的结论：应当这样来进行准备工作，要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被吸引到行将到来的斗争中。斗争的方式我们以后确定。是示威游行、罢工，还是起义，这以后会看清楚。但是必须使整个无产阶级都做好准备。其次必须这样来做准备工作，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

布哈罗夫：我认为需要再一次强调，要意识到必须使无产阶级对行将到来的发动更加做好准备，这是上次斗争的教训之一。

讨论结束时决定根据**谢尔盖**同志的结论的精神和**老头子**关于必须更仔细地进行军事发动准备的补充修改意见进行准备工作。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128—136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5 号
（特字第 48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0 月 29 日于莫斯科

1926 年 10 月 26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9. —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9. — 通过伏罗希洛夫同志提出的电报稿，并作一些修改（见附件）。

抄送：

契切林同志；

李维诺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第 65 号记录第 9 项决定附录：

致中国北京、广州、汉口、上海
谢廖金^①的电报答复谢廖金第 112 号电报^②

第一、广州胜利后形成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正如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不应吓倒它并使它向右转一定要同右派结成联盟一样。

第二、既然是指依靠广州和浙江的军队来成立由国民党和商人组成的政权委员会^③，那这是合适的，但要靠武装工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政变就有可能使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淹没在血泊之中。需要小心谨慎。

第三、谢廖金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这意味着把资产阶级、商人和豪绅推到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的怀抱里去。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北方的危险还存在，将来同它们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应当爱护自己一切可能的盟友和同路人。

第四、同意土地问题应具体地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农民的支持，胜利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同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战争正激烈进行的形势下，立即在农村发动内战，可能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必须在最近时期内向国民党和鲍罗廷提出农民政策纲领，并将你们的具体建议和他们的意见一并报告我们。

第五、暂时停止发表中共中央执委会关于当前任务的声明，将

① P. H. 维经斯基。

② 见第 118 号文件。

③ 指一旦国民革命军部队和浙江省夏超将军的部队占领上海就在上海成立政权机关的计划。

基本要点报告广州，最后报告我们。在当前任务方面，必须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协商一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非常危险的。

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9—1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件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1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6 号 （特字第 49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1 月 4 日于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6 号 （特字第 49 号）记录

听取：2. 一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2. 一〔2〕（1）批准中国委员会的半年预算开支，总数为 150300 卢布（苏联货币）和 143300 美元，其中包括已经拨给的 25000 卢布和 45000 美元，不包括某些待审批的开支项目。

（2）认为该开支数额是最大限度的，建议中国委员会在使用

时尽可能地缩减。

（3）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学生的建议^①。

（4）责成组织局在两周内拟定派往冯^②、唐生智和汉口各一名政治顾问的人员名单。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 决定：（4）；

格伊同志——决定：（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1—1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冯玉祥。

1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摘 录)

1926年11月5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全体出席。

一、给去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全会的马克斯同志^①的指示

(1) 向全会委员会呈交党的土地纲领草案，这是同中共中央一起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制定的。如广州有修改意见，将电告。

(2) 认为解决整个国民党的问题还不是时候，只确认在上次中央全会上所提出的党的方针。

(3) 认为有必要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党现在所面临的基本策略问题向中共发出秘密信，该信可用于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二、关于农民国际的代表

认为有必要派农民国际的负责代表到这里来，他可以帮助党

^① M. P. 拉菲斯。

做组织工作，协助从理论上阐明一些复杂的土地纲领和策略问题。

三、关于阿尔布列赫特同志

认为最好派阿尔布列赫特同志来这里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的代表，以协助和指导党的组织建设^①。

五、关于电报费用

采取坚决削减电报费用的方针，只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电报。

六、关于中共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责成马克斯同志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提出）于1927年1月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议程如下：（1）中央的政治报告；（2）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3）关于国民党的问题；（4）农民问题；（5）工人运动问题；（6）党的建设；（7）老头子^②关于党纲起草问题的报告。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2，第 231 页及背面。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问题的第四项。

^② 陈独秀。

123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26年11月5至6日于上海

秘密

陈独秀同志论农民问题

(摘自1926年11月5至6日远东局和
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的材料)

我打算谈四个问题，即（1）中国土地集中的过程；（2）农民运动的形式；（3）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政治纲领；（4）在开展农民运动基础上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土地占有有三种形式：（1）官僚和军阀手中的土地；（2）各种公司手中的土地；（3）为了开发工业原料而占有的土地。最大的一组大土地占有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比较少。我们可以在黑龙江、安徽看到。至于第三种，它的产生是与对盐矿的占有联系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盐将被采尽，而土地则留在占有者手中，但对土地的耕作方式很简单。在黑龙江，大土地占有是自由土地大量存在的结果。在湖南，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土地是湖泊干涸后形成的。在广东，这种土地是由于海面缩退而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沙质地。第三种土地占有是为了开发

工业原料，数量比较小。从中获得棉花。

第一和第二种大土地占有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虽然它们在组织方面表面上接近于大资本主义企业，但整个生产方法绝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第三种是直接为自己的企业开发原料。所有这三种都没有提高农业强度的因素。

土地集中在这三种占有者手里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造成了农民土地的狭小。但是这种集中过程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封建式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产生矛盾。

第一种大土地占有形式，即土地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三种大土地占有形式大约集中了中国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

农民运动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有着各个不同的形式。

在中国北方，即在河南和陕西，有“红枪会”组织，每个省大约有4到5万个。这些组织联合着小私有者农民或破产的农民。它们的宗旨是同各种捐税、土匪、豪绅和贪官污吏作斗争。它们发动的形式是武装暴动这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它们的主要愿望是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机构。

在华中，我们在湖南有40万参加农会的农民、小私有者和佃农。在湖北有4万这种社会成员。在四川，有10万多，他们在土地占有者和小私有者中间，但是这个运动不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华中所有这些省，农民进行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高额地租，反对民团、土匪。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农民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机构。

在南方，我们在广东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小私有者和佃农。在这里，斗争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高额地租，反对民团和豪绅。

由此可见，整个农民运动的共同点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豪

绅，反对军阀。由于运动的觉悟程度不同，也有某种差别。

我们的要求纲领应包括以下几点：

(1) 减少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取消非法的税捐（特别是钱币兑换税）。

(2) 限制借款的利息和禁止收税^①。

(3) 组织和武装农民。

(4) 禁止转让^②土地。

(5) 将大地主、豪绅、军阀的土地以及公有土地交给农民。

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农民不喜欢^③。农民拥护将土地划归他所有。

(6) 剥夺豪绅的政权并将农村政权交给农民。

应当明确无误地强调指出，这里说的仅仅是**农村政权**，而不是全国政权。现在农村政权掌握在地主和豪绅手里；应当使它掌握在农民手里。

其次必须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以便不使人感到害怕。

在农民问题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应当号召农民加入国民党队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转，并给它以力量来同右派进行斗争。

现在就可以为将来制定三种政治组织关系形式：(1)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领导农民；(2) 改组国民党，保留其名称，但实际上是工农的国民党；最后，(3) 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新党，即工农党。所有这三种形式要根据他们左倾的程度来安排，应当根据农民的要求来选择。但是，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说，越是左，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斗争中就越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附加的一些地方杂税。

② 原文如此，是指转租。

③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是：不为农民所理解。

是孤立。

中国革命在飞速发展，形势变化日新月异。但是，制定未来的纲领要比制定当前的行动纲领容易得多，因为未来的纲领很可能落后于农民的要求。因此，处理问题不应搞教条主义，要根据斗争的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

应当不急于选择新的组织形式。

彼得罗夫^①：在确定前景和选择三种组织形式中的某种形式时，应当考虑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进行选择时，形势将会跟现在有所不同。国民党左派将掌权，将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右转。资产阶级会向右转，而农民向左转。如果选择第一种关系形式，那么各阶级在统一的国民党内的联盟就会被排除。

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国际形势。如果国际形势顺利，那时将选择**第三种形式**，即工农党。如果不顺利，那就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但务须保留左派国民党的名称。

如果国民革命顺利发展，如果一年间全中国将被北方和南方的军队统一起来，而国际革命没有跟上，那么就应当选择第二种关系形式，即保留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工农国民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2，第 236—23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彭述之。

124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6年11月6日于上海

敬爱的同志：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你们拍发关于远东局的电报^①，但不管怎么说它来得很及时。我的答复你们早就知道了。我曾答应再详细地写一封信，现在就来完成这个许诺。

关于我们局的问题其实在我从广州回来后就向我提出来了，当时我一方面在实际“考验”远东局委员们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再次确信，这里的运动是在怎样飞快地发展。我当时就想写信给莫斯科，说明用更强大的局取代我们局的必要性。但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我又得去汉口，于是就有意无意地把问题搁下了。诚然，还有一个原因妨碍我本人提出远东局的问题，即人员本来是我自己提议的，因此难以如此迅速地提出不满意的问题。我还指望，随着加拉罕到这里来，给我们派来一位我们对华政策的有影响领导人，把各个单位的工作协调起来，那时我们远东局就可能由另外的机构取代或部分地取代。我给你们的答复同我现在所说的并不矛盾，因为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需要设立，但不只是为中国设立的，而且也是为日本和朝鲜设立的，单是为中国可以设两三名工作人员，而不是一个局。远东局在这里之所以需要，是

^① 见第120号文件。

为了克服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日本和朝鲜工作方面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至今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很少，但还没有完全体验到，以致说从这里为日本和朝鲜做工作也像从莫斯科那里做工作一样地困难。

我讲对日本和朝鲜的工作需要有远东局时，我当然知道，既然它设在中国，那么中国的工作就在它的活动中占有主要的和不寻常的地位。全部问题在于，远东局是需要的，但必须是比较现在更强有力的。确实，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任务和问题，不仅有今天的问题，而且也有未来的下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比较年轻的中共中央无力解决的。然而，目前中共或许比除联共以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任何其他支部都更加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并且常常是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领导这样一个党自然是极其困难和责任重大的事。同时还应当注意到，现在中共的作用和意义不能与六个月以前相提并论：现在，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广州的影响超出广东省的范围，党的意义已经增加了许多倍。

我们党处在国民党内，不仅应当注意对国民党的正确策略，而且实际上常常决定着国民党作为全国性政党对民众的政策。此外，我们党在进行军事斗争或准备进行军事斗争的各省几乎与纳入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军事势力都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领导中国党，即使在莫斯科更多地关注中共的条件下，也还需要在当地直接设立一个重要的局，来正确地贯彻执行由最高领导机构确定的中共总的政策。

这个局应当能胜任随着目前中国运动的飞速发展而越来越复杂的任务。

但这仅仅是就中国的工作而言。关于远东局所面临的对于朝

鲜和日本的问题，马克斯^①将向你们转告。

因此，我的具体建议是，派一位我党中央有威望的代表到这里来领导和协调各单位的工作。日前我就此事给斯大林发了电报^②。我很清楚，挑选一名合适的人员是多么地困难，但我认为，现在绝对有必要为在华工作抽出最好的政治力量。完全用不着证明我们远东政策的中心在中国，因此，在当地没有足够强有力的领导，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犯下无可挽救的错误。

至于在有这样一位领导人的情况下远东局的人员组成，那还必须使它成为较有工作能力的机构。光呆在上海是不能给中国中央的领导工作提供足够的帮助的。必须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每个大的省份都是一个国家，我们在那里有庞大的组织，那里在解决政治和军事政治问题时，都需要给予认真的指导。

例如，现在在湖北和湖南就需要这样的指导，再过一些时候，可能更北面的地方也需要。然而在我们远东局的成员中没有进行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当然可以提到马克斯，但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或许责成他来独立地进行指导是危险的。

关于马克斯的莫斯科之行

在同中央一起讨论国民党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时，我们一致得出结论，必须有人去参加全会，通报情况和参加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农民问题上特别重要。在收到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③对我的关于必须发动农民起来反对豪绅和地主的电报的第一份复电后^④和他建议拟定过渡性口号后，我们决定，必须让莫斯科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马克斯带去的草

① M. I. 拉非斯。

②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③ I. B. 契切林。

案^①也是我们就该问题提出的建议。他将向你们详细转达报告内容和讨论报告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也给鲍罗廷寄去这份草案，以便得到他的意见和国民党左派的意见。如果他们方面有异议，将电告你们。

谈一谈广州争论的记录。出乎我的意料，中央刊登了这场争论的摘要^②。无法跟踪观察中央刊登的所有东西，因为我们不懂中文。在收到列·米^③的第一份电报^④后，我坚持要求把所有通报都收回销毁，只留一份给委员会。陈独秀肯定地说，这些记录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即使落到蒋介石手里，他也没有理由生气，因为那里谈的是共产党人的总的策略，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他认为，不让积极分子了解党的策略，就无法在国民党内正确地进行工作。

这几天我将收到通报的译文，那时我就能作出判断，陈的意见是否正确。不过从此以后，中央在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将先让我知道，因此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了。

我想鲍罗廷不会露面，因为自消息传出后已过去5周，但除了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外，没有任何传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里高里^⑤ 签字）

全宗514，目录1，卷宗180，第123—124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指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34—437页）。

^② 可能是指瞿秋白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其中部分地谈到Г. H. 维经斯基和M. M. 鲍罗廷之间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见分歧。见《中央政治通讯》上海，1926年9月15日第3期；又见《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年第418—419页。

^③ 即Л. M. 加拉罕。

^④ 电报没有找到。

^⑤ Г. H. 维经斯基。

125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6年11月6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

非常遗憾，我们未能参加全会^①，虽然讨论中国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参加。但是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我想在这封信里阐述一下目前我们在同中国党中央一起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产生于异乎寻常的矛盾形势和日益发展的中国革命的条件。

由于北伐的结果，一些省现在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下。国民党作为国家政权在华南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设政权，因此要整顿秩序，安抚民众，竭力保持国内和平；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同北方的军阀作斗争。但是，国民党要想在反对中国其余地区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只有在自己的地区支持民众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才有可能，但这在农村必然会导致内战的爆发，削弱国民党政权的战斗力。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支徒有虚名的力量，它使用一些军事领袖，而且也被这些领袖所利用。随着国民党势力范围的扩大，打着国民党旗帜的独立的军事集团越来越多，而它们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这些集团）之间将发生争斗，竭力争取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便对它加以利用。除了军事集团以外，还有来自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也越来越开始依附于国民党。不言而喻，上述这些现象是解放运动胜利的结果，但不能不看到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危险，不能不警觉地注意解放运动中日益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因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业已开始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是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倾向取得胜利，而是使民主发展倾向取得胜利。

第三个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得不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这一任务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而革命的胜利本身正取决于这一斗争。很难想像上述情况造成了怎样的矛盾条件。例如，在我们的同志领导着农会的一些县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国民军同军阀作战，许多大地主和豪绅出于某种原因，由于老的关系，同情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不久前还是军阀）。作为游击战中心的农会同这些地主结成联盟，而地主也拥有武装，过去是镇压农民的；结果在农村农民、地主和豪绅之间形成了统一战线。当你在我们同志的报告中看到这些东西，或者（更糟糕）在中央的报告中看到对这些情况的总结并建议根据上述原则在农村建立统一战线^①时，你就会明白，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革命力量联盟方面的任务也很复杂很艰巨，那里常常不得不同亲日派资产阶级携手来反对亲英派或其他派别的资产阶级。如果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再加上共产党还要在国民党内进行周旋的困难〔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和由自己（共产党人）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

但是，如果能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那么所有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而在这方面，应当承认，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并不是我们不明白革命的动力或者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倾向——这些问题是清楚的，而主要的是现在，在现阶段，运动直接向何处去。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需要加以明确，资产阶级现时的作用问题和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也是一样，必须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继这封信之后，我们给你们寄去在上次中央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党问题^①和农民问题的报告^②。此外，我们还通过这次邮件给你们寄去我们向中央建议的并在上次会议上协商一致的农民政纲草案^③。从这些材料中你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我们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使你们认真注意到动用我们党的强大力量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以便给中国党以应有的指导，帮助它达到符合日益发展的革命的越来越复杂的任务要求的理论高度。

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前夕，我们同中央一起起草了关于党纲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纲领草案的基础，将由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纲领委员会进行讨论。

要是布哈林同志先在问题的提法上给我们一些总的指示，然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422—430页。

② 见第123号文件。

③ 见本书第616页注①。

后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再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示，那就太好了。

现在我有以下两点具体建议：

1. 派我党中央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包括中共的政策，因为在中国很难分清对国民党的指导、对中共的指导和国民政府的指导，国民政府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局。

2. 给中共发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和关于农民运动采取的口号问题的秘密指示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附言：昨天开完中央会议后，我们大家还是决定派一人去莫斯科报告情况并参加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记录^①附上。

格·维·^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81—85 页。

打字稿，原件，正文下面和附言下面均为亲笔签字。

① 见第 122 号文件。

② Г. И. 维经斯基。

1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年11月10日于上海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 第×号记录^①

出席：老头子、彼得罗夫、谢尔盖、切尔尼亚克、年轻人和加^②。

听取：1. 加关于日本形势的报告。

2. 关于给加伦^③同志的政治指示。

决定：1. 备案待查。

2. (1) 答复加伦，总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彻底消灭孙传芳。

(2) 作为我们的意见，在信中阐述从老头子的报告^④中可以得出的前景。

(3) 等接到莫斯科的答复后再发出指示。

(4) 将我们的意见电告莫斯科和广州。

① 记录编号没有注明。

② 分别为：陈独秀、彭述之、Г. Н. 维经斯基、Т. Г. 曼达良、Н. А. 福京、加可能是加藤（佐野学）。

③ В. К. 布留赫尔。

④ 看来是指陈独秀在1926年11月5—6日在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5) 责成陈独秀和格里高里^①起草信和电报。

(6) 浙江之行的问题暂缓解决。

听取：3. 关于在湖北和江西的政治领导方式问题。

决定：3. (1) 给邓同志^②指出，湖北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没有唐生智参加是无法进行的。而让唐生智参加委员会就意味着把整个政治领导交到唐手里。因此，建议我们的同志撤销关于在湖北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问题。

(2) 一旦徐谦去湖北，我们的同志应竭力减少徐和唐之间的冲突。

(3) 指示广州和湖北必须加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4) 已拟定的湖北政府组成人员从 11 人削减到 9 人，徐谦和陈公博不参加。

(5) 部长分配作以下变动：由湖北人担任内政部长。

(6) 如果占领江西后蒋介石留在江西，那就让他担任省的临时政府首脑，让第二军和第六军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如果他离开，那么临时政府就由第二军的代表组成。

注：作出 (1)、(2)、(6) 这些决定的目的是防止国民军内部发生冲突和巩固国民党左派的地位。

(2) 湖北的同志应当在广州批准后执行这些决定。

听取：4. 关于汪精卫回来的问题。

决定：〔4〕同意中央发出的信^③。

听取：5. 关于工会代表会议。

决定：5. 责成中央审议呈报开支的预算。

远东局秘书 旦科^④

① I. H. 维经斯基。

② 可能是邓演达。

③ 信没有找到。

④ II. A. 福京。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138—139 页。
打字稿，副本。

1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7 号 （特字第 50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1 月 11 日于莫斯科

听取：〔8〕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8〕1.（1）认为远东局对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

（2）认为用远东局采取的方式复制多份共产党广州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做法是等于公布这些记录^①，这在目前条件下是个严重的和不能容忍的错误。

（3）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

（4）建议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通报。

2. 在任命驻北京全权代表以前，让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3. 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

^① 见第 124 号文件。

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如在这些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则交由莫斯科解决。

鲍罗廷同志和远东局在这些问题上的一切措施和倡议都必须通报莫斯科的驻京代表。

4. 认为任命鲍罗廷同志为驻广州的正式代表是不合适的。在任命我们驻广州政府的正式代表以前，鲍罗廷同志仍负责隶属于广州的各省的工作。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提出适当的人选交政治局批准。

5. 鉴于有必要依靠湖北工人的同情和尽快成立华中中的行政机构，认为现在在占领浙江和南昌的时候，可以不反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至汉口。

6. 不反对在中国成立俄语培训班，以便让中国学生进入我们的高等学校。

由中国委员会确定可能向中国人提供的高等学校接收名额，并预先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同志只能在这个限额内接收。

成立培训班的费用和中国学生在苏联的生活费用应完全由中国负担。

7. 认为由国民党任命一名驻巴黎的代表是合适的。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3—1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摘 录)

1926年11月15日于上海

俄国代表团会议第×号记录^①

出席：谢尔盖、切尔尼亚克、年轻人^②。

听取：1. 关于莫斯科的电报^③。

决定：1. 向上级机关提出关于必须派一名权威代表来中国协调各单位的工作的问题。

听取：2. 关于上海和汉口的罢工。

决定：2. 在同中央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讨论。

听取：3. 爪哇事件。

决定：3. (1) 征询莫斯科的意见，如果起义继续进行的话，如何对待爪哇的同志^④。

(2) 认为派法国人^⑤去爪哇取得情报资料是合适的。

(3) 请中共中央派人去爪哇以便在新加坡的爪哇同志同爪哇

① 记录编号没有注明。

② 分别为：Г. Н. 维经斯基、Т. П. 曼达良、И. А. 福京。

③ 见第127号文件。

④ 何人不详。

⑤ 让·杜克鲁。

中央建立联系^①。

远东局书记 旦科^②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9，第 65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8 号 （特字第 51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1 月 18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 〔1〕（1）建议今天就打电报给萨夫拉索夫同志让他提出辞呈，辞职的理由是督办对他的工作的评价，对他来说是侮辱性的，因此他不可能再继续工作^③。

（2）立即任命拉舍维奇同志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并在萨夫拉索夫同志提出辞呈后立即公布对他的任命。

（3）责成拉舍维奇同志立即根据契切林同志指示精神发表谈

① 指的是 1926 年 11 月—1927 年 1 月由伊斯兰教联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荷属印度的爪哇群岛和苏门答腊组织的起义。

② H. A. 福京。

③ 详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9 卷第 549 页。

话，并在报纸上刊登。刊登的日期根据契切林同志的指示定。

(4)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制定铁路问题的具体让步计划，今天夜里就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

(5) 鉴于业已变化的形势把与奉天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提上了日程，注意到冯^①看来不得不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北京方面，认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进一步加强冯在南面的军队是不合适的。

(6) 广州目前向北挺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并使张作霖脱离奉天，哪怕以江苏中立为代价。有鉴于此，建议鲍罗廷同志和加伦同志^② 劝告国民政府占领浙江并继续谨慎地向安徽推进，但不要同张宗昌发生武装冲突。同时，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极有必要把阎锡山吸引到南方人这边来或者使他保持中立。建议国民政府通过冯或同他协商就阎锡山转到国民政府方面来的问题进行谈判，保证他在山西的督办地位。

鉴于于右任和冯之间存在着摩擦，责成鲍罗廷同志向国民党中央指出，必须注意使这些摩擦不致发展，并采取措施加以消除。建议我们在华的负责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防止产生意见分歧。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1)、(2)；拉舍维奇——(1)、(2)、(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冯玉祥。

② B. K. 布留赫尔。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4, 第 15—16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

1926 年 11 月 20 日于上海

远东局和中央联席会议第×号记录^①

出席：老头子、谢尔盖、克拉辛、切尔尼亚克、年轻人、彼得罗夫、皮奥斯特雷、诺尔穆斯^②。

听取：1. 军事政治形势和国民政府的任务。报告人：老头子。

决定：1. 认为由于奉天反对冯玉祥的侵略计划，目前的北伐可能不得不继续向北推进，因此必须：

(1) 争取冯同阎锡山达成协议，保证他在山西的督办地位。

(2) 不阻挠张宗昌占领江苏。

(3) 竭力争取尽快消灭孙传芳，占领浙江。

(4) 建议冯不要将自己的主力部队向东南方向调动，而要集中在包头，以便对付北方可能发动的攻势。

2. 认为国民政府无论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还是对国内军阀的

^① 记录编号没有注明。

^② 分别为：陈独秀、Г. И. 维经斯基、陈乔年、Т. П. 曼达良、Н. А. 福京、彭述之。皮奥斯特雷和诺尔穆斯化名系何人不详，可能是李立三和何松林。

外交政策的作用现在都要比占领江苏以前大得多，因此必须：

(1) 继续同日本代表进行谈判，由国民政府派自己的代表去日本。

(2) 对英国继续采取强硬方针，同时利用英国内部的斗争来反对保守党政府，向工人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阐明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性质。因此，认为派社会团体的代表团去英国是合适的，并事先就此事同国民党中央达成协议。

(3) 通过各种办法孤立和分化奉天，在这方面要采取坚定不移的方针。

第2项（内部性质）注：

让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注意，对国民政府以及红色军阀（唐生智等人）的外交活动必须采取警觉态度，以防备有损于国民革命运动利益的幕后阴谋。

3. 认为目前巩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的成果对国民革命的未来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在动员党的一切力量来组织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同时，把这个问题和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

听取：2. 职工运动问题。报告人：切尔尼亚克。

决定：2. (1) 随着国民政府的影响向新的地区的扩展和国民革命斗争的展开，资产阶级对解放运动产生影响的趋势也在增长。

(2) 在解放运动的现阶段，两种倾向——革命民主倾向和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组织性和战斗力。

(3) 我们党的工人政策和实践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应具有鲜明性、坚定性和阶级性（即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纯洁性）的特点。

(4) 为了把党提高到这项头等重要任务的高度，中央在目前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 向全党提醒不太注意工会中的组织工作和经常性的正确

工作的危险性，以及倾向于搞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的危险性，应当用明确的、正确的阶级政策同这些倾向的种种表现进行斗争。

2. 在中央下面成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常设工会委员会。

(3) 对所有工会工作人员进行登记并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把他们放到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去。

(4) 采取从先进工人中选拔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的方针，实行这一方针时不要畏首畏尾。

(5) 成立由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学校，名义上隶属于工会。

(6) 认为有必要起草工人的具体要求纲领，这个纲领对一些省份来说既是共同的又有所区别。

(7) 选出委员会，其成员有：切尔尼亚克、李^①、何^②和李到来前的彼得罗夫，以便筹备即将在汉口召开的代表会议^③和起草向党代会提交的提纲。

(8) 委员会还要对广州发生仲裁事件的原因进行调查，并寻求适用于仲裁的相应说法。

远东局秘书 旦科^④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7，第 140—14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李立三。

② 何松林。

③ 看来是指召开湖北省的工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

④ H. A. 福京。

131

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

1926年11月22日于南昌

致张国焘同志

抄送中央和格里高里同志^①

亲爱的同志：

1. 您11月17日给中央的信的副本已收到，我认为有必要对信的内容作一些说明。蒋介石决定取消总司令称号是根据11日的决议^②作出的。

2. 王若飞向您转告的关于蒋介石希望让汪精卫在军事委员会中担任自己副手的事是不准确的。王若飞参加了我和邓演达的谈话。马祖林同志^③在翻译我们的谈话时，没有很准确地理解邓演达说的意思。第二天早晨，在邓演达那里澄清这个问题时，邓演达说，蒋介石没有这样说，他认为，一旦汪精卫回来，汪应当负责党的事务，即党务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在军事委员会中担任蒋介石的副手。

3. 我不完全同意您反对政府迁往武汉的理由。我不认为，在武汉，政府的威信会降低。我认为，正是在武汉，政府将易于解

① E. H. 维经斯基。

② 11日的决议不详。

③ M. M. 阿布拉姆松。

决与北方有关的问题。至于唐^①，我想不会同他发生冲突。现在唐的处境与在江西消灭孙^②以前有所不同。他已失去孙这个一旦发生冲突可以依靠的盟友。现在他的战略地位不同了，已经急剧恶化了。在东南面有国民军，在西北面有冯^③的军队，在广州有谭延闿，在江西的西面有程潜。在北面有奉系，他与奉系发生关系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最后，在武昌有第4军。如果您把所有这一切放在中国的邮政图上，你就会看到唐的处境没有过去那样的独立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同日本人结成联盟也不能保证他不被击溃，如果国民政府需要这样做的话。

蒋介石还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我们也不会告诉他这一点。至于唐，他是个狡猾的家伙，我上面说的情况他已经明白。在这方面，您可以找一找他向您献媚的原因，找一找说明他之所以含糊地表示愿意解除他前线总指挥职务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来到九江，立即去找贺耀祖，同他像同最要好的朋友那样折腾了两天。由于这些原因，他也不反对政府迁往南昌。我甚至以为，可能他会建议将总司令部迁往武汉。他给我发电报请求尽快派顾问来也说明了这一点。

他还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他的这些愿望促使他同左派调情。唐是个狡猾的、现实的军事政客。他看到，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变他在武昌城下已经习惯了的政策和策略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到了国民政府的威望出现危机的时候。他看到，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寻求盟友的时候，于是他到处寻找，从左派到日本人一无例外。

唐很狡猾，但他没有考虑到，我们也不是草包。他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忽略了他现在的处境。我相信，他现在会经常同您来往并改变态度，但是一旦处境有所改变，他就会改变对

① 唐生智。
② 孙传芳。
③ 冯玉祥。

您的策略，如果蒋介石犯一个大错误，使唐的盟友增多，那就可能是这样。这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应当采取使唐化为乌有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会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特别是现在需要唐。之所以需要唐是要将他作为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力量。需要通过唐掌握蒋介石。为此，他应当在军事委员会里，在国民军中和在政府里占居所需的位置。但为了扮演这个角色，他应当有适当的力量。不能让他从这种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力量变成能够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力量。依我看，我们的策略——对唐的态度和支持就应取决于这一点。

4. 您来信说，总司令变成了湖北的皇帝，而他的代表邓演达变成了首相。依我看，这是不对的。唐在湖北和湖南还有很多权力。您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事实如此。至于您所说的皇帝，他还没有明白这一点，这也是好事。我们应当注意使他不了解这一点。

我们把唐置于这种客观上限制他的框框之内，有没有什么坏处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坏处，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向中央负责。为什么说这没有坏处呢，这是因为现在这里形成的局势使我们有可能提出河南人^①在国民政府执政下的集中问题，有可能通过在军队中建立集中供给的办法造成军队的某种集中。为了同奉天进行斗争也需要这样做。军队实行集中和统一供给、统一财政将意味着政权掌握在国民政府手里。因此我特别建议不要急于把湖北的经费划分成地方的和政府的预算。我之所以建议这样做，是因为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不要急于这样做，以免失算。您在信中说：“唐说得对：湖北人当中有人说得好听，但是爱钱如命。”我认为，唐的这些话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

致同志般的敬礼

您的 加伦^②

①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湖南人。

② B. K. 布留赫尔。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馆藏文献。

打字稿，副本。

132

联共（布）中央会议第71号 （特字第53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11月25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6年11月11日会议第67号记录，决定：2（8）），（报告人：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 〔2〕（1）责成拉舍维奇同志于今年11月27日星期六去哈尔滨。

（2）给鲍罗廷、加伦^①、隆格瓦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近日来的事态证明最高领导机构预先估计到的奉天—山东人进攻疲惫的南方人军队的危险性（10月22日密电第619号）^②是符合实际的。还出现了包头国民军部队的实际威胁。

“我们深信，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国民革命军的英勇部队和指挥官今后一定会英勇地击退看来不可避免的北方人的进攻。

“然而，考虑到在战斗中已蒙受巨大损失的广州军队各主要军团的内部状况，以及蒋介石和同路人之间的摩擦，目前的任务是：

^① B. K. 在留赫尔。

^② 见第117号文件。

(1) 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来整顿秩序和补充部队；(2) 加强军队中，特别是同路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3) 必须劝告国民党中央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来消除或者哪怕是缓和蒋介石、唐生智和其他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临近的联合起来的北方人的进攻危险迫切要求必须消除国民革命军军事首脑之间的纠纷。梅津采夫。”

(3)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政治局 1926 年 11 月 11 日的决定（第 67 号记录，决定：2——〔8〕），组织局根据政治局 1926 年 11 月 4 日的决定（第 66 号记录，决定：2——〔2〕）^① 在下次政治局会议前提出担任驻广州的正式代表和三名政工人员的人选名单。

(4) 认为有必要给在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日寄来贺信的中国人复信，以（1）红军和（2）所有接到贺信的其他同志的名义回复。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分送复信草稿。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决定：（1）；

拉舍维奇同志——决定：（1）；

伏罗希洛夫同志——决定：（2）、（4）；

格伊同志——决定：（3）；

组织局——决定：（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24—2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第 121 号和第 127 号文件。

13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6年11月25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在今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国民党执委会委员胡汉民同志曾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①。同时他还递交了关于孙文主义历史和国民党宗旨的报告^②。经讨论后，扩大全会主席团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加入共产国际没有任何障碍，但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必须避免出现一切可能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造成麻烦的因素；由此可见，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到来^③。

国民党执委会的看法是，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既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革命的形势。从那时起的9个月来，中国的革命运动虽已取得成绩，但还需要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取得全国的统一。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统一战线，以便消灭军阀，然后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国民党认为，共产国际至今还不认为有必要讨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然而，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同志们却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能满足于得到革命者纯道义上的同情。他们认为，国民党

① 见第18号文件。
② 报告没有找到。
③ 见第24号文件。

应当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保持联系，向它学习革命的策略。此外，由于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克服两党内部的“幼稚病”。有鉴于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国民党派我到这里来，委托我求教于你们。

关于孙文主义，关于国民党的历史和意向，胡汉民同志详细地作了报告，因此重复将是多余的。有些左派同志担心，国民党由于其混杂的阶级构成和缺乏固定的阶级基础将来可能向右转并背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尽管它现在涂着左的色彩。依我看来，必须加强和巩固国民党左派，那时就可以不担心党向右转了。

就拿国民党发展的历史来说吧：早在国民党成立以前，孙中山就组织了兴中会和同盟会^①，这些组织的成员就是从基层民众中和侨民中以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和逃往国外的工人中吸收来的。从同盟会成立到国民党改组（1924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数增加了，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革命化。从1924年起，国民党开始特别注意在工农中做工作，因为它明白，只有在工农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国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应当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人士，来加强国民革命阵线，进行反帝的共同斗争。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忘记工农的利益，从来没有同反革命派实行妥协。目前中国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研究系”，这是一个学院式的政党^②。国民党正在同它作斗争。我们认为，加强国民党左派，对党来说这意味着前进一大步，即使部分右派同志离开党。

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吴佩孚的灭亡和对帝国主义者的打击；它也意味着，随着国民革命军势力范围的扩大，被压迫

^① 指孙中山创立的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兴中会”和“同盟会”两个革命团体，分别存在于1894—1905年和1905—1912年。

^② 指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的研究系。

群众的权力在增长。这是中国革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广州进行动员的初期，许多人曾认为，北伐的政策意味着右的危险，因为党的政策可能被军事发动所动摇。现在这种推测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湖南省的农民组织和武昌、汉口的工会组织在北伐胜利后得到很大加强。国民党的现时纲领是在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通过的^①，恰恰是在国民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

尽管如此，在北伐胜利后也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例如，归顺国民党的新的军队缺乏政治素养。军队的力量增长迅速，以致对它的粮食供应成了难题。一些机会主义官僚和政客归顺了我们，可能会阻碍实施我们的纲领和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必须竭尽全力来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今年的“三二〇事件”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因为即使最优秀的革命家也会犯错误。但是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得出相应的结论。事实表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变得比以往更加密切。戴季陶同志去年还怀疑共产党人，写文章说必须制定国民党的意识形态^②，这一点被右派利用了，现在他相信自己犯了错误，并强调指出，国民党应当同共产党合作，冲突应当加以消除。这是国民党取得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内都有一些人有“幼稚病”，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应当加以纠正，这样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就能得到保证。

国民党强烈希望与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建议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当在所有党的事务和革命策略问题上给党以忠告和指导。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当参加国际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还希望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密切的合作。我请求共产国

① 见本书第495页注②。

② 指戴季陶1925年发表的文章：《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际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角度审议这个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他们应当加以注意的重要事项，并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他们的工作中应遵循的相应指示，如果共产国际也给国民党发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方面的指示，我将代表国民党予以接受。

我在这里谨代表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及其下属革命组织给予我们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

世界革命的领袖共产国际万岁！

致革命的敬礼

国民党代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3，第 51—55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

作者 =

页数 = 639

SS号 = 10273188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第一部分：因国民军失败和“三二一事件”而实行的“喘息”政策

1. 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1926年1月4日）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特字第1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7日）
3. 古比雪夫给叶戈罗夫的信（摘录）（1926年1月13日）
4. 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
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特字第2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14日）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1日）
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3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1日）
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5日）
9. 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1926年1月26日）
10. 拉菲斯同胡汉民关于中东铁路冲突问题的谈话记录（1926年1月26日）
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号（特字第4号）记录（摘录）（1926年1月28日）
12.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不晚于1926年2月3日）
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号记录（1926年2月4日）
14. 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1926年2月8日）
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摘录）（1926年2月10日）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号记录（摘录）（1926年2月11日）
17.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
18. 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提要（1926年2月13日）
19. 斯大林给联共（布）领导成员的信（1926年2月16日）
20. 维经斯基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1926年2月16日）
21.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
22. 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2月17日）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1926年2月18日）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2月25日）

25.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 (1926年3月2日)
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4日)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特字第9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4日)
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4号(特字第10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11日)
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18日)
30.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
31.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
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7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25日)
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7号(特字第12号)记录(摘录)(1926年3月25日)
34. 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
3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1日)
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1日)
37. 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26年4月3日)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0号(特字第14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15日)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22日)
40.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4月23日)
41. 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
42. 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
43. 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5日)
44. 维经斯基给契切林的信(1926年4月26日)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26年4月27日)
4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
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摘录)(1926年4月29日)
48. 胡汉民就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报告(摘录)(1926年5月3日)
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3号(特字第17号)记录(摘录)(1926年5月6日)
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特字第18号)记录(摘录)(1926年5月6日)
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特字第19号)记录(摘录)(1926年5月13日)
52.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6年5月17日)
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摘

- 录) (1926年5月20日)
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8号(特字第22号)记录(摘录) (1926年5月27日)
55.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 (1926年5月30日)
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2号(特字第24号)记录(摘录) (1926年6月7日)
- 第二部分: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探索
57.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7日)
58.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11日)
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
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21日)
6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6月21日)
62. 拉狄克《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1926年6月22日)
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
64.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
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0次会议第4号记录(摘录) (1926年7月4日)
66.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摘录) (1926年7月6日)
67. 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
68.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便函(1926年7月8日)
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3次会议第7号记录(1926年7月14日)
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4次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7月15日)
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5次会议第9号记录(摘录) (1926年7月17日)
72.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摘录) (1926年7月18日)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17次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 (1926年7月23日)
75.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7月24日)
76. 鲍罗廷同蒋介石的谈话记录(1926年7月26日)
77.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6年7月27日)
-)
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5号(特字第33号)记录(摘录) (1926年8月5日)
7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

1926年8月9日)

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关于广州局势问题的初步结论(1926年8月9日)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议记录(1926年8月12日)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议记录(1926年8月15日)

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

84.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1926年8月17日)

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19日)

8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20日)

87.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26日)

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9号(特字第37号)记录(摘录)(1926年8月26日)

89.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1926年8月31日)

90. 拉狄克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1926年8月31日)

91. 拉菲斯对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在广州工作情况的材料的总的意见(1926年9月1日)

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0号(特字第38号)记录(摘录)(1926年9月2日)

9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24次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1926年9月11日)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

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6年9月12日)

97. 鲍罗廷给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9月15日)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16日)

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

1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特字第44号)记录(摘录)(1926年9月16日)

101.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不晚于1926年9月16日)

1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9号记录(摘录)(1926年9月18、19、21日)

10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不晚于1926年9月22日)

104.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2日)
106.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7月19日至9月22日期间工作情况的第2号总结报告(摘录)(1926年9月22日)
107.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1926年9月23日)
108.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3日)
109.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9月23日)
110. 福京给某些人的书信(摘录)(1926年9月25日、11月4日、12月18日)
111. 拉狄克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6年9月28日)
1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布留赫尔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的通报(1926年10月7日)
1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1号(特字第45号)记录(摘录)(1926年10月14日)
114. 拉菲斯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6年10月15日)
1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摘录)(1926年10月15至18日)
1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7号记录(1926年10月19日)
1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和64号(特字第47号)记录(摘录)(1926年10月20日和21日)
118.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6年10月22日)
1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10月28日)
1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5号(特字第48号)记录(摘录)(1926年10月29日)
1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特字第49号)记录(摘录)(1926年11月4日)
1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摘录)(1926年11月5日)
123.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6年11月5至6日)
124.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11月6日)
125.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
1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1月10日)
1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特字第50号)记录(摘录)(1926年11月11日)
1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摘录)(1926年11月15日)
1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特字第51号)记录(摘录)(1926年11月18日)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1月20日)

131. 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1926年11月22日)

132. 联共(布)中央会议第71号(特字第53号)记录(摘录)(1926年11月25日)

13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11月25日)

)
附录页